

一八五七——一八六〇年 俄国在远东的扩张

〔英〕 R. K. I. 奎斯特德著



商 务 印 书 馆



一八五七——一八六〇年

俄国在远东的扩张

〔英〕 R. K. I. 奎斯特德著

陈霞飞 译

陈泽宪 校

陈霞飞
同校

1979年
陈霞飞

商务印书馆

1979年·北京

**THE EXPANSION OF RUSSIA
IN EAST ASIA 1857—1860**

by *R. K. I. Quested*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Singapore, 1968

Quested

一八五七——一八六〇年

俄国在远东的扩张

[英] R. K. I. 奎斯特德著

陈霞飞 译

陈泽宪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9 1/4, 印张 227 千字

1979 年 12 月第 1 版 197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800 册

统一书号: 11017·455 定价: 0.90 元

目 录

绪 言	1
绪言附记	17
第一章 1792 年至 1857 年俄中关系的背景	19
第二章 1857 年 1 月至 1858 年 7 月: 普提雅廷的使命 与《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	77
第三章 1858 年 7 月至 1859 年 6 月: 彼罗夫斯基的使 命,《天津条约》的互换,与《瑷珲条约》之被中国 废除	160
第四章 1859 年 6 月至 1861 年 1 月: 伊格纳提耶夫的 使命与《北京条约》	197
结 论	271
书 目	281
人地名对照表	289
译后记	298

绪 言

俄国和中国的关系在今天的国际事务中，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极其重要的问题。不知道它过去的历史，就不能充分理解它的现状。虽然对于两国本身，这种关系长期以来只是些无关大局的、细微末节的事务，在世界政权的中心它也只引起轻微的震动。可是，近年来，这种关系却涌入了全球大事的主流之中，就使得对这一内容非常迷人的题目作一个回顾，甚至追溯到较远年代，增添了重要性。

然而，中俄关系的历史，迄今尚未得到它所应得的充分研究。目前虽然业已存在一定数量关于俄中关系的一般论述，其中多数是中文的，但是，引用全部现存可资运用的资料而撰写的学术性通史仍未出现。同时，用欧洲语言对特定时期所作的详细专题论著也比较少，用远东语言写的就更加罕见了。

关于下至 1792 年的早期历史，已经由历史学家们使用俄国方面的资料，作过相当的研究。可是，在使用中国资料方面，尽管现在已有塞比斯神甫对尼布楚条约的出色研究，但需要做的工作还是很多。巴德利编：《俄国、蒙古、中国》和加恩著：《彼得大帝时代的俄中关系史》这两部极有价值的书已对 1617—1725 年阶段作了概括。但是，这两部书都是只用俄国档案资料为基础。书中那怕就象雅克萨战斗与尼布楚谈判，从俄国方面来说，事情也不是都讲得清清楚楚的^①。班蒂什-卡缅斯基所编：《1617—1792 年俄中外交》^{viii}

^① 雅可夫列娃著：《16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1958 年莫斯科版，是从俄国方面研究尼布楚条约的著作；另外，文森特·陈在 1967 年出版了一部有关十七世纪的新书。

资料汇编》有着无比的重要性，它差不多把那些年两国间外交函件全部汇集到一起了。库尔茨教授 1929 年在哈尔科夫大学出版了有关此一时期饶有兴味的著作：《十六、十七、十八世纪的俄中关系》。这是一部讲俄国政府垄断它对中国贸易的书，只是它们差不多也全是以俄国材料为主。十九世纪还有一本以这一时期为主的特鲁塞维奇写的《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它把库尔茨书中没有提到的资料搜集进去了。可是，它不如上面提及的那些书那么有用。

关于 1792 年以后俄中关系历史的著作就出版得更少。1857 年柯尔萨克著的《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是一部下至十九世纪中叶，涉及全部俄中贸易的历史书，而苏联作家斯拉德科夫斯基的苏中经济关系概要，从开始讲到 1955 年，算是一本当年出版的新书，而就政治历史而论，关于这一时期，还未曾有过一本能象论述早期那样详尽的书。1919 年胡世泽在巴黎大学所写的博士论文《近代俄中关系的条约根据》，试图在没有中文材料而俄国材料又很少的情况下，把 1850—1881 年间的事，加以概括论述。另外，还有 1949 年 P.I. 卡巴诺夫在莫斯科大学提出的题为《阿穆尔^①问题及其解决》的博士论文，但只有它的第一部分陈列在列宁图书馆供公众使用，其内容论述穆拉维约夫在国内经历的各个方面，和俄国人在这地区早期的开发活动。它的第二部分，讲到穆拉维约夫时代俄中关系的却不出借（后面将进一步涉及）。1959 年卡巴诺夫在布拉戈维申斯克^② 出版了一本叫《阿穆尔问题》的书。把他的博士论文的第一、二两部分作了压缩。只是，内容一经压缩，大家所不知道的东西就所剩无几了。ix 坂野正高与马克·曼考尔依据中国档案把伊格纳提耶夫使团的部分有趣的材料加以印行。对 1881 年伊犁事件有一篇短文登在 1936 年的《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上，它用的仅

① 即黑龙江。——译者

② 即海兰泡。——译者

仅是中文和英文资料。左舜生在《中国近百年史资料》^①卷I中也收有伊犁谈判的资料，纳罗奇尼次基所著：《1860—1895年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是从俄文资料中对1861—1895年代所作的有份量的概述。最后，罗曼诺夫题为《俄国在满洲》的书，研究了1895—1905年俄国的对华政策有头等的重要性。可惜，它仅仅依据财政部的档案，而未及于俄国其他任何档案，更没有别国的任何资料。

1905年以后的大部分年代迄今尚未为历史学家所涉足。间或有此种著作问世，虽然质量很高，但大多不以档案材料为依据。惟一特殊的例外，那就是台湾将1917—1920年俄中边界关系的档案印行了。它包含了大量有价值的原始材料，可供进行学术研究。

日本人也进行了许多俄中关系的研究，主要涉及的是关于日本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从政治上闭关自守中走出来之后出现的事件。但是，除坂野正高所著：《中国和西方》中的有关各章之外，据现在所知，都未译成其他文字，而且显然没有一本书曾对本书所涉及的年代提供过详细的论述。^②

俄中外交关系史中的几个空白阶段当中，再没有比1857—1860年间俄国攫取沿阿穆尔河和滨海各省时期更为引人兴趣和文献更丰富的了。尽管有过坂野正高和曼考尔合写的有价值的著作，这一阶段迄今仍然是未经全面和详细地考察过的。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毋需加以强调的。因为，这一片辽阔土地落入俄国之手，肯定是远东历史上有决定意义的大事之一。同时，也可以证明这件事是中国在它不久以前的衰弱时期所受创伤

① 此书正在付印时，徐中约研究伊犁事件的一本新作刚才问世，同时，沙俄对外政策的一本新的文件汇编正在莫斯科发行。

② 可惜我不懂日文，无法亲自阅读它。

中最为持久的。外国历次入侵的创疼,即使是上次的对日战争,都已经愈合了。数目浩大的赔款也不过是在中国经济落后的大海多添几吨水罢了。而且这种落后状态她也正在克服之中。台湾归根结底也是在中国人民手里。伊犁和外蒙古价值比较次要,其他的边缘地方都已完全收复了。可是,难以想像,丢失给俄国的富饶的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的土地,除非经过重大的变乱,它怎能改变过来!对俄国来说,这次征服的影响是诱使她以巨大的代价,成为一个既是欧洲的又是太平洋的强国,并承受这样做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它使俄国自此以后陷身于满洲的纠纷和对日本的战争之中,因而对于俄国革命的发展也有重大的关系。从较短期的角度来看,俄国吞并这一片地区标志着满洲遭到瓜分的第一阶段。所有这些已为人所周知,这里就无须着重地谈它了。

因此,本书的意图是:在有更多的档案公布于世,人们能够据以写出更翔实的信史之前,先行填补历史知识中的这一空档。

作者的目标在于提出一幅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的清晰全景,而又尽可能不重复学者们已从用欧洲各种文字出版的著作中见到的那些片断资料。对于自1857年1月至1858年7月这一阶段,作者试图详尽论述迄今未被人所熟悉的普提雅廷出使中国的经过,以及中俄两方在阿穆尔河地区的相互关系和中国方面在北京制定对俄策略的过程,正如在中国档案中和巴拉第书信及回忆录中所反映的那样。同样的处理方式也应用于彼罗夫斯基出使中国的阶段,即约自1858年7月至1859年6月期间,虽然关于彼罗夫斯基活动的资料比普提雅廷的少。对于伊格纳提耶夫自1859年6月至1860年末出使中国,则只介绍了一个轮廓,仅对迄今尚未作过

xi 应有诠释的特殊事项详加叙述。这是因为:坂野正高已经依据中国档案,对于伊格纳提耶夫与中国人的一部分关系作了说明。伊格纳提耶夫本人在《伊格纳提耶夫将军于1861年1月给外交部亚

洲司长关于他出使中国期间外交关系的总结报告》^①，与《有关伊格纳提耶夫出使中国的材料》^②中为自己的出使经过留下详尽的记述。关于这一时期，我提供了相当数量关于中俄两方在沿阿穆尔河和滨海地区相互关系的资料，这些，以前都还未从中文译出过。最后，我整整四年，即自1857年1月至1860年12月，试图从各有关档案把英、法、美三国对于俄国在远东活动所采取的政策，特别重点是英国的政策加以叙述。因为，这与俄国人之得以成功是大有关系的。

关于1792—1857年间俄中政治关系历史的连贯性记录从未公布。为使本书不致凭空立论，我在书的开头处为这些年月写了第一章，用以引出端绪。无庸讳言，这一章不过是个简略的提纲，所依据的是第二手资料和少量中国档案。可是希望它能有助于恰当地看到全书的主要部分。

至于1857—1960年间的资料，我有幸接触到大量的中文和俄文文件。中国档案《筹办夷务始末》出版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③，几乎把1836到1874年间俄中之间来往的外交函件统统包括在内，那一期间有关俄国的谕旨与奏折，也差不多是全的。这是所有已出版的中国档案中最丰富与最翔实的一种，历史家们一致认为它极有价值。斯威舍在《中国办理美夷事务的经过》一书中把《筹办夷务始末》放在其他的书一起作了评价。他这本书内从《筹办夷务始末》中，译出了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谈判期间有关俄、美两方的某些文件。收在《筹办夷务始末》中的很多关于俄国的资料从未自

① 本书以后各章均简称为《报告》。——译者

② 本书以后各章均简称为《材料》。——译者

③ 我没有使用《筹办夷务始末》的索引，而是按照全书的年代次序使用它的——因为必须同意吴相湘的意见，索引里面有目无注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即使是《筹办夷务始末》，似乎也没有把当时的有关文件全都包括进去。难以想象，那些有奏折收入此书的官员们彼此间从不互通私人信件。可惜这类私信从来未见发表过。

中文译出过,以致,许多研究俄国历史的学者也没有利用过。另一本中国档案《东华录》,载有《筹办夷务始末》中未载入的少数奏折与谕旨,这些也一直没翻译过。卷帙浩繁的《大清历朝实录》除了作为当代中国状况某些方面的背景材料外,别无用处。书内有关俄国的文件,《筹办夷务始末》内已经应有尽有,而且实录中的某些文件是经过节略或篡改的,把其中侮辱外国人的词句之类删去或改换了。

可惜,人物传记令人失望。他们不把跟俄国人打过交道的人士的观点载入其内,这些人似乎谁也没有写过回忆录。我得以参考的唯一的一本,是追随过曾国藩级别较低的御史叫尹耕云的回忆录,看上去他没有跟俄国人直接接触过。第一章中我利用了《清代外交史料》,这部书令人失望,不如它的续篇《筹办夷务始末》那样材料丰富。当时中国期刊中可用的只有《京报》,它虽极为重要,里面可能保存许多早期的,但现已罕见的重要的谕旨,不幸我未能得到它作为参考材料。^①

我没有能够使用坂野正高所说现存台湾的中国档案。我自然也无法使用新近才移存英国伦敦档案局,但尚待分类的清代新资料。同一时期还有大量其他中文材料,从中也还可以找到与此接近的资料。但是我相信,凡是现时能够接触到的主要资料来源都已经查过了。

xiii 必须注意的是,中国所有的档案,都是用官样文章的枯燥程式来表达的,翻译之后还需作一定程度的解释。如果照文艺复兴时代安科纳的学者奇里亚科的说法,史家的职责应该是“起死回生”,那末提出这些中文档案,至多不过只能把它们涉及到的死者的骷髅摆出来而已。所幸的是,还有其他的资料可以用来赋予这些骨

^① 本书正在付印,作者休假返回伦敦,此际,我查阅了《京报》,发现其中仅载有关于国内事务的谕旨。

架以血肉。

我未曾接触到俄国方面的档案。虽曾有过一次非官方的接洽,代我请求阅读档案的许可,但没有成功。后来我也再未提过此事。本书撰写到最后部分,临近付印的时候,我交上好运,得到一份用微型胶卷复制的伊格纳提耶夫呈交俄国外交部,并经官方印行的正式报告,其中所涉及的年月是伊格纳提耶夫出使中国的后半期,即1860年5月至12月。从这一来源得到的资料,随即以脚注形式大部分加进本书之内。《红档》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档案摘录。巴尔苏科夫的穆拉维约夫传记里面,也包括很多有趣的文件。1878年度的《俄国档案》载有舒马贺尔的文章,其中收入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材料(这篇文章中没有列举文献,但是所提到的都可从其他来源得到很好的证实)。多亏苏维埃政府自五十年代中期推行的比较自由的政策,使我也能够在写作初期,从列宁图书馆借到本书论及到的事件的几个参与者所写,并已出版的回忆录。这些书的印本即使有过,在西方也已多年无法得到了。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伊格纳提耶夫出使中国的材料》。这个长篇记述曾在1892年匿名发表,但无疑是伊格纳提耶夫亲自写的,其中摘引许多重要信件乃至公文。书的有些地方编排得很乱,但总的来看不失为坦率的,因为有许多事已由其他材料充分证实。再者,这篇材料比伊格纳提耶夫的正式报告要好,它把伊格纳提耶夫出使的全部过程都包括在内了^①。可是,也有一些事情未在这本书中披露。布克斯盖夫登^{xiv}所著《俄国—中国》,第I卷,声称是以文献资料为依据的,但是都未明列出处。书中有些似乎是真的,内容却未见于伊格纳提耶夫的材料或正式报告。而且,他的两本书中有的东西也被他删掉不少,某些地方肯定是不正确的。因此,我以怀疑的态度对待它。巴

^① 《报告》和《材料》彼此在很大程度上互为补充,因为《报告》似少为人所闻,我就从《报告》中吸收了相当多量的材料。

拉第、涅维尔斯科依、司徒卢威、巴布科夫将军（此人在中亚细亚边境与中国接触）的回忆录都已承列宁图书馆借阅。所有这些材料都是1917年以前很久就出版的，它们就不象是曾经为了政治原因而篡改的。除布克斯盖夫登的著作之外，其他都可认为相当可靠。苏维埃时期在俄国出版的两本书，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书目，这就是著名的斯卡奇科夫的《中国书目》，和纳罗奇尼次基的《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中的资料目录。

最后，西方档案中颇有足以阐明谈判的资料。英、法、美三国在这些年月里派驻中国使节的外交文件，已由有关政府公布——或者象法国方面那样，由亨利·科尔迪埃在他所著关于1857—1858年和1859—1860年对华战役的两本书中加以引用。有不少从未发表的机密文件是在英国伦敦档案局、法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档案的微型胶卷拷贝中发现的。英、法、美三国驻圣彼得堡使节的报告同样也找来参考了。这些文件都证明是有意义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件也未曾刊印过^①。进一步的资料也是从微型胶卷拷贝中所得，有的是来自美国1856—1860年派驻阿穆尔地区商务代表所作，但从未公布的报告；有的来自1857—1860年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未经发表的私人日记，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斯托克利文件。我也参阅了英国伦敦档案局所存的罗素手稿，和包德林图书馆所藏克拉伦登手稿，以深入了解那一时期英国上层的对俄政策，
xv 还参考了驻圣彼得堡、北京两地的英国使节与英国外交大臣之间的机密通讯。承蒙现在袭爵的马姆斯伯里伯爵慨允，我到他的庄园上查阅了第三代伯爵留下的文件，但从中找到的资料很少^②。法国外交大臣华留斯基的少量秘密信牍也在法国国家档案局见到了。

① 仅有克兰普顿爵士于1860年11月所作报告曾经付印，以供英国外交部使用。若干年前曾有一份付本赠给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

② 我未能查阅额尔金伯爵的私人函件，如果它还存在的话。

书里也引用一定数量英法方面与 1857—60 年对华战争有关的人物的回忆录和传记，其中都有关于俄国人在华活动的零星记载。这类西方提供的资料，虽然大部分早已公布，但是如果把它们和俄国和中国的资料系统地汇集在一起补充印证，是无法充分利用的。

可惜有少数俄国的第二手著作我未能用上。最主要的就是卡巴诺夫论文的第二部分，与载于 1909 年度《军事文集》，卷 X—XII，季姆钦科-鲁班所写《俄国归并阿穆尔河沿岸、萨哈林和乌苏里地区》。后一著作卡巴诺夫在他的序言中认为是很宝贵的材料，并在他论文神秘的第二部分内加以引用。奥斯登-萨根于 1884 年发表在《圣彼得堡报》上的回忆普提雅廷之行一文，我只见到它的第一部分，而且是印在模糊不清的微型胶卷上的。

引言式的第一章所用资料包括中国档案《筹办夷务始末》和内容不完备的《清代外交史料》，以及有限的英国外交部记录。关于这一题目的俄文第二手著作，有些现已找不到，涉及到这一题目的俄国档案则差不多没有。此外还有其他关于这一时期的中文资料散存世界各地的图书馆^①，不过鉴于它们的重要性较小，就决定不多花时间去查找了。

所以说资料是不完备的，但都可靠，并且足够为这一题目提供一个比迄今为止用任何一种文字写出的作品更为充实的记录。尽管如此，这本书仍然不免随时失去价值，由在俄国或中国出版，根据俄国档案和后续公布的中国档案以及回忆录（它们肯定是存在的）中新的资料写出的著作所替代。有迹象表明，它对俄国或中国的出版者来说，未必是一个受人欢迎的题目。中俄两国的学者和出版工作者的态度确实是整个问题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方面。因 xvi

① 见傅乐淑为迄至 1820 年时期所作的出色的书目提要。

此,在这里应该联带地谈谈。

显然,关于俄国占领阿穆尔河和滨海省的回忆,从来不是造成中俄关系和谐的因素,甚至苏联的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对这件事的解释从来也不一致。熟悉俄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苏维埃政权以前,俄国人所持的态度,是从谴责到颂赞,形形色色,分歧很大。可是自从苏维埃独裁政权建立以来,就定下一种以成就自豪的爱国主义态度。而且就现在所知,斯大林当政之后,对此事的批评从未在官方出版的著作或小册子中出现过。有清楚的迹象表明,自共产党接管中国以后,就这个题目为公众写书是会给俄国人造成某种不安的。

首先,在苏联国内,自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起,很少出现过关于1917年前中俄政治关系的书。上述卡巴诺夫论文的第二部分甚至到了斯大林以后的政策转变时期,仍然不准向国外出借一事也肯定是有其意义的。值得注意的还有这本书只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发行过为数不多的一版,而这本书在当时是足以吸引更广泛的读者的。库尔茨教授的书于1929年出版后,也未重印。尽管他这本书很值得发行第二版——不过,它是以强烈的俄国人观点写的,文中每每有明确地不同情中国之处。

在《远东国际关系》一书中简短地提到归并阿穆尔,给人以辩解的感觉,并且把责任放在中国方面: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当时英、法正在中国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并准备发动一次反革命的干预以镇压太平军。中国政府力求利用英俄间的矛盾。当时,它特别需要调整跟俄国的争论,同时也认为作出让步是得策的。1858年的璦琿条约中,中国明确地承认了阿穆尔地区归属俄国,1860年的北京条约又承认乌苏里地区归属俄国。穆拉维约夫认为尽快地解决此一问题极关重要,他害怕英国占领波谢特湾。

这些地方与俄国的结合，为俄国构成保卫它在远东和西伯利亚，……领土的必要战略基地。

必须认识到，俄国在远东和中央亚细亚扩展领土一事发生时并未损及中国人所定居的土地。事实上这些地方都不是与中国相连的。沙皇俄国尽管具有反动和侵略的性质，但是并未对中国作战，而是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了与中国的分歧。俄国也没有积极参与对太平军叛乱的镇压。

1957年出版的斯拉德科夫斯基著：《苏中经济关系概要》中谈到的政治史如此之少，以致使他对经济关系所作的解释不免为之减色。可是，他以三页多篇幅谈了1857—60年的远东事态。在里面他似乎是试图造成一种印象，使人觉得中俄关系在这些年代中一切都是协调的。在第105页上，他以如下的话来介绍这个题目。“彼时，俄中关系中出现保卫他们的领土不受外国侵袭的公共利益……俄国于1858—60年在欧洲人的对华战争中出头干涉，和她在议和谈判中的斡旋，赋予俄国以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中的高度威信”。斯拉德科夫斯基叙述了《璦琿条约》的各条款，却没有提示中国人并不乐于签订这个条约，而且还曾予以否认。在第107页，他认为中国皇帝初时之所以不愿意批准俄国的《天津条约》，是因为英、法两国的《天津条约》中的某些条款使他烦恼。斯拉德科夫斯基承认俄国所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都与其他列强所订条约一样，是“不平等”的。然而他又说由于俄国未能利用从这些条约中获得的特权减弱了这种不平等。斯拉德科夫斯基的论调不仅与《国际关系》一书中提出的互不一致，而且他们不都是属实的。本书下面还要提到这点。 xviii

纳罗奇尼次基于1956年出版的巨著：《资本主义列强1860—1895年在远东的殖民政策》，显然意在为比阅读前二书的人们更专的那一部分公众写的，它也较另两书为公正。由于此书自1860

年写起,就对阿穆尔这段插曲的始末未作详细叙述,只在开宗明义的章节里,用学者风度和诚实的笔法扼要地一提,但是书中也有些大的纰漏,而且大部分材料业经公布,多数依据的是西方资料。书内未用多少俄国档案,中国档案连一件也没有用。可是纳罗奇尼次基却在书末列了一张非常引人注意的书目,其中显然包罗了俄国档案内关于 1840—1895 年时期俄国远东政策的一切资料。此事似可以表示俄国学者并没受阻拦,不让去研究这一时期的问题,即使出版得是极少的^①,纳罗奇尼次基也为 1861—1895 年间的俄中关系作了引人入胜的概述,并使用了一定数量的俄国档案。但是在象他所写的那样一本百科全书式的通史中,既然把一切欧洲国家相互关系,又把中国和日本相互关系都包括进去,他自然就无法详尽而深入地谈俄国方面的事情,书中这一部分遂不免为英、法两国远为多样化的活动所掩盖。

中国史学家方面确实有过许多表示,指责俄国在 1917 年以前对待他们的国家的政策,尤其是对于吞并阿穆尔河土地一事。迄今用中文所写研究近代中国和她的对外关系的历史,把阿穆尔问题的前前后后包括在内的书已达几十本之多。就作者所曾经查阅过的二十来本书而论,没有一本对于这一片土地的丧失认可。虽然有些历史学家,例如著《近代中国史》的郭廷以,和著《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的陈复光所作的议论是有节制的,但是很多人用毫不含糊的字句抨击了俄国人。

曾友豪在 1926 年出版的《中国外交史》中谈到《北京条约》时

① 从俄国刊物上看不出有任何俄中关系历史的书预定要出版,虽然科学院的七年计划要出版一本文化关系史(见《历史问题》1960 年 12 月第 113 页及其后各页。同时也有个研究中国人移民到阿穆尔省的计划,见《东方学问题》1959 年第 5 期)。<《历史研究》》上也没有提到有研究俄中关系的任何计划。可是,只有在最近看来才有苏联的历史学家,对清史本身开始真正感到兴趣。见 1966 年 9 月《历史问题》齐赫文斯基的文章。

说：俄人不费丝毫气力，居然诱得中国承认给予乌苏里以东九万三千平方公里的地域，其侵略手段诚足令人惊叹。

肖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含蓄地表示他并非不同意把阿穆尔河北岸割让俄国。在这一方面，他在中国的评论家中可以说是异常宽恕的。可是就连他也把北京条约概括为“在俄国得之为殊利，在我国失之为创闻”。^①

陈博文在他 1929 年所著《中俄外交史》中写道：“俄人不费一弹，不损一兵，徒凭威吓伎俩，于二、三年内攫取我国如许领土，木喇福岳福^②之侵略东方，至此可谓大告成功。而满洲朝鲜一带，乃从此多事矣。”

蒋廷黻所著：《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中所说是他所有的评论中最为激烈的。他把书内关于阿穆尔河事件的一段冠以“俄国友谊之代价”的篇名，把奕山有关《瑷珲条约》的奏折描绘为“中国外交史上最可耻可羞的文案”，把穆拉维约夫之对待奕山，说成“象十九世纪初年英法德野心家对付非洲土酋的方法”。后来他断言“俄国开口就讲……英国如何强暴，讲中俄应如何联合以抗英，从那时到现在，俄国对中国外交没有变过”，蒋廷黻在最后讲俄国取得阿穆尔河地区的利害轻重“不言可知”。

上海 1939 年版李鼎声所著的历史教科书《中国近代史》的态度是冷静的，但是篇末为学生所列习题当中，有一条关于 1856—60 年事件的提问却露出作者的心意。这条提问是：“俄国由英、法联军之役在中国获得了什么利益？”

① 肖一山在他所著《清代通史》中凡有关中俄关系的章节，均表示了他不同意将黑龙江左岸割让俄国，应当认为措词是明确的。作者此论显系错误的了解了肖的原意；又原著此句为“a very great gain for Russia and injury to China”，按“injury”一字意为创伤，而肖原文为创闻，亦系作者误解。——译者

② 即穆拉维约夫。——译者

就是在莫斯科留过学的汉博文^①也深为仇视沙俄，尽管他在《中俄外交史》中审慎地对苏联表示了同情，但是他对导致中国失去该地区的事件讲了许多反对的话之后，对《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他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这两次条约的恶果，是丧权失地，但是最坏的恶果，便是把满洲全部从此处于危险的境地，成为东方的巴尔干，酿成许多国际纠纷，而归于今日我们完全丧失全部满洲。所以，以后远东国际局面的推移，以及中国今日国运的形成，很明显，这两个条约，都是极有关联的。

所有这些都是在共产党掌权以前的著者。可是，即使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学家的态度，也不见得就有根本的改变。例如早在1950年7月的《燕京学报》上，当时该刊的编者陈芳芝就发表过一篇关于阿穆尔河谈判的文章，全文从头至尾对俄国极为敌视并企图证明奕訢从未否认^②《璦琿条约》（为了提出这种说法，作者完全无视刊印在《筹办夷务始末》上的证据）。

比较起来，后来的著者们仅仅略为沉默一点。例如胡绳在他所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就倾其全力将英法的恶劣行径详加叙述，对于俄国十九世纪中叶在中国的活动，则只最简略地提到。但是他提出一个惊人的意见说：“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虽是由英法联军所执行，却可说是英法美俄四国共同策动的。”该书译成英文时，这句并未改动。

多年来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学家老前辈的范文澜，在他引人入胜的《中国近代史》的早期中文版本中，并未对俄国多说^③。可是，在书内他描绘1850—1860年俄国政策的措词，一个仇俄分

① 应为何汉文。——译者

② 原文如此。——译者

③ 1953年在北京出版。

子是不会反对的。他两次以上把那时的英、俄说成是“侵略中国的两大主角”^①。可是，当1955年此书译成俄文时，有关1857—1860年俄国的章节完全重新写过，含有恶意的字句也全部去掉^②。

自从共产党在中国掌权以来，似乎对俄中关系的全部历史还没有出版过什么书籍。

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台湾的历史学家在这一方面的意见，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家是近似的。当然对阿穆尔河问题的愤懑，从一开始便构成对俄国公开表示敌视的一部分。例如，关于阿穆尔河插曲的论述，在程天放用英文所写的中俄关系史、黄大受和刘彦用中文所写关于现代中国的著作，以及李定一编辑的《专题论文》等书之中都曾出现过。所有这些人的著作，没有一本对于阿穆尔河土地的丧失说过一句赞成的话。黄大受和李定一甚至走得更远，宣称整个西伯利亚一度属于中国^③。 xxii

引证的材料现已足够说清楚原来想要阐明的论点，甚至使作者有理由敢说，在当前时刻由一位既不是俄国人，也不是中国人的作者公正地来写吞并沿阿穆尔河和满洲海岸土地的经过，也许是比较易于着笔的。

在结束时，我必须再次强调，怎么也不能认为这本书确实是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的了。资料来源的缺陷使它不够完全，而且我也深知自己知识有限，特别是汉语知识有限。由于这些原因，尽管作出最审慎的努力，错误一定是无可避免的。如果出版之后，能引起学者们加以指明，我将十分感激。我在非共产党世界中迄今尚

① 第181—182页，第184页。

② 范文澜原主编，尼基甫洛夫改编的《中国近代史》（莫斯科，1955年）。1895—1905年俄国政策一段改动不大，而1881年伊犁事件的那一段就未作改动。

③ 由于1960年阿穆尔问题进入了中苏政治论战的领域。《历史研究》为此事以及其他的侵略在1964年第4期上载文驳斥沙俄。亦见刘大年著：《中国近代史诸问题》（北京，1965年）。

未遇到任何人对于这一时期的中俄关系具有抑制不住的兴趣。直到现在我也未与在俄国或在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接触过。这本书是我于 1963 年为在伦敦大学取得校外生的哲学博士学位而提出的论文所作的增订和修正本。增订和修正工作在马来亚完成，远离各主要藏书中心，对于工作是有一定障碍的。

奎 斯 特 德

1965 年 11 月于马来亚大学

绪 言 附 记

正如绪言已经讲过的那样，这本书远非一切都已讲清楚了。在它付印后的近两年时间内，又有关于这一题目的新资料出现。俄国人现在出版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对外政策》第一卷，载有戈洛夫金之行的新情况。最近我去苏格兰访问了卜鲁斯勋爵，他欣然让我看了额尔金八世伯爵的私人信函，它可以对伊格纳提耶夫与额尔金之间的关系增添一些新的说明。我从前未曾见到的一批中国第二手材料也顺利得到。而且现藏英国伦敦档案局的清代文献，分类工作已将近完成，其中或许有关于俄国的文件。最为重要的是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刊行的《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和《四国新档》。这两种资料中的某些部分已纳入本书的脚注之中。但是未能用这种办法把从中得来的材料全部用上。因此，希望将来能在刊物中，就此题目撰写一篇文章。

奎 斯 特 德

1967 年 11 月于马来亚大学

第一章 1792年至1857年 俄中关系的背景

俄中关系的主导因素，迄至十九世纪为止，是那一大片面积辽阔，几乎杳无人迹而气候严寒的土地。它把这两个文明中心隔开，从而造成各处一方的两帝国彼此间的互不了解。直到十八世纪末为止，中国在与西伯利亚接壤地带，至少在局部上，享有压倒俄国的优势力量。彼得大帝之前，在军事上，中国大概完全是较强的一方，而在文化领域内，比起还是半开化的俄国来，中国就更为优越了。1689年，中国人毫不困难地就把俄国人逐出了阿穆尔地区，并有能力把一支大军带到尼布楚与该处的小小俄军对峙。彼得大帝改革之后，与中国毗连的边界与俄罗斯本部的遥远距离，越来越成为俄国在那里力量薄弱的主要原因。

整个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两国相互间的态度是敌对的，只是由于距离遥远和各自身边有事而有所克制。经艰苦谈判之后，俄国人在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中，甘愿同意俄国商队不进入蒙古，而以准许俄国东正教的教士团常驻北京作为交换条件。中国人于1731年慎重地派了一位使节前往莫斯科，打算让俄国在中国征伐准噶尔人时保持中立。俄国人无论在这件事情上，或1757²—1758年中国平定准噶尔人联盟时都没有插手。十八世纪中蒙古人大批逃入俄国，恰克图互市中的争端，以及小规模互犯边界，使两国交换了颇为激烈的咨文。清朝的乾隆皇帝曾经多次停止俄国人在恰克图的互市。1731年的中国使节虽然没有远达圣彼得堡，也没有深入俄国西部，但是他的报告却使人有了深刻的印

象^①。十八世纪中,中国从没有发动对俄国的战争行动,尽管当时中国正在向各方面对它的较弱的邻居扩展他们的宗主权。卡特琳娜二世当政之初,在她说来曾企图发动一次远征,征服阿穆尔地区并惩治中国,但这想法随即放弃了。

从1731年到1805年,俄国方面只有比较次要的人物曾与中国接触。中国则从未再派使节前往俄国,因而,对俄国发生的变化茫无所知,并且仍然认定中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助长中国人这种信念的其他种种因素可能是东正教驻北京教士团的潦倒颓唐(见下文),与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可怕的野蛮状态。这些情况无疑是通过与俄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商人透露到中国的^②。

中俄1792年的条约清楚表明中国视俄国如藩属。事实上,它不象是条约而更象是满清皇帝给下属的谕旨。这一条约,开头就是“大皇帝普爱众生……因尔萨那特衙门吁请,是以允行恰克图贸易”,全文通是这种口气^③。按瓦西列夫的说法^④,直到1851年俄中条约的满文原文中,提到俄国皇帝或女皇的地方都没有另起一行(与西方用大写字体同等的尊敬表示)。虽然1792年的条约曾由斯拉德科夫斯基在他的著作中翻印^⑤,库尔茨还研究了这个条约是在什么情况下缔结的,可是这两位权威人士,谁也没有想到应当引起人们注意中国所采取的异常高傲的口吻^⑥。而使人惊讶的

① 见列昂节夫译:《异域录》,书中的大意认为俄国系一极大极富然而野蛮的国家。我未找到该书的汉文本,但列昂节夫在俄国汉学家当中的名望是很高的。

② 见特鲁塞维奇:《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莫斯科,1882年)第224页。总之,那时的西伯利亚人可以分作两帮,一帮人只想苟全性命;另一帮人比只苟全性命的人则更多地想到敲诈、劫掠和逞凶。

③ 文见1689—1831年《俄中条约汇编》(圣彼得堡,1889年);中文《乾隆条约》。

④ 瓦西列夫:《俄中条约》(圣彼得堡,1860年)。

⑤ 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济关系概要》(莫斯科,1957年)附录。

⑥ 不过,一些现代的中国史学家已见到此点;例如,郭廷以《近代中国外交史料》(台湾,1958年)。

倒在于卡特琳娜二世的听之任之。她之所以如此，大半是由于她的关注是在于法国革命，而恰克图条约的缔结，仅系由伊尔库茨克总督出面，并非由俄国派出专使之故。她似乎从未明白地或公开地把这个条约与对中国人的认识联系起来^①。

不管怎样，我们所见到的 1792 年条约的语调反映了事态已经在迅速地消失，权力平衡开始向有利于俄国一边摆动，它已逐渐成为经济与军事的强国，虽然落在西欧后面，但已跃居中国前头。在一般的文化教育领域，她也已开始追上千年以来被认为居首位的中国。1792 年之际，中国遵循着它的政府制度和它的经济所形成的古老模式，又在出现衰微时期。当时乾隆皇帝年事已高，才能衰退，政权旁落到肆无忌惮的宠臣和珅手中。他除了满足私欲之外不过问其它的事。官吏中贪污腐化盛行，军队也听其成为废物。⁴ 乾隆朝滥行征伐与种种靡费，使库藏耗竭，全国人口在清初政治良好的时代虽大有增殖^②，可是没有发展出象欧洲那样的技术，因而不能使新增的人口吃饱。结果，人民的苦难便开始以叛乱的形式表现出来，诸如早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1775 年）和 1796 年皇帝去世时，有九个省都发生了叛乱。乾隆死后，清皇族中，再也产生不出一个有才干的君主来扭转这种局面。以嘉庆（1796—1820 年）、道光（1820—1850 年）、咸丰（1850—1861 年）为年号的三个皇帝，都在初登极的时候引起人们的希望，然而事实证明，他们除施行一些微小改良之外别无业绩，每一个皇帝不是拱手无为就是以沉缅于逸乐而结束生命。混乱日增，遍及全帝国，终以十九世纪中叶与欧洲人的战争及巨大的太平军叛乱而达于顶点。不过，在整

① 她对 1792 年俄国派往日本的贸易使团采取了同一路线，这一使团虽是奉她之命前往的，但表面上却用私人的名义。见基恩：《日本人发现了欧洲》（伦敦，1952 年）。

② 按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麻省坎布里奇，1959 年），1700 年人口系一亿五千万，1850 年已增至四亿三千万之数。

个这段时间内，蒙古、满洲均未遇到什么麻烦。蒙古由于人口下降，和清朝统治者采取措施把蒙古贵族争取过去，早期普遍的不满已经平息下去。满洲则在满人入关之后，只剩下非常少的居民^①。

直到1815年欧洲反法战争结束时，中俄关系大致停留在与前一阶段相同的地步。可是，由于俄国政府以对付法兰西为当务之急，中国政府则困于内忧，双方的关系反倒相当地缓和了。1792年条约所订的解决办法，双方都觉得满意，并为两国政府所情愿遵守。⁵ 两政府之间的往来行文继续以俄国萨那特衙门和中国理藩院的名义进行^②。这种办法在恰克图条约（1727年）中应俄方之请创行。俄国人的意图是避免中国皇帝在致沙皇的文件中，再用直到那时为止一直在使用的那种傲慢无礼字句。在中国官吏的眼光中，俄罗斯人不过是不时遣使向天朝皇帝朝贡的远方夷人。接待俄国使臣的严谨仪注都明白记在礼部的册籍内。俄国人与西欧人不同，他们在中国的体制中有一份地位，虽然这份地位是卑下的^③。俄罗斯和俄国人的名称，从来没有象英国人、法国人或其他西欧人的名称那样，被加上含有轻蔑意味的口字偏旁^④。而且《大清会典》中给予俄国使节的待遇，优于其他任何国家。每隔四天要从御膳中赏赐他们四盘菜和十壶茶^⑤。

但是，俄国人自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即与其他西方人一样，几乎经常被视为夷人。这一名词的使用始自周朝（公元前1027—

① 肖一山：《清代通史》（北京，1927—1928年）卷4。

② 它的正确称呼应为蒙古理藩院，也就是管理蒙古藩部的机关。

③ 亦见克拉普罗司：《旅行新年鉴》卷28中所收的文章；和科恩主编：《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发展》（伦敦，1964年）中曼考尔所写关于恰克图贸易制度一章。

④ 除非有时偶然出于意外，例如在俄国船初次抵达南方港口时，当地官吏不知道应当怎样书写“俄罗斯”，“俄国人”这些字。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860年，即本书所讨论的时期之末，尽管俄国人的种种行为，仍然没有对他们和他们的国家名字加上口字偏旁，一查《筹办夷务始末》或其它档案资料便知。

⑤ 克拉普罗司，前书。（本书英法均不加口字偏旁。——译者）

公元前266年),它的初意指来自东方的蛮夷(这个名词也适用于西欧人,因为他们的初次出现是在东部沿海。后来它渐次扩大使用于全部欧洲人种,包括美国人、俄国人等等)。

1727年以后,北京来了俄国东正教教士团。他们在极为严峻⁶的条件下,由少数几个学习汉语的学生陪伴住在北京^①。俄国人员除非死亡,必须整整在北京住上十年,他们不准携带任何女眷,并且必须穿着中国服饰。在中国官方词令中这些教士都名为喇嘛,这是一个不怎样体面的字眼,意味着是些与蒙古的愚昧喇嘛相似的人物^②。可是这种办法显然是俄国人自己创出来的。他们在翻译中使用佛教名词来表示基督教中相同事物的意义。隶属于教士团的一切世俗人员都称为学生。尽管后来这些人中包括医生、天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俄国文武官员。

那一时期俄中边境的情况,为便于研究起见,可分为三个方面^③。第一:西伯利亚南部与新疆的边界,自沙宾达巴哈岭起至伊犁河一段,理论上已于1727年以笼统字句定下来,但是从来未曾就地划清。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并由此沿着西伯利亚一线向西,贯穿哈萨克草原设有俄国哨卡。但是这一带地方与中国方面伊犁和塔尔巴哈台迤北的一线之间,插有一片荒无人烟,两方不能发生直接接触的缓冲地,其中有三个部落的哈萨克族人往来游牧。有两部直到进入十九世纪后很久,还在中国和俄国之间挑拨离间,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有一段时期,他们甚至在名义上同时接受中俄两国的宗主权和津贴。

① 关于俄国教会内建筑物的详细记载,见孟思明:《北京俄罗斯馆》,载《哈佛亚细亚研究月刊》,卷23,1961年。

② 同上书,教士在北京居住实际年数,约为十六年之久,亦见《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

③ 条约中关于边界的各条款,见前引《俄中条约汇编》,斯拉德科夫斯基,前书,等等。

处在最西边的部族,即俄国所说的“小帐汗”于1731年臣属俄国。处在中间的一部于十九世纪初年向俄国归顺。最东边的部族,即“大帐汗”则于1844年并入俄方^①。在伊犁河外,中俄两国还没有发生直接接触。

7 自沙宾-达巴哈岭向东,穿越蒙古,直抵满洲起点的额尔古纳河一段边界,已于1727年用安设边界卡伦办法划出。蒙古一段边界可以认为是另一件事。这一段边界在十八世纪初期和中期,由于有大批蒙古人叛逃到西伯利亚而成为最不平静的。可是,及至1792年,它已颇为稳定,并且以后在本书所涉及的岁月里一直如此。

第三,自额尔古纳河起向东的满洲边界,在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里只是不明确地加以规定。这一缺点已由加恩和库尔茨评论过,胡世泽也曾详加论述,因此在这里除扼要综述他们所见之外,毋须再说^②。这段边界按照习惯,而不是按照任何明文规定,自额尔古纳河河口向西,沿石勒喀河道,上溯至格尔必齐河(西格尔必齐河,不是现名阿玛扎尔,更偏东的那道河),并从此河源头沿流至斯塔诺夫山脉分水岭。自此而下直抵鄂霍次克海的地方,在尼布楚条约内列为未定界,留待中国和俄国共同采取步骤加以勘定。

嘉庆朝以前和嘉庆朝期间,中国人完全忽视了视察蒙古与西伯利亚接壤处的中俄边界。嘉庆七年(1802—1803年)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奏请巡查边界。他必须上奏请准这件事本身就说明没有经常重视巡边。皇帝批复的谕旨也证明了这一点,并且表示中国皇帝不欲招惹俄国。谕旨向蕴端多尔济宣示,巡查恰克图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圣彼得堡,1912年),亦见岑科夫斯基:《俄国的泛土耳其主义与伊斯兰教》(麻省坎布里奇,1960年),第55页及其后各页。

② 在唐盛镐:《1911—1917年俄国对待满洲与外蒙古的政策》(达勒姆,北卡罗来纳,1959年),第4—5页处有关于1689年俄中边界的详尽书目。

东西两方四十七处无人戍守卡伦之事查无前例。他应于次年巡查恰克图以西的十九处卡伦。下一年再去巡查恰克图以东的二十八处卡伦。以后应每十年巡查边界一次。谕旨又道：“俄人多疑，著⁸ 蕴端多尔济于巡查卡伦之前，明白晓谕，使俄罗斯国固毕那托尔（指东西伯利亚总督——作者）知巡查原系永清二处交界，并无别故，自不致心生疑惧也”。^①

嘉庆十年（凉系 1805 年夏）蕴端多尔济再次上奏并获准“此后每年可自乌里雅苏台派扎萨克一名赴各处卡伦查看，毋庸亲自前往”^②，这句话自然是明白的。

中国人对积极争取哈萨克人的打算，到十八世纪末也停顿下来。哈萨克人在未定界地带，即俄国在额尔齐斯河占据的屯居地，与中国占领下以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为中心的新疆之间的地方，任意往来，行踪无定。中国的巡哨人员，想向恰克图条约所定名义上的中俄边界推进的最后一次努力，起于 1791 年，但是未能实现^③。没有见到俄国人方面有这类的放松迹象。他们对哈萨克人抓得很紧，早在 1797 年，俄国政府就下过一次敕令，准许向布赫塔尔马河与伊犁以及塔尔巴哈台等地，开展秘密贸易。而这是未得中国政府准许的^④。

中俄两国彼此对于对方的语言、历史和事态的无知迷雾，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才略见拨开。确实，直到本章所涉及的时期之末，中国官僚社会也许除商人与少数边境上的官员之外——实际上对于俄国是一无所知，直到 1820 年，俄国政府对于中国，也同

①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上海，1923 年，第四篇卷 336 第 10767 页。此书仅以年记，未录文献日期。《大清历朝实录》，卷 102，嘉庆七年八月十六日。

② 同上，着重点是我加的。这是上海版的原文。1959 年台湾版则说他应亲身前去，而不是派一名扎萨克前往。

③ 库尔茨：《十六、十七、十八世纪俄中关系》（哈尔科夫，1929 年）的结论。

④ 柯尔萨克：《中俄通商历史统计概览》（喀山，1857 年）。

9 样表现了消息极不灵通。

自彼得大帝以来,圣彼得堡科学院收藏的东方学手稿的主要部分继续增加,可是除去北京驻有俄国教士团,和翻译家列昂节夫与索罗兴的佳作之外,俄国方面直到十八世纪之末,对于中国研究的进展,比起对蒙古和鞑靼的研究要差得多。照谢罗夫斯基所说,驻在北京的教士团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简直是荒唐的笑柄^①,教士们普遍酗酒放纵,而教士团的某些首脑则是其中最为堕落的。多年之中难得有一个改信基督教的中国人。带回俄国的有用情况也很少。当时中国人对俄国人的轻蔑,可以部分地归因于教士团道德水平的低下。据维谢罗夫斯基说,迄至 1794 年止,共有过二十四名学汉语的俄国学生隶属于教士团,但是,他们回到俄国,官方对于他们所获得的不论何种知识都很少使用。大司祭格里鲍夫斯基就在那年就任教士团首脑,他到达北京时报导说:“教士团的下级属员不受他们的上级控制,并且沦落到行为不端、酗酒、劫财,与中国人叫骂等。院长没有控制他们的任何能力,陷入极度惊惶沮丧的境地。他有时为了他们的丑行而责打他们。他们则还手打他。”格里鲍夫斯基不久即放弃整顿纪律的希望。在他的任上,除去从俄国来了商队时,有个别善于经营的中国商人为了与俄国人作生意时取得更大成功而接受洗礼之外,别无中国人改奉基督教。教士团的成员,与有权势的汉人和满人没有任何接触。

10 十八世纪结束之前,已可找到迹象表明俄国政府觉察到中国国势开始衰落。俄国派赴塔什干的使节们接到那里的要求,请俄国保证在中国来攻时给予援助。使节们先依照他们所得的指示予以拒绝。可是,当他们回到圣彼得堡时,俄国政府已重新考虑过自己

^① 维谢罗夫斯基:《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圣彼得堡,1905年),看来这是唯一一份自行公开出版的资料,因此无法核对。不过,它与众所周知的十八世纪俄国与西伯利亚的事情大致相符。官方 1916 年出版的历史对此保持了可以理解的缄默。

的态度,命令使节们重返塔什干,并带了一封俄国枢密大臣别兹鲍罗德科的信件。俄国人在信中答应给予所要求的保证。信中谨慎地提到“中国政府的和平意向”,认为中国不致袭击塔什干,并劝塔什干的首领玉努斯和卓遵守“小心谨慎”的原则与中国相处。如果“事与愿违”,中国果真来进攻,俄国将出面调停。玉努斯和卓为报答这一允诺,口头上表示接受俄国的宗主权。但是,并未将此事写入文件^①。

俄国的保罗皇帝跟着他母亲的脚步,在他登极之初,打算搞一次远征以“惩处中国”^②。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性质,还没有弄清楚。不管怎样,在他下手做这件事之前,就已经被谋杀了。

1804年,亚历山大一世采取更为和平与有见地的方式,重新拾起同一思想。他在登基之始,就表现出对在西伯利亚发展经济与俄国占有远东与北美的兴趣。他对俄国与中国贸易也感兴趣,认为这种贸易对于他的辽远属地深有必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在1800年扩大了俄美公司的权力,1801年在恰克图为俄商与中国人贸易制定了新的章程,在1805年又派克鲁逊什特恩的舰队作了环球航行,并安排了新的使团去中国^③。戈洛夫金伯爵被任命为一个不带武装的使团的首领。接受去北京谈判开放整个边境¹¹进行贸易与对俄国船只开放广州,至少每年准许少数俄国船只行驶阿穆尔河上,如果大船实在不能在阿穆尔河上通行的话,就在该河口上建立一处屯栈。他同样要设法使中国答应俄国人在伊犁与塔尔巴哈台贸易;向北京派遣外交与商业代表;向广东和阿穆尔河口派遣商业代表,并为前往西藏进香的卡尔梅克人委派监督,因而

① 索科洛夫:《俄国驻塔什干首任大使》,见《历史问题》,1959年第3号。

② 瓦西列夫,前书。

③ 俄国使团在北京的人员几乎都死掉了,只剩下两人。亚历山大只得派三个耶稣会士去北京,首先是为了收集关于中国的情报(见《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

打开俄国与该地的关系^①。亚历山大一世给予戈洛夫金的使命，其目的与 1797^② 年英国的马戛尔尼勋爵企图获得的相似，只是走得更远一些。假如戈洛夫金成功了，中国于 1806 年即可对俄国的贸易开放，俄国势力也能进去了，就象 1860 年中国在英国武力之下开放一样。然而俄国即使于 1806 年达到目的，它也不处于能够利用局势的地位。

倡议派出使节的首要发起人之一，似乎是商务大臣鲁缅采夫伯爵。可是，由于外交大臣查尔托罗斯基亲王跟他作对，他要组成这个使团遇到了困难。查尔托罗斯基声称找不到人率领这个使团，而他最后选择了戈洛夫金则是不适当的。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把戈洛夫金描述为一个虚浮、高傲、教育受得不多的人^③。参加使团的语言学家克拉普罗斯的话则更不可信，他把戈洛夫金形容为有风度而能干^④。不管怎么说，任命他的主要条件看来还是因为他是查尔托罗斯基亲王的亲戚，并在宫廷中担任某些职务（他是一位活跃的枢密参赞、参议员、国立学院校长、皇家最高典礼官）。陪同使团的有三名秘书、六名助手和十二名专家，其中五人
12 是知名的科学家，五名较低级的军事专门人材，和两名汉文学生。团内还有教士、书记、译员、哥萨克轻骑兵、龙骑兵与一百二十七名仆役^⑤。前此派赴中国的使团，人数从来没有这么多，也没有这么大的抱负。然而戈洛夫金使团，是组织得很糟的。外交部亚洲司的中国档案发现丢失，这样，戈洛夫金动身时所得的指示就不充

① 卡巴诺夫：《阿穆尔问题及其解决》（两卷本，莫斯科，1947 年），这是一份博士论文。卷 1，第 77 页及其后各页。从瓦斯金（Vaskin，但应为 Баснин，即巴斯宁——译者）所著的一本书中摘出戈洛夫金指示的某些细节与皇家地理学会 1875 年年度记事录，这些资料都无法查阅。

② 应为 1793 年。——译者

③④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阿穆尔洲札记》（圣彼得堡，1894 年）第 1 章。

⑤ 《旅行新年鉴》卷 28 中的第一篇文章，转载在《北方档案》中。

分^①。1805年10月，他和他的一行抵达恰克图中国边境，并有希望在冬天穿越戈壁滩。

从《清季外交史料》中清楚看出，清朝皇帝认为特别重要的事情是给戈洛夫金以深刻印象。他认为这次使团是前来进贡的。1805年12月14日下了一道三级的紧急谕旨^②。谕旨派大学士、钦差大臣、刑部侍郎瑚素通阿负责安排，其他人员协助，以接待俄国人，并在张家口以外就对戈洛夫金一行赐宴和颁赏礼物，以示“朕柔远嘉惠之意”。戈洛夫金在这则谕旨中被视为“贡使”。同日，署直隶（首都所在省份）的总督裘行简接到的圣旨说，戈洛夫金经由该省进入北京，“该督务须经理周妥”，“不可稍有缺误”。沿途坍塌之处，均应平治。次日，即1805年12月15日，裘行简又接圣旨一道，命令他带兵丁四百名，预为护送戈洛夫金一行，并拨款十万两作为招待费用。这件谕旨内还包括一句道出真心的话：“至于觐见之礼，渠（戈洛夫金）力所能及，自不得不敬谨将事。”^③看来皇帝的首要目的是保证使戈洛夫金不致象马戛尔尼勋爵那样拒绝叩13头，而能够行礼如仪，借此显示一下一个将近百年未来朝贡（上一次是1726—1727年来华的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使团）的强大藩属的恭顺，从而壮大清朝的渐趋式微的声威。裘行简也对此作了说明。1805年12月16日，他奏道：“查俄罗斯属在外藩，久未宾服。此次望风顺化，实仰圣德远敷。初入中华，凡经过地方照例一切自应周备。至观瞻所系，尤应严肃整齐，方足以示怀柔而昭体制。”在这种公文语言的背后，似乎是暗示如果用破例的款待令戈洛夫金心悦诚服，他那一方面自必须对清朝皇帝格外表示谦卑恭

① 《旅行新年鉴》卷28的第一篇文章，转载在《北方档案》中。库尔茨，前书。

② 照字义译为“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头两类紧急的驿递文件办法（五百里与六百里加急驿递）很少使用。此处和下面所引中文文件均载于《清代外交史料》嘉庆、卷1第33页及其后各页。

③ 此句引文查而未见，系意译。——译者

敬。裘又奏道，他已责成护送兵丁一反常例，自带食粮，以免“借端生事”。总之，准备是十分周详的。

就在此时，克鲁逊什特恩的两艘船“希望”号和“涅瓦”号正于远航世界途中，碇泊在广州。这是进入中国港口的第一批俄国船。他们的访问，事先经过安排，以期与戈洛夫金劝中国人把广州向俄国船开放的活动配合一致^①。不过戈洛夫金当时还滞留在边界上，没有到达北京。粤海关监督延丰吓了一跳，他奏陈，因其“情词颇为恭顺”，姑准开舱贸易。他想如令其原载回帆，似非仰体皇上“柔远怀夷之意”。此折皇帝于1805年12月19日收到，但是，直等到一个多月之后，他才降旨令两广总督吴熊光查报，并谕示以后不可自作主张再准俄国船在广州碇泊。这种延宕，大概是想要看
14 一下戈洛夫金使团如何发展，再决定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俄国的这一新招。

总而言之，戈洛夫金开始就遇到困难，照克拉普罗斯的说法^②，恰克图的中国当局（实际是蒙古人）拒绝接待比前次来过的更为庞大的使团，并声称他们仅仅准备让一百名俄国人通过蒙古。或许这是由于办事效率差，因为中国皇帝谕旨只令他们准备接待一百二十四人。在经过两个月的磋商之后，戈洛夫金答应了把他的随行人员减到一百名。他终于在1月份的零下气温中进入蒙古。这伙人夜里在帐篷内必须燃煤取暖，忍受难熬的困苦。戈洛夫金在库伦说，他不准备叩头。他于1月29日到达张家口。中国当局遵皇帝之命张宴款待，但是席设露天。中国人要戈洛夫金面向设在帷幕后，饰有黄缎，代表皇帝本人的宝座行三跪九叩礼^③。在张家口的这种象征性叩头，料想是前次来华的俄国使节

① 克鲁逊什特恩：《环球旅行记》（伦敦，1813年）。

② 克拉普罗斯：前书，《北方档案》第21部分（1825年）重印。

③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持另一说法，但按照习惯贡使须在北京皇上面前行三跪九叩礼，见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卷1（麻省坎布里奇，1953年），第29页。

所未做过的。这或许出自瑚素通阿的主意。戈洛夫金当场拒绝,宴席不欢而散^①。

1806年2月2日(嘉庆十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国皇帝接到瑚素通阿的奏折,里面说据蕴端多尔济报称“贡使不知礼节”。皇帝立即作出毫不妥协的反应,令瑚素通阿著即回任,毋庸招待戈洛夫金。2月3日(嘉庆十年十二月十五日),皇帝又令两广总督,不准“希望”号和“涅瓦”号两俄船留在广东等待货物售完,因为俄国 15 贸易久已立有章程,“不得轻更”。章程明定俄人只准在北方边界指定地点贸易。不幸的是总督不得不回奏他业已允准俄人之请,于售完皮货后回帆。接着,2月15日(嘉庆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两广总督又有一件奏折递呈皇帝。在折内,总督申述他的看法,认为“该国商船此次来粤,未必非由英吉利导引”,因为俄船回国的时候,有“如奉有谕旨交与英吉利驻粤大班即可寄至该国等语”。当时,英国人在广州已经变得名声很臭,总督所奏显然不是为俄国人说好话。皇帝在这件折上硃批申斥总督犯了“大错”。2月26日(嘉庆十一年一月九日)又发布两道谕旨。其一撤消吴熊光的职务。另一个则宣布俄国船此后如来广东,著令其即刻离去^②。

可惜,《清季外交史料》里面没有载入其他有关戈洛夫金的文件,仅有1806年2月24日(嘉庆十一年一月七日)谕瑚素通阿的又一圣旨,说道:蕴端多尔济既已斥拒戈洛夫金,该使业经回国,原派之中国护送人员著即遣撤^③。俄国人显然相信,戈洛夫金的失败主要应当归咎于中国方面的蕴端多尔济。他行事极其傲慢,不等候皇帝命令,便自作主张把戈洛夫金打发回去了。可是就《清

① 蒙古人无译员。当时从北京派去了一些学俄文的学生,但听不懂一句俄国话,见孟思明,前书。

② 这些资料中的某些文件的详细译文见傅乐淑,前书,第316页及其后各页。

③ 傅乐淑引《清季外交史料》日期为十一年一月四日(2月21日)。

季外交史料》中的材料来看,似乎表明蕴端多尔济的态度是由于皇帝的命令和袭行简的怂恿。另一方面,中国资料也说明,戈洛夫金恼怒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不肯让俄国人在广东开始贸易。

这样,戈洛夫金使团就结束了。中国和俄国双方都对这件事
16 抱有不小的,但是矛盾的希望。俄国人企图在中国沿海贸易的第一次尝试也就此告终。鉴于双方彼此之间的无知,这样的结局原是意料中事,尽管这对于两国都是一种损失。

戈洛夫金一行返回西伯利亚之后,他的随员之一,奥夫莱上校得到如下的命令,派他去作一次秘密调查,“尽可能地搜集情报;记下贝加尔与中国边界卡伦之间,自石勒喀至恰克图一段,特别是最接近石勒喀河及额尔古纳河与阿穆尔河合流地带的军事状况;提供关于中国在满洲,阿穆尔等地军事力量的情报;要求他判断是否有可能在阿穆尔河与斯塔诺夫山脉之间进行一次秘密的、小型的考察;并严守秘密,小心谨慎”。奥夫莱看来是考察了从尼布楚到格尔必齐河所有的边界,他在那里发现边界卡伦用五种文字刻了界碑,从年长的土著处得悉阿玛扎尔河边界卡伦另有界碑。但他又听说,阿穆尔河与尼布楚地方的通古斯部族心向俄国。奥夫莱拟了一项正如命令中所指出的远征计划。可是,它被束之高阁^①。没有看到有什么证据说中国当局曾经知道这项调查。

虽然在戈洛夫金事件发生的时候,两国在外交技术的枝节问题上彼此互相侮辱,可是两国政府中任何一方,也没有向对方表示任何严重的敌意。1806年拿破仑托人向北京转达他的建议,中国应该袭击俄国。中国不接受这种建议,认为“与俄国和好相处是为上策”^②。俄国方面,则主动提出另派使节的事。到1810年又提出了要在恰克图举行一次会谈的建议。由伊尔库茨克总督特列斯

① 卡巴诺夫,前书,第80页。

② 班蒂什-卡拉姆津:《俄国史》卷Ⅷ,至于这是否是真实的,我还无由查明。

金与库伦的两位办事大臣参加，两大臣中之一就是蕴端多尔济。中国接受了这一建议。接着就是这些官员在1810年3月和4月¹⁷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接触和会谈。特列斯金关于此事所作的全部记叙，幸运地都发表了^①。这里还有以中国档案为依据的许多中国人所写的第二手著作^②。

特列斯金与两位库伦办事大臣的会见，以双方都用极为和好、平等的方式互相接近而值得注意。它和戈洛夫金事件是个对照。之所以有这种诚挚气氛，部分原因确实是由于中国与俄国的皇帝都指示要表示修好。两个政府都急于想由俄国再派出一个使团，以获致戈洛夫金所希望但没有得到的效果。驻库伦办事大臣，虽然受过汉语教育，但都是蒙古人而不是汉人，这一事实大概也起了作用。因为关于十八和十九世纪俄国人在蒙古活动的全部记载中，俄国人对蒙古人的关系总比对中国人要好^③。取得信任的现实办法，很清楚是特列斯金个人做了一系列的努力，以求在各方面适应中国人的礼仪。用这种手腕他赢得了蒙古官员的友谊（以后穆拉维约夫和他的将佐们都同样用了顺着来的办法，与汉人、蒙古人和满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然而，会谈在政治上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中国人想说服俄国人无条件地另派一个使团；反之，俄国政府提出应由中国人派遣回访使团到圣彼得堡，使中国人明了俄国人的真实力量。中国政府没有准备考虑这一意见，目光是太短浅了，而且使他们后来吃了大亏。但在当时这样作，是太纠缠于有失体统这个问题了。

即使特列斯金在与库伦办事大臣会谈中使尽力气开导他们，¹⁸

① 特列斯金：《1810年2月19日至3月13日伊尔库茨克省长特列斯金与中国边界官员蕴端多尔济友好会见记》，载《莫斯科大学的皇家历史和古代俄罗斯学会会刊》（莫斯科，1860年）第一册。《大清历朝实录》卷227，第9页下。

② 例见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昆明，1947年和郭廷以，前书。

③ 库尔茨，特鲁塞维奇，瓦西列夫，前书与其他作者。

看来却无效果。特列斯金向他们出示了地图、放大镜和其它他们显然不知道的精巧工艺品,这几位蒙古官员对地图特别感到兴趣,因为他们不懂得地理,还认为法国与俄国在人种学上是同宗。这些事好象没有传回国给中国皇帝知道,就算是传回来了,政府也从来没有理会过它。《清季外交史料》没有关于此事的材料一事,并不能证明什么,因为它原不是一部完整的档案。不过,其他材料表明,直到三十多年以后,清朝政府与官吏阶层才开始对世界地理给予认真的注意。1842年,台湾总兵达洪阿奏报了一些不很确切而且肤浅的俄国在欧洲的疆界与俄国的近代历史^①。就业已发表的主要档案来看,这是在1792—1857年期间向皇上奏报有关俄国状况的头一份奏折。在前一年,林则徐印行了《海国图志》,魏源于1844年也刊印了他著名的地理书^②。

中国人似乎对于克鲁逊什特恩从俄国朝着日本沿海、萨哈林与阿穆尔河口所有的各次航行,依然一无所知^③。那个时候,在这些水域内中国航海家几乎进不去。

1810年谈判失败之后,中俄外交关系很长时期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某些不很重要的蒙古边界争议,于1818年由奇丘林与中国代表解决了^④。以后,四十年间两国未就任何严重事态办过交
19 涉。这一期间,在中国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内迅速地继续衰微。这个时候的俄国,自从1815年解除了对法国的顾虑之后,渐次聚积起必要的资源,以备对中国采取更激烈的政策。中国则日益不愿在边界上冒任何足以招惹俄国的风险。可是,俄国人只在哈萨克边界上利用了这种局势。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62,第15页下。

② 费正清与邓嗣禹:《中国对西方的反应》(麻省坎布里奇,1954年)等。

③ 《筹办夷务始末》、《清季外交史料》等。

④ 萨文:《沙俄、苏联与中国的相互关系》,(莫斯科,1930年)。

据中国资料的记载^①，嘉庆十八年(1813—1814年)，一支一百人的俄国分遣队深入到塔尔巴哈台以北，名义上在中国卡伦控制下的地区。当时派来质问他们的是一个中国官员和一个译员，听他们讲，分遣队此来是为了寻找某些受俄国保护的安集延人^②。这些人被一个叫罕巴尔的^③，不归附任何人的哈萨克族头目绑了架。俄国人这时已增至“四百”人。不过，就在当月，他们便搜索到了被掠的安集延人，并撤回他们本土去了。走时，把罕巴尔的牲畜作为被杀的许多安集延人的赔偿带了去。罕巴尔要求中国人给予支援，但是遭到拒绝。中国人要他答应俄国人的要求。伊犁将军晋昌的奏摺表明，他担心与俄国人发生纠葛。中国皇帝对他奏摺的硃批也透露了同样看法。反正，晋昌小心谨慎地仅只派了一名中国军官暗中追踪俄国人，看看他们是否真正回到他们自己的领土。他还告诫土尔扈特余众与俄国保持和平。皇帝认为晋昌在这件事上“轻举妄动、有乖体制”，而且带有公然用武之嫌。晋昌与他手下负责派人追踪俄兵的官吏都交刑部议处^④。

在这次非常事件之后，无怪俄国人在往后的四十年中，逐渐将 20 哈萨克草原完全纳入他们的控制之下了。早在 1816 年哈萨克人就已经怕透了俄国人。据一个目击者描述一队俄国巡兵出现在这些牧民中间时说：“简直无法想像吉尔吉斯男女看到武装俄国军人突然来临所引起的那种混乱状态”^⑤。

俄国在向前推进，而中国仅仅随之以抗议。中国只有一次暂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 4，第 6 页下至 15 页上。

② 傅乐淑称他们为安集延人(浩罕人)。

③ 他的人民也叫罕巴尔。也许就是俄国人称为“大帐汗”的那些人。究竟是谁我无法确认。

④ 《清季外交史料》，卷 4，第 6 页下一第 15 页上。

⑤ 尚格林：《西伯利亚通讯》1830 年，第 9—12 号，那时俄人称哈萨克为“吉尔吉斯”。

时地阻挡了俄国前进。照巴布科夫所说^①,1825 到 1826 年,俄国人在卡拉塔尔河为亲俄的中帐汗国哈萨克苏丹阿布拉汗建造了一所住宅,但在中国人抗议之下拆毁了。这件事在中国档案中有过记载,但与给清朝皇帝的奏报内的说法不同。^②据中国方面记录,他们接到扎萨克^③,或哈萨克的报告,俄国人在中国人称为哈拉塔拉的地方建立了屯居地。该处名义上在中国卡伦线之内,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停止巡逻得那末远。理藩院奉命向俄国提出抗议,可是由于缺乏关于俄国边界的地图,无法对局势进行调查。俄国人在答复中国抗议时说,俄国军队只是应哈萨克人之请,建造了一些临时住所。现在俄国人已将其拆除。此后,中国皇帝命令扎萨克要绝对地居留在中国巡哨线之外。因此,中国终于收缩了,不再为要使这些部族臣服而斗争。俄国在这段边界也未作任何退让。

然而中国人在这段时期设法不让俄国人在新疆的商业活动中
21 获得立足点。1811 年俄国翻译官布蒂姆采夫作了一次秘密侦察,一直深入到伊犁。他报告说,俄国和这城市进行的贸易倘若由官方主持,而不是象迄今为止那样通过当地部族为中间人私下进行,将是大有出路的^④。1813 年,事实上有些俄国商人确曾走到伊犁作买卖,但是,中国皇帝谕旨把他们撵走^⑤。新疆与布赫塔马河俄国哨所之间的贸易,到十九世纪中叶渐渐缩减^⑥。

1831 到 1832 年,西伯利亚和亚洲问题委员会的特别会议在圣彼得堡做出决议,不顾中国的抗议,固守哈萨克草原的前沿阵

① 巴布科夫,前书。

② 刘锦藻,前书,卷 336,第 10707 页及其后各页。

③ 在中国档案中有时称作扎萨克而有时为哈萨克,不过,看来均指同一民族。(按:扎萨克,官名,不是民族名,作者误。——译者)

④ 斯拉德科夫斯基,前书,第 84 页。

⑤ 汉博文(应为陈博文——译者):《中俄外交史》而吴相湘说他们有一处基地是在 1827 年在伊犁设立的(见《清代史论集》卷 2,第 322 页)。

⑥ 斯拉德科夫斯基,前书,第 85 页。

地。及至 1842 年，俄国人到了贝加尔湖以南的伊犁河。1847 年，建立了科帕尔斯克要塞，斜米列钦地区全被占领。维尔内(阿拉木图)于 1854 年建立^①。据巴布科夫说，中国对这些举动，每次都提出了外交抗议。可是，在《筹办夷务始末》中我们找不到一点线索。

俄国人在南西伯利亚差不多是不由自主地被引向前的，起先是必须守卫前哨基地，防御哈萨克人的侵掠。后来，哈萨克人的怯弱又是那么诱人。推动俄国人刺探中国方面弱点的这类因素，满洲边界上却不存在。那里直到 1847 年^②任命了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为止都极为平静。实际上仅发生过一件古里·瓦西列夫事件。他是个旧教徒，1815 年、1816 年、1822 年曾三次非法地穿越阿穆尔地区。每次都被中国人捉住，每次都平安地交给俄国人。卡巴诺夫记载了他的全部冒险事迹^③。这件事情对于俄 22 国人来说重要性在于瓦西列夫的报告使俄国人了解到中国人对阿穆尔没有采取殖民或防御的措施。那时，在该地的汉满居民不过几千^④。几次拘留瓦西列夫的事，中国档案中都无法记载。但他们报告说，1819 年间有一个褴褛的俄国人名皮沃特尔，为了躲避残暴的主人而逃入中国境内，但由中国人给以衣装送回西伯利亚去了。

在这种背景下，事态的演变不可避免的要使阿穆尔地区的局势发生变化。十九世纪前半叶，俄罗斯与西伯利亚都出现经济的稳定与文化的发展。东西伯利亚经济的重要性和经恰克图与中国的贸易，都按比例地跟着增加了。古里沙巴罗夫、柯尔萨克和卡巴

① 巴布科夫，前书，第 3 篇，第 1 章。

② 对满洲官员视察黑龙江边界的描写，见陈芳芝：《中国边界外交》，《燕京学报》第 5 卷，第 1 号，1950 年 7 月，第 83 页及其后各页，摘引《黑龙江外记》，卷 5，第 10 页下一第 11 页下。

③ 卡巴诺夫，前书，第 81—82 页。

④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前书。

诺夫都对这一阶段西伯利亚的历史作了记述。在这里，从卡巴诺夫所引用的档案中，摘录一些数字是完全合适的。他记载道：1824年俄国工业品的产值是四千六百五十二万四千银卢布，1854年增到一亿五千九百九十八万五千银卢布，在这些产品中，纺织品占了48%。这是俄国途经恰克图出口到中国最重要的产品。恰克图贸易还有它的独特处，即这种贸易完全掌握在俄国商人手中。其他的外国人不得从事此道。中国确实是俄国工业品的唯一真正市场，它在欧洲是无力竞争的。虽然1830年间还有许多普鲁士货物在恰克图出售，但到1850年保护贸易的措施取得成功，俄国就重新获得了出售纺织品的优势。到1854年，向恰克图输出的俄国货物从1825年已起升了六倍，而输入则为七倍。从中国输入的茶叶数量特别巨大，俄国的常年关税收入总额的15%—20%，是在恰克图征收的^①。

但是，到1850年时，通过恰克图和中国进行的贸易对西伯利亚本身已经失去了它早先的重要性。它对于满足这一地区日益增
23 长的需求，已经成为大有局限性的了。此时，对西伯利亚来说，恰克图与俄国之间运输货物已比跟中国做买卖得利更大。卡巴诺夫指出西伯利亚的人口从1815年的一百五十三万四千五百人，增长到1854年的二百九十三万六千〇三十六人，经济发展也与此并驾齐驱。1854年东西伯利亚生产的谷物与马铃薯已足够满足本身的需要，堪察加、雅库特也可以得到供应。此外，西伯利亚各业行会中，商人人数从1823年的三百多一点，增加到1851年的一千五百人。1851—1854年间西伯利亚水路运输船只数目增加了四百六十五艘。载货总值，从1851年约二十亿卢布，到1854年增至四十亿。由卡巴诺夫以及其他人所引的数字，令人信服地证明：十九

^① 卡巴诺夫，前书，第4章。

世纪中叶西伯利亚的实际与潜在需要，都要求得到更多的对外贸易机会，和支持从东西伯利亚进一步向东拓殖的力量。

满洲与蒙古的经济跟俄罗斯相比是停滞的，即使是与西伯利亚相比也是那样。看起来十八世纪以后蒙古的人口数字有所下降，而当时满洲的人口留下的极少^①。满洲居民稀少，蒙古人贫困，因而使这些地方对谁都不成为很有吸引力的市场。不过，在他们的后面有着中国本土众多的人口，如果谁能供给他们以廉价的纺织品的话，他们的需求将会是无厌足的。俄国人也同样地为中国的茶提供了一个不会收缩的市场，因为他们的需求在稳步增长^②。

此际，英国在1842年，接着是法国、美国与其他国家都与中国签订了条约，条约给予他们在中国以极大的商务便利。不久，这一点在中俄恰克图贸易中也反映出来。因为海上列强现在能从海路将货物运往中国，这比以同样的货物通过西伯利亚运去要便宜得多。结果恰克图贸易立即减少下来了。1861年在刊物《同时代人》²⁴上引证的价格，表明俄国纺织品上一年已在恰克图亏本出售。不过这是十八年前即已开始的衰退的顶点^③。

使俄国与中国之间贸易蒙受不利的，不仅是由于缺乏通商地点和远东港口，同样，成为贸易障碍的，还有两国于1792年和1800年在恰克图协议中对商人施加的陈旧限制，特别是除物物交换外，禁用其他交易方式。为了逃避规章的限制，出现大量走私。中国商人所受政府干扰远比俄商为少，因为这时清朝对商人的管制已经松弛了。中国和俄国商人各自在国内的垄断，也成为发展贸易

① 自1751年以后乾隆皇帝就不鼓励汉人移民，最初的三位皇帝是鼓励的，见陈芳芝前书。

② 这些众所周知的事情，柯尔萨克，卡巴诺夫，斯拉德科夫斯基都曾提到，见三人所著前引各书。

③ 卡巴诺夫，前书，第4章。

的障碍^①。

然而所有这些经济问题都只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中俄两国政府都必须相信两国之间的贸易基础有必要扩大。他们之中的这一方或那一方，早晚必须认识到阿穆尔河航行的可能，和满洲沿海开发的必要。在这种特定环境下，自然是俄国统治者先对局势有所觉察，并且在西方国家协助下，把解决办法强加于中国。

自 1792 年至穆拉维约夫到达西伯利亚那年，中俄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些发展，是在俄国的汉学界方面，和东正教驻北京教士团性质的转变。以亚金甫神甫(俾丘林)为首的第九次教士团(1806—1820 年)带来了变化。俾丘林不象他的许多前任那样尽情放荡或游手好闲。他学会了汉文，并且把须用十五头骆驼驮运的图书，通过蒙古带回俄国。他离任前不久，理藩院建议，增补五官灵台郎时
25 毋庸再用耶稣会士，可由俄罗斯教士团中选任。然而这个想法并未实现^②。

此时，俄国政府对中国开始了新的兴趣。1818 年，圣彼得堡亚洲博物馆开放。1819 年，外交部设立了亚洲司^③。尽管俾丘林作了许多工作，第九次教士团的全体成员返回本国时，都因行为不端受到弹劾。他们受到了轻重不等的处分，其中有些人后来恢复了名誉并被派到亚洲司工作^④。亚历山大一世亲自出马给 1821 年离开的第十次教士团以鼓励。这次教士团为首的是卡缅斯基(大司祭彼得)，被认为是一个“无瑕的老人”。沙皇并颁赠他二级安娜勋章，大批丰富的图书以及法衣。职级较低的教士也得到了赏赐，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前书，第 83—94 页。

② 巴尔苏科夫：《波果丁生平》，莫斯科，1890 年。俾丘林也做了许许多多不道德的事，有次教士团全体都被理藩院领导人叫去申斥了一顿。见前书，第 86 页等。

③ 巴托尔德：《西方研究东方的历史》，圣彼得堡，1911 年。

④ 巴尔苏科夫：《波果丁生平》，俾丘林本人改过自新了。以后在涅瓦修道院从事了三十年汉学研究，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

学生得到了薪俸。这次教士团第一次有医生参加。第十次教士团的行事,比起他们的前几任来好得多^①。在这次护送人员中有一名热情的青年人叫季姆可夫斯基,官职是八级文官,他往返北京的有趣报导于1825年出版^②。这一篇以及当时刊物中所发表的其他文章,表明在俄国公众中出现了对中国的广泛兴趣。季姆可夫斯基的文章最值得注意的是使政治历史学者了解到:俄国教士团和他们的护送人员与汉人、蒙古人,尤其是与后者的关系非常之好。

在第十次教士团时期,教士团与俄国建立的通信联络关系,更加正规。迄今恰克图与北京之间所有的报告与邮件都由俄国商人或蒙古人递送。其后,1826年时,有个蒙古人带着大司祭彼得一封致俄国当局的信回家,他带着这封信死在蒙古。他的儿子把这封信交给了中国官员,两国政府为此交换了照会。双方商定以后就责成理藩院,把文件递送到恰克图^③。这样做,使教士团的报告更能安全递到,而自然也给了中国人以暗地拆开信件的机会,使他们能够获悉俄国的策略。可是,中国人未能利用,因为他们没有可信赖的译员。在1727年建立教士团时,曾经挑选年轻满人^④,让他们正规地学习俄语。可是,看起来从1727年至1857年整整一百三十年间,其中没有任何人认真学习过。照克拉普罗斯所说,在第九次教士团在华期间,满族学生“所译的文字的第一行就不合最简单的文法规则”。孟思明指出,直到1860年,整个时期情况都一样^⑤。

① 维谢洛夫斯基,前书。

② 《北方档案》第9—12号(1825年)。

③ 克拉普罗斯,前书。

④ 这些人是当初在阿尔巴津(雅克萨)被俘的俄国人的后代。

⑤ 同前,他详细记叙了为满人学习俄语而设的学校,人称俄罗斯馆,谈到了学校的种种不足之处。大约从1757年起俄罗斯馆就在一所单独的院落内,由内阁和理藩院共同管辖。

第十一次教士团的人,从1830年到1840年都呆在北京,比起其他各次他们最为成功。参谋本部的上校拉狄仁斯基率领着人员护送他们出国,并把第十次教士团送回国。此事确切证明,俄国人在军事上对中国感到更大的兴趣。魏若明神甫是这次教士团为首的人,而他是不能胜任此职的。在1835年,大司祭阿瓦库姆^①代替了他。瓦西列夫说他“才智出众”,不过又是一个酒鬼。团内除四个教职人员之外,还包括一个医生,一个画家(列加希夫)和三位大学教授。其中有来自德尔布特的植物学家朋治,和后来在普
27 尔科沃观象台任职的天文学家富克斯。来自喀山大学,著名的蒙古学学者科瓦列夫斯基,则跟随护送队到中国打了个来回。这次教士团与其说是在布道方面的获得成功,不如说是社交方面获得成功。他们并没有比以往的教士团多收一个基督教信徒。但是“中国首要大臣和王公们”据说都拜访了教士团,并且要求其中的医生和画家为他们服务。“画家为北京所有的达官贵人们画了肖像”^②。这次教士团的报告,无疑可以对中国的政治作出饶有兴味的说明。

阿瓦库姆学会了中国话,回国后任外交部亚洲司顾问。1837年间喀山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学讲座,由第十次教士团的归国成员丹尼尔、什维尔洛夫主讲。他死后由曾任第十次教士团医生的沃伊谢科夫斯基继任^③。当1830年科瓦列夫斯基从北京返回时,赠送给喀山大学一百八十九种书籍,有中文、蒙文、满文、藏文共一千四百三十三卷,又赠给博物馆许多文物,包括满、汉各文武显贵

① 中文名安文公。——译者

② 维谢罗夫斯基,前书,为他们以及其后的教士团所作的医学工作,做了详细记叙,见斯卡奇科夫:《北京俄国传教士团的医生》,载《苏维埃汉学》1958年第4号。亦见《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

③ 巴托尔德,前书。

的肖像。^①后来科瓦列夫斯基成为外交部顾问,并且是穆拉维约夫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②。

1840年的第十二次教士团由杰出的汉学家符·普·瓦西列夫陪同前往。《俄国东方学历史概要》两卷集中有一篇长文谈到他的生平及其著作,另一篇文章则谈到科瓦列夫斯基。从这本集子中所引的瓦西列夫的日记摘要来看,第十二次教士团由于领导人波里卡尔普·图加利诺夫^③的专横,工作受到阻碍,没有他们的前任那么大的收获。不过,1844年,俄国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将教士在北京强制居留的时间从十年减为五年,以后,对中国的状况就做出了良好的研究成绩。^④瓦西列夫返国后成为喀山大学汉文²⁸与满文教授;1855年又是圣彼得堡大学第一任汉文教授。照《俄中条约汇编》文章的说法,他可能是俄国第一个大汉学家。科瓦列夫斯基主要是个蒙古专家;而俾丘林、列昂节夫和罗索兴,与其说是重要的学者倒不如说他们是熟练的翻译^⑤。1855年到1860年间,瓦西列夫对中国的历史与地理发表了许多文章,对中国文学也有一部著名的讲演集。此次教士团其他许多成员汉文也学得很好,后来十年,他们还在俄国政府里担任了重要工作。

第十三次教士团于1850年赴北京时,由另一位杰出的汉学家卡发罗夫(大司祭巴拉第)率领,他已经跟随第十二次教士团在北京呆过十年。他发明了以俄文字母拼写成汉文的办法。这至今仍为俄国所采用,而且仍然以他的名字命名。在他的指导下,教士团于1852年把每年发表的文章汇集成册,加以刊行。其中有些文

① 《俄国东方学历史概要》第2集。

② 卡巴诺夫,前书和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材料》(二卷集,莫斯科,1891年)。

③ 中文名佟正笏。——译者

④ 《北京的俄国传教士团史料》,第115页。教士团继续留住十年。

⑤ 巴托尔德的看法也是如此,见《西方研究东方的历史》。

章被认为饶有趣味，值得译为德文^①。到1860年，巴拉第发表了不少学术性的文章。主要是基督教会和佛教在中国的历史，也有论及通过蒙古的不同路线的著作^②。

巴拉第或许在政治领域内对于他的国家贡献更大。虽然他在任期间，教士团在中国人中间的人缘由于外在的原因而越来越坏，可是它仍然是对俄国政府非常有价值的代理人。教士团不是外交使团，却是一种与外交沾边的组织。巴拉第非常适合担任官方观察员的角色，因为他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还会英语和法语^③。他虽然不能得到太多的准确情报，然而他能使圣彼得堡知道北京方面的一般动向。他的报告，比起驻在上海和广东的英法代表递交伦敦和巴黎的决无逊色。英法代表虽然享有更大的行动自由，但远离中央。不象在中国南方的欧洲国家的代表们，巴拉第在北京利用间谍获得中国政府文件副本的机会比较少，可是他能从北京的街谈巷议中刺探到很多东西。

除了他给政府的报告以外，巴拉第^④还写些冗长的信给穆拉维约夫。这些信件见于1914年的《俄国档案》，这也是我们评价写信人的政治功绩的主要依据。穆拉维约夫确实从巴拉第的信件中得到许多帮助。这些信件成为穆拉维约夫手中的宝贵武器，不仅可以用来对付中国人，而且还可以对付俄国政府中敌视他的政策的人所持的怯懦态度。可怪的是《俄国东方学历史概要》一书里有恭维俾丘林、科瓦列夫斯基和瓦西列夫的传记，而对巴拉第却只字

① 可在巴黎的现代东方语言学校内见到一些付本。

② 亨利·科尔迪埃所写大主教巴拉第的讣告，见《远东评论》1882年第9—15页。

③ 他曾与几个遇难的美国和法国海员谈话，并设法把他们经通商口岸遣返本国。

④ 巴拉第给外交部写了大量的政治性报告，对教士团只写些内容贫乏的纯粹布道性质的报告。因而在官方关于教士团的历史中，受到（含蓄的）批评。见《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第127等页。

未及。也许可以这样揣测,部分原因由于他是教士,部分则由于他在北京所起的颇为暧昧的作用^①。

俄国方面由于展开了对中国的研究,加强了教士团的作用,并且改组了外交部,才使俄国政府于1857年面对中国时有了充实的知识作为后盾,而中国方面当时对于俄国的无知,并不比1792年差多少。俄国的军事力量,尽管不久要在英、法面前丢脸,比起中国来却无疑要强得多。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的军事状况。本章从中国档案中摘引的几节,也雄辩地说明中国在新疆和蒙古边防的真相。舞台已经布置好了,可以使俄国显示一番它新近对中国取得的优势。可是这种优势力量要等到穆拉维约夫受命为西伯利亚总督之后,才实际上施展出来。

中国政府被国内问题和欧洲人从南方施加的压力所纠缠,直到1850年代,一贯对俄国采取不惹麻烦的政策。林则徐与魏源在1860年的对英战争中,从他们对地理学的研究得到启示:认为应使法国与美国进攻英国,俄国人和廓尔喀人进攻英属印度。然而,利用俄国的想法,从来未曾为清朝皇帝以任何方式采纳^②。

涅谢尔罗捷和他的同情者对中国的态度,比起满清对俄国的态度,也没有多大的差别。早在1840年,涅谢尔罗捷就责成北京教士团的秘书列比莫夫就阿穆尔问题与中国人进行谈判,但是未能做到。此后,用穆拉维约夫的话来说,外交部“反对早在我前任任职时期由地方当局提出的一切意见,一部分原因是恐英病作祟,而

① 余元龢所写:《三百年来的中俄友谊》,见:《历史研究》,1957年11期,文中,巴拉第却是受到赞许。

② 林则徐、魏源:《海国图志》(1844年);亦见费正清、邓嗣禹前引书各页。林则徐以持独特的观点而著名。他认为俄国是中国最迫切的祸患。当他于1842—1845年任伊犁总督时,曾试图加强中国对伊犁的控制。吴相湘认为林则徐是自他那时起中国抗俄政策的根源。可是,抵御俄国的渗透自两国最初有所接触以来,即成为中国对俄政策的基调。(按:伊犁将军1840—1845年为布彦泰,林则徐于1841年发往伊犁。——译者)

大部分原因则是由于门户之见。也就是说,凡是外交部这位文职官员所办不到的事,其他任何人当然也办不到,而且也不应该办^①。1844 年来登道尔夫的远征,带回许多有用的资料,给政府中的一些人包括尼古拉一世以轻微的推动。1843 年,普提雅廷提出了一项计划,打算进行一次远征,为俄国的贸易打开中国的某些商埠。外交部初步批准了它。但是财政大臣审查后认为不值得用这么多经费^②。待到 1846 年,沙皇派了加夫里洛夫到阿穆尔河口作秘密勘察,而加夫里洛夫所提出的错误报告使他把此事搁置了。^③

从一些俄国出版物中详细引证俄国政策的发展与从 1847 年起实际占领阿穆尔的始末,显然是多余的。所以,对于 1847 年到 1857 年事态的描叙,从俄国的著作中只作一些最小限度的引证,而尽可能地要注意到中国的档案材料。

对中国执行急进政策和思想,随着穆拉维约夫奉命到西伯利亚,而得到了有力的提倡,并开始迅速发展。在穆拉维约夫节节前进以后的两年,涅维尔斯科依在 1849 年的远征,证实阿穆尔河可以通航。1850 年就在该河河口附近建立第一个俄国哨所。第二个哨所则建在尼古拉耶夫斯克^④。中国档案中找不到痕迹足以证明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曾经传到北京皇帝的耳中。尼古拉一世和穆拉维约夫显然是对的,他们都没重视扎克列夫斯基所说的话。他说中国人曾在买卖城^⑤告诉俄国商人,穆拉维约夫为打通阿穆尔

①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 2,第 200 页,穆拉维约夫致科瓦列夫斯基,1858 年 10 月 28(16)日。

② 克兰普敦爵士对阿穆尔问题的报告。

③ 据孟思明,前书,摘自《文献统编》卷 27,6.5,1847 年曾由大司祭波里卡尔普经手向北京朝廷提出,要求增开三处通商口岸,但遭到拒绝。

④ 即庙街。——译者

⑤ 俄国称为恰克图。

航路所作的努力，引起中国朝廷的牢骚与不满^①。

在沙皇于 1850 年为讨论阿穆尔问题而设立的基立亚克委员会上，涅谢尔罗捷是对俄国攫占该地的主要反对者。他在会上作出有名的呼吁。俄国不应占领阿穆尔，以避免来自中国方面的“极度危险”。中国政府会提出质问和抱怨，并且可能发动对俄国新建 32 哨所的大规模攻击。这说明他仿佛仍然生活在一个或两个世纪以前，因为他见不到这种攻击只能是英国——唯一不太可能的对头——的影响所造成的后果。他真正地相信满人仍然有力量在阿穆尔地区采取独立而有力的行动。不过，涅谢尔罗捷被否决了。基立亚克委员会于 1851 年 1 月 19 日会上决定加强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②，虽然名义上把事情委之于俄美公司。

在另一极端，穆拉维约夫又过高地估计了中国人想与俄国在政治上密切联系的热心。1852 年，他向尼古拉一世呼吁要发表一项对中国皇帝友善的声明，他希望如果叛军把清朝皇帝赶出北京，就请他逃到俄国领土上来。不久，穆拉维约夫又写信给孟什科夫说，清朝皇帝会欢迎俄国军队作为抵挡叛乱的堡垒进入中国^③。1853 年，他又写信给司徒卢威说，1842 年战争的开始，“中国朝廷已经察觉自己的虚弱并切望接受俄国的帮助与指导”。他脑子里经常有个希望在支持他，即能把中国朝廷置于俄国的某种影响之下。穆拉维约夫也许因为曾在恰克图发现中国人与俄国人之间普遍存在着友谊而这样想。司徒卢威^④描述了在那时候两个种族之间原有的猜忌如何成为了往事。尽管汉人通常很少离开他们所住的城，但在正月初，俄国人、汉人、蒙古人，都随便跑来跑去，还一起去参加

① 舒马贺尔：《获得黑龙江的历史（1848—1860 年与中国的关系）》，见《俄国档案》第 11 号，第 3 册，第 261 页。

② 同上。

③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 2，第 89—90 页。

④ 司徒卢威：《西伯利亚回忆录（1848—1854 年）》各页。

蒙古人庆祝正月初一的节日，甚至汉人还有时在中国城内款待俄国人。

- 以中国档案资料为基础来看，道光皇帝旻宁既无意与俄国敌对，也不想与俄国联盟。他只简单地希望事情尽可能保持原状。他
- 33 对俄国的看法可以用一只俄船访问上海发生的事件为例。1848年夏，俄美公司名叫“孟什科夫公爵”号的船抵达上海，把四十年前“希望”号与“涅瓦”号拟在上海贸易的请求重新提了出来。两江总督李星沅与江苏巡抚陆建瀛的奏折 1848年9月17日（道光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到达皇帝之手^①。此一奏折汇报俄国人是英国领事介绍来的。上海道台令俄人在军队监护下离开港口。虽然他们的货物只有狐皮与麦子，两种均非禁品。此外，道台又秘密地向英国领事讲，如果让俄国人来上海贸易，就会很不利于英国与其它在此贸易的国家。领事因而就同意让俄国船在接到通知以后二十天内出口。中国当局所提的理由是：他们查知，俄国照例只准在北方陆地通商（总督想必查过 1808 年的记载）。穆拉维约夫与俄国当局一般地认为让“孟什科夫公爵”号离开上海是英国人搞的鬼^②。而从英国外交部的档案可以看出，英国领事阿礼国向道台引见了“孟什科夫公爵”号船长莱顿布尔格^③上校，并解释了他的要求，他没有从任何方面对中国人施加影响。在致英国驻香港的贸易监督文翰的一份报告中，阿礼国解释说：“依我愚见，似应遵照我们所订条约的精神，使我们盟友的臣民得力于英国的协助，但又不致使英
- 34 国为各有关方面承担任何责任。”由于阿礼国活动的结果，道台准许莱顿布尔格卸货。即使后来两江总督命令俄船出口，道台仍然容许俄船寻找买主，售完货物^④。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 79，第 20 页上。

②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 1，第 269 页。

③ 即李顿北（旧译名）。——译者

④ 英国外交部档案 17/144 阿礼国致文翰 3/8/48。同上，17/145 阿礼国致文翰 9/9/48。

皇上对遣走俄船表示满意,在9月19日奏折上硃批如下:“所办甚属妥协,可嘉之至。”

在头一份奏折中,陆建瀛与李星沅表达的是,俄船“仅望贸易”,当时他们船上只有二十八人,但有炮六门。在1848年10月16日(道光二十八年九月二十日)^①皇上收到的第二份奏折中奏道:为该船事他们已与英、法、美“夷”商讨,均认为俄船欲在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各地贸易。两年之后,同一条船再次到达上海,并照样被遣走时,皇帝于1850年10月8日(道光三十年九月四日)的谕旨中宣称,“俄人此来,难保非英夷暗中招致”。^②

1847与1848年,俄国人两次通过教士团的首脑要求在伊犁与塔尔巴哈台贸易,都遭到清廷的拒绝。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1850年1月—2月)护送新教士团的军队指挥官转达了俄国要在该两地贸易的要求,同样遭到拒绝。^③

旻宁在临死那年终于同意俄国在新疆贸易。俄国政府派遣科瓦列夫斯基来与满人伊犁将军萨迎阿谈判俄国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通商与设领事。萨迎阿在奏折内谨慎地建议只准俄国人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两地贸易,喀什噶尔距俄边界太远,不应 35
应允。1850年3月3日,旻宁病已垂危,在一则短谕中硃批著理藩院酌办^④。稍后,理藩院奏陈同意萨迎阿的意见,并咨文俄国允予会谈^⑤。对俄国的这一让步究竟与皇帝的健康欠佳有多大关系虽难确定,但看来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此事造成的。巴拉第则认为这与赛尚阿有关。他是军机处的一位蒙古成员,后来为奕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79,第22页下。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咸丰,卷3,第1页上。

③ 皇帝收到的理藩院奏折中提到,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1,第7页上。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1,第1页上。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1,第7页上。

许所斥逐^①。在这里要提的是《筹办夷务始末》上既无论旨亦无硃批著将咨文递交俄国。

新的皇帝名字是奕訢。他在新疆执行的政策没有任何变化。只主张拒绝俄国在喀什噶尔贸易，他在新署新疆将军奕山的奏折中说明了这样办的理由。这一奏折于1851年5月2日送达皇帝手中(咸丰元年四月十二日)。奕山表示害怕俄人在喀什噶尔收税与征用乌拉^②。奕訢与此意见一致。^③显然，清政权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太薄弱，因而不敢冒险允许俄国人到那里去。中国方面谈判代表奉命提出的理由是，中国不能担保可以防止这一带凶恶的穆斯林部落对俄国商人的攻击。中国人想借此把俄国人从喀什噶尔吓跑。事实上，想在喀什噶尔通商的要求，不过是双方讨价还价中的一张牌。在伊犁和俄国代表最后的会谈中缔结了伊犁条约，奕山报道俄人：“举止语言，甚为恭顺”，在告以喀什噶尔断不许贸易之时，该代表等并无异言^④。照巴布科夫所说，中国人对俄国的要求³⁶ 求轻易屈服的原因在于西西伯利亚总督戈尔查科夫亲王在整个中国西部边界布置了备战警戒^⑤。

通商条约谈判尚在进行中，此地又复奏报在蒙古乌梁海地区出现侵害边界、抢劫与谋杀。这是由几小股俄国人干的：这件事或许要与俄国人向谢米列钦的推进联系起来。当时旻宁还在世，理藩院致送一份咨文，就此事向俄国提出抗议^⑥。拖延了一阵之后，俄国政府对此作了答复，宣称边界事件系由俄国人攫回被窃马匹与

① 见第61页以下。

② 一种征集人畜为驿运服务的制度。

③ 《筹办夷务始末》上的奏折，卷4，第29页下。同日的圣旨，第31页上。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5，第5页上，咸丰元年七月十五日折奏。

⑤ 巴布科夫，前书，卷1，第3章。按：此处戈尔查科夫与1856年后的外交大臣哥尔恰科夫并非一人。——译者

⑥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咸丰，卷2，第44页上等。

骆驼所引起；还说俄国设立新卡哨又系应哈萨克人的要求，保护他们的^①。咸丰帝降旨着即将各项事情访查明白。因为他收到的奏报是互相矛盾的^②。看上去这是奕訢早期努力要使他的朝廷有些效率的典型事例，但对于此事，档案中并没有再进一步的文件。显然，这件事也象他所作的其他努力一样，都渐渐停顿了。巴拉第1851年6月13日（1）写给穆拉维约夫的信谈到奕訢说：“新的皇帝亲自积极地致力于朝廷各部门的事务，他虽然年轻，却显出一个成熟的人的坚定和远大眼光。”不到一年，1852年3月14日（2）巴拉第给穆拉维约夫写道：“总之，朝廷各部的首脑或是高级顾问，并没有想进行真正的改革，皇帝的意图虽然好，也只有去和御史们打交道了”^③。

伊犁条约是1851年7月签订的。它的形式是大致平等的两方签订的一项文件。这里找不到任何一方感到自己比另一方强大的痕迹，例如1792年的条约或在1895年与1905年中俄双方缔结的条约里就都出现过的那种情况。在俄文《中俄条约汇编》，和中文《咸丰条约》中刊布的中、俄文约本，却有歧异之处。倘若任何一³⁷方日后想挑起争议，是可以从中找到借口的。中文约本第二条特别说明在中国境内每遇两国之人发生冲突，两国均需派员共同调查^④。但俄文本略去“共同”，只说由俄国领事调查此等事情。俄国本第九条说中俄商人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可以互相自由拜访对方”，中文本的词句是“两国商人交易之事，自行往来贸易”。中国方面的原本用满文书写，可能在译成汉语时引起了这种歧异。

伊犁与塔尔巴哈台的协议证明都是圆满的，贸易也繁荣起来。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4，第2页下。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4，第12页上，第38页下。

③ 《俄国档案》卷2（1914）。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5，第7页下所载伊犁条约第二条系“遇有两边商人之事，各自秉公办理”。——译者

1853年10月2日(咸丰三年八月三十日),奕山奏陈伊犁已有俄人八十六名,都能彼此相安无事^①。

伊犁条约还没有签字,俄国方面已经为阿穆尔问题采取了可以比喻为开第一枪的行动。这是在涅谢尔罗捷主持下,由俄国外交部发出的一件简短照会^②。它知会中国朝廷,外国船只已经在向阿穆尔河口行进,并建议中国与俄国应仔细考虑共同在河上设防。舒马贺尔描述了穆拉维约夫对这一照会的恼怒。因为,这件照会是他出国在外毫不知情时发出的。穆拉维约夫认为,这一举动危害了他打算不受中国干扰占领那一地区的机会。但是,清帝没有理睬这次照会,虽然他至少在名义上是看过它,因为这一文件已列入《筹办夷务始末》之中。

俄国人与中国人在恰克图的关系依然很好。1851年1月27(15)日,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城市,有它自己的市长。为在地方上与中国人打交道方便起见,穆拉维约夫积极促成了它。按照司徒卢威的说法,中国(蒙古)当局对于这种变化,颇为高兴,他们也
38 认为这样办有好处^③。几年以前,一位新的蒙古亲王德勒克多尔济就任库伦办事大臣。他不仅负责全外蒙,还管着大部与俄国打交道的事^④。十分奇怪的是,在中国方面他的任命标志着一种新开端,隐约地模仿着穆拉维约夫所作的任命。德勒克多尔济仅仅是这个垂死政体过时文化的奴仆,无法以超人的努力来对它们注入新的生命。他能够做的事很少,可是,从他经常不断地向皇帝所上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6，第36页上。

② 舒马贺尔，前书，第264页；《俄国档案》第11号，1878年；《筹办夷务始末》，卷4，第36页下。

③ 司徒卢威，前书，第161页及其后，在递向奕訢的报告中说俄国新派的长官极为恭顺。

④ 他所递呈的第一份奏折见于《筹办夷务始末》，卷2，第36页下，道光三十年八月十一日(1850年9月16日)。

的奏折的内容来看，他是中国与俄国人办交涉中少数干练的官吏之一。德勒克多尔济呈递的有关俄国的奏折，迄今为止比任何一个官吏多得多，部分原因是由于俄国人的活动确实很频繁，但无疑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他个人的热忱有关。

1852年3月14日（咸丰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德勒克多尔济奏报，俄人来此查询蒙古当局是否发现前一年有三名越界的俄国逃人^①。所谓的逃人，里面可能就有一个中尉叫瓦加诺夫的，他便是1850年奉派来阿穆尔秘密勘察的人。按司徒卢威的说法，他已被杀，中国人将凶手的尸骨解交俄国。按《筹办夷务始末》记载，这三人都黑龙江被杀，凶手均处以重刑，送回俄国的是俄国被害者的尸骨。

1852年6月25日（咸丰二年五月八日），德勒克多尔济奏报他对俄人有所疑虑^②。他说俄人在布利亚特各族各部驻扎重兵，因为各部据传颇为不靖，因此他已下令边界严行戒备。纪录上还没有³⁹其他的官吏曾象他这样早地引起皇帝对俄国人的警惕。可是，他以与他同时代人相同的典型无知，提出意见说，俄国统治者从北京教士团寄送回国的信函中得知中国南方的事态。显然，他相信欧洲各国之间，也象中国与欧洲那样过着彼此隔绝的生活。德勒克多尔济的奏折中，也报告了俄军向东移动^③。这是北京朝廷得知1852年穆拉维约夫在阿穆尔的活动唯一的迹象。他们对前一年涅维尔斯科依的考察队也没有得到什么消息。对于德勒克多尔济关于边防的及时报警，皇帝的反应仅仅是按老一套下令责成他加强警戒^④。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5，第19页上及其以后。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5，第23页上。

③ 此折并未见于《筹办夷务始末》，但所载论旨上提到它，《筹办夷务始末》，卷5，第23页下，第24页上。

④ 同上。

倘若不是由于穆拉维约夫,阿穆尔边界问题在 1853 年是可以对中国更有利地定下来的。那年春天,阿赫杰在对阿穆尔以北地方作了两年勘察之后写的报告抵达了圣彼得堡。尼古拉一世决定在他勘察所得的基础上,促使中国只把自布列亚河到阿穆尔河口的地方让给俄国。他下令致送一项照会给北京的朝廷,要求派员就划定格尔必齐河以东地方的边界一事与俄国人商讨。但在涅谢尔罗捷一派人的把持下,这份照会拖延至 1853 年的 6 月 28 (16) 日才发出。穆拉维约夫其时已赴欧洲,以致他无法来反对他们的计谋。这份照会大部份为舒马贺尔所摘引,他把此事以后的发展作了详尽的叙述^①。

1853 年 9 月 7 日 (咸丰三年八月五日) 收到了俄国来的照会^②。清朝皇帝反应很快,当即谕令黑龙江将军英隆亲自查明约本与边界情况^③。英隆奏报同意划界^④。奕訢降旨明春派员会同俄国人进行商定^⑤。按舒马贺尔所说,黑龙江将军与吉林将军于是年年末在库伦与德勒克多尔济会齐。舒马贺尔还认为英隆愿将阿穆尔北岸让与俄国而吉林将军反对^⑥。

1853 年,涅谢尔罗捷一派也打算取得扩大贸易的特权。同年年末,海军上将普提雅廷赴日本途中船开进上海港。他的到达在时间上配合着俄国的另一件照会,要求中国把业已向西欧各国和美国开放的通商口岸,也向俄国开放。可是,这些举动没有做到使清帝改变主意,反而加深了他的疑虑。1854 年 1 月 2 日 (咸丰三年十二月四日) 的谕旨是^⑦,着上海的钦差大臣饬令普提雅廷所乘船只

① 舒马贺尔,前书,第 275—276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 6,第 32 页上。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 6,第 35 页上。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 7,第 1 页上。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 7,第 1 页下。

⑥ 舒马贺尔,前书,第 275—6 页。舒马贺尔说的库伦会谈日期是 (儒略月) 11 月。

⑦ 《筹办夷务始末》,卷 7,第 6 页上,俄国照会在 7 页上 8 页下。

离开,并“严密稽查防范”,虽然船只还仍然任其修理完毕并备齐食物。1854年2月10日(咸丰四年一月十三日),普提雅廷再次到上海稍事勾留,又得到了同样的对待^①。

开放海口取得贸易特权的要求,早些时候在1853年8月恰克图市长列宾捷尔和德勒克多尔济的友好会谈中也提出过。但是德勒克多尔济并未奏报此一请求。唯一提及此次会议的人是司徒卢威,按他所说,关于此次会谈的各个项目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德勒克多尔济“十分焦急”地询问列宾捷尔,如果,蒙古与满洲联合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俄国将站在哪一边。倘若真有其事(司徒卢威的话向来被卡巴诺夫认为靠得住),则这些地方也许发生过某种未遂的阴谋,或至少出现过叛逆的议论。俄国人也听到关于这些事的谣言。因为与俄国6月28(16)日发出照会的同时,还有第二件照会(载在《筹办夷务始末》,但舒马贺尔未提及),探询蒙古境内是否有骚动。奕訢相当迅速地答复没有这回事,无论那里发生过什么样的骚动,必定都已经平息下去了。因为,在俄国进占阿穆尔和海滨省的整个过程中,蒙古和满洲的民情都非常安定。⁴¹

1853年8月,俄国在迭卡斯德湾建立了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在基齐湖附近建立了马林斯克^②,在皇帝湾建立了康斯坦丁诺夫斯克等哨所,这些都没让北京知道。

1854年初,穆拉维约夫返回俄国,立即挫败了中国人和涅谢尔罗捷一行想在阿穆尔以北定界的企图。当穆拉维约夫一得悉这件事,马上返回了伊尔库茨克,指示列宾捷尔用空洞的礼节敷衍中国官员的查询,并不说定会谈的日期^③。他还有意拖延了2月18(6)日,俄国政府从恰克图发出的重申要求划界的照会。从那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7,第17页上。

② 即阔吞屯。——译者

③ 舒马贺尔,前书,第276页。

时起，以后多年北京朝廷对于俄国人的真实意向，完全摸不着头绪。这样说决不是过甚其词。

清朝皇帝于 1854 年 5 月 9 日显然被弄得莫明其妙。因为他在那天，既收到德勒克多尔济报告，俄方久经耽搁的 2 月 16 日照会终于递到库伦；又收到穆拉维约夫本人的来文，宣称他已受命与理藩院直接办理交涉，并请求许他派遣一名官员至北京递送重要公文给俄国教士团^①（他企图派此人，即扎博林斯基上校去阻拦中国划界官员从北京出发）。同天（咸丰四年四月十三日），有一道谕旨令德勒克多尔济不准穆拉维约夫派来的官员入境^②。

但是，阿穆尔问题已不容搁置。外部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穆拉维约夫方向演变。1853 年底之前，英国和法国两政府无意中触动了天平，使它偏向穆拉维约夫方面，从而保证他的阴谋得逞，阿穆尔地区稳稳落入俄国手中。

对英国的恐惧，无疑经常是穆拉维约夫的政策的一个主要动力，这正为他立意为俄国争光；他羡慕美国；以及他决心趁中国积弱而获利^③。1846 年与 1848 年，有两个英国人（吉尔和奥斯丁）访问了东西伯利亚，都被俄国当局视为密探。1848 年，穆拉维约夫对奥斯丁乘木筏下驶阿穆尔的企图极为疑忌，他把他抓起来送回圣彼得堡^④。他认定英国政府随时都会作出攫取萨哈林或阿穆尔河口的决定。穆拉维约夫关于英国的公开言论曾由巴尔苏科夫征引，在英国易于见到。可是司徒卢威关于他的回忆录则比较难得。因此他给司徒卢威的一封信，值得在此摘引。1853 年后半年，穆拉维约夫向司徒卢威写道：“如若我们不在东海采取特别措施，那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 7，第 25 页下。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 7，第 26 页上。

③ 此点独见于巴尔苏科夫书中的文献内，尽管苏联作者尽可能使人们少去注意他对美国和中国的态度。

④ 司徒卢威，前书，与巴尔苏科夫，前书，卷 1，第 191—192 页。

么,英国在中国作战与英国在中国沿海扩张海上实力的结果,必将无可挽回地危及我国与中国的贸易。并且还会危及我们对那个遥远的地方的绝对占有,甚至能是永远不让俄国对该处有将来的抱负。”害怕英国攫占萨哈林或阿穆尔河口的俄国人并不限于穆拉维约夫一个,这种恐惧之缺乏事实根据,不下于当时英国人之害怕俄国进攻印度^①。可是,穆拉维约夫判断,俄国采取行动的历史时刻业已到来,自然是正确的。这样有利的环境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正当英、法为了支持土耳其而准备与俄国作战的举动已经明显的时候,尼古拉一世或多或少地为穆拉维约夫一派争取过去,在1854年初阿穆尔特别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作出了允许穆拉维约夫执行以木筏与轮船下驶该河的计划。这是对阿穆尔河口俄国据点的有效增援,也是对中国投下的挑战书。可是,在此关键时刻,沙皇还并没有同意穆拉维约夫急剧改变远东边境的愿望,而主要关心于不让阿穆尔落入英国之手^②。

现在该来研讨一下英、法政府对阿穆尔问题的政策了。这并不需要多作解释,因为他们并没有什么政策。法国不完全是个世界强国,她的态度不顶重要。当然,英国在那时是除俄国之外,能在那一遥远地方发挥若干真正力量的唯一国家。她的政策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为了能在撰写本章时说明这一问题,作者只查阅过一些为人所熟知的已公布的文件^③,从中可看出,英国政府从未认真考虑过,俄国在她的西部边界或堪察加遭到攻击时,在中国边界上

① 俄国已公布的资料来源中,唯一业经发现,并可作为这些疑惧根据的文献记录是:普提雅廷伯爵曾于1855年看见有些炮舰在法国瑟堡集中,并且以为它们可能是准备作阿穆尔远征之用的(见卡巴诺夫,前引书,第264—265页,摘引《海军档案》,第410集,1157号)。法国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曾经占领过朝鲜与九州之间的乌鲁普岛,见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伦敦:1861年)。

② 舒马贺尔,前书,第277页。

③ 《牛津英格兰历史》,卷13;《剑桥英国对外政策史》,卷2;贝尔:《巴麦尊》(伦敦,1936年);戈登:《阿伯定公爵》,伦敦,1893年以及克里米亚战争的历史。

44 俄国人可能作出的反应^①。崔威扬在他所著《英国史》中写到克里米亚战争时说：“……沉沦的巴尔干基督教各民族的状况，甚至于它们的存在，在当时的英国很少有人揣测。因此，没有人提出过建议，要建立一个自由的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来制止俄国向前推进。象以前坎宁^②，曾为那样的目的而建立独立的希腊。”如果英国统治者对于巴尔干如此漠不关心，那末他们对于荒无人烟的东北亚处女地的不关心还要大十倍。英国海军力量在整个世界大为扩张，但是究竟不能包罗全球，而北太平洋在海路上又离英国最远。那里没有常驻的英国海军^③，英国工商业在那个地区的利益也很少。1853年，英国女皇陛下的政府露出有向俄国宣战之意，因而为穆拉维约夫制造了机会。1855年，英、法分兵袭击堪察加，看上去正好证实了穆拉维约夫提出过的英国阴谋在这一地区夺占土地的警告。

假如克里米亚战争不爆发，可以想象尼古拉一世也许会一直到死保持着一种介于穆拉维约夫与涅谢尔罗捷之间的迟疑不决的政策。而亚历山大二世则很可能不得不全力关注内部问题，而不会在遥远的东方发动新的冒险。1860年之后，在英国已经获得对中国朝廷的一定控制的时候，俄国在远东的扩张，或许不会那么容易。1881年的伊犁事件对俄国只是局部的有利，尽管这一地区是英国海军力量达不到的。及至十九世纪之末，英国虽已不是欧洲
45 之外一切重大冲突的唯一可能的仲裁者，但是日本那时却可能会有效地挫败俄国沿阿穆尔东下的行动，就象他们反对沙皇沿辽河

① 法国人对于此事有些疑心，因为法国外交部曾于1854年1月7日写信给在澳门的法国使节布尔布隆命他查核一下俄国企图送军械军火帮助北京朝廷镇压叛乱的谣传是否属实。布尔布隆3月8日的答复解除了法国的疑虑（见科尔迪埃：《第一个法日条约》，原载《通报》，转引入胡世泽，前引书，第217—218页）。

② 坎宁勋爵是当时的英国首相。——译者

③ 温哥华岛海军基地的问题系1860年以后才提出的。

南下扩张一样。

1854年4月,穆拉维约夫从伊尔库茨克给中国朝廷发出一纸照会,通知他们他准备带兵沿阿穆尔而下直赴太平洋沿岸,以防阻敌对国家的攻击。该件的日期是1854年4月26(14)日,巴尔苏科夫记载了这个照会的全文^①。可是这件照会递到北京朝廷手里时,已经是7月了,一如下面所见,清朝皇帝头一次听到木筏远征的消息,还要等到黑龙江和吉林将军奏报木筏已过瑗珲的时候。

就在此时,穆拉维约夫仍然希望对清廷取得直接的影响,他还构成了一种设想:如果扎博林斯基到了北京的话,就让他提出俄国出兵,经由阿穆尔与松花江穿过满洲去镇压叛乱。1854年5月13(1)日,他将此意写信告知扎博林斯基^②。

几乎可以肯定,俄国人远征阿穆尔是突訢意料之外的。与此同时,克里米亚战争的最初消息,也传到了中国南方。1854年6月23日(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叶名琛与广东巡抚柏贵^③,对于这一交锋的原因与开始阶段作了颇为混乱的描述。他们提出对俄国应持审慎政策并建议不允其在已开口岸贸易。这样就使皇帝猜疑俄国在向南转移。遂于同日的旨谕中讲到:“俄罗斯夷兵,欲与英夷寻衅,难保不另蓄奸谋”,并饬各海口炮台严行防守。

就在次日,来了吉林将军景淳的奏折,提供了穆拉维约夫远征阿穆尔的详情^④。此系据瑗珲副都统胡逊布所报。他和其他官员⁴⁶登上穆拉维约夫所乘的船并与之交谈。这位俄国将军宣称,他已

①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2,第114—115页。

② 扎博林斯基:在1883年6月《古代俄罗斯》的文章(胡世泽摘引,前书,第640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8,第2页下以及其后各页。

④ 同上,卷8,第4页下。

照会理藩院。他并将他此行目的作了与照会内容相同的解释，他还说此次远征人数仅一千，后面也并不再来人。据舒马贺尔说这些都是真实的，只不过有重要的保留，即穆拉维约夫打算在以后几年中还要带领更多的人。而胡逊布和清朝多数的军人与官吏一二千样，似乎不能对人数作出正确的估计，他认为跟随穆拉维约夫的有人。奏折继续写道：“查本省兵丁军器，一概不足，未便遽起争端”^①。胡逊布终于允许船只通过。据舒马贺尔所说，他事实上并没有吭声。在批复他的奏折时皇帝说明^②，俄国人所说此次远航因系“英人占领岛屿之说”，未可尽信，而如果俄人对经过之处果无扰害，则“亦不值与之为难也”。璦琿都统受命著意防范，但并未提到对他有所增援。几天以后，奉天将军又有不同的奏报，他对俄人远征的规模，作了较低的估计。德勒克多尔济受命以后要不是自己当面询明的就不应该具奏。换言之，即不应该为此经常打扰皇上^③。

不久，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谣言，更多地传到了咸丰耳中，这就把他对俄国实力的了解搞得更乱。江苏巡抚奏陈，听到一个英
47 国官员讲，俄人准备攻击香港^④。1854年7月20日（咸丰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两广总督叶名琛又送来一则对战争作了曲解的消息^⑤，把俄国描述成为土耳其的宗主国，为了保卫它的权利，而抗击英、法的侵略；在战斗中英国被说成既没有得到多少胜利，也没有积极性。

1853年7月24日（咸丰四年六月三十日），大司祭巴拉第终

① 拉文斯坦，前书，第119页。对当时璦琿驻军作了一个可悲的描绘。该地当时仅一千人，带戈矛弓箭。只很少几个人有火绳枪。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8，第6页下及其后各页。陈，前引书，第94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第7页上，第8页下。

④ 《筹办夷务始末》，第21页下。

⑤ 《筹办夷务始末》，第23页下，自报纸中汇编的。

于把穆拉维约夫的照会译成汉文^①。这件照会是军机处中书交给他的。也许穆拉维约夫曾经秘密地把这件照会拖延不递送，就象他压下2月照会那样，希冀借此使满人意外地吃一惊，因而不欲抗拒他的武力。另一方面，它可能由于途经蒙古的邮递常有意外而耽误，因同一年巴拉第所迫切等待的某些新指示，曾于3月18日从恰克图发出，但直到7月5日才递到北京^②。

1854年8月14日（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清朝皇帝收到德勒克多尔济的奏折，折内大胆陈说俄人在阿穆尔河上的远征绝不当允准^③。1854年10月17日（咸丰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皇上又收到吉林将军另一奏折，首次报称阿穆尔河下游存在俄人屯居地^④。协领富尼扬阿年初在恰克图等待与穆拉维约夫相会而未能见到，就与穆拉维约夫的船保持一段距离尾随前进，从而发现了屯居地。他报告说，俄国人在阿穆尔河有“大铜炮二位”，“小铜炮二位”，“枪炮弓箭俱全”。面对这种消息，奕訢没有作出什么激烈反应，仅只旨谕德勒克多尔济致函俄国萨那特衙门，要他们派代表于来年春天勘察边界^⑤。这种消极的决定，如非经过北京朝廷内部⁴⁸的深思熟虑，是不可能作出的。

巴拉第在一封日期为7月21（9）日致穆拉维约夫的信中报告说^⑥，军机处有一次讨论俄国问题的会议，会上“皇帝之弟”采取亲俄路线，他回顾了自1689年以来与俄国的长期和平相处，和沙皇所下不准向中国输出鸦片的禁令。巴拉第认为，北京朝廷将会“满足于在阿穆尔充当观察员的脚色”。

① 《筹办夷务始末》，第25页上，陈，前书，95页。

② 《俄国档案》卷2，1914年，7月5日（6月23日）巴拉第致穆拉维约夫。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8，第29页上。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9，第7页下。

⑤ 《筹办夷务始末》，第8页下。

⑥ 《俄国档案》卷3，1914年。

夏季,大司祭巴拉第自行采取步骤,要进一步造成满人对俄国畏惧,并顺从俄国。为了支持穆拉维约夫的计谋,他向俄国教士团的监督、理藩院官员苏彰阿递送了一封半官方信件^①,吁请让穆拉维约夫所派使节入京。此事他在上述7月21(9)日信件中向穆拉维约夫作了汇报。在此,也谈到了他相信北京朝廷内部已经越来越认为英国人支持太平军,俄国政府支持清朝。事实上,关于英国人的这种想法是没有甚么根据的^②。

巴拉第在同一封信内,还提到北京谣传俄舰一百二十艘,已在中国南海打败了英国人。一支俄国的海军远征队业已抵达上海,打算先肃清南京一带的叛逆,然后回军上海与英国人打仗。这类谣言直到这一年的年底,还在街头巷尾流传。12月12日(11月30日),巴拉第写信告诉穆拉维约夫说,他甚至听到英国人即将从广州撤退的谣言。在这封信里,巴拉第还提到他听说英国人已经向中国提出,愿意帮助他们去打俄国人,但是他怀疑这是否会被接受,因为英国是他们最痛恨的国家,而俄国则将成为“常在的威胁”。^③

穆拉维约夫1854年11月11日(10月30日)致北京朝廷,通知他们俄船远征阿穆尔之行业已顺利完成的照会,于1854年12月23日(咸丰四年十一月初四)递到皇帝手中。这件照会从皇帝那里引起象往常一样的嘲骂而无实际的反应^④。他在1855年1月1日(咸丰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的谕旨内说,穆拉维约夫的照会语气虚妄,并再次表示了他自己的信念:“俄夷性本狡猾,诸事从无

① 巴拉第有时提到苏彰阿为(Shu-chang-a),但应为“Su”,见《筹办夷务始末》,卷21,第49页下。

② 见格雷格里:《英国政府与公众对待太平军叛乱的态度与政策》,为取得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而写的历史论文,1957年。

③ 《俄国档案》卷3,1914年。

④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10,第9页下。

实话。”总之，皇帝所要做的只是把解决问题的责任完全放在德勒克多尔济身上。德勒克多尔济还因为未做严密的查访而受到皇帝的责备^①。

1855年1月1日(咸丰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在一份致俄国的咨文中，理藩院又一次拒绝穆拉维约夫遣使入京的请求^②。此后，穆拉维约夫就不再坚持此事了。当时，即使他能顺利地派出使节，恐怕也未必能在那么早的时候取得普提雅廷与伊格纳提耶夫所赢得的条约让与。

在1855年1月1日的同一咨文中，理藩院又要俄国为划界派代表到库伦去。1855年2月，德勒克多尔济(他不知此事)通知列宾捷尔，为划界事中国代表希望在格尔必齐河会见俄国代表^③。在得知发往俄国新的咨文以后，他不得不奏明清帝，他向俄国人讲的与此有所不同^④。穆拉维约夫当即在3月2日(2月18日)发一照会，反过来要求作出解释，提出将划界谈判延期到秋季，并同时宣称他在春天向阿穆尔第二次派出远征队，因为英国威胁说将再次发动攻击。他还声称俄国已将进袭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英国⁵⁰海军部队击退。1855年3月29日(咸丰五年二月十二日)^⑤，奕訢收到这份照会。清帝不得已，随即于1855年4月16日(咸丰五年二月二十日)将覆文送往俄国。要求穆拉维约夫前往库伦，并届时偕同划界委员自中国前往格尔必齐河^⑥。德勒克多尔济将此交列宾捷尔时，他们作了会谈，列宾捷尔在会谈中声言英国企图帮助太

① 《筹办夷务始末》，第12页下。

② 《筹办夷务始末》，第13页上。

③ 舒马贺尔，前书，第279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17，第16页下，皇帝1855年2月12日(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收到奏折。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10，第22页下。

⑥ 《筹办夷务始末》，卷10，第28页下。

平军叛乱,并亟欲在俄国与中国之间“制造分裂”^①。

清帝对穆拉维约夫的阴谋诡计并没有准备还击。当黑龙江将军奕格奏报俄国远征队之事,并请旨晓谕明年若该夷再来如何应付之时^②,皇帝于1855年2月12日(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降旨如下:

“俄罗斯与别国往来,自应由海外行走,不能听其取道内地。惟去年(1854年)五月间,该国船只过境,既经放行,此时若阻其归路,该国不免借口,又滋衅端。著奕格随时查探,如该国前此经过之船,仍由黑龙江等地驶回,果于沿途地方,不致骚扰,即著听其归国,毋庸拦阻。若再有续来之船,并非前此经过船只,即著妥为开导,告以内地江面,不能听外国船只任意往来,此后断不可再从黑龙江行驶,致启猜嫌^③。”

- 51 中国如无外援要想抵抗是没希望,在1855年4月1日(咸丰五年二月十五日),吉林将军景淳呈皇上的一份奏折中,这点表露无遗。该折表明为会查地界能从黑龙江、吉林,和从库伦抽调的兵役总数不过四百名。官兵的粮食、装备以及饷银都需自库存中暂为借垫,否则无法成军临阵^④。

此际,沙皇尼古拉一世于1855年3月2日逝世。这对俄国的政策没有产生多少影响,亚历山大二世当政之初,在处理对华事务时,继续象他父亲那样在涅谢尔罗捷和穆拉维约夫之间充当仲裁者。

1855年5月20日,穆拉维约夫向北京咨送了另一照会。宣称他在下驶阿穆尔河的途中。并声言他准备与中国委员在松花江

① 《筹办夷务始末》,第29页下。奏折于1856年5月11日(咸丰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抵达皇帝处。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10,第17页下。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10,第18页上。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10,第24页下。

口会见,其他地方概不同意^①。约于此时,按2月12日的旨意,中国送出了一份抗议咨文。可是,这份文件既简短又平淡,全无威胁之意^②。

毫不奇怪,下一件出现在《筹办夷务始末》上关于俄国的事,就是吉林将军奏折上说的俄国人已经占领了马林斯克,即阔吞屯地方。此件于1855年6月5日到达奕訢之手(咸丰五年四月二十一日)^③。自不待言,事实上上年夏天俄国人早就在该处了。三日后,黑龙江将军奕格奏陈新情况的奏折又达皇上之手。内云瑗珲报称新到一支俄国远征队,有大船十艘,并其他船九十艘正下驶阿穆尔河,两名清朝官员曾亲与穆拉维约夫会见,收到他交出用汉字书写的一纸公文,内称这次远征部队有男女八千人^④。照涅维尔斯科依所说^⑤,实际武装男丁仅二千五百人,而包括屯垦民人总数则为七千左右。

清帝已于1855年6月9日收到了穆拉维约夫的第二次照会。无视中国发出的抗议,穆拉维约夫按照计划带领人马下驶阿穆尔河^⑥。奕訢当天作出答覆,更加婉转地向俄国作了第二次抗议^⑦,该日咨文中,也从原则上作了重要的让步。文内称:俄人在黑龙江航行,只能在俄国萨那特衙门与理藩院双方协议的情况下,方可放行。换言之,这种航行事实上是可以允许的。奕訢又向黑龙江与吉林降旨,命他们不必阻拦俄国船只,仅只“正言晓谕,令其毋扰

① 舒马贺尔,前书,第280页;《筹办夷务始末》,卷10,第31页上。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10,第33页上。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10,第34页下。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10,第35页上。

⑤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二版,圣彼得堡,1897年)书内多处。

⑥ 《筹办夷务始末》,卷10,第36页下,显系5月20(8)日咨文。

⑦ 《筹办夷务始末》,卷10,第37页下。

我境”^①。

对划界人员没有再发布新的命令，他们在前往格尔必齐途中，已于5月24日（12日）在阿穆尔上游，与穆拉维约夫对面相遇。舒马贺尔描述了这件事。他说中国人员共有四条帆船^②。大概早些时候景淳提到的四百人之说不过是个虚构。

穆拉维约夫在见到了这些划界人员之后，于他下驶途中会见了瑗琿都统^③。穆拉维约夫向亚历山大二世作了如下的汇报：

“从都统的谈话中我发现，中国朝廷已谕令他，让我我国船只自由通行，甚至可予协助。他虽然暗示今后可能不准我们航行阿穆尔，但是又加一句说那是指如果没有皇帝特旨的话。我在以最友好的方式与瑗琿都统告别时向他保证，不经中国皇帝允许，我方决不采取任何行动，我国皇帝对他的友谊不变。我随即向他和他的官员致送珍贵礼物。”^④

53 到了6月份，穆拉维约夫的策略进一步产生了有价值的成果。那时康士坦丁大公写信告诉他，沙皇已决定俄国必需取得阿穆尔河左岸与在中国北部自由贸易的权利，并授权穆拉维约夫与中国缔结一项正式条约^⑤。

奕訢得知穆拉维约夫不顾划界，而从格尔必齐河径赴马林斯克之后，谕令中国委员赶往那里去见他^⑥。1855年9月20（8）日（咸丰五年八月初三），^⑦他们到达马林斯克（即阔吞屯）。在该处举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10，第37页上。

② 舒马贺尔，前书，第280页。

③ 应为副都统。——译者

④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2，第130页。

⑤ 舒马贺尔，前书，第281页。他未说明确切日期，仅说“6月”，因之在西历上就是7月。

⑥ 《筹办夷务始末》，卷11，第1页下及以后各页。

⑦ 《筹办夷务始末》，卷12，第2页下。

行了一次短暂而无结果的会谈。按《筹办夷务始末》^①载，穆拉维约夫通过他的译员，要求把阿穆尔河左岸兴安岭分水岭南面的土地让与俄国，俄人在马林斯克所建屯居地均予保存；阿穆尔河必须听俄国行驶并任凭俄人在左岸骑行往来，而居住该地区的费雅喀^②及各族民人，则让中国将其移往他处。清帝于1855年11月24日（咸丰五年十月十五日）^③接到景淳经过特别长的耽搁之后奏报此事的折子，并在当天复谕，令他的划界委员拒绝接受穆拉维约夫的第一和第三两项要求，而容许在马林斯克建造的房屋，在俄国防堵英夷期间，可以暂准继续使用。在此旨之内，奕訢表示了他对俄国的看法：“居心叵测，恐犬羊之性难与理论”。^④俄国材料所记，大致与此相符^⑤。

1855年12月1日（咸丰五年十月二十二日）^⑥，从景淳处递呈 54 的另一奏折送抵清廷，内称中国委员已多次拒绝穆拉维约夫的要求，而穆拉维约夫则拒不改变他的主意。按照舒马贺尔所说，中国划界代表，还提醒穆拉维约夫说，俄国1853年6月28（16）日照会，里面明明白白提出俄国政府愿意维持1689年边界。中国划界代表进一步观察到，俄国已在马林斯克建造了“近百所”房舍，以及土垒、栅栏、炮座等物。景淳在他的奏折结尾处指出，俄人显然意欲攫占该地。1855年12月9日（咸丰五年十一月初一）^⑦，奕訢在谕旨中重申他决不让出黑龙江左岸，并宣称现在只可将先前未设界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12，第2页下。

② 一译费雅哈。——译者

③ 同上。亦见费正清和邓嗣禹“清朝文件的传递”载《清代行政的三项研究》（麻省坎布里奇，1960年）。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12，第4页上。

⑤ 舒马贺尔，前书，第281—283页，巴尔苏科夫，前书，卷1，第50章和涅维尔斯科依，前书，第29章。

⑥ 《筹办夷务始末》，卷12，第8页上。

⑦ 《筹办夷务始末》，卷12，第9页下。

碑之地勘定边界。德勒克多尔济、奕格、景淳三人联名将此意拟一咨文，交穆拉维约夫转致俄国萨那特衙门。在这一文件中，他们还可以说，他们决不敢将穆拉维约夫的要求转奏北京，上达天听。这显然是虚张声势向俄国人说，如果真把穆拉维约夫的话“上达天听”，中国方面就难免作出激烈反应，借此来吓唬他们。可是无论这两道谕旨中哪一个先到，反正在委员们收到它以前马林斯克会议已经破裂了。

1855年9月30日（咸丰五年八月二十日）^①，奕訢其实已经收到了奏报俄国远征队上溯阿穆尔河返回原处消息的奏折了。这大约是在他得知了马林斯克会议之后的两个月。1855年9月28日（咸丰五年八月十八日）^②，即两天之前，他也从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英秀处得知，属于清朝的“五、六百名流民”于8月26（咸丰五年七月十四）日抢劫和焚毁了该城俄国商栈，致使俄商远窜。清帝对
55 此事似较阿穆尔的事态看得更严重。他同意调四百绿营与二百满营官兵前赴该地^③。后又奏报为首之人拟杖一百，若仍幸存则再处以流刑^④。俄国更提出赔偿该国臣民损失的要求。可是濒于破产的北京朝廷坚不肯付。以后的数月之内，为焚烧俄国商栈之事的往来折奏与谕旨，其卷帙之繁几乎与阿穆尔问题相等。两国之间为此公文往来近五年之久。无疑这更促使清廷愈加急于仍与俄国和解，俄国现在如欲在新疆地区采取侵略行动，它已有了一个现成的借口。

虽然穆拉维约夫的一部份船舰在1855年夏末返回上游，而俄国七千名男女仍旧在阿穆尔河下游过冬^⑤。俄国对这一部分地区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11，第27页下。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11，第13页下。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11，第26页上。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14，第1页上，亦见巴布科夫，前书，和舒马贺尔前书。

⑤ 涅维尔斯科依，前书，29章，第363页。

的控制现已确立,单凭中国自己的力量是没法驱逐的。初冬,江上冰冻后,俄人首次沿左岸穿越在瑗琿对面的满汉农民屯居地从陆上回来,按舒马贺尔的说法,瑗琿副都统富勒洪阿无偿供给马匹粮食。他显然已于去年夏天被穆拉维约夫的热忱与贵重的礼品争取过去了,或者说他至少是不想冒险与俄国为敌。舒马贺尔把 1855 年 11 月 13 (1) 日他写给穆拉维约夫的信摘出如下一段:“最尊敬的伟大统帅穆拉维约夫,您以您的公道、正确与异常的坚定,创造了您如此的声望,为此,黑龙江^①的居民将永远歌颂您的荣光。”^②可是,富勒洪阿向他的上司报告却说他的属下拒绝把马匹供俄国人使用。黑龙江将军奕格将此事向皇上奏报了^③。奕訢于 1855 年 11 月 11 日(咸丰五年十月初二)的谕旨中批示“拒绝”得对^④。富勒洪阿也奏报他曾多次阻拦俄船于阿穆尔河上行驶并提出抗议,但俄人置之不顾^⑤。他还泡制了一则显然是相当荒唐的故事,说他曾拒绝让大批俄人经陆路通过他的管区,但他们以杀他相威胁,他不得不放宽,让他们过去。

1855 年 12 月 15 日(咸丰五年十一月初七),清帝收到穆拉维约夫的照会^⑥,内称他们官兵在东海海岸与英国人作战有许多人受伤,他请求清朝驻该处副都统,在俄国遣送伤员从陆路返俄时给与合作。尽管富勒洪阿个人对他们和蔼,可以认为,俄国人从在左岸的清朝当局方面也必定受到了相当程度的留难。

紧接着,奕訢于同一天(咸丰五年十一月初七)从叶名琛处得到了迄至当时为止,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一份奏章,陈述了不同于

① 原文为 The Black Dragon River。——译者

② 舒马贺尔,前书,第 284 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 12,第 1 页上。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 12,第 2 页上。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 12,第 11 页上。

⑥ 《筹办夷务始末》,卷 12,第 14 页上。

别人的看法^①、据该督的说法，英、法联军在克里米亚登陆之后，俄国随即向英国发动一次毁灭性的进袭，使维多利亚女王仓皇搭乘轮船亲赴美国和法国求援。奕訢可能在这一消息影响下，于1856年1月2日批驳了^②奕格和齐齐哈尔副都统奏章，不同意免除黑龙江省鄂伦春部民及八旗猎貂进贡；禁止他们上山打牲以免与俄人接触，并须勤加操练。皇帝这样作是因为打牲人如失生计难免心怀不满，而且俄人此刻“尚未敢显然违悖”，有此举动“转致猜疑”。可是奕格就在同一奏折内报告了俄国人已经宣称，自兴安岭以西
57 直到牛满江的土地都是他们的了。

清帝关于这一问题和马林斯克会谈的历次谕旨表明，他已下定决心，只要俄国人不进攻，也不占领阿穆尔河以南满洲的人烟稠密地带，就采取无为而治的策略。即使如此，他在表面上还得装作抵抗的样子。皇帝命令东北边界上的三位将军行文咨照俄国，要求在涅谢尔罗捷1853年照会的基础上进行勘界。这件照会曾于1856年1月4日（咸丰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呈交中国皇帝御览^③。据舒马贺尔的记载，这照会在俄国外交部确曾引起一番惊惶，其内容大意如下：三位将军不敢把穆拉维约夫在马林斯克提出的要求上奏皇帝^④，外交部决计，把向中国提出的要求限制于只在阿穆尔河上航行自由。然而亚历山大二世下令对中国咨文置之不理，且待中国对于俄国1855年12月26（14）日所提关于塔尔巴哈台商栈赔偿问题的照会如何答复再说。此后不久，穆拉维约夫到达圣彼得堡，把外交部的决定扭转过来。沙皇终于授予穆拉维约夫以与中国代表谈判的全权，并准他作第三次下驶阿穆尔的远征。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12，第15页上。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12，第16页下。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12，第18页下。

④ 它于1856年2月到达圣彼得堡（舒马贺尔，前书，第284页）。

他还受权得向中国提供一批军械,以换取航行阿穆尔的权利^①。应穆拉维约夫之请,俄国外交部于12月26(14)日咨知理藩院,进一步肯定在马林斯克提出的各项要求都已由沙皇认可^②。

清朝防务的糟糕与对阿穆尔下游的忽视,在1856年2月2日(咸丰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达朝廷的一份吉林将军景淳奏折中⁵⁸有所表露^③。他说英、法是否在东海攻击俄国人,实难调查。因为该处“各卡相去东海尚远”,据他了解,阿穆尔下游除有费雅喀与赫哲部族等居住外,该地“旷邈无涯”,甚或有“人迹不到”之处。除马林斯克(阔吞屯)外,无法得知何卡已被俄人占领。至于军事状况,“黑龙江存兵固(不)^④多,病在无粮,吉林既无粮,而兵又少”。然而他们无疑有御敌之力,而且“此时皆知自守,谁敢启衅,彼若在左近设卡,自不得不正言相阻”。在三姓,宁古塔,珲春各有兵丁八百人^⑤。吉林兵额为一万零一百零五人,七千已调赴中国他处,返回者不过八百人。团练已重办,但为数无几。奏折之末,呼吁以二千人增援三姓、宁古塔、珲春。但此事因南方叛逆未靖为皇帝拒绝^⑥。

现在,穆拉维约夫设法为他的第三次远征,使中国有所准备。2月间把两件咨文递到库伦的俄国信使说,与俄国作战的英、法兵船,已撤回上海、广东过冬。春暖后,定将再次攻击俄国^⑦。1856年2月26日,这两件咨文到达清帝之手,德勒克多尔济同时递交了一份奏折,描述了他和这个俄国人的谈话。他又在另一奏折中奏报他已令蒙古各部加强防范^⑧。奕訢这次谕旨调查穆拉维约夫

①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1,第429页。

② 舒马贺尔,前书,第284页。未载于《筹办夷务始末》中。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12,第23页上。

④ 中国文章的文字读如“固多”,但就下文来看似乎意义不明。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12,第24页下所载为三处共有兵丁八百人,作者误。——

译者

⑥ 《筹办夷务始末》,卷12,第24页上。

⑦ 《筹办夷务始末》,卷12,第26页下。

⑧ 同上(咸丰六年正月二十二日)。

59 所说是否属实^①。两份照会中有一份是关于新疆的,而另一份则系来自穆拉维约夫,他声言如俄军仍留在阿穆尔地方请“严令吩咐”中国的人不得欺压俄人^②。

1856年4月30日(咸丰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德勒克多尔济的奏折终于抵达皇帝处,提到穆拉维约夫最后的照会直接了当地讲明另一组远征队已经出发^③。

这一次,奕格已经能够把一些告急的消息报与北京朝廷。因为早在1856年2月27日(咸丰六年正月二十三日),有一件从他那里发出的奏折到达皇上处,其中叙述中国回民侦探报告说,俄国人准备再次远征^④。可是,奕訢除谕旨满洲将军如俄人再来时妥为款待,但断不可受俄人礼品外,并未采取其他步骤^⑤。清帝在收到穆拉维约夫最后的照会时,仅颁发了两道谕旨,其一宣称不许俄人远征队再来,另一谕旨令德勒克多尔济“妥为防范”,如俄人领兵再来,勿令彼等“另生事端”^⑥。

1856年3月,俄国政府内发生了重大事件。涅谢尔罗捷辞去他担任多年的外交大臣,由远较他年轻而能干的哥尔恰科夫亲王代替。亚历山大二世自此对他日益重用,授予指导外交政策的权力,皇帝本人则致力于内政的改革。

大约与此同时,奕山继患病的英格之后任黑龙江将军之职^⑦。

奕山系皇室成员,他于1842年在广东主持抵抗英国人时失利,证明是一个无用的将军。他因未能解广东之围受到重谴,但于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12,第28页下。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12,第27页下。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13,第7页下。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12,第28页下。在那天的谕旨内提到,但折奏未见。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12,第28页下。

⑥ 《筹办夷务始末》,卷13,第8页上。

⑦ 《筹办夷务始末》,卷13,第8页下。

1843 年得到原宥。1845 年出任伊犁将军。看上去,他在清廷的眼里,已经由于在伊宁签订条约^①并把俄国人推出喀什噶尔之外而立下功劳,足补前愆了。其实,俄国人在那一地区,如上面所已经提到的,行事非常谨慎,并不存在什么问题须由奕山来遏制他们。巴拉第于 1856 年 5 月 4 日(4 月 22 日)在致穆拉维约夫的报告中提到奕山时说:“我知道奕山非常不情愿接受新的任命。他直到最近还迟迟不从北京动身,大概是在指望新的阿穆尔河下游的远征队不等他到就已经过去了。”^②

在同一封信件中,巴拉第向穆拉维约夫用隐晦的语言,详细分析北京朝廷的对俄态度。他写道:

“一般地讲,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注意到,也不设想会有什么关于阿穆尔问题的明确行动纲领,而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一问题如此重要而具有决定意义,又发生在满人由于国内动乱和朝廷缺才而处境如此不利的时刻,以致北京的内阁徬徨犹豫于两种政策之间。一种是老式的严峻拒绝策略,其危险现在已经很明显;另一种是友好的让步式的行动,这是形势以及甚至他们本身利益之所趋。在这种局势下,我听说他们在此间已决定采取拖延战术,即把阿穆尔事件推迟到更方便和更平静的时候去解决。至于这里的和解政策究竟能做到何等程度,和究竟是否会试行这种政策,我不知道也不敢信任。

“在丘古察克^③发生的事情,此间的人们心慌意乱,认为这是可能造成与邻邦失和的因素。这一情况更加重了北京政府的慌张。

“军机处为边界事情花费了多少心思,此处不必多谈。他

① 恒慕义编辑:《清代名人传略》(卷 2,华盛顿,1943—1944 年)。

② 《俄国档案》,卷 3,1914 年。

③ 即塔尔巴哈台。——译者

61 们已向过去朝廷内的首脑人物和对俄国事务多少有些知识的人们去请教了。”

巴拉第接着说，王青^①，一个老实而无用的人，拿不定主意。赛尚阿已从他在蒙古的流放地召回，希望他不久能重新掌握他在伊犁条约签订时期享有的权势。“他在此地是懂得与邻邦结成同盟具有重要性的少数几个人物之一。或者用我早先用过的说法，他将遵循北方政策”。换言之，赛尚阿是想与俄国联盟的少数显贵之一。

巴拉第不得不解释说，他在观察北京朝廷的工作中，现在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受到更多的阻碍。因为事实上他只能与理藩院接触，而理藩院不能从军机处得知关于边界的事情，虽然人们都以为这是应由理藩院主管这些事的。巴拉第的报告无论如何对于穆拉维约夫和俄国政府两方面都是有价值的指南。他在报告结尾时，力主向边界上的中国代表充分说明俄国的要求，因为从他们手里也许会比从“多疑而狡狴的朝廷”手里更易于取得让步。他认为，中国朝廷由两种动机所主宰。一是担心皇朝已濒临崩溃，不愿采取任何足以加速领土分裂的行动；另一是害怕对俄国表示同情，难免会招惹英国的猛烈反击。它特别惊恐英国站到太平军一边，可能出面干涉。“在这种局势下，它（中国朝廷）认为还是继续不让人家注意自己的内部骚乱为好，并使两边谁也别去碰它。基于这些理由，它害怕张扬——这样办也许是正确的——把阿穆尔方面的事情掩盖起来”。巴拉第正确地看到欧洲人不会支持太平天国，因
62 为后者的弱点是如此明显。纵然如此，他还用隐晦的语言暗示，俄国可以利用满人的恐惧心理，进行于己有利的活动，在英国人果真站到太平军一边时，作出行动对清廷予以有力的支持。

① 可能是万青藜，更可能是文庆，一位满大学士（死于1856年）。

巴拉第在阿穆尔问题上的见解由次年夏季的事实所证实，卡尔萨科夫率领的俄国第三次下驶阿穆尔河的远征于5月起程。1856年6月2日（5月21日）到达瑗珲附近。这支队伍包括一千六百六十名武装人员。卡尔萨科夫在瑗珲受到了清朝官员极好的款待，他们告诉他，朝廷并未授权他们让其过境，但“因两国和好，即使害怕他们的上级为此处分他们，他们也情愿这样做”。对于卡尔萨科夫声言打算在阿穆尔下游建立更多的基地与仓库，他们只是在口头加以拒绝，并向俄国人提出不要苛待臣服于中国的子民以及请俄国人通知他们已有多少人来此地驻扎^①。卡尔萨科夫向他们说道，阿穆尔河口有一万俄人，另五千也将前来。

这一季之中，俄人在阿穆尔河及其北岸任便来往。清朝当局本身则仅限于将他们在各卡口观察到的部队与船只的大约数目呈报^②。美国商务代表柯林斯在他所著《下驶阿穆尔河旅行记》一书中记叙乌苏里江口卡哨时说，只有几所木屋，由很少的人掌管。

1856年下余时间内，两国政府关于阿穆尔问题各自采取的立场没有重大变化。亚历山大二世虽然批准穆拉维约夫向阿穆尔河流域展开殖民事业，但又从俄国外交部的顾问方面受到够多的影响，下令阻止西伯利亚总督拟于1856年夏季与中国重行举行的谈判^③。中国政府日益把它的注意力从俄国转向英国提出修订条约的要求。这年冬天，又传来俄国人企图攻占塔尔巴哈台的惊人谣言^④。1856年12月27日（咸丰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奕訢得到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奏报，伊犁防军五百人已全数调驻塔城，以防御俄人进攻^⑤。这一年夏季，北京对于俄国教士团的冷淡待遇大概是

① 舒马贺尔，前书，第285—286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13和14。

③ 舒马贺尔，前书，第286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13和14。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14，第21页上。

由于塔城谣言,而不是由于阿穆尔河事件。巴拉第于 1856 年 9 月 11 日(8 月 30 日)写信给穆拉维约夫提到此事。他还报告说,北京朝廷已经怀疑到他与俄国方面的通信往来,并加以留难^①。

在 1857 年 1 月 5 日(1856 年 12 月 24 日)致穆拉维约夫的另一信中^②,巴拉第又重申他的观点:在阿穆尔问题上必须对中国保持压力。他还进一步表达他的意见说:“因为英俄已经缔结和约,现在看来中国不象是会转而寻求英国的帮助。他指出 1841 年有人建议中国向美国求援来对付英国,可是这一计谋被北京朝廷拒绝了,因为他们不知道美国是否准备援助,又是否有力量进行干涉^③。”“清廷已陷入自己的政治偏见中去了。”巴拉第写道:“要使中国骤然与海外各国互相承担义务,并在事务上紧密联系是有困难的。”巴拉第在这封信的结尾处暗示,他深信俄国不应支持叛逆方面,而应以在大清帝国一旦垮台时取得某些土地为目的,等待事态的发展。

因此,1856 年末,俄国占领阿穆尔已是既成事实。1857 年初英国的活动,更帮助了俄国的占领,并为俄国提供了绝好的机会,通过条约获得对占领地的正式承认。

① 《俄国档案》,卷 3,1914 年。

② 同上。

③ 亦见费正清与邓嗣禹:《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前书,第 28 页以及其后各页。

第二章 1857年1月至1858年7月： 普提雅廷的使命与《璦琿条约》 和《天津条约》

64

英国与中国于1842年间建立起来的条约体制，到1851年实际上已经失效，英国政府终于决定批准修改这一体制。克里米亚战争把此事推迟了，不过，到1856年秋，为派遣额尔金勋爵作为使节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已经认真着手进行。额尔金将以雄厚的兵力为后盾，去和中国谈判一项新的协议。

俄国政府并没有得到这事的消息。不过，不久就知道远征军即将出发，因为当时对此并未特别保密。消息似乎先从俄国驻伦敦武官伊格纳提耶夫伯爵处传出来的。他在巴黎偶然间发现后，就告诉了俄国驻巴黎的使节基谢列夫将军^①，和俄国在伦敦的海军武官普提雅廷伯爵，普提雅廷又告诉了海军大将康士坦丁大公。1857年1月，康士坦丁从汉诺威写信把这件事告诉了哥尔恰科夫，催促他派一位使节去中国。他并推荐普提雅廷担任此职^②。2月5日（即1月24日），康士坦丁也写信给穆拉维约夫，进一步提供了此事的详情^③。

在此之前，基谢列夫曾于1月11日往见法国外交部长瓦列夫斯基，询问法国是否有一支派往中国的远征军正在整装？如果确

① 伊格纳提耶夫：《关于伊格纳提耶夫出使中国的材料》1892年，莫斯科。

② 舒马贺尔：《俄国取得阿穆尔江的历史：1848—1860年与中国的关系》，见《俄国档案》1879年，第286页。

③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二卷集，1891年莫斯科版）卷1，第483页。

实,它的目的何在?在得到他所要知道的消息之后,基谢列夫又曾问过,俄国是否不可以参加?可是他没有接下去提出任何更为正式的方案。他的试探也未为英、法所理睬^①。

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科瓦列夫斯基是根本反对参加英、法远征军的。他在1月份写信给哥尔恰科夫,说他认为这种办法对俄国来说是不行的,它会触犯中国;而俄国置身事外,同样也是不行的。决不能让英国取得北京或赫拉特^②,而取得北京势必把我们刚在太平洋及阿穆尔沿岸开始的事业搞垮。如果是取得了赫拉特,英国也就会把整个中亚置于它的控制之下^③。1857年1月22日,哥尔恰科夫把信呈交沙皇。事实上,叶弗菲米·瓦西利耶维奇·普提雅廷伯爵已于2月间受命担任驻中国的全权使节,并于3月5日(2月21日)自圣彼得堡启程^④。原来的意图是,他应与正待出发的经恰克图去北京的教士团结伴同行。他的启程日期,由俄国咨照了中国理藩院^⑤。

普提雅廷生于1803年,是一个服役多年的海军军官,在战时和平时都经历过许多风险。他曾在拉扎列夫的领导下,于1822—1825年作过环球航行,并参加了1838—1839年的高加索战役。1842年,他成功地在波斯完成了一项武装外交使命,打开了俄国与波斯的贸易、航运、以及外交关系。1852年到1855年,他再次航
66 行全球,为俄国在日本初步发展了外交与商务关系。在那里,他九死一生地从一次地震和海啸中驾船逃出。为了他在日本的成就,沙皇于1855年12月晋封他为伯爵。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1856

① 英国驻法大使考莱勋爵与外交大臣克拉伦登的通讯。英国外交部档案,27/1187,1188。

② 阿富汗西部的大城市——译者。

③ 《红色档案》第21卷。

④ 舒马贺尔,前书,第287页。

⑤ 同上,以及引自巴尔苏科夫,前书。

年，他受命任驻伦敦海军武官^①。据英国驻圣彼得堡公使所得情报，由于普提雅廷就任之时英国对他接待冷淡，为此，他对英国怀有个人敌意。他曾不附任何介绍函件，写了一封生硬的信，要外交部为他提供关于皇家游艇人员装备的情况。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勋爵愤怒地下令拒绝他的要求^②。

随同普提雅廷使团去中国的有一等秘书毕休罗夫，二等秘书弗利德利希·冯·奥斯登·萨根男爵，塔塔里诺夫任医生及译员，大司祭阿瓦库姆任通译，还有炮兵上尉巴留捷克、工兵上尉瓦托夫斯基。阿瓦库姆与塔塔诺夫都曾经随第十二次教会使团到过北京^③。

给普提雅廷的指示在《红色档案》中至少提供了一部份。值得注意的是，他奉命采取最迅速的步骤，澄清并且解决俄国和中国之间的争议事项。他的主要任务是取得俄国对阿穆尔左岸的所有权，和确认在那条河上自由航行的权力；并同时为在北京建立正规的外交使团作出安排；为俄国取得在五个条约口岸通商的权利；重派商队前去北京；在中国西部各地设立堆栈；取得途经蒙古连接俄国领土的邮路。对此的回报是向清廷作一定的让步与提供帮助。对塔尔巴哈台的商栈不再要求赔偿；俄国愿意停止在蒙古唐努乌梁海与新疆以及叶尼塞斯克与托木斯克省相邻地方向牧民们征收 67 赋税，并且还可保证使该地的部族向中国纳贡^④。俄国也同意前往中华帝国西部的商队不越过库伦，如果其他商队能够获准径赴北京的话。更有趣的是向清朝政府提出，如有需要可以提供武装

① 《人名辞典》（1910年圣彼得堡版）；亦见伦森：《1852—1855年俄国人到日本的远征》（盖恩斯维尔，1955年）。

② 克拉伦登文书，71类，伍德豪斯致克拉伦登函 18/4/57，克拉伦登致伍德豪斯 29/4/57。

③ 柯尔迪埃：《1857—1858年远征中国》。（1905年巴黎版）第404—405页。

④ 从未有过这种让步，这些部族在《北京条约》中已订明并入俄国。

力量,为清朝保卫满洲。但是,它必须是应北京朝廷的请求,并且以阿穆尔和其他问题都获得圆满解决为先决条件。普提雅廷还奉命对中国表示,可以履行早就提过的“组织、装备并训练一批中国部队”的诺言。

上述最后一件事,看上去是指科瓦列夫斯基于1857年2月9日写给巴拉第的一封信。信内令巴拉第敦促北京朝廷接待普提雅廷,并且告知北京朝廷,“俄国永远准备帮助,无论是在道义上,或于一定程度的物质上,诸如供应军械弹药以供国内使用……”。不过,引自《红色档案》的这封信,没有提到训练中国部队^①。

给普提雅廷的指令中说得很清楚,俄国政府只准备在万不得已时当作最后手段,才在中华帝国的定居地区进行武装干涉。对与西方列强合作一事,俄国也表示了相同的态度。指令上说:“如果你们谈判的进程表明,肯定可以依靠西方列强的胜利,那末你可以作为一种最后手段,转而与(他们)合作,但在行动中只应运用道义影响,而决不可应允物质上的支持”^②。

由于俄国人才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于英国,俄国人采取中立态度是很自然的。圣彼得堡的美国公使1月14日向他的政府报告,“英国战舰炮击广州在俄国人方面引起了相当的震动,许多俄
63 国人用极为强烈的词汇来谴责此事”^③。

普提雅廷使团的真实目的并没有公诸于俄国公众,对他们只说他前往阿穆尔地区是为寻觅一个海港^④。他的离开,对圣彼得堡的外国使节也没有打什么招呼。

早在1856年7月,美国国务卿就听俄国驻华盛顿公使说,整

① 引自《红色档案》。

② 引自《红色档案》。

③ 美国国务院藏手稿,35/17,西摩致马尔西 14/1/57。

④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I,第484页。

个阿穆尔地区都在俄国的掌握之中^①。现在他又听到圣彼得堡的消息说,普提雅廷受权去取得航行阿穆尔河的权利,以便阿穆尔河口俄国人的基地可以得到供应,使“某些次要的基地”也可受益^②。俄国当局没有把这类情况供给其他任何的西方政府。

在此期内,所有西方列强对于俄中关系的状况,听到的少得可怜。他们之中不仅美国人,其他人也对此一直没有表示兴趣。1月份,驻圣彼得堡的英国公使沃德豪斯勋爵,已经打算就此问题去摸哥尔恰科夫的底。不过,他总是支吾搪塞过去。沃德豪斯1月21日向外交部报告,“我曾不止一次试图探询哥尔恰科夫公爵对中国的看法,而他总是表示厌烦这个话题。最后这次我提到中国,哥尔恰科夫公爵发泄了一些不满……谈到我们在那里的行为不公正,和我们在那里作战所造成的严重牺牲。同时,哥尔恰科夫否认俄国对这些事有兴趣。他说,这是我们的事,而我们必须对我们的行为承担责任”。沃德豪斯表示:他怀疑基谢列夫是否真向法国作过交涉,就象考莱向外交大臣汇报的那样。他接着又说:哥尔恰科夫⁶⁹“特别忌讳提及任何关于俄国人在阿穆尔的举动——而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向他谈到过,这对我们来说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实际上,英国政府对于俄、中边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似乎只得到一些模糊的印象。在同一信件中,沃德豪斯把英国使团一等秘书朱利安·费恩与哥尔恰科夫的代表托尔斯泰伯爵之间的一次谈话,也作了描述。托尔斯泰确证俄国驻北京的使团“具有某些政治性质,虽然正式来说它只是宗教性的”^③。

迟至3月14日,沃德豪斯所能报告的还只是流言。说普提雅廷是以教士团首脑的身份去北京的。他把下述情况当作新闻加以

① 普·姆·柯林斯:《下驶阿穆尔河旅行记》(1860年纽约版)。

② 《红色档案》,前书,第190页。

③ 英国外交部档案,65/492。

报告,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经过奥伦堡定期有文件来往,那是“由鞑靼人当信使的”。托尔斯泰也曾告诉他“这确实是真的,中国西北边境的某些城市驻有领事,叶尔羌看来就是俄国在那里驻有领事的地方之一”^①。

只有在1857年3月21日,沃德豪斯才能肯定普提雅廷是护送教士团去的^②。在这封信中,他说托尔斯泰曾叫这英国人(沃德豪斯)去向波西埃特船长打听消息,波西埃特对俄国人在阿穆尔河的前途作了暗淡的描述——或者这并非假话。

法国驻圣彼得堡的公使同一天从这英国人(沃德豪斯)那里打听到普提雅廷的使命。1857年3月26日,他报告给他的政府。当时,法国当局对俄国与中国的关系有什么知识或兴趣的话,在法国外交部档案中是找不到证据的。只是德·莫尔尼在3月26日信件中提到普提雅廷离开的消息似乎引起“英国公使馆中的一些使
70 人不安的诧异”^③。如果说英、法驻俄使节在1857年初,忽视了俄、中问题,那末在香港的英国商务监督与官方代表包令爵士就是妄听传闻了。他经常传布一些说到俄国人在中国进展的离奇故事。这和巡抚叶名琛,以及其他的满、汉官员向北京呈报关于俄国的无稽之谈一模一样。他只能分辨其中的一部份是靠不住的。

1856年底,香港谣传俄国“在舟山得到了中国割让的领土”。不过到次年2月份包令就能在汇报时说这是虚构,可能来源于俄国人自己。2月14日他写信给外交大臣讲,有两艘俄国舰只来香港呆了些时候,而这些舰只的出现引起了“中国人方面的妄测,夸大了俄国人力量的巨大,日本人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④。塔尔巴

① 英国外交部档案,65/493。4月11日,沃德豪斯汇报说他见到了科瓦列夫斯基。科瓦列夫斯基说俄国人在叶尔羌和喀什噶尔没有领事,“但是,它应当有”。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65/493。

③ 法国外交部档案,俄国篇,第214—221卷,1857—1860年。

④ 英国外交部档案,17/261。

哈台商栈事件，因1857年3月《京报》的复本传入英国这块殖民地，而由包令作了汇报^①。1857年3月20日，他向克拉伦登写道，“伦敦报纸上报道的中国答应和俄国订立条约，准在五口通商的消息可能是有根据的”。封皮上写着投交“俄国驻广东公使级全权代表梅迪姆公爵”的邮件到达香港的事，也为他证实了这一看法^②。包令发出日期为5月23日的信件，说在华的英国人也从未听说过伊犁条约^③。

美国驻华代表伯驾向华盛顿汇报，4月1日在澳门，法国代表布尔布隆和他本人在一次会议中听包令说过，他相信在北京的俄国教士团的首脑已经与中国缔结了意料中的通商条约，而俄国人也确实是想向朝鲜伸手。包令4月23日在和伯驾的私下交谈中⁷¹说，他认为俄国人已经占领了满洲与朝鲜的一大部分地方^④。

显然，伯驾认为，除了与包令的谈话以外，没有什么值得汇报给他的政府的情报。法国代表布尔布隆听到了俄国打算帮助清朝扑灭太平军叛乱的谣言^⑤，此外则毫无所知。

在三个西方列强中，只有美国对于调查俄、中边界的状况，有了切实可行的办法。它是通过一个青年商人柯林斯的企业办到的。柯林斯说服国务院授权他穿越俄国和西伯利亚，调查美国人在阿穆尔河进行海运贸易的可能性。1856年夏他离开美国，1857年初夏到达阿穆尔河，正碰上普提雅廷在下驶阿穆尔的途中^⑥。他的汇报经过几个月才到达华盛顿，而美国政府那年年初，消息也象别人一样地不灵通。5月到达中国的列卫廉，以为去北京的俄国

① 英国外交部档案，17/261。

② 同上，梅迪姆1857年到香港后就死了，并未派人接替。

③ 英国外交部档案，17/261。

④ 美国国务院档案馆档案，92/15。

⑤ 柯尔迪埃：前书，第168页。

⑥ 柯林斯，前书。

教士团，“其性质一定是和一个普通的政治使团一样”，并相信俄国与中国是友好的^①。美国国务卿卡斯，直到7月才为时已晚地写信给美国驻圣彼得堡公使托马斯·西摩去要情报。他说“对俄、中关系了解甚少”，并相信国务院没有从官方来源取得权威消息^②。

到了3月份，俄国政府让大家都知道，它不会在中国与联军作
72 对。这是通过俄国驻华盛顿公使斯托克利男爵与英国驻那里的使节内皮尔勋爵的谈话传出来的。当时，内皮尔勋爵正在为他的政府促成英、美在中国的某些合作，料想斯托克利必曾向美国政府费过许多唇舌。及至1857年5月，双方必定业已达成一种初步的协议^③。

与此同时，普提雅廷4月份到达伊尔库茨克，5月初到了恰克图。这时候，俄国在西方列强向衰朽的大清帝国大肆勒索权利的行列中，无疑已是走在前面的一个了。不过，在中国边境上，普提雅廷受到一些挫折。

清帝奕訢收到俄国照会通知他俄国使节将于1857年3月30日(咸丰七年二月初五)到达中国边境。照会中声明普提雅廷具有处理中、俄间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全权，并且说，他将作为新的教士团的护送人前来中国。他的随从不，安排他途经蒙古，不致给中国找多少麻烦。照会又说，希望中国不要怀疑俄国有不友好的企图，但俄国也不希望因中国的内忧外患影响到俄国的边境^④。总之，开头就很明显，中国没有一个有关的人切望接待普提雅廷。在附呈这次照会时递给皇上的奏折中^⑤，德勒克多尔济写道：“查

① 美国参议院行政文件，30号(36届一次会议)(对列卫廉的官方指令)。

② 美国国务院档案馆档案，77/136。

③ 英、法、美三国外交部档案里关于他们各自与驻本国首都的外交使节往来的记载，都枯燥得令人失望，大部分只含有一些关于礼仪和行政的琐细事件。

④ 舒马贺尔，前书，第286—287页，《筹办夷务始末》卷15，第7页上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15，第7页上页。

咸丰四年因该夷欲遣人进京时，曾经咨驳。此次俄夷遣人欲进京城（并未据情详细说明，从前遇有进京之事，经理藩院斥驳）。此次即自备资斧，亦应将人性数目，究系何事，声明报院。如未奉到理藩院咨文之前。断难任令入境。”奕訢在奏折上硃批“知道了”^①。73却并未再有所举动。

1857年4月26日续向皇帝递呈的一份奏折，（咸丰七年四月初三日）^②德勒克多尔济奏报俄国派了两个官员，由译员他他哩诺幅^③陪同，到库伦解释普提雅廷的任务。他们又致送照会一件，说明普提雅廷在伊尔库茨克，不日即到恰克图。他写道：“即向他他哩诺幅详询阿迪玉唐提^④有何转述事件，据称，闻知英吉利勾结法夷^⑤，由上海^⑥前赴天津，侵占地界^⑦。我两国均有妨碍，应如何办理？是以委派使臣，会同在京之王、大臣等商酌等语。及至再三穷诘，答以并非另有别情”。作为一个机警与无知相混合的典型的德勒克多尔济，似乎怀疑俄国人假扮和平使团策划武装入侵。他在奏折中又说：“查俄罗斯遣使声明各章程，虽与雍正五年（1727年）定例，均属相符，惟该夷人性情诡诈”。他在此暗示，从前有过拒绝接待俄使的先例，“从前乾隆年间，俄罗斯遣使进京一次，业经严谕，嗣后不得援以为例。此次仅由库伦咨驳。恐怕别生枝节”。

结尾时，他要求直隶总督、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妥为防守。他本人也须与喀尔喀外蒙王公等不时巡查。对于这则奏折的硃批

① 英文译文是“Sent a despatch about it in advance”，中译文应为“事先知照”现录文系据《筹办夷务始末》。——译者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15，第11页上页。

③ 他他哩诺幅即塔塔里诺夫，中文名明常。——译者。

④ 系指俄国参谋。——译者。

⑤ 法夷即法国人——译者。

⑥ 英文译文系“Shanghai”，应为东海——译者。

⑦ 事实上，联军没有作出过不惜一切代价入侵中国的决定，这是众所周知的。

说明，皇上业已览阅。只是没有采取什么行动^①。

74 同日，奕訢收到理藩院的奏折说，4月9日（咸丰七年三月十五日）由巴拉第递交了俄国政府的函件，解释了普提雅廷之行的目的。巴拉第的这封信可能就是按照科瓦列夫斯基给他的指示写的，但是在他递交的译文中，显然没有提到供应武器的事。信中说普提雅廷之来，是为讨论俄、中共同自卫抵抗英国以及另外两个均被认为“有窥伺占据之心”的国家的办法的。所以，俄、中边界事务都须立即清理。该件又说，俄国“深知大义”，“非同贪利之国可比”，并且提请中国注意条约所载接待使节不得迟滞的规定。

奕訢同日向军机大臣等降旨^②，他在此第一次提到德勒克多尔济的奏折，其文如下：“俄罗斯狡猾性成，所称：英夷纠约各国欲往天津，伊欲来京密商等语。无非藉端恐吓，欲与黑龙江（阿穆尔河）外占据地方，并索赔塔尔巴哈台夷圈货物起见”，皇上著理藩院行知俄国，说明既已准许俄国送学生进京，毋庸特派大臣前来。“从前英夷滋事，中国自行御侮，不借外国帮助之力。至外国互相争斗，中国亦从不与闻。并无机密要事应与尔国相商。至尔国既诚心相好”，那俄国人就应记得，“从前只有恰克图一处通商，今大皇帝又准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处通商，相待可谓‘优厚’”。至于焚烧商栈事件，一定认真查办。在此旨之末，谓：如果俄方接此咨文后不遵晓谕一味坚持，仍然“据理”劝止俄国派大臣前来。

75 同时，奕訢又看见穆拉维约夫致德勒克多尔济的照会，力求接待普提雅廷。此文已由蒙古简略咨复照收^③。

奕訢见到6月7日从普提雅廷来的另一照会^④，他抱怨说对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15，第12页下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15，第13页下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15，第15页上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15，第20页上。咸丰七年五月十六日。

他的第一次请求允许让进北京，他从未得到任何回答。此项照会出言不逊，称“皆知贵都至库伦往返行文，不过二十五日”^①。照会之末，以最后通牒语气宣称，如至五月以前并无回文，俄国使节即由阿穆尔地方径行赴京。满洲当局收到他的通知，请于6月12日（咸丰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前后准备他的来临。

随后，德勒克多尔济用两封咨文答复普提雅廷。第一封以颇具降尊俯就味道的语句，通知普提雅廷，他的请求业已送交理藩院，但恐那里“处理一切藩部事务”工作很忙^②。话里的意思差不多直指俄罗斯是这些藩部之一。第二封咨文转达了理藩院复文中的一些内容，并说该复文已由德勒克多尔济于4月26日（咸丰七年四月初三日）递送给恰克图市长。《筹办夷务始末》中无此文。舒马贺尔指出普提雅廷是于5月在恰克图收到的，该文日期是4月26日^③。

此项咨文的措词，不论怎么解释，较之原来谕旨中所表示的，口气略有缓和。因为在提到商栈事件时，把它当作断不能因此伤及中、俄两国长期友好的小事。象谕旨一样，咨文内也避免提及阿穆尔河。 76

清帝于6月16日收到普提雅廷的最后通牒时，也即行降旨吉林、黑龙江两省将军，劝阻俄罗斯使节，不得令其途经满洲^④。皇帝又另颁谕旨，不许再从满洲各省及察哈尔抽调军队前往中国本部^⑤。

当普提雅廷收到来自中国的咨文之际，不让他途经蒙古已是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15，第22页下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15，第23页下页。

③ 舒马贺尔，前书，第287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15，第25页上页。

⑤ 《大清历朝实录》（1937—1938年东京版）第223章第14页上一—15页下。舒马贺尔，前书，第287页。

清楚的了。他致函哥尔恰科夫,建议如果中国人不让他途经满洲,俄国就用武力占领瑷珲城^①。私下里他又向穆拉维约夫讲:即使圣彼得堡不准,他也要这么干。穆拉维约夫虽然反对这样做,却赞成占领瑷珲城,认为这“不仅从政治观点来看,即使是从乌斯特-结雅驻军在冬天与外贝加尔省的交通来看,也是一个根本问题”^②。看来他似乎没有向哥尔恰科夫表示过这一看法。但是,较此为早,在3月份他就已鼓吹更放肆的行动。3月18(6)日,他写信给卡尔萨科夫说正在作入侵满洲和蒙古的准备^③。3月26(14)日,他又写信给康士坦丁大公,建议俄国对印度作一次佯攻^④。

77 普提雅廷与穆拉维约夫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表现出很热火。穆拉维约夫给卡尔萨科夫的信中写道:“普提雅廷的确不是一个坏伙伴。但很可惜,他参预了阿穆尔事务,这很可能给事业带来损害^⑤。”

1857年5月28(16)日,他们两人在两营步兵、一队野战炮兵的护卫下,离开恰克图去阿穆尔下游。此时,穆拉维约夫下令把江的左岸屯居地往前扩展。四百五十家哥萨克占领了自乌斯特-斯特烈耳卡到小兴安岭山脚下的地方。又在乌斯特-结雅设立了一个轻炮兵营地^⑥。穆拉维约夫给部下作了详尽指示,要他们与中国各阶层居民都保持友好关系,同时要事先通知那些不愿在俄国统治下生活的中国居民迁过江去。穆尔维约夫命令阿穆尔沿线

① 按巴尔苏科夫前书卷1,第494页与《红色档案》载,他只建议在瑷珲或萨哈林作一种示威行动。

②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1,第494页。

③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I,第484页。

④ 同上,第498页。1853年普提雅廷反对过占领阿穆尔河,而伦森则假定他1857年仍然反对。见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97年圣彼得堡第二版)第292页与伦森:《俄国向日本的推进》(1959年普林斯顿版)第308页。

⑤ 同上,前书,卷I,第493页。

⑥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I,第495页。

第一区司令官,告诫他凡是接触到的满员,如果他们方面露出任何敌意,将会遇到进军右岸的远征军把他们的武装解除。^①

英国驻圣彼得堡使节于普提雅廷走后,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弥补了他的政府对于俄国在中国所处地位的无知。4月14日,他向克拉伦登汇报说,他“曾经设法探查俄国在北京的使团。但是由于有关这个使团的一切事情都高度保密,要取得关于它的可靠情报是极度困难的”。可是这个英国使节总还向外交大臣作了一个关于俄国在北京使团的相当准确的概述。他还报告,科瓦列夫斯基早在六年以前就缔结了《伊犁条约》^②。

沃德豪斯4月25日给克拉伦登私人写信倡议,英国在向中国提出它的要求时,要邀请俄国合作,那样或许会诱使哥尔恰科夫透露它们在中国的真正目的。^③为答复此信,克拉伦登5月5日给沃德豪斯写了两封私人信件。第一封是打算非正式地向哥尔恰科夫表示一下,它的内容是试探性地向俄国提出合作。第二封信只供沃德豪斯自己看。信内说:“……你可以把上述信件全部给哥尔恰科夫看,使他从中或许看出我们准备与俄国合作,但并不寄予特别的重视……当然我既不期待会有诚意,也不期待能有联合行动。但这是我们方面怀有友好情绪的一个证明,这也许可以使你得到机会去查明他们究竟在北京搞些什么”^④。

与此同时,哥尔恰科夫夫人正在因普提雅廷很快就被中国接待的希望日趋暗淡,想转而与英国取得谅解。5月9日,托尔斯泰向沃德豪斯作了一项小心谨慎的建议。这是在沃德豪斯收到克拉伦登的信之前。5月15日,沃德豪斯答复克拉伦登说信已收到,

① 舒马贺尔,前书,第290页。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65/494。

③ 克拉伦登文书,71类。

④ 克拉伦登文书,139类。

他向哥尔恰科夫交涉后,哥尔恰科夫非正式地表示同意在“和平谈判的范围内”,在中国与英国合作^①。

接着,5月25日,克拉伦登授命沃德豪斯去与俄国人取得一项官方的谅解^②。在6月10日,此信到达圣彼得堡之前,沃德豪斯已于6月5日向伦敦汇报,对英国所提的要求,即:扩大中国对外贸易的便利条件和北京朝廷接纳西方各国正式任命的使节,哥尔恰科夫本人肯定表示给予“纯属和平性质”的支持^③。

6月13(1)日,哥尔恰科夫写信给巴黎的基谢列夫公爵,命令他向法国交涉^④。克拉伦登也要求考莱去劝法国政府自行向圣彼得堡交涉^⑤。关于法、俄两方达成协议的内幕,外间所知甚少。然而,看上去法国与俄国达成的谅解,比俄国与英国达成的谅解要更友好、更直率。当时,法国还没有强烈的要求想知道俄国在中国北方边境的野心并加以阻挠。1857年到1860年整个期间,俄国与法国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相互关系。仍是立足于友好的基础上,79 它反映在两国关于欧洲事务的协议上,协议于1857年6月达成并一直维持到1860年底。必须把法国的对华政策看作是在英、俄之间谨慎地保持平衡,以争取两国的亲善。这是拿破仑第三在那些年中总的外交政策。

沃德豪斯想尽快看透俄、中关系奥秘的希望落了空,因为哥尔恰科夫把他对华政策的情报卡到最低限度。他不愿接受援助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因为他不肯承认怀有任何重要目的。当沃德豪斯追问他关于普提雅廷所负任务的全部看法时,他只“泛泛地描述了教士团,并说这个使团并“不具有政治性质”。“海军上将普提雅廷的

① 克拉伦登文书,71类。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65/486。

③ 英国外交部档案,65/495。

④ 柯尔迪埃,前书,第169页。

⑤ 克拉伦登文书,139类克拉伦登致考莱函18/5/57。

使命”，他说，“具有完全特殊的性质，由于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分歧而受遣派，以备在中国局势如此紧急的时刻在北京有他这样一个在政治上有分量和重要性的人物，代表俄国相应行事。”“有一些事情”，哥尔恰科夫又说，“关系到中、俄两帝国之间边界上发生的争执。普提雅廷海军上将已受命设法料理，但是这类事情就它们本身来说，并不需要一个特别使团”。哥尔恰科夫只承认这类“次要”事情是关于塔尔巴哈台赔款和阿穆尔边界的要求。6月5日，沃德豪斯在公文中向克拉伦登报告了这些^①。他在同一天的另一封私函里自己承认：“……从哥尔恰科夫那里硬逼出关于普提雅廷的实情，或者除泛泛赞同我们的意见之外，还要得到更多东西，就犹如从石头里榨出血来那样难。处理近阿穆尔的边界，究竟牵涉到些什么？就难说了”^②。尽管如此，克拉伦登仍表示他本人对于所得情报是满意的^③。

照沃德豪斯6月5日私人信件的说法，哥尔恰科夫“对于奇赖普托维奇拍来的一封电报很高兴，电内提到奇赖普托维奇与克拉伦登交谈了关于中国的问题，虽然这次谈话并没有什么新东西^④”。80本来在1857年5月16（4）日，哥尔恰科夫与沃德豪斯第一次达成非正式的谅解之后，就已经立即向普提雅廷下了新指令。这位海军上将受命支持英国要求的建立外交关系、取消对外人贸易以及对基督教徒礼拜的限制，但不支持他们所提出的要求补偿或赔款的主张”。广东陷落的消息于5月23（11）日传到俄国后，哥尔恰科夫再次写信给普提雅廷，催促他加快速度，并“不论用这种或那种手段，总之要尽一切努力来设法到达北京”，尽可不必理会“中

① 英国外交部档案，65/495。

② 克拉伦登文书，71类。

③ 同上，139类，克拉伦登致沃德豪斯函 16/5/57。

④ 见克拉伦登文书，克拉伦登致沃德豪斯函 2/6/57。

国人的惶恐犹疑,或别国政府的敌意与猜忌”。

6月6日(5月25日),哥尔恰科夫又写信给普提雅廷说,他打算拒绝接受西方对俄国或将提出的特殊要求的支持。这封信中,他断然拒绝普提雅廷提出俄国用武力占领瑗珲或萨哈林的建议。他说只有“在必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做这种事,因为它将置俄国于“极不愉快与极为困难的处境中。不仅是与北京朝廷的关系,就是对英国与美国的关系也一样”。他也提到沙皇同意普提雅廷的想法。哥尔恰科夫6月20日(8日)指示普提雅廷:俄国决心得到阿穆尔左岸,同时这点必须得到承认^①。

普提雅廷似乎并没有认真考虑取道满洲,虽然他于6月17日(5日)抵达瑗珲,询问是否已经接到准他通过的许可?瑗珲副都统有礼貌地接待了他^②,告诉他说还没有。之后,这位俄国使节悄悄动身向下游行驶。7月初他和穆拉维约夫收到北京朝廷发来的咨文,再次申辩无需俄国使节赴京,因为中国不要别人帮助平叛与对付欧洲的侵略者。按舒马贺尔的说法^③,这份咨文日期是6月24(12)日(闰五月初三日)。但它没有收入中国档案。

与此同时,清帝6月17日(咸丰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看到德勒克多尔济一份简短的奏折,附有普提雅廷离恰克图前发出的咨文一件,意思是说:如不同意他取道满洲,他就径赴天津,并望在7月11日(闰五月二十日)前到达该地^④。

这则消息显然引起了北京朝廷的焦虑,为此下了好几道谕旨。

① 《红色档案》,前书,据卡巴诺夫:《阿穆尔问题》(1959年布拉戈维申斯克版)第181页,普提雅廷也受命取德卡斯特湾地区,不是整个滨海地区。

② 巴尔苏科夫,卷I,第496页。亦见柯林斯前书(柯林斯曾跟在普提雅廷一行之后旅行)。

③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I,第287页,《四国新档》,第392号(咸丰七年闰五月初三日), (24/6/57)。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15,第25页上页。而俄国材料中无此记载。

头一道是6月17日,着直隶总督谭廷襄,秘密采取措施,但“勿启衅端”^①。6月23日(闰五月初二日)^②,又续颁谕旨。这个文件差不多可以全文引述在这里,因为它概括了清帝所处的境地,表明他如何清楚了解俄国人的动机以及他自己如何无力去对付他们。

这则谕旨对前两年在阿穆尔和塔尔巴哈台的事件作了一个现实地总结后,接着说道^③:

“现忽又有遣使来京之说,难保不即为此两事,而以商御英、法为名。且咸丰三年夏间,普提雅廷曾到上海,声称欲进口贸易。此次遣来仍系此人,必有诡谋。况业经由理藩院行文知照该夷毋庸来京。而该夷不遵回文,言欲到天津。未便由京派员,与之讲论。如果该夷到津,谭廷襄等密派晓事大员,察其来意如何,再与理论。倘仍称堵御英、法,当告以两国和好,原以各守旧章各安疆界为要。从前英夷犯顺,中国未曾借助外国,至于外国互相争斗,中国亦从未与闻。该来使意究欲何为,应由该国萨那特衙门行知库伦办事大臣知照理藩院核办。至天津并非应到之地,此处地方官亦无应行代奏之人,碍难办理。如仍欲假道黑龙江,则告以风闻两年来,该夷不遵旧约,任意行驶,该将军因和好有年,但以言语阻止,不敢详细奏闻。若必欲上达天听,则是该夷圈占地方,起衅之咎,彼国先有乖和好,于理不顺;若提焚烧圈子一事。可告以现在查办,两国均当秉公定议,断不因此而伤和好;若提及进京一节,告以向来朝贡各国使臣到京,原有接待陪臣之礼,该夷既为与国,来者又系大臣,应如何接待之处,理藩院并未办过,恐其简慢来使,反伤友谊,不如仍照旧章,可以相安无事。中国不愿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15,第26页上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15,第26页下页,由军机处秘密地紧急发出。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15,第27页下页。

83 来使进京,无非为恪遵成例永远和好起见,并无他意。闻得理藩院早已行文知照该使矣。待该夷说到何事,即可随机应对,其所不提者,毋庸先露端倪”。

此项谕旨指定直隶布政使钱忻和^①至天津与俄国人交涉,因为他有过与英国人办交涉的经验。这一天又降旨^②特派文谦作为钦差前往直隶,参与对俄交涉,因为“前此晓谕英夷,颇能力持大体”。谭廷襄不必接见俄人,可先由守口员司或委员接待,然后徐待总督藩司衙门各官前往会晤。如其态度恭顺,仅得在俄舰启碇回帆之时,致送食物。文谦不得从俄国人处收任何文书,并应声明,他所能办的,只严格限于地方之事。

普提雅廷及其一行于7月13(1)日乘小汽船“亚美利加”号自尼古拉耶夫斯克起程^③。阿穆尔河上平静无事。7月19日,穆拉维约夫写信给哥尔恰科夫^④说:“斯卡奇科夫从北京到达这里,带来教士团的书信”,并且谈到他的看法,“……我们不能和中国现政府谈任何事情,特别是不能用书信谈任何事情。”他又说:“我在
84 这里就严格按照这种想法行事。但是保持着友好的态度,仅只把我所要做的,或我所需要的,告诉最接近的中国当局。他们也以同样的礼貌对待我的要求。他们自己则惧怕一切书面往来。”后来,他在信上又说:他希望同当地人民自由贸易,“这种希望在各村也已部分实现,必将逐步在城中办到^⑤。此地人民尊敬与爱护我们,不过当局是非常畏惧我们的,把我说的每句话都当成不可更改的。

① 卫三畏在他所写:《1858—1859年记事录》(原载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华北分会会刊》,卷XL11,1911年)一文中,描绘钱忻和“象一个老人”,“有一张温厚的脸”(第28页),“一位说话慈祥絮絮叨叨的人”(第34页),“无疑会高兴地应允所有的要求的”(第34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15,第28页下页。

③ 舒马贺尔,前书,第291页。

④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2,第155页。

⑤ 即瑗珲。

因此,我不认为需要占领这座城,甚至也不必对它安一门炮。”

中国档案中有很多材料可以证实此种情景。和俄国人积极地讲友好,中国人没有报导,但本来也没有期待他们会报导。1857年7月11日(闰五月二十日),皇帝在北京收到奕山^①的一份奏折,奏称俄国人在海兰泡(乌斯特-结雅)有六门炮,其中四门对着黑龙江上的中国卡所(据信位于精奇里江西岸)。奕山派满洲协领去乌斯特-结雅会见穆拉维约夫,接待尚好,并馈赠了礼品。穆拉维约夫告诉他,还有许多俄国人将到此地,但决不会破坏和平,并要求仿照恰克图条约通商。奏折中报称有六千余俄国人在乌斯特-结雅。8月29日(咸丰七年七月初十日),奕訢又收到奕山的两份奏折,奏报阿穆尔江下游布满新设的俄国屯居地^②。奕山并派一官员去告知穆拉维约夫,正式拒绝了他所提的贸易要求,并对他在海兰泡(乌斯特-结雅)继续设屯居地提出抗议^③。在这次日期不甚确定的会谈中,穆拉维约夫拒绝迁移俄国的任何房屋,并首次提出了要中国在阿穆尔河左岸的屯户迁至右岸的要求。在出现这种事态后,奕山具文向穆拉维约夫提出抗议。他的奏折送到北京,理藩院为此咨文穆拉维约夫^④。按照舒马贺尔的说法,总督拒绝接受奕山抗议,随之附回一函否认俄国与中国之间有什么需要商办之事;北京朝廷不是以此为理由拒绝接待普提雅廷吗!在穆拉维约夫离此去圣彼得堡后不久,理藩院就致俄国萨那特衙门一纸咨文,要求把穆拉维约夫的任意妄行转达给沙皇,提醒他的注意^⑤。

1857年夏,尽管中国提了正式抗议,但并未采取抵抗俄国人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15,第34页上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16,第14页下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16,第16页下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16,第18页上页(舒马贺尔提供的俄文原文,前书,第293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16,第21页下页,(舒马贺尔,前书,第294页)。

的行动。仅把三姓驻军从四百人增至五百人，瑗珲也增补四百人^①，并增添了弹药^②。北满与瑗珲驻军总数即使从纸面上看，也远不足一万人，因为吉林驻军现在据称有四千三百另五人，黑龙江驻军人数估计与此不相上下，或者还要少^③。俄国人有二万二千受过良好训练的武装力量在满蒙边境，更有一千人可以增调该处^④。

约在同一时期，御史吴焯重又提出前拟向满洲荒原移民的建议。奕山与现任吉林将军景淳经过调查后，得到奕訢批准，将原住满洲的民人移建新农垦区，如果这些垦区不致影响采参、采珠和军屯制度^⑤的话。

8月5日(7月24日)即咸丰七年六月十六日，海军上将普提雅廷乘“亚美利加”号抵津。奕訢6月23日的谕旨中规定了关于⁸⁶接待他的事宜。清帝在谕旨内准许天津的官员们接受普提雅廷的照会，因为这看上去仍是诱使他离去的最有希望办法^⑥。中国人企图说服普提雅廷在恰克图或阿穆尔领取回文，而普提雅廷则执意不得回文决不离津。按中国档案所载，普提雅廷继续隐瞒了他的使命的真正目的，坚持“英夷深蓄异志”，英人与俄人并未结盟而与太平叛军串通。长芦盐政乌勒洪额于1857年8月20日(咸丰七年七月初一日)的奏报中^⑦，表达了如下的意见：“该夷素与日本、美利坚等国较密，窃恐托名英夷，妄肆鸱张，从中调停，为要求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16，第8页上页——咸丰七年七月初八日景淳的奏折。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16，第2页上页——咸丰七年六月初四日谕旨。数达一万斤。

③ 同上，第58页。

④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2，第152页。

⑤ 《大清历朝实录》，前书，多处载有，尤其是第229集第12页下。参看以下各句。

⑥ 在咸丰七年六月初四的一项圣旨中。《筹办夷务始末》，卷16，第4页上页。

⑦ 《筹办夷务始末》，卷16，第6页下页。

地步。至于进京一层，谅非本意，而在津守信，实系固执成见，牢不可破。”同日，奕訢降旨让普提雅廷在津候信，但命令他须先行离去，候复文备齐再来。这道谕旨通知普提雅廷之后，8月24日（12日）即咸丰七年七月初五日，就收到他的照会，声称他拟于次日驶往上海了^①。当《亚美利加》号在津之时，巴拉第派遣教士团中的一人，去和普提雅廷接触，但未获准与俄国人中的任何人见面^②。

经普提雅廷之手递交的照会，要求注意几代皇帝曾经接纳六位俄国使臣进京，并且再度提到早先业已表示过的担忧，即深恐中国尽管精于韬略、施政及文学，但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对付英国。它也提到未定界址，现在应行商定^③。9月6日（咸丰七年七月十八日）谕旨^④中奕訢命令边界问题应与奕山在黑龙江商定。对普 87
提雅廷所提其它各条，均加以拒绝。如他重行返津或到中国其它口岸，就不能再给回文。可是，为了避免触怒俄国使节，在他离津之时，应为他送行如仪。

理藩院写给普提雅廷的咨文^⑤，精心阐述了谕旨。它解释了接待俄国使臣会招致困难。它的有关段落中文如下：

“凡贵国朝贡使臣来京，将奏书赍至午门，行三跪九叩礼，大皇帝赏赐食物，礼遣回国。若寻常护送学生喇嘛人等来京者，另有相待之礼。今普提雅廷，既无贵国奏书，自不便照朝贡礼节。且自称头等公，又不便照寻常相待。恐有简慢，反伤友谊。此亦系中国好意，本非猜疑。”

舒马贺尔所引这则送到圣彼得堡的咨文，略有不同，口气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16，第8页下页。参看以下各句。

② 卡发罗夫：“给穆拉维约夫的信件”1857年10月27（15）日《红色档案》，卷2，1914年。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16，第12页下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16，第29页上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16，第26页上页。

也比较直率少礼^①。后来在和额尔金谈话时普提雅廷宣称，复文要求磕头，认为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避免的^②。他也告诉葛罗，照会抱怨没有提到贡品^③。可是中文给人的印象却是，如果普提雅廷声明愿以比较谦卑的方式进京，作为教士团的护送官，原是能够给他这个机会的。

8 月末，普提雅廷在上海作短期访问的时候，看上去他想讨英国人的好。他会见英国领事罗伯逊，他向罗伯逊说俄国没有和中国缔结新约。并给罗伯逊留下一个印象，他的任务是“敦促中国政府不要执行排外政策”^④。

9 月 14 (2) 日 (咸丰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普提雅廷回到天津。因为天气恶劣，迟延三天以后才有一只小船带着北京的复文登上他的船^⑤。9 月 19 日 (咸丰七年八月初二日)，乌尔洪额奏折^⑥，“该夷遵谕回帆，情词恭顺，兹派员送给回文，酌备羊、水、菜食物，……该夷颇为欣慰”。乌尔洪额、钱忻和、文谦同日在另一奏折中^⑦说，普提雅廷与通事明常 (塔塔里诺夫) 讨论中国的复文后，声称他将返国与沙皇商酌，并谢绝为他举行的送行仪式。中国人一离开，“亚美利加”号当即启碇入海。按奥斯登·萨根对此次使团的记载中唯一明确的部分^⑧，讲俄国这帮人未能进入北京的失败，使他们感到十分沮丧，其中有人提出一定要把北直隶湾从英语称为 Gulf of Pechihli 改成俄语的 Zaliv Pechali。不过，看来使普提雅廷作出决定的，倒不是他再也进不了北京，而是他不得不靠武装力量或

① 舒马贺尔前书，第 292 页。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17/276 额尔金致克拉伦登函 14/11/57。

③ 法国外交部档案，葛罗致瓦列夫斯基函 26/11/57。

④ 英国外交部档案，17/276 罗伯逊致额尔金 1/9/57。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 17，第 1 页上页。

⑥ 《筹办夷务始末》，卷 17，第 1 页下页。

⑦ 同上。

⑧ 《圣彼得堡报》1874 年第 94 号。

大笔金钱，才能以政府所派正式大使身份去到那里。他致哥尔恰科夫的第80号函件，日期为10月7日（9月25日）提出他应以三、五百万两银子把锡霍特山脉（老爷岭）“换来作为俄国的边界^①”。

俄使再次离开天津前往日本。他在那里没有遇到什么困难，⁸⁹即于10月29（12）日与日本议结商约，确认了1855年1月俄日双方的初步协议，从中为俄国取得相当好处^②。11月初，普提雅廷从那里又赴上海，他在此向罗伯逊说，北京坚决不准许他去，他“暗示在华有利益的列强一致行动是会有好处的”。他也说到希望会见现在香港的英国使团及远征部队的首脑额尔金勋爵^③。他重去日本第三次回到上海之后，向罗伯逊谈到“我们的友好关系”时的语气，据罗伯逊报告额尔金说，“我如能依样重述，是定会使阁下极感满意的。”^④

普提雅廷也从上海写信回国向哥尔恰科夫建议，俄国政府应以停止恰克图贸易作为报复。因为据他看，中国政府把这种贸易当成俄国所必需的，他们为了这一原故，便对俄国更加蛮横无理，否则是不致如此的。这位海军上将也慨叹俄国没有拿三、五百万卢布来贿赂中国官吏，这样，保险准他进入北京^⑤。

11月9日，普提雅廷又驶向香港，11月14日到达那里。刚到该岛，他就去拜访额尔金勋爵。把他在天津受的挫折完完全全地告诉了他，但却隐瞒了俄国政府对阿穆尔有企图的一切情况^⑥。

①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同上书第3页，见后第89页。

② 见伦敦：《俄国向日本的推进》（1959年普林斯顿版），第9集。

③ 英国外交部档案，7/276 罗伯逊致额尔金 3/10/57。

④ 同上。罗伯逊致额尔金 3/11/57。

⑤ 《红色档案》，前书。

⑥ 见“额尔金勋爵使华的有关书牍”14/11/57；邦纳——史密斯和卢姆拜：《第二次对华战争》（1954年，伦敦）；与前书第57页以前。

额尔金离伦敦时奉到的正式指示中未曾提到俄国^①。但是克拉伦登在7月10日的私函中告诉他,“俄国人正在走以友好方式与
90 们合作的道路,可是我们决不可信任他们。……如果信仰基督教的列强能在中国合作的话,你在中国会有更好的机会去发现他们在那里作什么,你在那里也易于成功”。^②英国使节现在极力向普提雅廷查明曾否向中国提出援助以镇压叛乱。俄国人“有点发窘”地加以否认,但是又说:“他无疑地或许表示过,俄国作为一个邻居,会对中国的内忧外患提出最好的忠告。”额尔金断言这句话足以表明,“如果中国更肯听话,俄国或许不是不愿采取这种态度的”。“对中国政府已别无办法,除非能对北京本身施加压力,而那就需要有吃水浅的船舰直入白河。”额尔金约他与北上的联军同行,并向克拉伦登报告这次会晤“极为和谐。”^③可是,法国使节葛罗男爵向法国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报告,“额尔金勋爵与普提雅廷海军上将之间很少一致;当英国使节告诉普提雅廷,女王陛下政府已知俄国皇帝曾经向中国皇帝提供人力和财力援助的时候,普提雅廷是十分窘迫的”。

稍后,普提雅廷拜访了葛罗。和英国使节的会见相较,这次要紧张得多。葛罗描绘这个俄国人说一口好法语,但是“远不具从练达世故而来的那份温雅坦率风度”。^④他又评论道:“海军上将的颀颀是有些令人为难的。直到现在他还保持着一种我所难于解释的含蓄。我差不多是对他直言不讳的,以便向他查问香港所传北京朝廷已接受他的要求一事是否有根据。普提雅廷虽然详细讲到他旅

① 见“额尔金勋爵使华的有关书牍”14/11/57;邦纳——史密斯和卢姆拜:《第二次对华战争》(1954年,伦敦);与前书第57页以前。

② 克拉伦登文书139页。

③ 关于额尔金勋爵1857—1860年赴华的特别使命信函,额尔金——克拉伦登14/11/57。不在邦纳——史密斯和卢姆拜书中。

④ 普提雅廷不是贵族出身。

行中的一些事情，却绝口不提阿穆尔。葛罗告诉他英、法联军计划占领广州，而这位海军上将“十分直率地抨击了这种做法，并以为这是无济于事的”。他再次怂恿以武力直逼北京。此时，按葛罗的说法，额尔金似乎认为，俄国人希望在军事上参与向北方进军，而这是他所极不情愿答应的^①。显然，普提雅廷在透澈阐明他的政府的主张上，没有取得成功。也许，他只是向额尔金透露他个人的看法，象他于1月间写信回国时所说的那样。

尽管普提雅廷在见到额尔金勋爵之后，一直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想去会见美国代表列卫廉，可是他却和列卫廉不久就建立了诚挚的关系。在澳门的列卫廉，11月14日他一到就即刻写信给普提雅廷。而这个俄国人在第三天才复信给他。11月25日，列卫廉向卡斯汇报：“我和他坦率交谈了我们共同感兴趣的各种问题。他对于我们代表和平与中立的各国，促进当前中国事务圆满解决的能力，比我还要热情自信。”在列卫廉面前，普提雅廷也贬低了英国袭击广州的倡议；关于阿穆尔河，他对列卫廉也保持沉默，如果列卫廉不问他什么的话^②。

列卫廉与普提雅廷在社交上保持密切合作。列卫廉为他妻子写的私人日记中，保存了一些跟这个俄国人会见的描述。11月至12月间，这两个人在香港与澳门之间来来往往，经常会见。12月5日，列卫廉第一次请他和他的高级海军军官赴宴，普提雅廷10日也回请了他。列卫廉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些欢宴奇妙而可惊的安排，使我毫不怀疑，这些外交官都对它重视。”普提雅廷赢得列卫廉友谊的程度，可以从列卫廉日记1月23日日记中看出：“我邀集一伙美国人赴宴，而把普提雅廷伯爵加进去，因为他心里已是半个美国人了。”

① 法国外交部档案，葛罗致瓦列夫斯基函 26/11/57。

② 美国参议院行政文件，30(36, 1)

92 普提雅廷写回国内的信是好斗的、性情急躁的典型。11月，他在香港写信给哥尔恰科夫，说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告诉他，他的天津之行造成“沿海各地以及远到连北京都惊惶失措”。看来这是被夸张了。额尔金则从天主教传教士方面听到有一份布道汇报中提到，普提雅廷曾以带了一支海军和一支陆军重返天津进行恫吓^①。12月29(17)日，普提雅廷写信给哥尔恰科夫，建议封锁白河，以阻粮食运送北京。并汇报说：清朝皇帝已降旨抵抗在阿穆尔河上的俄国人^②。普提雅廷也提出俄国海军应与英、法联军在北方所可能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协同动作。在这一期间的另一份日期不明的汇报中，普提雅廷描绘他与美国人的关系是“友好而坦率的”；至于与英、法的关系，则是“有礼，愉快，但拘限于一定程度的警惕”^③。

同时，巴拉第在10月27(15)日从北京发的一封信，很清楚是12月才到圣彼得堡的。信中暗示拒绝普提雅廷途经恰克图进北京的主要负责人是德勒克多尔济。他又为此写道：“有人把一件据说是真的事情告诉我们，在一次为此而召集的会议上，彭尚书^④对历史作了回顾，认为中国历代朝廷凡在忧患中向外国乞援，企图借用外力的，无不失去自己的独立而覆亡。因此根本大计在于采取修好与拒斥政策。这位尚书在军机处是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意见就被采纳作为行动的依据了”。巴拉第在同日的另一封信中，第一次表示出他耽心教士团的安全^⑤。

93 秋天，璦琿副都统吉拉明阿，对俄国人的活动向穆拉维约夫提

① 这自然是可能的。塔塔里诺夫在得到，或没有得到普提雅廷的同意下，都可能向一些非官方的中国人讲这些话。

② 显然这敕令就是载于第85页上的那一件。《筹办夷务始末》，卷16，第8页上。

③ 舒马贺尔，前书，第295页。

④ 彭蕴章，工部尚书，大学士。

⑤ 《俄国档案》，卷3，1914年，穆拉维约夫把这事归因于巴拉第耽心普提雅廷用海军支持联军。（巴尔苏科夫，前书，卷2，第162页）。

了一个尖锐的抗议。穆拉维约夫复文令他们不拘是与普提雅廷或他在乌斯特-结雅的代表亚兹科夫都可讨论阿穆尔河的问题^①。理藩院把一份类似抗议的咨文送交穆拉维约夫转萨那特衙门^②。10月31日(咸丰七年九月十四日),奕訢收到7月份俄国政府的照会^③,坚持要求按恰克图条约旧例,允许普提雅廷入京。理藩院于11月2日(咸丰七年九月十九日)复文称,普提雅廷已为谈判去阿穆尔了,他对在天津受到的接待十分满意^④。

奕山及其同僚所上三份奏折11月8日(咸丰七年九月二十二日)送给奕訢。其中的第一份^⑤,奏报亚兹科夫已把吉拉明阿致俄国的抗议咨文退回^⑥。第二份^⑦,对于皇帝早些时候问及阿穆尔河左岸地方情况作了回答,说那里经常驻有旗户三十余屯,而“田园无几”,本身都感供应不足,自不能接济俄国人;黑龙江下游精奇里地方是布特哈和鄂伦春打牲游牧的地方。第三份奏折^⑧,奏报已严禁与俄国人贸易,而此地仍无普提雅廷的消息。为此,北京又送致一项咨文,询问普提雅廷何时才能抵达阿穆尔会谈边境问题。并宣称自乌第(乌特)河至海兰泡整个地区属中国地界^⑨。

12月底,圣彼得堡要举行讨论远东问题的会议,正在巴黎度假的穆拉维约夫被召回国。会后,哥尔恰科夫于1月5日(12月24日)拟发了一个新指令给普提雅廷,告诉他俄国政府决定继续

① 舒马贺尔,前书,第293—294页。

② 舒马贺尔,同上,《筹办夷务始末》中未载。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17,第14页上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17,第16页上页。可能就是舒马贺尔书上提到的咨文。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17,第16页下页。

⑥ 查《筹办夷务始末》,作者所引奕山奏折并无此语——译者。

⑦ 《筹办夷务始末》,卷17,第18页上页。

⑧ 《筹办夷务始末》,卷17,第18页下页。

⑨ 《筹办夷务始末》,卷17,第20页上页。

94 占领阿穆尔河左岸,但不与中国断绝关系。“恢复这种关系是极其困难的,甚或不能按照现存基础恢复”,并且有“毁坏我们的教士团和停止恰克图贸易的危险”。普提雅廷奉命停用赴华公使的头衔,并被命名为“赴华舰队司令与钦命大臣”^①。按涅维尔斯科依的说法,普提雅廷在同一则命令中得到通知说穆拉维约夫已受委托谈判阿穆尔边界,普提雅廷则可以不必再过问此事,而致力于取得其他国家在华所取得的特权^②。

俄国政府同时又向北京发出另一照会。大意说“中国派特使到瑗琿没有用处,因为普提雅廷伯爵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已去别的国家,与前往阿穆尔河口的舰队相会合”。咨文内还通知中国人说,沙皇亲自颁谕,召穆拉维约夫返回圣彼得堡,听取有关边界谈判的特别指示^③。

尽管书面上的活动频繁,而整个 1857 年到 1858 年冬天,阿穆尔的实际情况依然保持平静。1858 年 3 月 9 日(2 月 25 日)穆拉维约夫写了一封信给科瓦列夫斯基,从他自己的观点,对情况作了描述。“瑗琿副都统对于亚兹科夫之服从,犹如亚兹科夫即是我;我们的官员与他们的关系连中国的常礼都无需采用了。我们的部队与当地老百姓关系密切”。贸易繁荣,两戈比买一只鸡,二十戈比半只羊。穆拉维约夫又向科瓦列夫斯基说,为派出下一次的教士

95 团到北京,又缔结了新协议,这是清政府还无意与我们决裂的明显证据^④。

① 《红色档案》,前书。

② 涅维尔斯科依,前书,第 388 页及其他。亦见于巴尔苏科夫前书,卷 1,第 38 章,可是巴尔苏科夫没有说制止普提雅廷接触阿穆尔问题。此项命令是由中校马尔特诺夫经由苏伊士带来的。见第 102,115 页以后。

③ 舒马贺尔,前书,第 295—296 页,这则咨文并未载在《筹办夷务始末》上,但可能即系 4 月 8 日的奏折中提到的文件。(卷 19,第 24 页上)

④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 2,第 161—163 页。但,柯林斯,前书,1858 年 3 月 6 日记载,阿穆尔的当地居民经常拒绝售食物给俄国人。连他在内,也不售给。

1857—1858年冬季，俄国人第一次在阿穆尔河上他们的几个较重要基地之间修建雪上通道。尼古拉耶夫斯克与乌斯特-斯特烈耳卡和马林斯克也都联接起来了。两地相距约二千公里^①。

在整个冬季，满洲当局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但又呈递了几件关于有争议地区情况的含糊奏章。11月21日，奕訢在北京看到了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与齐齐哈尔副都统那敷德所上的奏折，其中包括富呢扬阿对阿穆尔河下游情况的叙述^②。他奏报那里“道路僻远，向无防兵”。只有赫哲、奇勒尔和费雅喀人等在两岸居住。阿穆尔河入海之口，因为远非一日可到，而且“江河浩渺，岛屿纷歧”，“碍难往查”。他的奏折附有地图，但此图没有公布。除海兰泡（乌斯特-结雅）这个满洲人所共知的城以外，对于俄国人屯居地的地位并未详细绘明。

当1858年春天穆拉维约夫回到远东时，他还打算来左右事态的发展。4月8日（咸丰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德勒克多尔济递呈皇上的奏折说，俄国少校迭斯波特-捷诺维奇将咨送理藩院的文书交到库伦^③，并告诉他广州陷落。他对此原无所知。来人并提出阿穆尔右岸空旷地方必须给予俄国，巴拉第必须获准前往广州与普提雅廷相会，还要保证俄国新到北京的教士团居住安全。末了，还⁹⁶要求德勒克多尔济赠与穆拉维约夫以花翎顶戴，并接收俄国的回赠。来人强调普提雅廷是可信赖的，并提出让普提雅廷去跟英夷办交涉。德勒克多尔济方面答复说，中国向来不需要借助外国。没有皇上批准，他断不能接受他们的奖章。他还说：“已于上年行知，学生驻京，由来久矣，毫无事端，何致有害？此次是否驻京，听

①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1，第505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17，第22页下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19，第24页上页。这件俄国照会并未收入《筹办夷务始末》，亦未见任何答复它的中国谕旨。它可能就是这一年早些时候发自圣彼得堡宣布穆拉维约夫已受命办理边界谈判的那件照会，见上面第94页。

尔办理。”

同日，一件批复此项奏折的谕旨证实了广州的陷落，并继续写道：“德勒克多尔济等，应于此案视为泛常，暗加防范，断不可于俄夷稍露声息。嗣后俄夷复至库伦，该贝子等即当告以现已简派大臣前往(南方)办理，从前遇有外国扰犯，我国从无借助别国，亦并无赏给吉那拉勒、固毕尔那托尔等翎支，及我国官员受尔国奖励之例。碍难赏给翎支。”关于教士团的复文也获得批准^①。

巴尔苏科夫从穆拉维约夫书函中所作关于上述库伦会晤的摘录，则提供另一幅图景^②。穆拉维约夫4月6日(3月25日)致康士坦丁大公的信中写道，迭斯波特-捷诺维奇听德勒克多尔济说：“……他本人怀疑清朝的稳定，他不敢对教士团的安全作肯定的保证”。

在此期间，在中国本部的英、法联军于攻陷广州之后，已决定自上海向北京朝廷作一次最后的谈和交涉。2月4日，额尔金与葛罗同时致书普提雅廷与列卫廉，邀请他们与英、法一起向中国朝廷提出相同的照会。其中要求中国朝廷派遣钦差大臣至上海，谈判接纳各国外交使节入京、各条约口岸的通商便利，和华人、洋人等信教一律自由等要求^③。俄国与美国使节都对这一提议表示同意。普提雅廷在整个冬天与列卫廉经常会晤。他首先正式函询列卫廉是否同意此举，列卫廉同意了^④。2月8日，这个俄国人带来照会的英文本交列卫廉修改，借此再来恭维他。列卫廉的秘书麦金莱与普提雅廷共同斟酌这件照会。列卫廉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一年以前，谁能想到麦金莱会在澳门坐在福士先生走廊里的沙发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19，第25页下页。（系上页——译者）

②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2，第164页；亦见舒马贺尔，前书，第296页。两本书都没有提到翎支问题。

③ 关于额尔金勋爵1859—1860年赴华特别使命的信函。

④ 美国参议院行政文件，30(36, 1)。

上,帮助全俄罗斯皇帝的大使(原文如此)改定一封致在北京的另一皇帝的照会。”列卫廉觉得这件事颇“有趣”,因为事实上,普提雅廷讲的是一口道地的英语。

2月8日,普提雅廷把他的照会底稿送给葛罗,次日又将一份副本送给额尔金。当时给西方使节看到的这些文件,由柯尔迪埃公诸于世了^①。这些文件支持联军的要求,而仅有一句提及边界和商栈事件。当额尔金把一份文件副本交给克拉伦登时,他没有另外作什么说明,但在一封写给他妻子的信中,承认“普提雅廷的照会好极了,也可以说比别的全要好得多。”^②葛罗所得的印象也差不多。他在给他的部长的信中说:“我看普提雅廷伯爵的照会是一个很出色的文献,我认为是早已由俄国枢密院准备好了的,只不过是段落之间插进一些关于事态的议论”^③。

列卫廉对俄国照会本身没有表示特别赞赏,而在2月13日写给卡斯的信中说,他觉得普提雅廷在准备这一文件过程中,态度始终是那么友好,所以他很高兴地让美国巡洋舰“密西西比”号司令尼可尔森上校把普提雅廷的照会递送到上海^④。

98

可是,英、法、美的使节,谁都不知道普提雅廷的照会中附有一份有关阿穆尔的附件,《筹办夷务始末》中载有^⑤:

为咨行大清国军机处事,普提雅廷等四国所愿条例及俄罗斯国使臣亲身赴京商议两国边界事宜,前已咨行在案。查分边界当以两隅直至东海,普提雅廷等四国,求祈与贵国派出

① 柯尔迪埃,前书,第282—286页,亦见关于额尔金1859—1860年赴华特别使命的信函。

② 华尔伦:《额尔金勋爵的信件和日记》(1872年伦敦版)。

③ 柯尔迪埃,前书,第286页。法国外交部档案,葛罗致瓦列夫斯基函10/2/58。

④ 美国参议院行政文件30(36,1)。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18,第32页上页到第33页下页。舒马贺尔前书第296页有简短记载。亦见卡发罗夫(巴拉第),《1858年的日记》(1912年,圣彼得堡)第3页。不过,他并没有引原文。

大臣，商办此件要事，请贵国预先晓喻，该大臣令其先议我国如何办理。查两国定界及地理图式，惟自沙斌岭起，至阿尔管什勒喀河止^①。此外余地，人皆不知。均谓自兴安岭起，至东海止。俟将该处查明后，始行分界。今查明兴安岭并非直达东海，此岭在本处不远，分作两股。一经过我霍斯克，在恰克图未立条约以前，已归我国所属。亦并非由黑龙江通松花江，系仅达黑龙江地方。此岭由黑龙江右岸至满洲地方，是以不能以兴安岭为两国边界，当以黑龙江为界，况俄罗斯已有人民在黑龙江左岸居住，应以黑龙江左岸为俄罗斯边界。至黑龙江城附近满洲各庄，无论多寡，均令移居右岸，其移居费用本国供给外，并可赔偿钱财物件，惟祈以此事为要。再查乌苏里江下游，并无满汉人等居住，亦无赴彼处船只，应以乌苏里江右岸为界，且相距河源不远，当以入海河叉分作海岸。其海岸空地，俄罗斯已有人民设卡筑城，惟愿在伊犁地方分明界址。各处均照自沙斌岭起，至阿尔管什勒喀止。规模定议，如此办理，边界可期永远谧安。上年七月间，在天津海口接到理藩院来文，甚不合理。彼时并未多言，但俄罗斯国并非别国所属，向不与中国纳贡，敝国君派普提雅廷，并非专为此事，系会同商办两国有益之事，贵国大臣一至上海，即行商议。

对中国领土要求的全盘主张，俄国人终于向中国人端出来了。这是瞒着西方使节的，而俄国使节却倚仗他们来支持这些主张。美国人对俄国人没有任何怀疑，这是明明白白的。当他们的照会还在美国人手里的时候，美国人并没有试行检查它一下^②。不管怎样，美国人对于俄国人的向东扩张，如果说他们感到任何兴趣的话，也是好意看待的。1857年11月25日，列卫廉写信告诉卡斯，

① 即额尔古纳河、石勒喀河——译者。

② 尽管美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的信件，曾被俄国人偷阅——见第191页以后。

美国驻广州领事福士曾经主动与耆英接触。福士向耆英提出，如果中国肯按照据信已经准给俄国的条件，也让英国大使进驻北京，他愿为中国出面与英、法两盟国斡旋。后来福士通过耆英的一个同僚得到答复。此人描述了俄国教士团的非外交性质，并且说：100
“俄国人新近书面告知中国朝廷，俄国将提供给养、士卒与弹药以消灭英国人。可是皇上总是想怀柔远夷，我不敢说他究竟答应了他们没有”。（在给卡斯的译文中原文如上）。列卫廉写给卡斯的信里说，他对这种说法宁愿打个折扣，他从没有把此事告诉额尔金，美国政府对之也不感兴趣。俄、美继续维持极好的关系。西摩1857年10月10日从圣彼得堡写信说，他于9月1日与哥尔恰科夫谈话时，“正如通常一样受到外交大臣阁下极其诚挚的接待。他总是友好地询及美国的情况。阅过美国政府给列卫廉的指示之后，他颇为高兴”，虽然他对其中的某些字句有意见，因为这些话似乎含有俄国对于全盘合作还有些犹疑不定的意思。在后来的公文中，俄方用的也是同样友好的口气^①。

对于俄国教士团在北京的地位和阿穆尔河的情况，美国还是没有得到什么可靠的情报。哥尔恰科夫在提到这件事时，仍然竭力闪烁其词。美国打算将来在阿穆尔通商的前景仍然光明。西摩在1858年1月26日与穆拉维约夫会见后更加乐观。穆拉维约夫在那时“非常殷勤与坦率”，声称迭卡斯德湾、马林斯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对外贸易都刚才开放。穆拉维约夫在此次会见中力图消除对俄国力量夸大了的说法，尤其是外蒙古已向俄国臣服的谣言。他还谈到约翰·珀迪于1857年末在伦敦出版的亚洲地图，把满洲滨海，阿穆尔河迤南的土地，划归俄国的部分，“要比他在看见这幅地图之前所知道的还要广大得多”。^②

① 美国国务院档案馆档案35/17。

② 同上。

柯林斯在 1858 年春,途经俄国的欧洲部分从远东回来。4 月 29 日他给卡斯写了一份热情的汇报。建议美国设立贸易公司与
101 俄国太平洋沿岸进行贸易^①。早在 1857 年,已有一份他早期所作报告的副本,落入英国驻夏威夷群岛中的俄胡岛领事手中,并且从那里转递给英国政府。

除此之外,英国内阁仍然没有从英国人手中得到俄、中事务的真实情报,直到 1858 年 2 月 27 日,沃德豪斯勋爵才送给外交大臣一份新设俄国黑龙江公司的章程的副本。哥尔恰科夫有好几次提到他对额尔金与普提雅廷的合作表示满意。3 月份他告诉沃德豪斯说,巴拉第描绘的北京情况令人感到遗憾^②。

瓦列夫斯基于 1858 年 4 月 3 日写信给法国驻圣彼得堡的使节查特伦那德,提到普提雅廷在 2 月份对于四强最后照会所作的显著贡献时说:“普提雅廷海军上将在照会内所用的词句,鼓舞我们与俄国共同合作的坚强信念。我们诚恳地祝贺这种可靠合作的建立。”^③

事态现在在中国发展得更快了。附在美国照会中的一份俄国照会,由额尔金勋爵的秘书俄理范于 1858 年 2 月 26 日亲自交给在苏州的中国人。奕訢于 1858 年 3 月 21 日(咸丰八年二月初七)收到此件。在回答两江总督何桂清的谕旨中,这位清朝皇帝描绘俄国人的行为“殊可诧异”,命令由理藩院知照萨纳特衙门,抗议普提雅廷违背前约,竟赴上海^④。同日又降旨军机处^⑤。奕訢宣称俄国人之所以如此行为,其意明显是“欲助英法两夷,而实则事不干

① 美国国务院档案馆档案 35/17,美国在阿穆尔的领事的汇报。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 65/493。

③ 法国外交部档案,《俄国集》第 216 号。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 18,第 34 页上页。照会在卷 19,第 5 页上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 19,第 1 页上页。

己”，“此次广东之事，全与该国无关”^①。他降旨避免美国与英、法两国联合一气。3月22日（咸丰八年二月初八），又一谕旨愤怒地¹⁰²回绝了俄国人提出的对阿穆尔河与乌苏里江的要求。谕旨内又枉自宣称，俄国擅入边界侵占之地，所有俄国居民必须迁走，乌第河边界亦应勘明。奕訢坚持说，普提雅廷的种种要求，显系荒谬之词，否则为何两国边界前此从未有过争竞之事^②。

普提雅廷在交出他的照会之后，又到过广州、厦门、福州与宁波^③。3月24日抵达上海^④。他在此收到圣彼得堡1月份发出的指令。让他不要再用使臣的头衔，并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诉诸武力。列卫廉觉得，这对他是十分诧异的事。此时普提雅廷当即把他的舰队中的大小船只分别派遣到日本或阿穆尔，只留下“亚美利加”号和一艘快速舰。他还立刻在3月29日把他接到的新指令知照其他三国使节^⑤。

四强的代表在上海从何桂清处得到了答复。由于普提雅廷送来的照会是附在列卫廉来照的封皮内一起送来的，因此两江总督何桂清没有单独给普提雅廷以复照，而只在给列卫廉的照会内提到“俄国从未在五口通商，上年曾有敕谕派遣大员至黑龙江与普提雅廷商议边界事宜”，因此请列卫廉转知普提雅廷，理藩院将另行咨达，俄国人所有应议事项均可与之往来函商^⑥。普提雅廷与列

① 此句系《筹办夷务始末》，卷19，第2页上页不相连属的两句，作者引成一段，现增一引号将其断开。——译者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19，第3页上页。

③ 此去是为研究该地情况。只是，倾盆大雨妨碍了他的访问。见列卫廉私人日记（卷2，国会图书馆手稿部）1858年3月24日日记。作过这类访问的又一外国使节是额尔金。他对普提雅廷的活动留有印象。见《额尔金勋爵的信函和日记》，见1858年4月11日日记。

④ 见1858年3月25日列卫廉日记。

⑤ 美国参议院行政文件，30(36,1)列卫廉致卡斯函。3/4/58与附件；亦见《关于额尔金勋爵1859—1860年赴华特别使命的信函》，与柯尔迪埃，前书。普提雅廷并未提到阿穆尔河。

⑥ 美国参议院行政文件，30(36,1)

卫廉二人,为了中国没有各别答复,同时向中国人提出抗议^①。

103 致送这三位使节的照会,都要他们回广州去与叶名琛的后任谈判。知道这不可能取得什么结果,额尔金和葛罗分别于4月1日和4月3日,邀约俄、美使节同去天津。4月5日,普提雅廷分别向他们表示,他完全同意此行^②。

额尔金于4月23日致外交大臣的一件公文^③,表明促成这次北上进军的部分原因,是出于一种不甘心向俄国人示弱的心里。额尔金曾告诉普提雅廷,英国在浅水舰只方面实力很强,可是事实上海军上将西马靡各厘还没有能把他所需要的炮舰都集中在香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那些没有与我们携手的人,不知何时或许还会掉头来反对我们”——不用说,这是暗指对俄国人耽着心。普提雅廷早些时候也对额尔金说过,在北方作战的季节到5月底就过去了。看来额尔金是相信他的^④。

普提雅廷接受了英、法的邀约,然而他有办法比别的使节都早出发到天津。但这也有些偶然性,因为另外几个使节都由于料不到的原因而不得不滞留在那里^⑤。普提雅廷是4月7日(3月26日)离开上海的。1858年4月12日(3月31日)到达白河^⑥。在那些国家的代表还没到达的时候,他已经设法与中国打通关系了。

普提雅廷刚碇舶,立即送了一封照会上岸,要天津的官员到他的船上商讨一件好事。直隶总督张殿元,乌勒洪额和天津镇总兵

① 普提雅廷 1858 年 5 月 4 日照会。这个照会的底稿副本曾经送交额尔金(英国外交部档案,17/287)。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17/287;柯尔迪埃前书,第 321 页并参看第 321 页以下。

③ 英国外交部档案,17/288。

④ 英国外交部档案,17/287,额尔金致克拉伦登,3/4/58。

⑤ 见列卫廉日记,前书,与俄理范《1857—1859 年额尔金勋爵出使中国日本记》(1859 年伦敦版)。

⑥ 列卫廉日记,前书。胡世泽从布雷特斯奇奈德处引的日期并不一定正确。

达年的奏折载有此事^①。他们这份奏折在4月15日(咸丰八年三月初二日)到了奕訢之手。何桂清的一份后发的奏折也于同日到达,他把上海道台接见普提雅廷的情况作了描绘^②。说俄国“甚为恭顺”,仅作寒喧应酬。他对美国与俄国人的看法是“乘衅附和,希冀坐收现成之利”。然而这些对清帝造成的印象似非不利。他谕令在天津对普提雅廷妥为接待^③。

在普提雅廷到津投书的第二天,有两个中国低级官员到了“亚美利加”号上。普提雅廷拒绝接见他们。因而,第二天又来了两位高级官员,他同意会见^④。4月17日,乌勒洪额奏报了他们的谈话^⑤。他说他的代表刘永桂到普提雅廷处,带回公文一件。俄使坚持不赴阿穆尔,并采取亲英的立场,说他们因为不想跟广州的黄总督打交道,怕他不肯据实代奏,所以四强的代表才到了天津。他们把一切麻烦都怪罪于广州的叶名琛。并说俄国素与中国友好,方才肯将实情相告。他还要求派中国官员到停泊白河口外的四艘英国船上去。起先,刘永桂声称,中国人不到英国人那里去,最后也终于应允在次日去了。照普提雅廷后来在碰到列卫廉时告诉他的情况,中国人把美国与俄国当成他们的朋友,而仇恨英国。他们鼓不起去英国人船上的勇气^⑥。

与此同时,额尔金勋爵于4月14日到了北直隶湾,次日普提雅廷就拜访了他。用额尔金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计划及其前景作了极为坦率的会谈。”他还说他打算一俟他的炮舰到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20,第2页上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20,第2页下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20,第8页上页。斯威舍:《中国对付美夷的办法》,纽黑文,1953年,第414页。

④ 列卫廉日记,前书,见1858年4月18日。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20,第11页上页,斯威舍,前书,第419页。

⑥ 列卫廉日记,前书,见1858年4月18日。

105 达，就立刻溯白河上行。普提雅廷完全同意这种行动决不致引起中国人的抵抗。他还告诉额尔金，说他一定乐于追随于他之后^①。

奕訢于4月19日(咸丰八年三月初六)收到乌勒洪额的奏折后，即降旨谕知^②崇纶、乌尔棍泰与钱忻和，至少要等五、六天后才能与俄使相见。告诉他已经在致俄国的咨文中嘱他前往阿穆尔。

同日，奕訢见到普提雅廷交给刘永桂的照会，照会的调子是十分缓和的，仅仅要求中国应允以平等的条件对待所有各国。应让俄使进京，即使见不到皇帝，能见朝廷大臣也行。并要求让巴拉第来海口见他^③。

4月17日，美国一行人到达白河口外的北直隶湾。葛罗是20日到这里的，这四位使节就会齐了。因为北直隶湾水浅，许许多多各种战舰都星罗棋布地停泊在口外几英里的地方，从岸上的守卫看来，只见一片全是无法加以区别的白种人的舰队。

英国与法国在后来一个月中，继续以中国向他们的商务和势力开放门户为他们的目的。美国使节温和地坚持了他自己的通商与传教要求，并且依从中国人的意见，试图使英国人降低他们的条件。普提雅廷的政策则是要中国人全部答应他的一切要求。至于其他使节所提，只要不致造成北京朝廷落入英国势力范围的后果，
106 也要中国接受。他敦促赶快答应联军所提增开通商口岸和外交使节有事得以进京的要求，因为这些都是与他的政府的愿望相一致

① 英国外交部档案，17/288，额尔金致马姆斯伯里函9/5/58。舰艇未能及时到达。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20，第14页上页。《筹办夷务始末》中所列的日期是皇帝收到的日期。文件的写成日期都是从其它材料上推断的。北京、天津之间递送文件的时间约在三天之内。不过，一般不超过三十六小时。见费正清与邓嗣禹：《对清代行政管理的三项研究》（麻省坎布里奇，1860年）第16页。我所列的日期自然也是推断出来的。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20，第15页上页。

的。他还为他们调停努力赢得中国人的好感，使他们可能会愿意让与阿穆尔河和滨海土地作为报酬。末了，作为最后一着，普提雅廷还可以倚仗英、法远征军的兵力攻打中国，逼它向所有的人作全面投降^①。

英、法和美国使节们的所有活动都是相当公开的，彼此都或多或少地了解对方的意图与策略。但是，普提雅廷却在玩弄一种孤立而危险的手法。在此期间，他和中国人的谈判，不仅谈了西方列强的共同要求，还谈了俄国对东北边界的领土要求。后边这些要求他是极为诡密地提出来的，把额尔金勋爵和葛罗都蒙在鼓里，显然也包括了列卫廉。普提雅廷使他们以为他从未认真提出过这问题^②。普提雅廷的这笔赌注算下成功了。不过这并不仅仅由于他个人的手腕，还因为中国人决不会从他们最为憎恨的英国人那里寻求帮助，额尔金又专心致志于自己的事，没有想花更大的力气去刺探普提雅廷的活动。葛罗与列卫廉则对俄国人态度和顺，某些美国人甚至是姑息纵容的。在这种环境下，俄国人才能把普提雅廷在天津进行的关于阿穆尔河的谈判，向西方世界保密多年。迄今为止，本书确实还是第一次用西欧文字提到此事并印刷出版的书^③。

直到5月20日，西方四国使节都在不间断地与北京朝廷的代表谈判。北京朝廷的代表多方推宕闪避，企图先后利用俄国人和美国人去放低英国人的要求，然后再利用美国人去削减俄国人的

① 对我来说，普提雅廷的策略，没有真实的说明材料可资利用。但从我已有的材料看，显然也就是那样。

② 也可能普提雅廷藐视了俄国政府的命令，继续为解决阿穆尔问题而谈判。见上面第94页和下面第115页。

③ 柯尔迪埃与胡世泽和近年的一位作者徐中约，都相信普提雅廷在天津并未谈阿穆尔边界的问题。见柯尔迪埃，前书第345页，与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60年的外交状况》（1860年麻省坎布里奇）第30页。

条件,但都一无效果^①。

清帝4月21日收到谭廷襄的一份奏折,显系19日写的。他说普提雅廷必将与英、法一致行动,并提出黑龙江之事“恐难了结”^②。事情尽管到了这个地步,奕訢在批复谭廷襄的谕旨中却突然变卦,下令对夷人施行分化,在面子上对俄国人优于对英国人,目的在使英国人央求俄、美两国出而说合^③。满人在若干个星期之内都是采取这种依赖俄国人的路线。不过奕訢仍然反对作出真正的让步。4月26日,他又降旨着谭廷襄从崇纶与乌尔棍泰手中接过谈判领导权。极有趣的是,奕訢特别命令决不要把任何夷人的要求告诉另外的夷人,除非该夷首先自己提到。还指示了如何向俄国人措词。特别在这个谕旨之末加上:着谭廷襄向普提雅廷强烈表示对英国人夺占广州的抗议,并说除非英国人对其错误行为“自知愧悔”,中国人决不准准备与之谈判。不过鉴于法国在1854年帮助中国剿平逆匪,中国人预备“宽恕”法国,但须“转为恭顺如前”^④。俄国人的任何调处办法都必须是“中国可行,无伤体面”之事。滑稽的是:答应给俄国人在五口通商中的两口贸易的权利,让
108 他们与其他国家所得通商口岸之数相合^⑤。这项谕旨显然是行不通的,它使普提雅廷什么也得不到。

谭4月25日奏陈,他认为俄国已与英、法暗中联络,给他们以五口通商,似无多大妨碍^⑥。4月28日,这份奏折送达奕訢时,他很恼火,谕令谭廷襄不必去会晤俄使,甚至不必把他业已到达的

① 关于普提雅廷于1858年4月20日至5月20日在天津的谈判,资料是如此之多,我简直可以写出一个逐日的详记,但限于篇幅,此处仅作一经过压缩的摘要。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20,第18页下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20,第19页上页。

④ 原文为“念其从前恭顺”。——译者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20,第30页上页,斯威舍,前书第430页,咸丰八年三月十三日。

⑥ 《筹办夷务始末》,卷20,第35页下页。

消息通知俄使,如果后者还不知道的话。崇纶应继续主持各事,不必把在通商口岸的同等权利给予俄国^①。尽管如此,谭廷襄还是控制着谈判。次日,即4月29日,^②他会见了普提雅廷。无疑这是28日的谕旨到达天津以前的事。

由于各方面的态度都基本上是不妥协的,普提雅廷的调停,自不能取得成功。不过,他的确作了努力。他告诉三位西方使节、清朝钦差大臣崇纶与乌尔棍泰到来的消息^③,并说服钱忻和接受他们要求见钦差大臣的第一次照会^④。这次与知州卞宝书、署游击陈克明,在5月1日的重要会谈中,普提雅廷对联军的情况作了解释(据中国方面所载谈话内容^⑤)。他说明四国来到中国,实因几年来中国对各国提出的要求不办不复,他们心中疑惑是否实情未能上达天听?他又说:英国坚欲进京,断难阻止他们。至于英国所提其他要求,他认为重要的只是两点:增加通商口岸与宽待基督¹⁰⁹教。他指出:外国人事事实上并不仅只在五处口岸通商。他劝告中国将现在已有贸易的地方,悉准开口通商。这既有利于中国税收,且能增进和平。广州问题须由英国与中国直接解决。英国人提的其它要求,都是小事。谭廷襄从卞、陈二人关于此项会谈的汇报,所得对俄国人的印象是,“察其情词,实与英、法等夷,联络为一,固结不解,所云愿为帮助说合,断不可靠。”

5月2日,普提雅廷作了一次“在江口外的辛苦奔波”,按列卫廉的秘书卫三畏的说法,“以试行劝阻”英国人和法国人不要拒绝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七年四月初五。（作者此注显系错误——译者）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21，第1页上页，卫三畏，前书。

③ 列卫廉日记，前书，1858年4月23日的日记。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20，第28页下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21，第9页上页（谭的奏折）。斯威舍，前书，第433页。卞是个“年轻、能干，一脸快乐相的人。”美国人起初喜欢他。见卫三畏，前书，可是，以后他们不信任他了。见坂野正高：《中国和西方》（麻省坎布里奇1964年）第69，121—122，272，与296页。

谭廷襄和他的同僚，尽管谭等并未握有联军方面所要求的明白无误的全权。据卫三畏说，普提雅廷“对于此次访问的结果似有颓丧与气恼的神气……”^①。普提雅廷次日写给额尔金与葛罗的信中，也流露出同样的情绪。当卞宝书与陈克明到他船上，以谭的命令责备他调解不力的时候，普提雅廷无动于衷，只答复说一旦开始敌对行为，即使英、法败去，来年必定重来。中国必须在天津商谈全部问题，也只有这样他方才可以开导英国人。他又说，如果英国与中国关系决裂，俄国人就打算撤出白河了。

普提雅廷在5月5日的另一次会晤中，指教卞宝书和陈克明怎样应付法国人的要求。卞、陈二人表示法方所提惩办马正农神甫被杀案件中有关官吏，和基督教徒应与佛教徒及道教徒享受同
110 等权利两项要求，可以与法方商谈。普提雅廷对此显然赞同。至于法方的第三项要求，即在温州和厦门附近岛屿上的贸易权利，普提雅廷也建议答应，因为这些地方早已有走私，正式开放通商只会有裨于中国的税收。第四项要求是派使节驻京。普提雅廷建议答应，但应附有条件，即只限于讨论重大事件方准进京，停留日期须有限制，所需费用须由各国自备。法方的其他五项要求，均为普提雅廷所不赞成。他建议中国人断然予以拒绝，或对其中某些事提出反对理由。这五项要求是：在中国内河贸易，让法国教士及领事在内地自由行动；要求赔偿军费；允许在中国内地购买丝、茶，以及降低关税等。最后，显然出于普提雅廷的主动，他建议：关于英国私在内地出售鸦片，并私贩苦力出洋两件事，中国应向英国理论，并要求英国下令禁止。将来如何处治这类行为，也应与英国明定

① 卫三畏，前书，列卫廉与普提雅廷都碇泊在白河口内，额尔金与葛罗仍舶在口外。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17/288，柯尔迪埃，前书，第349—350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21，第13页下页。斯威舍，前书，第438页。

条约^①。

这些是普提雅廷试图在联军与中国人之间调停的主要事例；这些，他在其它场合也提过。以5月6日他致额尔金与葛罗的照会为例，他要他们对中国人用“坚持与威胁的手段”，一样能取得成功“或者甚至比打仗更好”^②。似乎他在更早的时候，送过一封照会给谭廷襄，让他们反对英国在北京长驻使节；在内地自由旅行与贸易；废除厘金，并开放天津，在此设立一所英-华学堂。当巴拉第5月7日在天津时，奥斯登·萨根把这份文件的复本给他看了^③。无论如何，迟至5月15日^④，巴拉第还向谭廷襄说，中国不准英、法使节有事暂行进京是制造无谓的麻烦。¹¹¹

普提雅廷在致力调停之际，为了达到俄国秘密与公开兼有的要求，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自他4月19日首次向谭廷襄提到阿穆尔以来^⑤，4月25日他与崇纶和乌尔棍泰会见中又再次提出。这次他提出四款：在大沽先行讨论俄国各项要求的大纲；然后进京商讨细节；查明阿穆尔与伊犁边界；俄国应仿照各国获得通商权利^⑥。在4月29日与谭同席时，他坚持他过去的要求，同时说明俄国人愿助给十万两银子作为满洲居民从阿穆尔河左岸移出的费用^⑦。那天普提雅廷递交谭廷襄一纸照会^⑧，重提在各通商口岸与各国权利均等和边界居民区问题，并第一次提到满洲沿海的土地，这样来施加新的压力。文内声称，有“外洋夷人”意图在此驻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21，第13页下页，咸丰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17/288，柯尔迪埃，前书，第352—353页。

③ 卡发罗夫（巴拉第）前书，中国人的材料中对此没有记载，但这与他对待法国要求的态度相符。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22，第11页上（8/4/3）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20，第18页下页。摘自谭的奏折中。

⑥ 《筹办夷务始末》，卷20，第34页上页，摘自崇、乌二人的奏折中。

⑦ 《筹办夷务始末》，卷21，第1页上页，谭的奏折。

⑧ 《筹办夷务始末》，卷21，第5页下页。

留，为此俄国已向该处移屯，以便阻挠他们。作为对此的抵偿，俄国放弃塔尔巴哈台商栈的赔偿要求，并第一次书面重申付银十万两以备迁移阿穆尔地区的满洲人。对早先提过的军事援助也谨慎地提到了。其文如下：“贵国兵法器械，均非外洋敌手，自应更张。俄国情愿助给器械，并派善于兵法之员前往代为操练，庶可抵御外国无故之扰。”这份照会结束时威胁说：条约内如不订明，俄国船只必将强入通商口岸进行贸易。在附件中，又要求东部边界一定要沿阿穆尔河、乌苏里江、绥芬河以及其他较小的河流直入大海。

- 112 5月6日，谭廷襄派卞宝书和陈克明到普提雅廷处，对于普提雅廷所拟应付法方要求的建议作进一步咨询，因为谭廷襄认为有些拟议是颇难索解的。普提雅廷这一回又“再三再四”谆劝卞宝书解决阿穆尔问题。他也希望派一信使途经恰克图赴俄，为中国准备枪炮与教习。对于通商权利，他坚持要与英、法取得平等待遇。他随又取出另一照会，其词如下：

“代我等请旨定夺二条行知贵大臣，至今已逾七日，并无知照复文。本大臣请定二条，此来原为两国和好，甚为紧要，应查之件，不可逾时。前已行文至京将我等所请代奏二条，大皇帝谕旨定夺否，给与我等准信。所请之故，如何示知，大臣过四日后，与我等都城大臣等速定，或有复文报知。倘四日内我等所请二件，若奉旨定准，缮写文书，遣两报事人至本国：一报事人由旱路走恰克图。前议知兵法三人，并豫备军械，贤能官员，再当回报，将所定银数由贵国速为发给（即银十万两）。一报事人至黑龙江，将应行新定东西交界，由贵国派出大臣，一同会查，再绘边界图式。由我们东边希比哩地方，行知各城总督。此报事二人，由我等自备食物、牲口、银两，为是驰驿之意。请旨定夺，倘过四日，不见复文，本大臣想系大皇帝将我们所请二条，不行恩准。既然如此，本月28日（5月10日）已

知我们所请不行。再就此机会到黑龙江,将此应如何办理,向俄罗斯大臣官员计议,遣报事人由海道至俄罗斯国可也”^①。

普提雅廷的这份照会,事实上没有得到回答,以致5月10日¹¹³他拒绝再行调停^②。5月11日又致照会一纸,说明他已送报告回俄国,并坚欲取得派使臣进京的权利。他在5月14日重新与中国人会见。当时他向卞宝书讲,要是能让西方使节每几年进京一次,他也可使各项问题得到解决。他这次又继续催卞答应派信使到恰克图^③。5月14日,他还是为俄国的全部要求向谭施加压力^④。

从一开始,谭廷襄就有意在某些问题上对各国使节让步,而且这种倾向是与日俱增的。可是普提雅廷的调停办法并没有对他产生印象。4月25日,他提出准许俄国五口通商,5月7日又奏请作全盘妥协,建议中讲必须让其他国家的问题有个确实的进展,才能谈到答应俄国人的要求^⑤。谭廷襄多次派他的代表卞宝书与陈克明去见普提雅廷,责备普提雅廷调停无效。5月10日,谭廷襄在奏折中说普提雅廷不肯继续调停,实属“可恶”,他必待稍缓才能再与他相会^⑥。可是,5月14日谭廷襄就建议皇上准西方使节进京。他与美国人和普提雅廷会谈中也作了一些进一步的妥协,不过他显然没有敢把这些奏报皇帝^⑦。

奕訢是不肯在任何实质性问题上让步的。他对于俄国人无力劝诱联军放弃他们的要求,也日益感到恼火。5月5日,在他获悉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21，第28页下页（系第29页下页——译者）。这一文件的公文程式，比其他任何西方国家使节所用，都更多地带有藩属国通常向中国投递文书的精神。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21，第49上页，斯威舍，前书，第453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22，第1页上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22，第11页上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21，第38页上页，斯威舍前书，第448页。

⑥ 《筹办夷务始末》，卷21，第49页上页，斯威舍前书，第453页。

⑦ 卫三畏，前书。

普提雅廷断言：就算联军打了败仗，肯定往后他们还会再来攻打的话以后，在谕旨中他就表明：“普提雅廷之言，并不足信。”他降旨
114 开导美国人出而转圜^①，此后要更多地依靠他们。5月1日的谕旨拒绝了普提雅廷关于英国要求的建议^②；5月7日朱批也拒绝了关于法国的建议^③。5月8日的谕旨中，奕訢拒绝了普提雅廷提出的武器援助，但是许他按照6日俄国照会中所要求的，派信使经恰克图回国。此外，还许普提雅廷自选两处口岸，使俄国能与其他国家完全一致，各有五处口岸可以通商^④。

当中国人得到巴拉第通知，穆拉维约夫现已受命全权办理阿穆尔事宜，他们就更加不肯听信普提雅廷。这位大司祭于4月16(4)日接到穆拉维约夫来信，把这事告诉了他，并说给普提雅廷的新指示，仅是令他解决中国与欧洲各政府的争端，对中国应尽可能地和睦^⑤。奕訢得讯后，于4月30日降旨，令奕山与穆拉维约夫会晤，并处理边界问题^⑥。

中国人对普提雅廷的调停渐感厌倦，便另找巴拉第出面调停。他们通过北京俄罗斯馆监督苏彰阿，于4月26日及30日，请巴拉第相助，向英国人交涉交还广州，并不要过多地勒索赔款。巴拉第小心谨慎，什么也没有答应，只同意由军机大臣裕诚所派使者陪同，于4月30日离京去见普提雅廷^⑦。这位大司祭所乘的船，5月7日^⑧泊于白河普提雅廷的船傍。二人相见并无多大的热情。巴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21，第15页下页（咸丰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21，第11页下页（咸丰八年三月十八日）。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21，第23页上页（咸丰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21，第27页下页（咸丰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⑤ 卡发罗夫（巴拉第）前书，第80页，亦见第94页以上。涅维尔斯科依和巴尔苏科夫未提到调停问题。

⑥ 这一谕旨并未留传下来。但在5月1日的谕旨中提到了（卷21，第4页上页）。

⑦ 卡发罗夫（巴拉第）前书，第9页，并参看第9页以下。

⑧ （4月25日）。

拉第在他的日记中对普提雅廷的描绘是：“一个五十左右冷冰冰的人……果断而机智”。在由早到晚整整一天的讨论中，巴拉第把北京朝廷硬要让他办的事告诉了这位海军上将。巴拉第吃惊地发现，普提雅廷对这些事没有多少应允之意，反而倾向于给中国人一 115 顿“狠揍”，如果他们再不听从好言相劝的话。他宣称耶稣基督主张过用刀剑去传布基督教。他并且坚持认为已不能为调停作什么切实的事，因为他的作用已受到限制，而且另几位使节已经在怀疑他的调停过于中立了。巴拉第把穆拉维约夫最近的一封信交给普提雅廷。这位海军上将回答说，他本人已经收到了新训令，不过，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做不出什么事来。晚餐时，普提雅廷的一位参谋在巴拉第耳边低语：穆拉维约夫派副官马尔特诺夫带来一件致普提雅廷的公文，可是普提雅廷把它隐瞒起来，以便自己可以放手行事。

普提雅廷给巴拉第的最后命令，是让他向北京朝廷提供两万支来复枪，二十门炮以及教习。他还可以答应把焚毁塔尔巴哈台商栈的赔偿数目，不仅减掉十万两，甚至可减二十万两^①，并答应增加对清朝的支持。可是中国方面必须给俄国以与其他列强均等的权利，并满足俄国关于边界的要求。巴拉第应劝告中国人，除下列五点以外，均可向英国人让步。这五点是：在北京长驻使节、在内地自由旅行和贸易、取消内地关税、开放天津以及在该处设立英华学堂。巴拉第还可以声言，普提雅廷如果在四天之内，得不到北京的正式答复，即将向圣彼得堡请求调派战舰。这位俄国海军上将再次吹嘘他自己所拟发展俄国在华教务和商务的宏大计划。可是巴拉第漠然无动于衷。

5月9日，这位大司祭会见中国代表，告诉他们他的任务失败

① 俄国的最高要求才三十万卢布。——译者

了。中国人向他倾诉了他们对英国人的激烈不满。而巴拉第只能将普提雅廷奉劝他们拒绝五点而在其他方面让步的意见转告中国人^①。

116 5月10日一早，巴拉第动身回北京。这一天，中国人与美国人作了长谈。照卫三畏的说法，他们再三请美国人出面为阿穆尔边界向俄国人说项，同时也要求美国人为英、法之事调停。第二天，美国使团中的一员，丁甦良留在岸上，与中国人商谈。卫三畏对这次会谈中发生的事记述如下：

“卞宝书再度提到俄国边界问题，并且申述了他的政府方面的困难……是妥善安置割让地区的居民……但是，但是，但是呀！中国人所说的每一件事都得打些折扣。弱者总是耍乞灵于狡狴的欺诈的。我不相信这一说法。倘若俄国人果真想拿走萨哈林（阿穆尔）迤北的满洲土地，关于这片古老领土的争执是容易引起的，如1846年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或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这条河是最适当的贸易出路，也是东西伯利亚的排水道。它为俄国人提供了种种便利，而对中国人则比较没甚用处”^②。

如果美国真对阿穆尔问题制订过什么官方政策的话，卫三畏的这段记载可能是美国官方对俄国在阿穆尔扩张政策的一个准确的反映。国务院的档案里，除批准柯林斯商业计划的文件之外，再也没有提到阿穆尔。无论是列卫廉的日记和公文，还是卫三畏的日记，里面都没有任何迹象足以证明他们觉察到普提雅廷当时实际上正在为阿穆尔边界进行谈判。列卫廉没有把中国人呼吁调

① 卡发罗夫（巴拉第）前书，第19页，并参看第19页以下。虽然巴拉第并不那末喜欢普提雅廷，但后来对于普提雅廷的坚韧精神与精力旺盛还是赞赏的。并且把他在逆境中变得急躁以及他的思想很容易转向也记载下来了。（前书，第51页）这也很符合于这种可能性：普提雅廷在天津不遵从命令而擅自谈判阿穆尔问题。

② 卫三畏，前书。

停的事向国务院报告,也没有向英、法方面报告。他甚至没有在日记里提到此事。看上去可能是卫三畏和丁韪良没有把中国人的请求告诉列卫廉^①。

谈判中最迷惑人的还是普提雅廷用巧妙的手法蒙蔽其他国家¹¹⁷使节。列卫廉对俄国人完全信任,也完全被他左右。4月17日,美国人到白河的那天早晨^②,普提雅廷立即去拜访列卫廉,从此两人就你来我往。当四位使节越过沙洲于4月24日到达白河的时候,列卫廉就下榻在普提雅廷的“亚美利加”号上,因为他自己的船吃水太深,只能停在河口以外。普提雅廷经常和列卫廉聊天^③,并多次弄虚作假,给列卫廉和其他使节以关于他自己活动的假象。他有时装作草拟照会,并将它的内容给他们看,诳称要把照会交给中国人,而事实上并未送去。

举例来说,正如上面提到的,我们从《筹办夷务始末》上知道,5月5日,普提雅廷与卞宝书、陈克明在“亚美利加”号船上,有一次长时间的会谈。他在此坚持要同意自己的要求,并把他对于法国要求的看法作了详细阐明,劝告中国人拒绝他们的某些要求。就在那天,普提雅廷写了信给列卫廉,以谄媚的词句,说他相信美国的崇高态度,已经阻止了英、法的进攻。他又说道:

我今天会见一位中国官员,他此来是为把昨日谭廷襄给“我们的信当中的某些话的意义加以解释。据说,只要我们把中国与联军之间的分歧处理好,谭廷襄就会设法把与我们有关系的事情予以圆满解决。我没有同意,不过,我写了一封短信

① 远在五年之前,在1853年,美国驻中国公使马沙利已经强烈地反对俄国人的扩张。见唐德刚:《美国对华政策》第130页。

② 列卫廉日记,前书,普提雅廷为大风所迫,当夜留在列卫廉的船上。他在列卫廉的舱内渡过黄昏,读着一张报纸,“他戴的眼镜滑落到他的鼻尖,手捻着他长长的胡子”。那时列卫廉在记日记。

③ 同上。

给他〔谭〕，现随函附上。该信说到为防止发生一场冲突，我已经做了努力。”

英、法、美三国的档案中，都有这封信的复本^①。信上以缓和的词句，吁请这位总督取得如英、法所提出的便宜行事的全权。中国存档中找不到这个线索。普提雅廷次日致卞宝书的照会已在前面的第 112 页上提到。从行文看，这似乎是他在前周内给中国人唯一的一份照会。

此外，普提雅廷于 5 月 8 日又写了一封私信给列卫廉，这是“坦率”风格的绝妙例证，使得这位美国人解除了疑虑。

亲爱的先生：

我已发出两封信，其副本都已送交阁下。我只按照您的信稿内关于调解的答复，略加修改。我见到了我们在北京的使团的两位成员。一俟我俩见面，我当愉快地把我所知北京现况告诉您。在您于星期一与谭大臣会谈后，我将乐于与阁下一同会见那位官员。不过，我们必须考虑到这对其他各位特使会产生什么影响。

亲爱的先生，我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您忠实的普提雅廷^②

这里提到致中国人的两封信，其一必定是 5 月 5 日的那封“伪造”信，而其二在中国资料中也无迹可寻。看来，或许就没有送出过这样一封信。普提雅廷不肯与列卫廉同去会见谭廷襄，原因可能就是害怕暴露他的真实活动，而不是耽心额尔金与葛罗的反应。

把这些信件当成是杜撰的，尽管证据并非显而易见和不容争

① 英国外交部档案，17/288；柯尔迪埃，前书，第 352—353 页；美国参议院行政文件，30(36, 1)。

② 列卫廉日记，前书，列卫廉建议他们一起去见谭。

辩的。但是,看到普提雅廷在把副本送交列卫廉时,又向美国人特别讨好了一番,正象前次2月8日他在澳门草拟致中国的照会时欺骗列卫廉一样,人们是会更倾向于相信5月5日的信同样出于捏造。

尽管天津的官员们对待联军的要求已处于投降的边缘,而奕訢皇帝却一如既往。5月15日(咸丰八年四月初三日)他又下了另一道极不利于俄国人的谕旨。他写道:俄国“显系知我意在速了,¹¹⁹故为迫切之语。分界一事,已越数年,该夷日久耽延,何此时忽形急切?现已加恩准其在海口通商,则通商自为先务。彼处之事,现有木哩斐岳幅^①经理,该夷若能寄信伊国,秉公勘办,固为妥善,否则不必与闻。竟将通商事宜,赴各海口妥为料理,得沾利益,亦不负天朝加恩至意”^②。

由斯威舍^③译出的这道谕旨最后部分,包含着对允许使节进京的“根深蒂固的反对”。在奕訢下这道谕旨(或前一道谕旨)的当天,谭廷襄正在草拟一件奏折^④,委婉曲折地吁请开放北京,以免天津被敌侵占。他又奏道:“现俄事渐可就绪,尚未全结,美则合于俄而潜随英、法。自应用俄通美,以制英、法……。”

5月17日,奕訢收到上述奏折。在那天下的一道谕旨中责备谭等“过涉惊惶”。表示他认为进京的要求,“半由俄夷因不允所请,特借英、法为要挟”。谕旨通知所有的夷人都回到广东^⑤。

5月16日,在这道含有可悲错觉的谕旨发出之前,谭廷襄接¹²⁰

① 即穆拉维约夫。——译者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22,第9页下页。在谭的奏折上的朱批是15日。奕訢拒绝应允俄国派人赴恰克图。《筹办夷务始末》,卷22,第9页上页。

③ 斯威舍,前书,第457页。

④ 同上,第495页;《筹办夷务始末》,卷22,第12页上页。

⑤ 斯威舍,前书,第460页;《筹办夷务始末》,卷22,第13页上(咸丰八年四月初五)。

到15日的谕旨，并马上向普提雅廷传信^①。5月17日，普提雅廷写信给额尔金^②与葛罗^③，转达了这些内容。普提雅廷并去找了列卫廉，密告他说：这则消息可使联军各位使节“按他们认为恰当的去自由行动了”，还说：“敌对行动用不到越过大沽，对北京的朝廷或许就会产生有益的效果”^④。

5月18日，额尔金与葛罗收到了普提雅廷的信。他们当即会晤，并决定来一个快速进攻。当时，海军司令们已经得到了他们可能得到的一切增援。会议结束前，四位使节全都到齐。在葛罗离会前，列卫廉与普提雅廷见到了额尔金^⑤。

现在事情迅速走向高潮。巴拉第在5月13日与5月19日之间回到北京，赶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设法把俄国的立场向裕诚作了详细说明，随后给普提雅廷写了一封信，最后是把俄国人的要求递给理藩院，只是，全被北京的朝廷拒绝了^⑥。5月19日，美国人与中国人在大沽举行一次会谈。由于得到布雷医士带来给列卫廉的一个短筒，通知美方联军拟于次日发动进攻，会谈便告中断。钱忻和及其他人坦率地当面指出：他们认为使节们拒绝见谭大臣是不对的。钱似乎很看重列卫廉的调处，而言谈之中蔑视俄国使节的作为^⑦。

额尔金与葛罗各在一封致普提雅廷的长信中，把他们的最后

① 列卫廉的日记，前书。

② 《关于额尔金勋爵1859—1860年赴华特别使命的信函》，第305页。

③ 柯尔迪埃，前书，第365页。

④ 列卫廉的日记，前书，与卫三畏，前书。普提雅廷停留的夜晚，用讲他冒险生涯的故事来迷惑美国人。卫三畏认为“中国官员到现在应该知道他是一个朋友，要是他们有一个朋友的话”。列卫廉写道“确实，伯爵能够做作的了。不过，他也是很谨慎很谦让的”。

⑤ 同上。

⑥ 卡发罗夫(巴拉第)前书，第28页并参看第28页以后。

⑦ 卫三畏，前书。

通牒内容通知他,申明他们认为已不能期待从谈判中再有所得,并对他为促进解决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普提雅廷对此给予了客气¹²¹的答复^①。并把和额尔金来往信函的复本送给列卫廉^②。谭廷襄在给皇上的奏折中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四个使节中俄国人是主谋^③。

这天晚上,卫三畏向普提雅廷转述前一天他在岸上与中国官员争辩与让步的主要之点。日记的作者说:“普提雅廷非常反对英国要求把中国内河一律无差别地对外开放通商,他尤其反对那些外国坏人,利用这种自由,在他们本国当局看不到和管不到的地方,对土著居民为所欲为,干出坏事。这种意见似乎是根据他到中国后沿海各地所获悉的外国鸦片贩子和其他小商人的普遍恶劣品质^④。现在倘若只准教士们在国内各地旅行和居住,他们就会备好道路,使中国人知道怎样运用自己的权力令这些不法分子听话”。

20日上午8点,霍尔舰长——一位英国海军军官,递了一个最后通牒,要求大沽两座炮台的指挥官,在两点钟之内投降。这一要求并未收效,英、法联军发动攻击。几个钟点就占领了炮台。

现在是吃了败仗的中国人主动要求重开谈判了。5月21日,谭廷襄奏陈,他已要求俄、美使节调停,他们也答应了^⑤。5月21日列卫廉拜访普提雅廷时,他看见谭廷襄的代表,中国军官张振熊已在普提雅廷处。列卫廉描绘普提雅廷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由于近几天越来越紧张,显得很憔悴和疲乏。不过,他待我之殷勤¹²²

① 英国外交部档案,17/288;柯尔迪埃,前书,第373页。

② 美国参议院行政文件,30,(36,1)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22,第19页上页。斯威舍,前书,第462页。

④ 这也是额尔金对小商贩的看法:见华伦,前书,第212—252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22,第29页下页。这并非奕訢特地的谕旨。奏折于5月23日接到。(咸丰八年四月十一日)。

和友好一如既往”^①。

5月21日,列卫廉与普提雅廷都接到谭廷襄的信件,声明他们提出的要求均已奏陈皇上^②,这是各项要求可以获准的有力证明。5月26日,谭廷襄又向普提雅廷口头要求在天津会晤。普提雅廷则用照会书面答复,坚持四强使节必须同时获准进入天津,并随后进入北京。如果不能亲见皇帝,也要见到一位大学士^③。他说上述要求如均不获允准,恐英、法势必挟其军队,闯入京城。在草拟这一照会之前,普提雅廷曾问额尔金与葛罗,是否同意他单独一人去天津?葛罗倒没有反对,而额尔金就向葛罗密谈,这样做“会使处置当前事态的权力轻易落入俄国特命全权大使之手”。葛罗因此写信婉转地劝阻普提雅廷不要一个人单独前去,不如谨慎一些,等待已经进入天津的联军各海军将领的消息,而且如果四强使节能够作为一个整体进入天津城,必然会更有效果。信内还附有其他准备提出的条约草稿^④。

5月27日,中国人和额尔金的译员李泰国开始谈判。同一天,普提雅廷写信给葛罗感谢他送来条约草稿,并说据他的意见,即使要中国人接受这个条约,也必须有强大压力才行^⑤。

在北京方面,怡亲王载垣接手处理俄国问题,奕訢接到他的奏折,他对俄国所提的全部要求作了摘要,并建议除已经答应了的,什么也不再答应,即:划定阿穆尔边界和各口通商。载垣也提出设法避免向英、法赔偿,因为这事“最为棘手^⑥,又予俄夷以藉口”^⑦。

① 列卫廉的日记,前书。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22,第31页上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23,第1页下页。列卫廉的日记,前书。

④ 法国外交部档案,葛罗致瓦列夫斯基2/6/58。

⑤ 柯尔迪埃,前书,第378页。

⑥ 《筹办夷务始末》,卷23,第13页上页。奏折中此句全文是“最为棘手,允之则无名,又开俄夷借口”。——译者

⑦ 《筹办夷务始末》,卷23,第10页下页。这似乎是标志着亲王集团对于对俄政策干预的开始(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

5月30日,紧随英、法使臣,列卫廉与普提雅廷都登陆到了天津。他俩费了许多周折合租了一所私宅,比起给额尔金勋爵的,虽然地方较小,但房子较好^①。美、俄两使宣称,他们全心愿为中国“与英、法尽心说合”^②。普提雅廷与其余列强的使臣同日把一份照会送交卞宝书,要求授予新的钦差桂良、花沙纳以全权。并威胁说,若入京受阻,就要使用武力攻入北京。普提雅廷在四位使节当中,单独把他的照会内容向卞宝书口头上概述了一番,又将此照会副本送给额尔金与葛罗^③。

从这一天起直至6月13日,俄国使臣似乎专谈他自己的条约,进展相当迅速。这次谈判的过程,除在桂良与花沙纳的奏折中有几处涉及外,找不到多少材料。不过,我们对普提雅廷调处英、中条约的会谈与巴拉第在北京的活动,有较多的材料。5月21日,这位大司祭经苏彰阿接见,他讲普提雅廷说英国要求:控制粤海关,在各地贸易的权利以及逢大典觐见。巴拉第建议,英国人所造成的损失问题应由一个设在广州的委员会予以解决,对鸦片的禁令应予以取消,以减少这种毒物的诱人力量。他试图再送一封信给普提雅廷,但京城的人首次听到大沽开战谣传,这封信于5月25日退了回来。5月31日,他把俄国外交部致中国的信译出。该信说伊凡·扎哈罗夫已派赴塔尔巴哈台去处理商栈被焚烧的事^④。 124

6月初,北京的中国当局又尝试让俄国向英国说项,设法使英国人放松所提要求。也可能这样做未得皇上批准。苏彰阿6月1

① 列卫廉的日记,前书,与卫三畏,前书。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23,第32页上页。载于谭的奏折中。

③ 柯尔迪埃,前书,第384页。《筹办夷务始末》,卷23,第34页上页。载于谭的奏折中。

④ 卡发罗夫(巴拉第)前书,第32页,并参看其后各页。扎哈罗夫是俄——清字典与清文文法的作者。并获有关于满洲研究的博士学位。他曾与驻北京的第十二次教士团一齐驻北京。

日再次去看巴拉第，重申如果普提雅廷肯于斡旋，他要什么中国都可以答应他的。苏彰阿说，各国态度都不坏，唯独英国人是死硬派。他们进攻中国正如同他们进攻俄国，其不合法理简直一模一样。而俄国也找过别国为它调停。6月2日，亲王们与大臣们开了一次规模很不小的会议。耆英又被授权与英国人谈判。次日，他秘密派人找巴拉第要他写封由耆英亲交普提雅廷的信。巴拉第写了，他劝普提雅廷找寻机会，会见北京最有权势的裕诚^①。

奕訢此时仍然对于俄国人的调停全无信心。6月4日，桂良、花沙纳在天津首次接见额尔金，为递交敕书关防事发生争执，当即奏报已找普提雅廷协助将此事说妥^②。但6月6日紧急旨谕加以制止，根据是：“俄夷前来说合，实为自请通商地步。迨允其通商，又称英、法二夷必欲进京。如果不允，伊即不管此事，是俄夷已遂其所求，全不足恃。若仍托该夷说合，恐徒劳无益”。自此，信任就落在了美国人身上^③。

普提雅廷首次正式会见桂良与花沙纳，是6月6日午后6点
125 钟。（额尔金会见他们是6月4日，葛罗比普提雅廷早二小时，列卫廉则不迟于6月7日^④），照卫三畏的说法，6日普提雅廷曾私下会见谭廷襄。在这次会见中，普提雅廷得到谭廷襄肯定的允诺：即同意他的全部要求，而他那一方面则提出愿意出力代向英、法磋商他们提出的一切条件。谭将此事告诉了桂良、花沙纳二人；普提雅廷则郑重吁请联军将事态了结^⑤。6月8日，苏彰阿用一番“激动恳切而未经事先准备的真实语言”，吁请巴拉第转求普提雅廷调

① 卡卡罗夫(巴拉第)前书，第32页，并参看以后各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24，第19页上页和第27页上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24，第20页上页（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④ 卫三畏，形容他们说：“桂良的……年纪使他胆子很小，花沙纳较决断、胆大和表现出有相当的辩才。”前书，第76页。

⑤ 柯尔迪埃，前书，第397页（普提雅廷同日写给葛罗）。

停。可是，这位大司祭不得不指出，俄国使节是不会作出什么切实事情来的^①。

这位伯爵的作为，其实不过是两度使中国人觉得安心，并使他自己能与英国人融洽相处而已。6月5日，卞宝书奉密命来到俄国人和美国人的船上，因为谣传英国人即将攻打天津^②。普提雅廷的劝说使他安心而去。可是，6月10日又发生一场同样的惊扰。俄国人得知李泰国以炮轰天津城池胁迫中国钦差赶快签订英国条约，准英、法两盟国进入中国的一切江河，并在他们所选定的地方派驻领事。中国的谈判代表们是如此激动，普提雅廷简直无法和他们商谈他自己的事。他回到住处以后不久，他们就派人送信，“求他相告是否今晚即将攻城。如果实有其事，务必请他在两三小时之前通知，以使他们能够及时迁避”^③。他再次安慰了他们，并去找葛罗向额尔金疏通。可是这次没有发生效力。因为额尔金已经勉强认可了李泰国的行为^④。事后，连普提雅廷自己也不得不同意卫三畏的意见，这次流血原是有办法避免的。

126

6月7日，普提雅廷把他草拟的约文交给中国人。他改动了其中的一条，以取悦英国人。卜鲁斯于同一天和普提雅廷、列卫廉会议，商谈俄、美两条约底稿内都把鸦片当作违禁品的问题。额尔金又于第二天为此事拜访了俄国使节。普提雅廷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不赞成鸦片贸易，但他本人对之并无成见，并准备把这一款删掉，好让英国人满意^⑤。（这和他前此对于西方商人在各条约口岸

① 卡发罗夫(巴拉第)前书，第34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24，第27页上页。

③ 卫三畏，前书，对李之事，后来中国人又写信给普提雅廷与列卫廉(柯尔迪埃，前书，第400页)。

④ 《关于额尔金勋爵1859—1860年赴华特别使命的信函》，与柯尔迪埃，前书，第401页。

⑤ 英国外交部档案，17/289，额尔金致马姆斯伯里10/6/58，1840年，尼古拉一世禁止鸦片出口。

的行为所表示的强烈反感适成对照。这可能是巴拉第的影响。)

英国人于6月7日第一次试图置身于中国人和俄国人之间,但并不很成功。额尔金在一封于12日发出致马姆斯伯里亲启的信中^①,向他汇报如下:

“李泰国先生按照约会,于今日(6月7日)上午第二次往会中国委员。他只受到卞的接见。……卞于要求最严格地保密之后,透露与各国使节会谈的详情如下:

俄国使节在会谈中告诉钦差们,他是应英国使臣的邀约而来天津的。他曾向英国使臣建议迅速解决。他只求他的国家能够分享给予大不列颠的任何商务利益。至于他的政府方面,他有一项重要的要求必须提出,即划定俄国的边界,但此事仅只与俄国一国有关系。他希望在黑龙江(阿穆尔)一带举行关于此事的谈判。他甚至不愿在此间提到这一问题^②。

127 当谈到俄国边界问题时,李先生以他在前一天所观察到的,即某一国家为了某些问题置身于中国与第三国之间的事,提请卞宝书注意。他说按照现行条约,中国让与有约各国中任何一国的任何一项权利,其他有约国均得分沾。因此,任一国家方面的任何足以影响中国利益的行动,都可以成为其余国家借口保护共同利益出面干涉的公正理由。李先生问卞,是否能明白俄国使节的顾虑,他非常不愿意在此张扬边界问题。卞对此答复说,“哦,我懂了,他想不让你们这方面出面干涉”。卞接着说中国并非反对四国使节联合(照钦差们最初提议的那样)与钦差大臣们会谈的唯一国家。俄国使节也一口咬定坚决反对。而他——卞宝书——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李先生提出,

① 英国外交部档案,17/289。

② 从这一点看,普提雅廷在5月20日之后确实是突然决定为取得阿穆尔问题的解决不进一步施加压力。

当解决俄国边界的时刻到来时,中国向英、法征询意见或请求援助,那会是对中国有利的,卞对此显然表示赞同。”

可是李泰国的这一步行动,没有得到结果。在现已公布的中国档案中,任何递陈皇帝的奏折都未提到这件事。

然而,尽管普提雅廷作了努力,李泰国的威胁必定是产生了效果的。因为6月11日桂良、花沙纳写信给额尔金,答应了他的全部的要求,包括那些有关内河与设领等等,但只坚持推迟使节进京与暂不向外国人开放太平叛军仍然占领的地区^①。

或许就是同日,桂良、花沙纳奏陈耆英已抵天津,俄夷、美夷都同意与他会见^②。他们两个自己则应额尔金之请,和他会晤,俄国条约已大致“就绪”^③。他们试探性地提出,可以准许美国人在“江河上一两处地方”通商。普提雅廷很早就得到中国人的通知获悉此事,因为他一清早就去找刚刚起床的列卫廉。据列卫廉说: 128

“那时——我当时还没穿好衣服——普伯爵走了进来,他比前一天晚上还要显得心烦意乱。他说他刚刚弄清楚,李泰国先生的要求里,有一条是准许英国的船只、军舰和商船,驶入中国的一切江河水道,从各水道的发源地直到河口,并包括它们所有的支流。这肯定是我们从来没有梦想到的;这简直是把中国变成一个新的印度。对此,普提雅廷说,他和他的政府必将反对到底。那样,如果继续下去,必致引起欧洲人的战争。我承认我同意他说的:英国人的这种作法是不能允许的。早餐之后,我写了一封措辞谨慎而恳切的信给额尔金,对李泰国的行径表示关切”^④。

① 《关于额尔金勋爵 1859—1860 年赴华特别使命的信函》，与柯尔迪埃，前书，第 401 页。

② 斯威舍，前书，第 484 页；《筹办夷务始末》，卷 25，第 3 页上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 25，第 3 页上页。

④ 列卫廉的日记，前书。

就在这天，普提雅廷又亲自交了一份照会给中国人，请见普英。那时他要将“杜绝英、法两国要求之法详陈”^①。

第二天，奕訢降旨，允向英国增添两个通商口岸，但对在内地通商往来则予拒绝^②。因卞宝书忙于与俄国人订约，未能会见列卫廉^③，该约实际已于6月13日签订^④，而向北京的皇帝奏报则已是6月18或19日了。

俄国的《天津条约》主要之点如下：

(1) 此后，两国往来照会，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递交俄国外交部，大清军机处或特派之大学士。俄国使臣可由恰克图、大沽或其它通商口岸进京。所需费用由俄国政府自理^⑤；

(2) 俄国取得七口通商的权利，即：上海，宁波，福州府，厦门，广州，台湾府与琼州。准俄国照别国一律办理，并准在上述各地设立领事；

(3) 嗣后，陆路通商，不必再示限制；

(4) 两国之间从前未经定明之边界，由两国派出全权大员^⑥勘查，并补入此次和约以内；

(5) 居住北京的东正教士，得不拘年限允其返国，无论何时均得允其接替，所费全由俄国政府负担；

(6) 北京与恰克图之间台站递送往来公文，经常按月一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25，第7页下页。

② 斯威舍，前书，第486页；《筹办夷务始末》卷25，第6页下页（咸丰八年五月初二日）。

③ 卫三畏，前书。

④ 普提雅廷于同日傍晚告诉列卫廉：列卫廉日记，前书。

⑤ 使节长驻北京问题，与其说是彻底解决了，不如说是就此滑过去了。中文约本内的“使臣”虽然可以指为全权使节，可是坂野正高将他译成“特派之员”。中文约本内说俄国没有紧要公文，可以遣使臣进京。此文应由礼部转达军机处。俄文约本内说，俄国政府如欲遣使，随时均可派往北京，并可以会见军机大臣或领銜尚书。中文约本内未提这一点。

⑥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27第10页下，为信任大臣。——译者

次^①。②

14日,皇上收到桂良、花沙纳,约在前一日缮写的奏折,陈述耆英既受辱于李泰国,又为威妥玛所窘困,国体攸关,吁求准耆英返京^③。谭廷襄又奏陈俄国人在东浮桥与铺商争闹^④。

6月14日也是同样重要的一天。那天奕訢收到了奕山奏报的《璦琿条约》,并降旨对这个条约或多或少地表示了接受^⑤。另 130
又将此事在谕旨中告知桂良、花沙纳与耆英:

“桂良等即可借此一事,告知俄酋,谅伊必早有所闻。唯中国与尔国,二百年相好,故能如此优厚。至英、法二国,现踞广东,断难尽如所请。而李泰国等,情形凶悍,恐一旦决裂,枉费尔等说合好意。英、法二酋,来至天津,本应置之不理。皆因俄国前来说合,声言并无恶意,是以未与用武。不料此二国先开大炮,直赴天津府城,迄今未有定议。今俄国已准五口通商,又在黑龙江订约,诸事皆定,理应为中国出力,向英、法二国讲理,杜其不情之请,速了此事,方能对得住中国。〔告诉彼等〕若不能挽回,我三人不能办理,即日回京。现有僧格林沁带兵在后,听奕〔其〕办理。但兵端一开,不能再议抚局,不但各国均无所益,即尔〔俄使〕公使为好之本心,亦难剖白矣。如此晓谕,看其如何转圜,再行酌办^⑥”。

① 《筹办夷务始末》所载系半月一次——译者。

② 《俄中条约汇编》,前书,《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27,第8页上页。亦见坂野正高前书第133,300页。

③ 斯威舍:前书,第488页。《筹办夷务始末》,卷25,第18页下(咸丰八年五月初四)。

④ 在中国档案中有抱怨俄国人这类事情的很少,这次是仅有的。有关英、法联军的这种记载则有的是。《筹办夷务始末》,卷25,第21页上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25,第15页上页(见第152页以后)。

⑥ 《筹办夷务始末》,卷25,第17页下页。卡巴诺夫,前书,第192页,用词上略有差别。

我们从这则谕旨中可以看出,中国方面自皇帝以下,都又一次把希望集中在俄国人身上。

- 131 6月14日的谕旨中,皇上还想保全耆英。6月15日,他看到众王大臣吁请将耆英治罪的奏折,遂降旨允许他们的请求,令耆英返京^①。

普提雅廷在15日写信给额尔金与葛罗,有礼貌地告诉他们,他已经迅速而成功地签订了条约。普提雅廷还向他们每一个都指出,清朝朝廷不可任其覆亡,中国应当得到一段和平而受到庇护的时期,以使它不致受到那些荫蔽在各条约国旗帜下的冒险家们的蹂躏^②。据舒马贺尔记载,普提雅廷在那一天也收到中国钦差的照会,通知他《璦琿条约》之事。这件受奕訢之命而发来的咨文,敦促普提雅廷向英、法劝说,不要过肆要挟,以作为俄国知道感激的表示。普提雅廷答复说,现在除非中国作出切实让步,他是无能为力的。俄国只能在以后再给中国以援助^③。不过,他没有把这些话告诉西方各国使节。

葛罗于6月16日函复普提雅廷,对普提雅廷担忧中国将来安宁一事详细地回报了他的意见。但是他认为麻烦是可以避免的,这只须建立有效能的领事机构,并由所有的条约签字国家共同协调行动^④。额尔金直到17日才答复说收到俄使来函,并且提议以后应由俄、英两国协调行动,以防止外国人滥用特权^⑤。

在以后进一步的谈判中,17日下午4时中国人答应:美国教会牧师可驻内地。可是,9点钟又取消了这个让步。普提雅廷在当中起了什么作用我们不清楚,卫三畏却怀疑“俄国人或天主教译

① 斯威舍,前书,第490—493页。

② 见英国外交部档案,17/289和柯尔迪埃,前书,第411页。

③ 柯尔迪埃前书,第420页,与舒马贺尔,前书,第301页。

④ 柯尔迪埃,第413页。

⑤ 英国外交部档案17/289。

员插手了”^①。谭廷襄奏报：各夷中惟有俄酋“仍属恭顺”^②。奕訢收到桂良、花沙纳奏折，说他们已将《璦琿条约》传谕普提雅廷^③。132 同日，谕旨中仍托俄国人转圜，只有在俄国人表示无能为力时，才能向联军让步^④。

6月16日，皇上准巴拉第到天津再与普提雅廷会见。17日，这位大司祭起程，第二天半夜始行到达。在途中他曾与骁骑营都统国瑞谈话，国瑞告诉他：“我们满人与俄人是老朋友，不要忘了我们既是邻居，又都是北方人。我们休戚相关，你们要遇事公平，帮助我们。”照巴拉第说，这是普遍的见解^⑤。

法国档案中，有一封葛罗18日致外交大臣的亲笔信，附有中俄条约的复本。葛罗说道：

“我对帝俄大臣十分好感，我甚望得到阁下的同意。在我们需要审慎处理的谈判中，我没有理由不称赞他。对于他，我还经常不得不防止人家的责难。这种责难大抵只根据一些对于他在大沽经常与清朝大员接触所作的猜测之词。而这类接触我事先都得到通知，并得悉其性质”。

葛罗说这番话是对这事——5月5日普提雅廷曾向中国人建议如何对付法方要求——确实一无所知，还自己觉得很好。

在这封信的附言里，葛罗提到普提雅廷没有把他所订条约的复本送给额尔金勋爵。而额尔金“可是为这种疏忽生了气”，并向葛罗去要他收到的复本看。不过，普提雅廷在同一天就弥补了他的这一过失，他有礼貌地附了一份说明，送去了复本。额尔金于18

① 卫三畏，前书。

② 斯威舍，前书，第494页；《筹办夷务始末》，卷25，第33页下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25，第27页下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25，第28页下页（咸丰八年五月初七）。

⑤ 卡发罗夫（巴拉第）前书，第37页。

日将此寄给马姆斯伯里,而未作任何正式的评论^①。

天津《中美条约》18日也签订了。卫三畏在他的日记中所写的,看来是反映了一般美国人对普提雅廷的看法:“他们〔中国人〕
133 最好的盟友是普提雅廷伯爵,他通过他的译员起了好大的作用,并且通过他的谈话引导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四位使臣在此所处的地位,非常象四位玩一局惠斯特牌的人……。俄国与美国人是一对搭档,要是英国人能更好商量些和更坦率些,他们是有可能把美国佬当成对付俄国人的帮手的,如果要做这类事的话”^②。

在18日或19日,桂良、花沙纳终于奏报“俄、美两国条约已定”,英夷仍坚持内地通商,在津议赔^③。同日,桂良又上奏折,报告巴拉第到达,并重提普提雅廷愿提供武器、教习与探矿人。普说他打算回国以便派遣官员带火枪一万枝、大炮五十尊送到大沽,“实系感激图报,并无他意,不必见疑”。奏折道:“奴才等连日接见该夷,与之深谈,见其出于至诚,俟该〔各〕夷酋^④备文转求,即拟据情代奏”^⑤。巴拉第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讲到中国官员怎样坚持一定要在19日去见他,甚至要在他去见普提雅廷之前。他们向他讲,伯爵拒绝作直接的调停,尽管中国已经答应了他们的全部要求。他们求巴拉第帮忙,并求他不要只提对于英国要求让步或不让步的意见。大司祭觉得《天津条约》是普提雅廷在极度匆忙中凑成和议定的。他生怕中国人或者会改变主意。而且俄、汉两种约

① 《关于额尔金勋爵1859—1860年赴华特别使命的信函》,第331页,英国外交部档案,17/289。

② 英国海军舰长霍尔于19日在与列卫廉共餐时,也以惠斯特牌戏作了相同的比喻。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25,第36页下页。

④ 系指普提雅廷——译者。

⑤ 斯威舍,前书,第495页;《筹办夷务始末》,卷25,第38页上页。

文不符，某些字句甚至互有脱漏；俄、清两种文本之间又词意不尽相合。巴拉第再次向普提雅廷提出中国对他的希望。普提雅廷的答复同样是：“没有办法。”¹³⁴

耆英当时呈递的供词中，已预见英、法将采取更为敌对的行为，但在奏报美国人和俄国人与他见面的情景时，他说是“情词尚属恭顺”^①。桂良再次上奏，重提俄国人要求派信使到恰克图送信，并且说“仰恳天恩”，准其所请^②。

6月20日，中国钦差大臣与普提雅廷又一次会晤，他们再次求他调停。后来额尔金向普提雅廷说，他决定不再催逼那有争议的两条了。这样，这位伯爵马上就写信告诉桂良、花沙纳，他已经说服额尔金不再向他们要求。可是，额尔金的译员坚持两条一如过去。按巴拉第的说法，这使得中国人感到“不可思议”。显然，桂良在与巴拉第再度会晤之际，把此事作为笑话提出，并示意这位大司祭去设法改正。照巴拉第说，中国钦差见到英国的谈判代表就害怕，桂良看来是精疲力竭了，而花沙纳则是迷迷糊糊的^③。奕訢于18日或19日收到奏报美、俄两条约业已签订，普提雅廷重提送武器事折片的那天，他又降旨令中国钦差们竭力劝告英国人不要坚持使节长驻北京、在长江通商和由天津直赴北京；并劝令他们重返广州。俄国人的“好胜之心当可激发”，可以提醒他们，中、俄两国多年来，俄国单独享有“学生住京”的权利，为此他们应当“从中设法”，即使不能避免允许各夷使节偶尔来京，也必须办妥交还广州之事。允许在长江通商最大的障碍是：它将使英国人能够阻挠经运河向北京输送漕粮，因为他们已经阻挠过漕粮由中国帆船海运

① 斯威舍，前书，第501页；《筹办夷务始末》，卷26，第4页下页。是6月21日收到的（咸丰八年五月初七）。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26，第8页下页。

③ 卡发罗夫（巴拉第），前书，第41页。

135 至京。但是这一点“不必向俄使实告”，以防他们将此转告英国人。应当告诉俄国人枪炮“必当接受，将来亦必以礼相酬”。中国急需军火之情，不可“露”给俄国人。“其欲令人来教导技艺，晒看矿苗，均着婉言回复，勿许为要”。最后，俄国人获准派人赴恰克图，但须由绿营干练员弁沿途护送，兼资察看^①。

6月24日，皇上收到桂良、花沙纳6月21日递呈的奏折，提到6月20日事件。折片陈述道，普提雅廷递来的照会内说：“进京、内江两事已代（向英国人）说明”，而英国人认为这事与他们（俄国人）无干^②。普提雅廷还说那些（英国）人“性情反复，言而无信”，俄国人“此后竟难为力”了^③。

巴拉第日记中于6月21日提到，他从中国人方面听说英国人告诉中国人，俄国人每年一块一块地占领他们的领土，因此“转向我们吧！我们能把俄国人劝说过来。”这或许是李泰国或英国其他译员非正式的暗示，因为英国档案里没有关于这类活动的再次记载。巴拉第还在同一天记载见到一道中国皇帝的谕旨，大意是说普提雅廷既然把外国人招到天津，现在就该由他把他们弄走。可是中国档案内没有关于此事的文献。6月21日，列卫廉，普提雅廷与西马靡各厘一起进餐。列卫廉记道：英、俄海军将领“在极友好地，几乎是很有感情地谈话——看上去，英国人甚至也把伯爵当作朋友^④”。后来，列卫廉到岸上去拜访普提雅廷，发现这位伯爵当时极其烦闷，因为英国人还在提要求，而中国皇帝于6月20日拒绝使节驻京和内江通商的谕旨已经到达了。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26，第24页下页的奏文系：“将进京、内江两事，已代说明，询之英夷，乃云并无其事……”——译者。

② 斯威舍，前书，第495—497页，《筹办夷务始末》卷25，第39页上页（咸丰八年五月初十）。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26，第24页下页（咸丰八年五月初四）。

④ 列卫廉的日记，前书。

按巴拉第的说法,在6月22日普提雅廷要求葛罗去说服额尔金,放弃那有争议的两项条件。葛罗不肯,让普提雅廷亲自去见额尔金。普提雅廷只满足于自己怂恿中国人不要接受,并向他们担保英国决不致于进攻北京。可是,有关这些事并无其他材料来源。¹³⁶

中国皇帝接受普提雅廷军火援助的谕旨,据巴拉第说,于6月23日收到。钦差们在执行皇帝谕示婉言谢绝俄国教练人员的命令时,只说皇帝暂时还不要教练人员。普提雅廷却即刻照会桂良、花沙纳说,拟于晚些时候派五名教官来华。桂、花二人似乎对此未有异议,也没有向皇帝奏报。普提雅廷通知俄国方面,教官们可于第二年冬天动身来华。来复枪、大炮和运输船舶将在比利时备办。这些枪炮船只大约可于1859年秋天抵达中国,而中国人所得的印象则是1859年春季即可到达^①。

卫三畏日记中,于6月23日就记载着普提雅廷仍然强烈反对英国人想在内河航行与开放天津的主张。他讲:“如果天津是一个开放口岸,没有别的,那就只能是一个鸦片烟仓库”。而英国人为坚持这种主张,竟提出了最后通牒,扬言如果遭到拒绝,他们必将向北推进。

对诸位大臣的奏折,6月24日有项谕旨,是答复他们关于英、俄之间矛盾问题的。谕旨促令桂良、花沙纳向英国人商议,有事来京,勿须长驻,并同意用武是一种选择。为了大力加强这道谕旨中的决定,告诉美国人和俄国人,一旦开战,需将其内河船只立即退出,免致误伤。斯威舍书内载有这件谕旨的全文^②。桂良、花沙纳似在同一天收到奕訢于6月20日所发,意思完全不同的那件谕

① 卡发罗夫(巴拉第)前书,第42页。

② 斯威舍,前书,第503页,《筹办夷务始末》,卷26,第26页上。俄美均被要求仍任调停。

旨。在这件谕旨到达之前,两位钦差已经答应付给美国赔款,可是
137 美国谈判代表们开完会回去不久,中国方面又差人送信,有礼貌地
但是很急迫地,求俄、美两位使节再上岸与他们议事。中国钦差是
在作最后挣扎,力图使列卫廉与普提雅廷去劝英国人,撤销那两项
可恨的要求^①。巴拉第描绘等待普提雅廷及其同事到来时的情景
道:列卫廉先来,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脚翘得比头还高,他的秘书
卫三畏,坐在他旁边剔牙。中国官员殷勤地坐在另一边。列卫廉
记载道:

“伯爵一到,R(列卫廉),C(伯爵)和E^②都立刻用最友好
而无法听清的方式,一齐开口说话。……他们……特别是桂良
……似乎极为激动。看到他们争取我们帮助的殷切感到奇怪,
印象很深。英国人压他们答应的两点是外交使节长驻北京和
内地到处贸易的权利。这些都经皇帝断然拒绝。他们说,这
些除非用他们的性命去争,是决不会准的。我真心怜悯他们。
法国方面的未决问题是关于条约文本的,即以中文本或法文
本为准。我们劝了他们。他们答应立即与法国人议结,不再
争约文之事。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拟一同去找葛罗商量。可
是,对于英国人,我们是既不能也不愿向他们进言了”^③。

在卫三畏的记载中,桂良^④以最认真的态度向两位使节讲他
接到的谕旨“拒绝外使用任何借口长驻北京,推迟长江航行,俟叛
乱平定后再谈;关税与赔偿的问题在广州与上海商议。他又讲,英
国人和法国人要他第二天就在条约上签字。甚至在他说这话的时
138 候,英国信使已经走到门口,催问是否答应?”巴拉第的说法是,普

① 卫三畏的日记,前书。

② 根据上下文可能是中国人,但因系引自《日记》,又作了删节,查《筹办夷务始末》也未解决,有疑。——译者

③ 载于6月24日列卫廉日记中。

④ 卫三畏的日记,前书。

提雅廷对中国钦差最后还讲,“顶住,你们自己强硬一点嘛!”可是,这自然是他们所办不到的^①。

那天普提雅廷和列卫廉都去见葛罗,请他再去向额尔金转圜。葛罗去了^②,但仅能说服额尔金稍稍修改了一点他的条文词句。这是属于什么性质的还弄不清楚。

6月26日早上,列卫廉“跑去找普提雅廷,看见他心事重重,中国人绝不肯在使节驻京和内地普遍通商两点上后退。而英国人则决意坚持。他问我是是否愿意写一件正式抗议,由他和我署名,来反对英国人的行动。我向他说明,我很倾向于采取这一步骤。但是,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步骤,事实上等于把反对英国一事诉诸全世界。对此,我必须好好考虑”。普提雅廷就再也没有提过这个计划^③。

不过,巴拉第提到过卞宝书曾经告诉普提雅廷,英国已放弃使节永驻北京这一条,也同意只乘中国的船只航行长江。这位大司祭指出这不是事实。卞这样说,只是为了使普提雅廷不再固执中国必须抗拒这两款的劝告。他们对于这两款,“到头来还是显然很勉强,很不甘心心地接受下来了”^④。可是普提雅廷却相信了卞的话。因为据卫三畏的描述,普提雅廷跑去找美国人,“带着满脸高兴,告诉我们双方都已作了微小的让步,条件终于谈妥,英国条约即可签字了”。列卫廉在他的日记中说,据普提雅廷报告,不但英国人不再提长驻北京问题,由于他本人的劝告,中国人也已准许英国人在内地航行。可是事实上,桂良、花沙纳已经完全屈服,并且为最后宣布这件事上奏皇帝:如不答应英方要求,战争决不能避免,而俄

139

① 卡发罗夫(巴拉第)前书,第44页。

② 柯尔迪埃,前书,第436—437页,但在列卫廉日记中,他说葛罗要求普提雅廷和列卫廉同意他告诉额尔金,他们曾在24日见过他。

③ 列卫廉的日记。

④ 卡发罗夫(巴拉第)前书,第45页。

国人、美国人“与英、法究属一气，即托代说，万难有益”。^①

中英条约遂于6月26日晚签订，连形式也没有改动。普提雅廷并没有察知，直到6月28日他才知道自己受了骗。6月29日列卫廉写道：

“昨天普提雅廷伯爵去拜访葛罗男爵，祝贺法中条约的签订。在交谈中普提雅廷表示，他对英国人在常驻北京一条上的让步满意。葛罗就向他说，他认为他搞错了。刚刚离开他那里的额尔金曾让他知道对常驻北京一条让步的是中国人，而不是额尔金自己。葛罗承认对此他原来也毫无所知（而且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了自己的条约），伯爵带着这则情报立即来到我处。傍晚时分，我得到这一条款的汉文本。他把它交给自己的译员和卫三畏先生去审查。他们认为这一款明白答应了给予权利，虽然词句是委婉的。中国人告诉伯爵说，谈判到最后一刻，卜鲁斯先生来了并且横暴地胁迫他们说，必定要攻打天津，并立即进军北京。他们——这些可怜虫——就在惊惶中不得不屈服了。他们承认这样做是会危害条约的最后批准和他们自己的性命的。”

据巴拉第记载，当中国人告诉普提雅廷，他们答应了全部条件时，伯爵“极为生气。他说中国代表出卖了他们的皇帝，卞宝书受了英国人的贿赂”。6月27日，他打发中校马尔特诺夫带着一份俄中条约复本，与中国拒绝有争议的两款的消息返回俄国。现在他不得不另派一个信使去把第一个追回来，或是让中国人自己去
140 向英国人说，皇帝在北京不会批准条约。不过，中国人对他的任何一条要求都不同意。因此，普提雅廷为中国方面接受英国两项要求之事，派员去向桂良和花沙纳提了正式抗议。但是，中国公布的

① 斯威舍：前书，第505页。《筹办夷务始末》卷26，第28页上页（我的译文）。

档案中未见这一文件^①。

有个英国舰长,由于额尔金没有差他充任去伦敦的信使,而这个差使是他所想要得到的,便以暗中向列卫廉告密来泄愤。现在他向列卫廉透露,额尔金接受英国新政府^②的命令,不得进攻北京,也不得推翻清朝。列卫廉立时告诉了普提雅廷。而普提雅廷又把这话告诉了中国人,并且叫他们拒绝那两条要求。不过,中国人认为不必,他们觉得条约是否能获批准还说不定^③。英国人为皇帝^④接受条约时所用的词句很含糊而大为不满,要求另作明白确实的表示,并在河上排列炮舰示威。额尔金去拜会普提雅廷,向他保证,要是皇帝给他们一个确切的满意答复,他就不再增加登陆部队。正当额尔金与普提雅廷还在会谈的时候,中国人已把皇帝关于这一问题的新谕旨的付本送交普提雅廷。他立即把这个复本出示额尔金,额说“我很高兴我们同是首先见到它的人”^⑤。

在这些日子里,普提雅廷在他的约文中文本内发现了一处疏漏,并使中国人准备了一个新的文本。当他去签字时,桂良与花沙纳以他们在休息为借口让他在他们客厅里等了一刻钟,他们出来时还在眨着眼睛打哈欠。普提雅廷邀请他们去赴宴,但他们不肯去^⑥。尽管受到这种有意地怠慢,普提雅廷还是向中国人又提起送军火和教习的事。桂良和花沙纳6月27日奏报时提出应该接受,并附上普提雅廷为此事送来的照会,其主要内容如下^⑦:

“为咨行事,前经请准呈送炮位鸟枪一节,奉谕旨,俄罗斯

① 卡发罗夫(巴拉第)前书,第4、5—6页。

② 指1857年3月英国议会改选后,新成立的以麦巴尊为首的政府——译者。

③ 列卫廉的日记,前书。

④ 指奕訢——译者。

⑤ 卡发罗夫(巴拉第)前书,第46页。

⑥ 同上,第47页。

⑦ 《筹办夷务始末》,卷27,第22页下页。

呈请送枪炮，实属于至诚，俟解到时，准其接收。职当谕派出回国之玛拉提诺甫^①将此情节赶紧知照本国，令其豫备器械，以期无虞。计明年可以抵津。虽西洋各国枪炮坚利，若兵丁等操练不能合式，亦无利益。若炮位抵津，炮台仍似大沽之徒设，于防守地方，亦难得力。鸟枪操练无法，必致废弛，如此安能望其制敌？本国欲中国得收实效，除解送器械外，并欲派熟习军务人员教演。惟官员抵中国时，其要莫先于器械炮台修筑坚固，然后安设炮位。兵丁等先教以步伐，习以鸟枪。此等缘由，祈贵大臣奏闻请旨。先令派官数员进京，绘出坚固炮台式样，令其指示修筑。贵国再派年壮数员，教演兵丁，演放式样，以期咸成劲旅”。

照会的下余部分恳求清朝皇帝在俄国官员远道回国之前，先为这一事业祝福。他拟派两位官员，跟随塔塔里诺夫和巴拉第手下轮换的俄国教士返国。将来即由此二人照料护送教官来华。

于上述照会之外，奕訢又收到普提雅廷另一则照会，这是他6月20日交给桂良与花沙纳的^②。他在此对解决阿穆尔边界致
142 谢，并推卸了他把西方列强带到天津的责任。普提雅廷指出，咸丰四年美国小船早已到达天津内河，英、法联军由那次就知道河水深浅。他说联军入津是中国自己的过错，因为中国不准他们在上海商议。他又剖白他曾经劝阻英、法放弃驻京及行驶内河的意图，他要中国不令西方各列强再入天津内河。接着又说：

“惟宜于西洋各国和约后，筹备将来防守之法。本国帮扶贵国，沿海扼防，操练兵丁，妥备器械，整齐队伍，则小丑不敢窥犯。此次英、法仅坐船十只，带兵二千，即能阑入天津。如本国代为设防后，虽该夷增船三十只，添兵二万余，亦不致似

① 即马尔特诺夫——译者。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27，第23页下页。

此邀幸也”。

桂良与花沙纳附呈这件照会的奏折，详述了普提雅廷所提口头建议。他说俄国教习愿意自备旅费^①。如果中国给以俸禄，自属“大皇帝格外天恩”，当然更好。奏折说他们对普提雅廷，查其“情词委系出于至诚，且俄夷亲见英夷傲狠情形，愤恨已极”。桂、花等还望返京觐见皇上，讲求“防患之法”。他们奏报与英国缔约，并抄呈了与美、俄所订条约。

览奏后，奕訢口气更加亲俄，当即降旨再次嘉许俄人“恭顺”。¹⁴³他以满意的心情接受俄国军械，对普提雅廷的评语是“恭顺实非他国可比”。可是，他还不许派教习来中国，并令普提雅廷为开放内河、进入天津、使节驻京三条，向英、法出力说合。奕訢在这件谕旨中，没有象普提雅廷所请求的那样，批准他的方案，而宁愿等到伯爵与英国人谈妥有争议的各款之后再说。

赐著英自尽的谕旨降于6月29日，该日桂良、花沙纳收到6月28日谕旨。次日即6月30日，他们又奏陈，再事修改条约已不可能，“若又向商量，不但该夷反复性成，必致另生枝节，即俄夷见诸事俱妥，亦断不肯再向阻止。”他们并奏报，已将皇上允许接受军械但不需教习之意，告诉普提雅廷，而普称只派十人，甚或仅只五人。（不过桂良、花沙纳等坚不承认已答应了此事。）

奕訢收到这份奏折，他也只能同意。7月1日，降旨允准俄人酌派“数人”，但只能教演枪炮，修筑炮台。这是作为“嘉奖”而允准的^②。

普提雅廷直到他离开，和美国人一直很热火。7月1日，列卫廉写信给卡斯讲普提雅廷告诉他，俄国暂将塔城商栈事件推迟处理^③。美使对美国所提广州的问题也同样推迟。普提雅廷跟美国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27，第4页上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27，第34页上页（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③ 原著注文缺。——译者

人说妥让他们一行人乘俄国的“亚美利加”号下驶大沽口外，卫三畏记道：“普提雅廷伯爵的这个建议，只是他平素一贯表示好感与帮助的一端”而已。因为如果“亚美利加”号不折回的话，会使他大不方便，不得不改乘本地船下行。我想他不会这样干，尽管他的确讨厌英国人。英国海军上将西马靡各厘已经和列卫廉非常要好，他提议派一艘英国战舰把美国人送出大沽口外。不过，列卫廉在日记中写道：“经过全面考虑之后，就策略明智和个人感情而论，我决定接受俄国人的帮助”。他辞谢了西马靡各厘的战舰。

7月2日，桂良和花沙纳通知普提雅廷，皇帝允许派教习来。这位俄使解释说，这些人将与枪炮一同自海运来此，停泊于拦江沙外，中国再用沙船运上岸。普提雅廷送钦差每人八件礼品，也向较低级的官员送了礼。计有钟表、呢绒，图画等。他们给他回了礼^①。英国人一点礼品不送，而列卫廉仅仅送了一册医学著作的汉文译本^②。

在这以后，直到普提雅廷离开中国，他和中国人的关系，这里很少得到消息。桂良与花沙纳7月2日奏陈：晃明^③（阿瓦库姆甫，系普提雅廷的译员及第二通事）和他们讨论了，他们新近接到英国人的来信告诉他们广州在打仗和香港发生纵火事件。中国档案中对此事的始末并无记载。四位使节在离津之前，签订一项议定书，确立了指导各条约实施的原则，并各向本国政府陈报^④。

7月4日，“亚美利加”号开走的时候，俄国人和美国人互相告别。普提雅廷于3日向列卫廉个人辞行。列卫廉在日记中写道：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28，第1页上页（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② 卡发罗夫（巴拉第）前书，第48页。这件事，象俄国人在历次照会中所用的语言一样，表明他们对于中国人的办事方法多么了解。

③ 作者误。阿瓦库姆并非晃明。晃明按《筹办夷务始末》译名是哈喇坡斐察启，是教士团跟班“学生”兼译员。——译者

④ 柯尔迪埃前书，462—464页。

“我与我很好的朋友——伯爵道别。他是这里我最为相得的朋友。”

7月5日,普提雅廷看到英中条约最后定本的时候,据巴拉第的记述,曾经连声叹息。因为他为了防阻英国人从条约中得益过多,斗争得如此之久,而最后签字的条约还是包含了那么多的利益。他向这位大司祭保证,他一回圣彼得堡,就要吁请俄国政府与英、法商谈减轻中国赔款中最苛重的负担,并使他们签订协议,不要再进攻中国^①。

7月6日,巴拉第离津返京。9日,普提雅廷一行乘“阿斯科尔德”号巡洋舰赴日^②。这条船于7月初才到达北直隶湾,虽然它早已答应要来了。(据巴拉第的意见,俄国政府命令该船,故意耽搁,使它不失时机地参加英、法联军的军事行动^③。)因《亚美利加》号未能返回载他们出口,普提雅廷一行确曾向谭廷襄借过一只本地船,以便下溯河口。临行,普还向谭告辞,并与谭商定,一俟俄船二艘不久到津时,即将其带来的两份照会收下^④。此际,马尔特诺夫在五十三天中走完了从天津到圣彼得堡的全程,于8月19日抵达俄国京城。俄中条约签订的新闻,就从彼得堡,由欧洲各国驻俄使节电报回国。额尔金之弟卜普斯带着英中条约赶到伦敦的时候,发现一件他所最不喜欢的事,即亚历山大早已知道了。

普提雅廷在1858年8月19(7)日与日本签订了《江户条约》。《江户条约》与《璦琿条约》签字的消息大约于同时传到在中国的欧洲人耳朵里。我们可以从葛罗男爵处看到俄国人的这两项成就,在上海产生了深刻的印象^⑤。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阿穆尔。也许,还回想得起4月份穆

① 卡发罗夫(巴拉第)前书,第49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28,第51页上页,第52页下页。

③ 卡发罗夫(巴拉第)前书,第48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28,第51页上页,第52页下页。

⑤ 柯尔迪埃,前书,第419页。

146 拉维约夫曾经为了支持普提雅廷，提议由他本人和蒙古王公互相授勋，为此曾向德勒克多尔济办过交涉，虽然这些交涉没有起什么作用。在这以后，直到5月间，穆拉维约夫以他所接到的新指令为武器，沿江而下，与黑龙江将军相会的时候，俄中边界上没有发生过什么很有趣的事件。

关于俄中瑗琿谈判的业经公布的资料，主要有四种：俄国方面有涅维尔斯科依所作的相当详尽的记述^①；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约翰·克兰普敦爵士于1860年提供的一份记述，差不多是完全依照涅维尔斯科依的；巴尔苏科夫在他所著：《穆拉维约夫传记》中，则提出一个简略得多，并且有些不同的记载；最后，还有《筹办夷务始末》中奕山给清帝的奏折^②。该文至今没有译文，如把涅维尔斯科依与奕山所记加以对照，应视为相当确切的材料。

照涅维尔斯科依所记，1858年冰融时节，穆拉维约夫立即乘船下驶阿穆尔河。事先就派人送信，通知当地满员他是去谈判的。5月17日（5月5日），他到达乌斯特-结雅，吉拉明阿拜会了他两次，说明奕山在瑗琿等他谈判边界问题。吉拉明阿向穆拉维约夫暗示，奕山可以“安排每一件事，办理每一件事”。他还问穆有无孩子？穆答说没有。吉拉明阿以为是件憾事，因为“一个立了巨大功勋的人，总要能把光荣留传给后代才好”。俄国人中间的气氛是自信而快乐的。

5月21日，他们为乌斯特-结雅大礼拜堂行奠基礼，并在普遍的欢乐中把乌斯特-结雅这座城市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穆拉维约夫和他的随从于5月22日碇泊于瑗琿，显然，被当作尊敬的贵宾来接待。奕山在吉拉明阿宅邸中设宴招待他，“欢乐，有礼貌地交谈”。不过，当天并未谈到实质性问题。

① 涅维尔斯科依，前书，第31章。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25，第11页上页。

次日晨,即5月23日,在吉拉明阿宅邸中开始谈判。穆拉维约夫把历史作了一番回顾,并为俄国人在阿穆尔的行动作了辩护。他要求以阿穆尔作为“对两国都有利”的边界。是日下午,奕山及其“庞大”的随从,登上穆拉维约夫的船,俄国人以茶点及伊尔库茨克骑兵合唱队的歌唱来款待他们,奕山对此很为欣赏。147
第二天,即5月24日,清语译员希什马廖夫和穆拉维约夫的主要助手彼罗夫斯基^①,及俄国外交部参赞,向满人提出一份草约。其内容五点如下:1.从石勒喀河与阿穆尔河汇合处,沿阿穆尔河、乌苏里江及其各支流,再沿图们江及其各支流以至入海处为界;2.所有边界各河只准俄国与中国船只自由航行;3.凡在应交对方管有之领土上的两国臣民,均在一年之内迁走^②;4.沿各河自由通商;5.前此有关北京通商、派遣教士、使节、信使往来的条约,均应“按两国友谊,重大利益和光荣”,重新商酌规定。满人不肯接受其中任何一条。爱绅泰对于最末一条内提到的“光荣”一句,提出反对,理由是大清皇帝已经享有足够的光荣,无须再添什么了。傍晚,爱绅泰与希什马廖夫再行会谈,没有结果。

5月25日,希什马廖夫又将另一草约交给奕山的下属。这份草约去掉了第五条,而设法取得他们对前四条的同意。黄昏时分,爱绅泰又到俄船。流着眼泪恳求希什马廖夫不要再提要乌苏里地区的主张,并且声言如若不肯他便立刻投江自尽^③。他又向穆拉维约夫重申了他的愿望。穆拉维约夫认为已经到了时刻,必须对“事态作肯定而坚决的扭转”了。第二天,即5月23日,他上岸把他的全部要求用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满人开始提出他们对于阿穆尔河和乌苏里地区拥有主权的证据;他们说他们以主人身份向当地居

① 旧译丕业罗斯奇。——译者

② 巴尔苏科夫书上是“三年”。

③ 实际上他到1860年底,仍然活着。

民征收贡赋。他们在这些地方和沿海都一直设有卡哨，足证他们对土地的主权。从乌苏里江以至海滨的土地，都是当今皇朝的祖宗发祥之地。如果这片土地让给俄国，那就无异是“叛逆”。俄国
148 人对此统统加以否认，辩称：在阿穆尔河与乌苏里江地区的原住民，从未向中国纳贡。而在 1854—1855 年间英国人侵犯时，保卫他们的是俄国人，没有见过中国有什么帮助。至于清朝的老家则系宁古塔地方。对此种说法，奕山答称，他决不怀疑俄国政府要求很高，可是，如果中国也跟你们一样要求把尼布楚要回来，请问俄国政府肯不肯让中国人越过瑗珲，去把夷人赶走。穆拉维约夫驳道：这种说法与本题毫不相干。他假装大怒向希什马廖夫说，他放弃和平解决的希望了，他的要求都是不容更改的，中国人至迟必须在明天早晨予以接受。他起身回船时，用眼愤怒地瞪着这一大帮满人。奕山午后派一位官员去问他发脾气的原因时，并说“他们今后的行动必不致使将军生气”。

5 月 27 日一早，满人派协领一员与爱绅泰同到穆拉维约夫船上。他们声言可以同意接受条约，如果能把约文内提到乌苏里江之处的“边界”字样删略。那就是说，自乌苏里江直至于海的土地，在条约未经北京批准之前，应作为未经划定土地。《瑗珲条约》遂于 1858 年 5 月 28(16)日(咸丰八年三月十五日)，以颇为隆重的仪式签了字。

在涅维尔斯科依的材料中，极有兴趣的特点是他不管是在谈判期间还是在条约中，都没有提到乌苏里地区共管。照他所说，条约最后文本是这样的：

“自乌斯特-斯特烈耳卡(即石勒喀河与阿穆尔河合流之处)起，阿穆尔河左岸，及自乌苏里江口以上直至于海的阿穆尔河两岸，直抵海滨的整片土地，归属俄国国家所有。阿穆尔河右岸至乌苏里江之口，归属中国国家所有。乌苏里江外，自

江之上游直至于海之土地，现应作为未经划定之处，以待俄国皇帝及中国皇帝查核定夺。”

可是，按照中、俄两方后来付印的条约形式，都明白规定某种方式的共管。在其他方面，两方所公布的条约，均与涅维尔斯科依 149 的说法相同。

在奕山有关谈判的材料中，基本分歧与值得注意之点如下：他没有提起受到款待与进行了友好的谈话。5月22日开始了谈判的主要议程，谈及俄国人要求满人须从阿穆尔河左岸移出，并付给迁移赔偿。奕山说他向俄国人声明乌苏里地方寒苦，并无出产，而民情强悍，不遵约束。俄国应将他们的人悉数从那里撤出，以全和好。他写道：“该夷〔即俄国人〕争执狡诈。理穷处辄以防堵为词〔防范英夷〕，甚至推诿不知”。对俄国草约，他写道“言语更加荒谬，婉言开导至再”。当爱绅泰回复俄国照会之时（系5月25日，奕山略其日期），俄国人趁送他返回，又带来了另一照会，答应左岸的满人屯户可以留居下来。至于穆拉维约夫动怒的情景，奕山写道：“木酋^①勃然大怒，举止猖狂，向通事大声喧嚷，不知作何言语”。据奕山所记，当夜瞭望穆拉维约夫的船，“火光明亮”，“枪炮声音不断”。次日早间，派吉拉明阿前去调查。吉报称：穆拉维约夫下令施放枪炮以警告满人。除穆拉维约夫所乘之船外，另有两艘俄国船各“载有夷人二、三百名，枪炮军械俱全”。他以为：穆拉维约夫等必定尚有人船在后，倘一举动，深恐难以收场。江左居民都到吉拉明阿处哀恳庇护并抵抗俄人。5月27日晨，爱绅泰被派赴穆拉维约夫处，这位总督亲自告诉爱绅泰等，如次日不签条约，他就不让江左屯居户及耕地存在。

奕山最后以此等话来为自己向清朝皇帝开脱：

150

① 木酋，即穆拉维约夫——译者。

“语〔最后的约文〕虽含混取巧，较之前文，略觉简明。且字内江左屯户居处仍可保留，并除此数处外本系空旷地面，现无居人。至松花江、乌苏里河等处，地属吉林，未敢酌准。但该夷业经占居阔吞、奇吉处所，字内又写乌苏里河至海，以为中国、俄国同管之地。议请通商一节，亦可比照海口等处办理。现在，割辨分界，本不当迁就了事，均应查照旧例，分定为是，第势处万难，若不从权酌办，换给文字，必致夷酋愤激，立起衅端。实于边疆大有关碍。是以不揣冒昧，暂安夷人豺狼之心，允其所请，换给画押文字，以纾眉急。该夷换字后，即将人众船只退去。于5月16日〔5月28日〕返回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现在海兰泡居夷，照常安静”。^①

《璦琿条约》的官方文本，流传到我们手里，与涅维尔斯科依所记的不同，这在上面已经提到了。俄国人收在俄文《俄中条约汇编》中的约文，与《筹办夷务始末》中所载，和以清文约本为依据的《咸丰条约》中所载，也都各不相同。

俄文本第一条为：“自额尔古纳河至阿穆尔河海口，阿穆尔河左岸，自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海口，为俄国所属；右岸沿江而下至乌苏里江为大清国所属。中国人认为阿穆尔流入松花江，而不是松花江流入阿穆尔。中国文本如下：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由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海口，为俄国所属之地，右岸顺江至乌苏里江，为大清国所属之地”。^②

在《俄中条约汇编》中，俄国约本有关共管的措词如下：“从乌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25，第14页，译文不尽符合原意，今按原意略作改动。
——译者

② 不过，按照伊格纳提耶夫（《有关伊格纳提耶夫出使中国》，前书，第66页脚注），清字条约版本讲俄国人在左岸的屯居地只是暂借俄国。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奕訢接受了这个条约（见第152页以后），但中文约本内为什么又把这一点漏略掉呢？（亦见第180页以后）

苏里江至海之地方，两国在确定边界以前，将如目前为大清及俄国共有”。中国文本为“自乌苏里至海，所有地方毗连两国交界之间，为大清、俄国共管之地”。关于航行问题，双方文本内都说，黑龙江、松花江与乌苏里江上只准大清国和大俄国船舶航行。这就明白规定俄国船可以在松花江上游航行，可是后来中国对此有争议。据涅维尔斯科依在他所写关于谈判经过的记载内说，爱绅泰至少应已完全领会这种字句的含义。然而爱绅泰是否曾把这一点向奕山解释清楚，我们就无从知道了。

奕山抱怨条约约文含混取巧，显然是完全对的。至于涅维尔斯科依的约文，与后来公布的各种本子的条约约文之间发生重大差异的问题，唯一可以说得通的解释是，如不是涅维尔斯科依记错了，就是穆拉维约夫故意制造一份俄文约本，其中含糊提到某种共管，蒙骗了满人。这事完全可能。因为在瑗珲的满人谈判者中间，没有一个懂俄文的翻译人员。事实上，大清帝国在 1858 年间是否会有一个能够通晓俄文的人，也是极成问题的。同样有可能的是，当哥尔恰科夫与亚力山大二世核对条约的俄文和清文约本的时候，认为穆拉维约夫作得太过份了，决定另拟一个新的，与清文约本参差较少的俄文约本。¹⁵²

奕谟 1858 年 6 月 14 日^①（咸丰八年五月十七日）降旨谕令奕山等，文如下^②：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俄夷与地界一节，言语反复，曾谕知奕山与木哩斐岳幅会勘时，当查照从前界碑，与之剖辩，不可迁就了事。兹据该将军奏，会晤夷酋，酌议地界该夷酋所请黑龙江左岸，旧居屯户之外，所余空旷地方，给与该夷安静存居，并江中准其行走等情。奕山因恐起衅，并与屯户生计，尚无妨

^① 原文为 1958 年系 1858 年之误——译者。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 25，第 15 页上页。

碍,业已悉行允许。自系从权办理,限于时势不得已也。维该处既给于俄夷,又恐民夷杂处,致滋事端。奕山当妥为弹压、毋稍大意。其松花江、乌苏里、绥芬等河,界属吉林,距兴安岭远近,奕山不能悬揣,即著景淳迅速查明。如系空旷地方,自可与黑龙江一律办理。倘该处本有居人,一旦为夷占据,与我国屯丁耕作,均有妨碍。景淳当咨明奕山。仍应与该酋据理剖辩,不可一概允许,又滋后患。至该夷所请,于黑龙江通商之事,即著奕山体察情形,妥筹条约,一面仍严密防范,设法驾驭〔该夷〕。毋令该夷既遂所欲,更肆要求无厌也”。

此旨似乎含蓄地承认了让出阿穆尔河左岸。并暗示如阿穆尔河下游(松花江)、乌苏里与绥芬如查明果系空旷地界,所谓共管可无须再提,让俄国人占领该地好了。可是奕訢也明白指示:如果这些地方有人居住,就不能让俄国人无条件地取得它。

可是,早在7月1日(6月19日),卡尔萨科夫给穆拉维约夫写信,讲到吉拉明阿派遣一位佐领告诉他,皇帝已经批准了《瑗珲条约》^①。这可能是吉拉明阿自作主张。照巴尔苏科夫著作卷1第518页,直到9月间,奕山才通知穆拉维约夫,皇帝批准条约。他并奏明皇上他已告知穆拉维约夫^②。1858年7月20(8)日,沙皇在圣彼得堡没有发布任何公报^③,悄悄批准了《瑗珲条约》,并以一份官方通知书送达北京。

不论是《瑗珲条约》还是《天津条约》,都没有完全满足俄国的野心。这两项条约有某种程度的重复。因为签订于6月13日的后一条约,可以解释为取消了5月28日签订的前一条约中的某些规定。(《天津条约》第9条,文为“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

① 舒马贺尔,前书,第301页。

② 见第三章以后。

③ 舒马贺尔,前书,第301页。

派出信任大臣，秉公勘察。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正如后来所发生的，北京政府不久就利用了这个机会。普提雅廷所定条约，在陆路通商和改善边界关系两件事上，与俄国人所抱希望相距甚远，因而在西伯利亚方面引起不小的反对表示。穆拉维约夫和恰克图市长都对他啧有烦言^①。这位海军上将答应向中国提供军火和教习之举，还被哥尔恰科夫批评为操之过急^②，尽管哥尔恰科夫本人不久就强烈地采取同一主张。

① 伊格纳提耶夫：《有关伊格纳提耶夫出使中国的材料》，前书，第5页等。

② 卡巴诺夫，前书，第193页。

第三章 1858年7月至1859年6月： 彼罗夫斯基的使命，《天津条约》 的互换，与《璦琿条约》 之被中国废除

巴拉第回到北京教士团，于7月8日（6月26日）获悉耆英的儿子曾来央求俄国人出面为他的父亲说情免死。这位大司祭虽然认为这样处分是不公平的，可是已经无计可施^①。

此际，穆拉维约夫赶紧利用了《璦琿条约》，他带着二百家屯户，下驶阿穆尔河作第三次远征^②。7月12日，奕訢收到一份奕山送来的奏折^③，奏报俄夷两起，一伙二百名，另一伙一百名，携带枪炮，乘驾木簰过境，后面还有“大船五只，三板船八十三只，木簰八十串，共载夷人一千余名”，尾随续到，奕訢仅在摺上批示“知道了”。1858年8月8日（咸丰八年七月初一日）收到的吉林将军景淳奏折中，奏陈穆拉维约夫本人携带官员九名与兵士九十名乘船上溯乌苏里，进行了一些勘察，并在一处称为喉温的地方建造堡垒。尽管驻防当地的中国人出来劝阻，他仍旧在归途中派了另一批人
55 回到那里。后来，穆拉维约夫又率领一批人上溯松花江，其中一名“夷人径赴三姓贸易”^④。收到的第二本奏折，显然驱使皇帝采取了行动。他谕令沿黑龙江边界两省将军派两名副都统去调查俄国人

① 卡发罗夫（巴拉第）1855年的日记（圣彼得堡：1912年）第53页。

②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材料》（2卷集，1891年，莫斯科）卷1。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29，第3页上。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30，第1页上。

的行动,并阻止他们向更远的地方扩展^①。

更早些时,即7月8日(咸丰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收到景淳一份奏折,奏报乌苏里江与绥芬河均在松花江南岸,分属三姓与宁古塔管辖,松花江下游(即阿穆尔河)地方除土著各部族之外,别无民居。土著各部族在该地采集人参,猎取皮毛,并采集珍珠。至于乌苏里、绥芬等地方究竟是否亦系无人定居的旷地,尚待查明^②。然而,直到年底,对此事并未进行任何工作。

穆拉维约夫在这次远航阿穆尔河口与乌苏里江之后,回到布拉戈维申斯克^③。7月20日,他和奕山及其随从,在瑗珲开始了一系列非常亲热的会晤,双方宴饮交欢,穆拉维约夫刚上岸,吉拉明阿还“张臂拥抱”了他^④。会上,签订一项正式书面协议,阿穆尔河左岸的满人屯居地可以仍留原处^⑤。7月25日,满洲当局把一张单子交给俄国总督,单内分列管理贸易章程十四款。满洲当局没有将此事立刻奏明皇帝。反正,他们提出的章程穆拉维约夫无论如何也不接受。9月初,奕山捎话给穆拉维约夫,他已奉到皇帝谕旨,批准《瑗珲条约》。他现在可以将穆拉维约夫方面所提在新边界上进行贸易和办理交涉的建议上奏。穆拉维约夫答复说,条约未经沙皇批准之前,他暂不拟提出此种建议。他希望在两个月¹⁵⁶之内接到沙皇的通知^⑥。

1858年夏季,阿穆尔各地的收成不好,穆拉维约夫很难使他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30,第3页上。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28,第44页上。

③ 当时的乌斯特-结雅,现已易名。

④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1,第518—520页,卷2,第184页。奕山被描绘成他真正的朋友。亦见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97年圣彼得堡第二版)。

⑤ 舒马贺尔:《(俄国)获得阿穆尔河的历史,(1846—1860年与中国的关系)》,载《俄国档案》,1879年第6号。

⑥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1,第518—520页,卷2,第184页。

的人得到足够的谷物^①。不过，中国人的奏章中没有提到过，即使他们是知道这件事的。

类似黑龙江各条约的谈判，在遥远的土耳其斯坦也依样画葫芦地重复演出。伊犁将军扎拉芬泰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谊连篇累牍地上奏，报告他们与扎哈罗夫的谈判情况。奕訢在批示中反复谕令他们妥善处理，并尽可能迁就俄方要求。扎哈罗夫起初要求偿银二十五万两，而明谊只允付十万两，另加五千五百箱茶叶^②。最后，塔尔巴哈台条约于1858年8月27日签字的消息，于10月16日（咸丰八年九月初十日）传到北京奏闻皇帝。在该约中，中国同意在8年6月或7月底之前修复俄国商栈，并付给俄国方面银十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二两，茶叶五千五百箱，每箱各重五十五斤。款项自当年10月起（1858年11月或12月）三年付清。此外还规定重设俄国领事馆，领事馆有权悬挂俄国国旗等等^③。这个条约显然是俄国人的项大有收获的胜利。

1857—1858年间，俄国人的注意力也为噶什喀尔所吸引。这
157 地方已经叛离北京。西西伯利亚总督加斯弗尔德强烈主张援助叛乱者。哥尔恰科夫却坚持一种不干涉的政策。可是他派遣一名兵弁瓦里哈诺夫，去侦察情况。这个能干的青年与叛逆者混了六个月。他于1858年回到西伯利亚汇报说，那里大有发展俄国商务的机会。在噶什喀尔通商，并设立领事馆的权利，现在成为哥尔恰科夫所追求的目标之一^④。

①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1，第421页。

② 塔城“补贴条约”，中方赔款银十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二两，抵茶五千五百箱，分三年交清。银、茶并非两项。——译者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31，第27页以下各页。中国方面其他出版物中都没有关于塔尔巴哈台的条文。袁同礼编：《中俄西北条约集，1857—1949》（香港，1963年），或《咸丰条约》（民国时期，北京），都没有提到它。这个条约也未列入斯拉德科夫斯基书中，或《中俄关系》（这是俄国方面自《俄中条约汇编》以来唯一的一本条约集）之内。

④ 哈尔芬：《俄国在中亚的政策，1856—1868》1960年，莫斯科，第106—113页。

夏末，北京朝廷对俄国的不满情绪第一次开始发泄在教士团身上。巴拉第在 1858 年 9 月 17 日（5 日）日记（已公布的日记中的最后一段）中记载：“俄罗斯馆前任监督苏彰阿已回通州。理藩院并未另派监督接替。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虽然派了，可是此人不顾惯例，直到新教士们抵达之后，还没有来馆拜会。”

关于俄国政府在《天津条约》签订之后对华政策的发展，没有多少资料可资查考。看来普提雅廷仍在继续敦促俄国政府设法控制中国军队的训练。他在返国途中，自巴黎写信给海军大将康士坦丁大公建议这一点。他说切不可让英国人在援助满人镇压叛乱这出戏中扮演独占场面的角色，这是个根本大计。1858 年 5 月间，他写信给哥尔恰科夫，提出如下五点方案：（1）在西方使节到达北京之前，赶紧确定新边界；（2）派五名军官赴北京，重新训练中国军队，他们须在 1859 年 2 月 13（1 日）抵达恰克图；（3）1859 年中运送大炮五十门、火枪一万杆到北直隶湾；（4）派遣一位具有某种身分的俄国使节，到北京互换条约；（5）调派一些浅水炮舰到远东，协助镇压叛乱。外交部参事彼罗夫斯基，先前曾在璦琿充任穆拉维约夫的清文翻译，受命赴北京互换条约，但是没有公使职衔，仅仅 158 被任命为教士团首脑，位在巴拉第之上^①。交付给彼罗夫斯基的政治任务，却是从来未曾交付给从前任何一位教士团首脑的。这次人选似在年初已经决定，因为在 5 月 31 日（19 日）穆拉维约夫已经有信给彼罗夫斯基，令他与北京朝廷展开关于通邮和通商章程的谈判，并且回顾了以前各条约中关于这些事项的规定^②。

彼罗夫斯基从哥尔恰科夫奉到的正式训令仅仅是命他从中国

① 伊格纳提耶夫：《有关伊格纳提耶夫出使中国的材料》（1892 年，莫斯科）第 6 页。普提雅廷也提了一项在中国，特别是在阿穆尔迅速开展东正教工作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第 36 页等）。

② 巴尔苏科夫，前书，第 171 页。

方面得到《天津条约》的批准,另外又指示他说:“我们要求的主要目标既已达到……你应竭尽全力,使外交部为保持我们与中国朝廷的和平友好关系所作的努力,不致受到妨害”。^①

1858年8月6日,彼罗夫斯基及其一行离开恰克图,“送行的隆重超过历来任何其他使团”。^② 10月10日(9月28日),他到达北京^③。但是,他的到达没有对中国政府留下什么特殊印象。档案中也没有什么记载。舒马贺尔正确地指示:一位全权公使一定会对中国人产生重大得多的印象。^④

穆拉维约夫在9月3日给科瓦列夫斯基的信中透露,他对于把彼罗夫斯基受哥尔恰科夫指挥,而不受他本人指挥,相当不快。不过他希望用他的友谊“与我从他那里赢得的某种信任”,^⑤来影响彼罗夫斯基。这位总督抱着万分乐观,期待彼罗夫斯基能够有所成就。他在11月2日(10月21日)信中^⑥,令彼罗夫斯基促使清朝朝廷指派划界委员,划定乌苏里江地区的新边界。此事必须在春季雪融之前办妥,以便在英、法使节抵达北京之前抢先一著。穆拉维约夫认为,英、法或许要在朝鲜与阿穆尔河之间占据一处海湾。他还把他的打算:从北京朝廷取得商业特权告诉了彼罗夫斯基,并进一步详细指示。这些要求多数只在签订《北京条约》时才到手。其中,在张家口设立领事馆一事,终沙皇之世,始终没有办到。不过另一项,即取消俄商入华人数限制,和俄国货物运入中国数量限制,则已在《天津条约》第四条中得到。1月22日(10

① 《红色档案》,卷21。(中央档案馆)

②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2,第183页,穆拉维约夫致科瓦列夫斯基函。1858年9月3日(8月22日)。

③ 《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第135页。

④ 舒马贺尔,前书,第302页。

⑤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2,第183页。

⑥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1,第205页。

日),穆拉维约夫写信给哥尔恰科夫时的口气,差不多是说中国要划定新边界已是既定事实。这或许是由于他曾经收到奕山的一件对及早划定边界显然表示关切的咨文^①。他另外于11月23日(11日)写信给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提到他已经函告彼罗夫斯基,令他在1859年夏天之前不要离开北京,嗣后再从北直隶湾经海路返回俄国。在这封致亚洲司司长的信中,穆拉维约夫还定出中国使节前往莫斯科所走的路线。他显然相信中国使节不日可以从北京出发^②。11月28日(16日),穆拉维约夫从瑗珲写信给哥尔恰科夫,说他已令彼罗夫斯基要求北京朝廷同意在恰克图与北京之间敷设电报线^③。这些通信给人的印象是,穆拉维约夫当时可能在奕山最大程度的合作影响下,已经完全丧失了他的现实感^④。

彼罗夫斯基在北京头几个星期所作的事,有些还难于核实。照 160
坂野正高的说法,他宣告于12月15日到达北京。^⑤可是据我们所知,他在几个月以前,即10月10日就已经到了。他是在8月6日离开恰克图的(这样算起来,他走得很慢,也许是非常地慢。伊格纳提耶夫只用二十二天就从恰克图走到北京,但这是非常快速的行程)。12月17日的一道谕旨,命令肃顺和瑞常二人与彼罗夫斯基会谈。但是,这个文件排在坂野正高所引述的同一日期之后。谕旨内云:——

“朕思办理俄夷之事,肃顺一人,尚觉孤零,若见面时,该

①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1,第214页。

②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1,第215页。

③ 同上,第217页。

④ 或者是因为他过度地庆幸了自己的成功?卡巴诺夫在他的论文里注意到穆拉维约夫的喝醉情况。

⑤ 坂野正高:《中国和西方》(麻省坎布里奇,1964年)第129页(引自台湾尚未公布的档案)——原注,坂野正高的上述材料,引自《四国新档》(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即1858年12月15日俄国来照的清字汉译。来照并未说明彼罗夫斯基到京日期,坂野正高说彼罗夫斯基到京日期是1858年12月15日,显然弄错了。——译者

尚书语言之间，总不免激烈，无一转圜之人。若事事许其转达，则一司员能办之事。况该夷既知入奏，挽回更难，著添上瑞常，仍不离事历理藩院之意”。^①

这很可以表明肃顺已经跟彼罗夫斯基会谈过一阵子了，而且这无论如何肯定地表示了奕訢意在怀柔。^②

肃顺是郑亲王端华之弟。康熙第十三子懿亲王的重孙。他性格跋扈，据坂野正高说是宗室集团的领袖，对奕訢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自此时起，直到1860年5月，他在与彼罗夫斯基，后来在与伊格纳提耶夫打交道中都起了主导作用。瑞常是蒙古族，不过充当第二把手。

161 中国刊印的资料中，最早提出彼罗夫斯基名字的是皇帝在10月9日^③收到的德勒克多尔济的一件奏折（此折料系三个星期以前发出的）。该奏折报穆拉维约夫所派使节抵达库伦，“带有口禀转交照料学生之彼罗夫斯基”，因此要求进京。德勒克多尔济在奏折内说，他未允俄国信使前行，并申请颁给《天津条约》，因俄国人曾提到此约，而他从北京朝廷一无所闻。此后，他两度奏请发给条约副本，但全无结果；只奉到复谕，如俄使再来要求，可准其进京。在日期为11月25日（咸丰八年十月二十日）的第二次奏折中，他奏陈俄国信使事实上已返库伦，并经他允准启程进京。一位俄国少校，大概又是迭斯波特-捷诺维奇，曾经拜访过他，并且大肆吹嘘普提雅廷在解决天津纠葛中的功绩。此人还重提穆拉维约夫请赏花翎的事^④。俄国使者带交彼罗夫斯基的口信的性质还不清楚，想来无非是前述穆拉维约夫所发的各项指示。彼罗夫斯基为《天津条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33，第5页下，作者译英。

② 坂野正高所见的未公布档案中，有一文件谕令军机处与载垣共同阅看谕旨，并传知惠亲王。肃顺当时是理藩院尚书。瑞常总管刑部。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31，第19页下（咸丰八年九月初三）。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32，第19页上。

约》的互换开始谈判的时候,立刻就遇到困难,因为清文约本(条约以它为准)的各种译文从来未经正式校对并取得一致。大司祭巴拉第当时就曾注意到此事。可是,普提雅廷在 1858 年 9 月 24 日给哥尔恰科夫的信中却说:立约双方各在两份清文约本上签字,各本并无岐异。事实上,在中国人手头的复本,与普提雅廷所执,其后又由彼罗夫斯基带回北京的一份根本不同(其间曾由利哈乔夫拿到圣彼德堡由沙皇批准)。中国的约本又不在北京而在上海,更增添了麻烦。彼罗夫斯基不知道这些,而怀疑北京朝廷有意试图 162 改动约文。^①

1 月 15 日(咸丰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清帝收到大学士彭蕴章的奏折,文如下^②:

查前次由天津送到俄罗斯清文条约与钦差所订条约,详细核对,除第四条及第十条内,意见微有不同,其余各条意思相同,文气全不相同。此件俄罗斯清文条约,与现在丕业罗夫斯基^③送到条约文底,意思相同,文气稍有不同。谨将第四条、第十条抄录呈阅。

钦差所定第四条,如带有违禁货物,即将该商船所有货物,概行查抄入官。俄国清文系如带有违禁货物,只将船下货物抄没。

钦差所定第十条,俄国人学习满、汉文义,居驻京城者,酌改先时定限,不拘年分,如有事故,立即呈明,行文本国核准后,随办事官员,径回本国。俄国清文系俄国差人赴京,更改从前定限,一面回明上司,不拘时日,即行回国。

1859 年 1 月 15 日(咸丰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一项复谕^④: 中

① 舒马贺尔,前书,第 303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 33,第 17 页上。

③ 今译彼罗夫斯基。——译者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 33,第 17 页下。

163 国的约本两份、及俄文、汉文约本各一份，现均在上海，即著桂良等迅速加以比较。此旨又道：“据该夷送到条约文底，与该大臣等前在天津所给该夷条约清文有互异之处，以致该夷借口，欲请更改字句，未能互换。”

1月25日(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奕訢得到满洲方面的进一步消息^①。奕山、景淳与副都统等奏陈，他们勘查乌苏里江与绥芬河流域已毕。该地除土著部族以外，别无人居。乌苏里江下游有三处俄夷屯居地，但均距边界甚远。穆拉维约夫送来照会一件，大意谓：他已派武弁两员、文官一员标定乌苏里江边界^②。他们将于1859年2月间或3月初(咸丰九年元月)抵达瑗珲，与中国当局会商，并筹备在春融前开始查勘边界。实际上，黑龙江副都统吉拉明阿已经会见过前来递送照会的人，并已向他表示同意，尽管当地还积雪很深，山路不通，来人还送到其他公文四件，只有一件附在奏折之内。紧接着，理藩院于1月27日咨知俄国，要求把军械子弹运到库伦，中国将自行修复海防工事^③，俄国毋需再行护送，以免“长途跋涉”。咨文是有礼貌的，并且表达了清帝对此事“甚为欢悦”之意^④。彼罗夫斯基不知道发出这件咨文的事。

俄国政府可能由于对彼罗夫斯基的进展不满意，1月间决定接受普提雅廷和科瓦列夫斯基的意见任命伊格纳提耶夫为驻北京164 的“政治代表”，以代替彼罗夫斯基^⑤。1858年12月间，在沙皇御前，普提雅廷本人也在座，特别委员会召开一次会议，普提雅廷 5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33，第22页上。

② 这是由布多·戈斯基中校率领的一帮人。

③ 此处疑有误，《筹办夷务始末》，卷33，第28页为“自行送至京”。——译者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33，第28页上，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见坂野正高前书，第155页。这可能是由于肃顺的影响，但所提及的该项谕旨《筹办夷务始末》中未见。

⑤ 伊格纳提耶夫，前书，第1页并参见其后。

月间提出的对华政策^①的全部建议都得到批准。少将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伊格纳提耶夫伯爵，是一位受过训练的军人外交家。他出身贵族家庭，社会背景比普提雅廷高贵。他在御前青年侍从班服役之后，1849年升为侍卫，1851年从皇家参谋学院毕业，接着在波罗的海各省工作。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受命在伦敦充任军事代表。在那里，他对于收集战略情报十分积极。他虽然以伦敦为驻地，但随时须听俄国驻巴黎大使的召唤。他于1856年参加了巴黎会议。俄国人当中，唯独他留神到奥地利人正在试图把摩尔达维亚边界划在雅尔布克胡河上，而不是划在雅尔布泽留河上，以便尽可能把俄国人远远推到多瑙河和普鲁特河之外。多亏伊格纳提耶夫，这一阴谋被挫败了。他在《有关伊格纳提耶夫出使中国的材料》内，自称是头一个探听到1856年英国即将远征中国消息的人。1858年，伊格纳提耶夫在一次周游东欧和地中海的旅途中奉到召唤，前往希瓦和布哈拉去执行一项使命。他带着一支只有五十人的队伍，从布哈拉缔结了一个贸易条约，并且使俄国俘虏获得释放。1859年他才二十七岁，即以显赫资历受任使华^②。

穆拉维约夫获悉伊格纳提耶夫的任命的消息，心里很高兴。看来，他现在对于北京朝廷的意图，似乎陷入一种近于夸大的恐惧之中，而且对于彼罗夫斯基感到厌恶。2月28日，他写信给科瓦列夫斯基说：“在恰克图流传的关于中国朝廷的谣言，都是最有威胁性的”，并说他已调派一千五百名哥萨克去增援外贝加尔第十七骑兵旅。3月4日（2月20日），他又写信给科瓦列夫斯基，敦促尽快把伊格纳提耶夫派来。3月5日（2月21日），他在致哥尔恰科

① 见伊格纳提耶夫，前书，书第157页。但原材料内无确实日期，月份据儒略历列出。

② 《俄国人名辞典》（1910年圣彼得堡）。亦见克拉伦登勋爵的笔记，他愉快地在第232页下半页提到了关于伊格纳提耶夫在英国的活动。伊格纳提耶夫于孩提时就有“明亮的太阳”的绰号（伊格纳提耶夫，前书，30页）。

165 夫的信中，哀叹彼罗夫斯基由于自己的懒惰和教士团圣职人员的迟钝，已经失掉获得任何消息的一切手段，无法知道中国方面正在发生些什么^①。他认为，中国要求把武器送到蒙古，是十分可疑的，因为即使“以中国人的自信，也不能自以为可以准保在白河敌得过英、法的入侵吧！”同时，他也力主在伊格纳提耶夫认为适宜时，才给中国以军械，如果不是为了海防需要，一门大炮也不给。此外，穆拉维约夫还建议授予伊格纳提耶夫以公使头衔，其级别不能低于英国新任公使卜鲁斯。他的随员中一定要有武官，但不必去教练中国人，因为“中国人不需要”^②。

不管怎样，穆拉维约夫怕中国人将在北方发动攻击，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1859年2月10日，奕訢的一道谕旨还命令黑龙江与吉林两处抽调一千五百名兵丁至山海关，准备防御英国人^③。再者，1月24日和27日^④两道旨谕，虽然责备了吉拉明阿不应放俄国人进入乌苏里，但没有指示任何补救办法，仅只按老一套说，可用当地满、汉平民起事相威胁，以使俄人惊扰，并且含糊地命令满洲当局，“设法抵御”俄国人。这两道谕旨中的后一件提到景淳的奏折（此折未保留下来），奏报十四款贸易章程中有三款尚待议定。此折也明白提到穆拉维约夫有一件照会，提议中国应派学生赴俄学习俄文。

166 其次，尽管北京朝廷对彼罗夫斯基并不十分尊重，他们在确定《天津条约》究竟以哪一文本作准问题上的犹疑，同样不能完全归

① 穆拉维约夫与巴拉第的通讯在《俄国档案》中最晚的到1858年5月，理由则不悉。穆拉维约夫在那时的言词，表示出他对待巴拉第极为冷漠。3月1日（2月17日）致科瓦列夫斯基的信也讲到北京有“两个胆小的大司祭”。他对彼罗夫斯基甚至还不知道额尔金上溯长江一事极为不满。

② 见巴尔苏科夫，前书，卷2，第244—247页。有类似信件。

③ 《东华录》，卷84，第73页上与74页下（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33，第24页上与第26页上（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因于他们不愿批准条约。2月1日,桂良的一份奏折递给奕訢。折内奏报已差原在天津襄办缔约的官员赉送条约文本进京,但恐路途过远,到达尚需时日。桂良也指出普提雅廷曾在天津拒绝互换条约,“借端欲请更正。天津原议俟一年再行彼此互换”^①。同日,一道谕旨透露,皇帝现在业已把在北京能够得到的各种文本对比研究,发现其中有不少岐异之处。谕旨原文如下:^②

“普提雅廷……^③此次狡赖,显系恃无质证。……如其仍欲任意更改,即不与之互换。……第二条内,该国自翻清文中,多遇有要事向军机大臣大学士面议一层。又汉文内,均照从前各国总例办理一语,该国自翻清文,系照今外国所立总例字样。第五条汉文内,皆照中国与外国所立通商总例办理一语,该国自翻清文,系照俄国与外国所立之例办理。第八条该国自翻清文内,赞扬天主教之说过甚,未便照伊翻译,是以与清、汉文通体话语多有不符。第十条汉文内,俄国人习学中国满、汉文义,居住京城一语,该国自翻清文内系差往京师人等字样,又汉文内不拘年分等句,该国自翻清文,系一面行知各该上司,不拘时刻回国,一面另差人至京师代替等句。第十一
167
条该国自翻清文,运送物件,下有限一月送交所指地方,汉文内无限一月字样。在清、汉文末尾,均有所议条款,俱照中国清文办理字样,该国自翻清文本少此句。”

正当此时,彼罗夫斯基企图乞灵于穆拉维约夫的武力以恐吓北京朝廷。穆拉维约夫于1859年3月5日(2月21日)致哥尔恰科夫的信件内说:“彼罗夫斯基在一封私函中告诉我:‘您将看到,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33,第46页下(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33,第47页下。

③ 删节号系译者所加,所引系照《筹办夷务始末》,卷33,第46页下原文,与作者所引个别字句略有出入。——译者。

在给中国人的公文中我利用了您授予的权利，用您的名字对他们进行了恫吓。我认为，这一招很见效’”。^①这可能就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因为3月10日军机处咨知理藩院，条约原文已自上海送达北京，现可着手讨论批准事宜。这件咨文结尾处说：俄国“既与中国和好，自以办妥大事为要，不可因小节而迟误大事。所有咨复缘由，相应知照理藩院，转行该使臣丕查照可也”。^②

大约在这个时候，哥尔恰科夫于3月20日（8日）下指示给彼罗夫斯基，令他与中国缔结一项包含八款的新条约，明确给予俄国下列诸权限：对直抵朝鲜满洲沿海的土地主权，沿与中国交界之处进行贸易之权，和在许多城市设立领事之权，以及规定与中国同时在东、西两方勘定边界。^③

中国方面则以极为审慎的方式，否定了《璦琿条约》。2月6日（咸丰九年正月十四日），奕訢收到奕山^④奏折，试图就分界一事为
168 吉拉明阿辩护，并解释穆拉维约夫所拟教授中国青年学习俄语的计划的细节，他建议在阿穆尔河上一处俄国人屯居地教授中国学生。奕山再次提到十四条贸易章程，虽然还是没有详细说明它们究竟是什么。同日，另有一道长的谕旨表示对吉拉明阿的不满，将他撤职，并令奕山将十四条章程据实明白回奏。^⑤皇帝于4月6日（咸丰九年三月初四）收到的景淳与奕山的奏折^⑥中，提到俄国译员希什马廖夫与布多戈斯基等人径赴乌苏里江源头，不顾吉拉

①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2，第245页。舒马贺尔，前书，第303页。伊格纳提耶夫前书，第100页，讲到彼罗夫斯基曾经多次提出俄国将采取军事行动的空洞恐吓。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35，第11页下（咸丰九年二月初六）。——原注文中丕即彼罗夫斯基。——译者

③ 伊格纳提耶夫，前书，转引哥尔恰科夫1859年6月12日（1日）致科瓦列夫斯基函。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35，第26页上。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36，第28页上。

⑥ 《筹办夷务始末》，卷36，第1页上和4页下。

明阿的竭力抗议(他们拜会过吉拉明阿,要求派官员陪他们前往),也不理睬吉林所派官员在他们抵达布拉戈维申斯克时再次对他们提出的质问。布多戈斯基据说提及彼罗夫斯基已经在北京提到了这件事,而满洲官吏们则对此一无所知。景淳要求理藩院向俄国提出抗议。奕山在奏折中^①称许吉拉明阿,并叹息无人可以代替他。奕山奏请该员留任原职,最后并于折内附呈贸易章程一份。

业经议妥的十一款如下:

(一) 通商后两国卖货,俱不征税。

(二) 彼此通商,总须以货换货,勿许赊欠。如有赊欠官员不负责任。

(三) 行使钱票,无论真假,官员不管。

(四) 黑龙江左岸各屯,不得骚扰生事,并应恪守章程。

(五) 货物如有遗失,各国应严密寻访,但不赔货物。

(六) 两国贸易,不得携带违禁货物入境,务须公平交易。

(七) 俄国人务须在江左行走,不得越过右岸,唯于严冬方可 169
在江上冰上行走^②。

(八) 贸易人等不得在市场过夜,必须各回原处。

(九) 如发生斗殴或谋杀,罪犯由各该国官吏自行处置。

(十) 一旦散市,价值不得变更。

(十一) 遗失马匹务须报告,砍伐木材共同斟酌处理。

有争议的三条是:——

(一) 双方均须设立官员,专司通商事务。

(二) 除商贩外,闲杂人等不得在中国市场往来游玩。

(三) 一切船只,务须在中国卡伦报明,设有遗失,以便查找。

景淳对乌苏里问题的意见,迅速得到采纳。因为在4月6日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36，第6页上。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36，第6页为“即冬令亦须由江路行走”。——译者。

或7日^①，在彼罗夫斯基不知道的情况下，中国发出一件咨文给俄国萨那特衙门^②。这件咨文对于穆拉维约夫求赴绥芬和乌苏里提出抱怨，因为这些地方并不与俄国接壤。文内也提到上年俄商在三姓地方的不良行为。咨文讲，鉴于中、俄两国和好多年，“想系木哩斐岳幅^③等借端生事，贵国王未必得知，望将石沙木勒幅等人船撤回，除黑龙江左岸……其余概不得游行占住”。最后，文内还抱怨俄国对中国要求把军械送到库伦的咨文迄未答复，虽然所用的词句不是激烈的。

同日有谕旨^④一道，其中最主要的一节如下：

170

“第该夷狡执异常，必须极力阻止。现已由理藩院行文该国萨那特衙门理论矣。上年奕山允许该夷居住黑龙江左岸，办理已属太易。复经允许赴绥芬、乌苏里会勘地界，致夷酋借词狡赖。若不严行拒绝，吉林一带地方，又为该夷占据，无厌之求，尚复何所底止。至所称丕业罗夫斯奇在京，亦为勘界；不知该酋此来，系为互换和约，（即天津条约）并未言及绥芬等处地界。该夷之言，断不可信。奕山等当告以中国准俄国于海口通商，并将黑龙江左岸空阔地方，许俄国居住，无非欲两国永敦和好，至绥芬、乌苏里等处，原不与俄国连界，若肆意侵占，必致有伤友谊。剴切晓谕，使该夷不致任意要求。至奕山所拟通商条规，内除该夷尚未拟定三条，皆有关系，自应催令速行定议。至第一条，通商后两国卖货，俱不征税，虽系照伊犁、塔尔巴哈台旧章办理，但现在海口，各国皆有征税，若不征税恐与海口章程有碍，且恐各国有所藉口（要求免税），着奕山

① 按照《筹办夷务始末》，卷36，第9页下。咸丰九年三月初四日，按舒马贺尔和后来中国人提到此事时的说法应为1859年4月7日。

② 舒马贺尔，前书，第306页。

③ 即穆拉维约夫——译者。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36，第8页上（咸丰九年三月初四）。

等将此条另行妥议具奏，总须俟奏定后，方能与该夷言明照办。”

奕山另折奏，因吉拉明阿对夷务熟悉，请准暂留本任。吉拉明阿得旨，“著革职暂留本任，仍责令该员力图挽救，以赎前愆。不可再含混了事”。奕山于拟定条规，并不先行具奏，著传旨严行申饬。¹⁷¹穆拉维约夫“如行抵黑龙江，该将军务懍遵谕旨，妥筹办理，毋得再事迁就”。

奕谕就是这样地回复到他的老策略，将遏制俄国人的全部责任推给满洲当局，又不让他们得到任何物资，又不给他们下任何可实行的足以遏制俄国人的指示。显然，中国在北方除去消极抵抗之外，其他一无设想。这不仅体现在4月6日咨文语气非常温和，也体现在4月11日的军队调动中。景淳和奕山在这一天奉命抽调精锐马队二百名，以备调往奉天抵御英国人，因为据信英军或将在该处及迤南一带进攻^①。然而，按照舒马贺尔的说法，则是璦琿副都统吉拉明阿于1859年春季作了“相当的军事准备”^②。

穆拉维约夫把中国人致俄国萨那特衙门的咨文扣住，并复文说，他对于北京朝廷越过在北京的俄国使节径行发送咨文一事感到诧异。他在复文中写道，关于枪炮的咨文，他已向圣彼得堡传递；关于乌苏里的抗议，他也已转给彼罗夫斯基。他请中国派遣自己的代表至乌苏里与布多戈斯基会合^③。这件复文未见于中国档案。

就在此时，穆拉维约夫收到彼罗夫斯基的一封信，内附一张白河上炮台工事和布设在河口的障碍物的图样。他显然是从教士团中一名叫拉夫罗夫的人得到这张图样的^④。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26，第12页上（咸丰九年三月初九日）。

② 舒马贺尔，前书，第307页。

③ 舒马贺尔，第305页。

④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2，第252页。1859年4月18日（6日）穆拉维约夫致科瓦列夫斯基信件。它从来没有传到英法方面。

《天津条约》终于在4月29日互换。军机处4月22日奏报该大臣等“谨议，既未便将汉文更改迁就，即按照用宝清字和约，另172 缮一分，由臣肃顺等画押”^①。随折附呈的条约文本上业已施殊用玺。

虽然如此，清朝朝廷始终没有解决条约文本的混乱。《筹办夷务始末》内所载，于1859年4月24日(12日)互换的条约文字，与俄国官方条约汇编所列的俄文和清文约本只有一些细微的歧异。因此，军机处显然并非象他们在奏折内所说的那样办理，而真是迁就了事的^②。俄国官方条约汇编所载约本^③，被当作大体上就是普提雅廷与桂良、花纱纳所签的那个原文。《咸丰条约》中所载文本，则据称是曾经由彼罗夫斯基与肃顺、瑞常互换过的。可是它与俄国方面的，和载在《筹办夷务始末》上的又全然不同，甚至不同于本书前面几页上桂良与奕訢在他们的公文中引述过的清文本^④。俄国政府认为这些歧异无关紧要，决定不加理睬^⑤。

换约之后，中国人稍微改变了他们对待彼罗夫斯基的态度。他私下写信给伊格纳提耶夫，说他打算设法重订一个新的条约，把《璦琿条约》的各项规定和穆拉维约夫关于贸易的建议都包罗进去，这是鉴于中国人否认了《璦琿条约》，而西伯利亚人^⑥又对于《天津条约》深致不满的原故^⑦。约在此时，彼罗夫斯基必定已经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36，第26页上(咸丰九年三月二十日)。

② 《筹办夷务始末》，关于俄国条约汇编中的中文约本，见坂野正高前书，第300页。

③ 《1689—1881年俄中条约汇编》(1889年圣彼得堡)只列有一种文本。亦见《筹办夷务始末》与《咸丰条约》所载曾经互换的中文约本。此本与原来的文本不同，提到俄国使臣得面晤军机大臣或大学士，也提到一位俄国使节或特命全权大使得与军机大臣、大学士和沿海督抚相对应。

④ 互换文本的第二条漏了这句：当俄国政府认为需要时，可以派遣一位使节至北京。第四条内则包含这样的规定：任何船舶携带违禁物品，所有货物俱应抄没入官。

⑤ 舒马赞尔，前书，第305页。

⑥ 指穆拉维约夫等在西伯利亚当权的人们。——译者

⑦ 伊格纳提耶夫，前书，第20页。

从哥尔恰科夫那里得到新的指示。穆拉维约夫当时则已打定主意¹⁷³，认为由中、俄两国官方交换新边界的地图，是批准《璦琿条约》的唯一符合要求的办法。哥尔恰科夫同意这一计划，认为它可以按照欧洲的法律标准确定对新疆土的吞并^①。

4月25日，肃顺、瑞常奏报已与彼罗夫斯基会晤，共同商定“俄罗斯国有紧要事件派使臣由天津进京”的手续。俄国应于事先行文知照库伦办事大臣，果系平静无事始能获准。入境口岸应在北塘而非大沽。俄船应淀泊在拦江沙外，使节登陆时须换乘中国船只。使臣所经过之处由大小文武官员迎接护送。理藩院把这些咨知俄国政府^②，而没有告诉彼罗夫斯基。他发觉此事时，向肃顺和瑞常提了抗议^③。

4月28日（咸丰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奕訢又作了一点微小的让步。他收到奕山一份奏折，迫切要求在黑龙江实行自由贸易，以免俄人借端寻衅^④。同日降旨准奏，但又谕令奕山面见穆拉维约夫，驳拒他在乌苏里的计谋。如不能办到，奕山必致“自干重咎”。此旨又说，至于彼罗夫斯基，“已与言明界址一事，仍归黑龙江吉林将军核办，与天津所定通商各口和约无涉。”吉拉明阿也受到严谴，如他不能阻止俄船，而听任俄船纷纷下驶，必重治罪^⑤。5月8日（咸丰九年四月初六日），理藩院发出咨文，正式通知俄国政府，说《天津条约》业已批准互换^⑥。

174

这些事正在发生的时候，在布哈拉执行使命的伊格纳提耶夫，就火急被召到圣彼得堡。他虽然在中亚细亚感染热病，但仍于3

① 舒马贺尔，前书，第306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36，第32页下。

③ 坂野正高，前书，第137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36，第36页上。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36，第37页上。

⑥ 《筹办夷务始末》，卷37，第3页上。

月18日动身去西伯利亚。他走得极快,徒步渡过冰已经在开裂的鄂毕和叶尼塞两河,在漂浮的冰块上,从这一块跳到那一块。他的随员包括五位军官:圣伯利伯爵、译员塔塔里诺夫、秘书沃尔夫和一位采矿专家马尔科夫。随从在后的,是运往中国军火的护送大队。

给伊格纳提耶夫的指令是要去执行普提雅廷的方案,由随他前往的具有各种专门军事学识的军官们协助训练中国军队。他所奉指令中,关于清王朝可能倾覆的那一部分,《红色档案》第21卷中有过引述。在这些指示中,他奉到命令:如有一个充分稳定的新王朝兴起的话,他可以着手与之搞关系。他又受到嘱咐,俄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使用武力保卫满人。但是,倘若清帝或皇室的某一成员逃往满洲,并在那里试图自立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统治者的话,那末,承认他的独立的问题就不是伊格纳提耶夫的职责了。“依我们之见,”指示接着说:“我们必须在满洲、蒙古、喀什噶尔,和准噶尔尽可能为取得最大的影响而努力。”然而,指令认为,鉴于自彼得大帝时代,直到最近两次订约,俄国“对于当今王朝的各项条约和少数几次外交交往是遵守信用的”,我们认为在一切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让满人继续留在中国皇帝的宝座上是可取的。至于指示中还提到些什么,我们就不能确知了。看来伊格纳提耶夫所奉命取得的东西,除阿穆尔、乌苏里江的疆界,和后来在《北京条约》到手的一切之外,还须加上俄国在库伦、张家口、北京、喀什喀尔和天津设立领事馆的权利,和在中华帝国境内到处贸易的权利。从他到达北京时所提出的建议中,可以视为就是如此。^①

175 伊格纳提耶夫于4月8日到达伊尔库茨克,并会见了穆拉维约夫。这两个人情投意合,很快就商妥有理由把原来要给中国的武器挪交给穆拉维约夫使用,因为他的部队短缺枪械。这批武器

^① 伊格纳提耶夫,前书,第196页并参看其他。

共装三百八十辆大车，其中包括一万支火枪，一百六十万发子弹（有米尼式的），伊格纳提耶夫还带有五十万卢布，以备支付给北京朝廷。^①

为新使节进入中国，向德勒克多尔济递交了申请书。他告诉俄国边界委员卡尔波夫，一定得等着北京的答复。结果伊格纳提耶夫就留在恰克图^②。

5月11日，他还在那里的时候，一个名叫希特罗沃的信使，从北京带来一封彼罗夫斯基的信。穆拉维约夫5月14日（2日）给科瓦列夫斯基的信中提到此事时说：“……彼罗夫斯基向中国钦差大臣提出几项补充《天津条约》的条款，即自乌苏里至大海的边界和发自恰克图的商队贸易两项，以及我们在各城设立领事馆；但是，钦差大臣们答复乌苏里边界事属吉林将军管辖，贸易事宜须在恰克图商议；不过，关于这次商谈还没有任何形成文字的东西。从这封信上看，彼罗夫斯基必定已在他致哥尔恰科夫的公文中报告过中国拒绝接受俄国所提供的武器。因为穆拉维约夫为此在信上写道：‘中国人呆头呆脑，竟然拒绝接受我们的武器，这使我深为惊讶……不管怎么样，这些漂亮的枪械仍然保留在我们手里，我倒是非常快慰的’。同日，穆拉维约夫又写信给哥尔恰科夫，说他拆开彼罗夫斯基于4月27日（15日）致外交大臣的最近的一次公文，因为直到那时为止，他还没有接到彼罗夫斯基得到给他本人的任何报告。他在信中还说：没有料到中国钦差大臣竟会拒收这些武器，并且真的这样干了。因此，一万支来复枪将留在上乌丁斯克，即这些枪支现在储存之处”^③。

这些信件写就后，5月14日（2日），穆拉维约夫离开恰克图 176

① 伊格纳提耶夫，前书，第19—20页，列有全部军械的单子。

② 舒马贺尔，前书，第304页；巴尔舒科夫，前书，卷1，第552页。

③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2，第264—266页。

下驶阿穆尔河去查勘新的领土，并和布多戈斯基一伙人会合^①。

关于伊格纳提耶夫的到达，德勒克多尔济给皇上的奏折 5 月 14 日也送达奕訢^②。奏称：

“俄罗斯送到咨文，声称彼罗夫斯基之父病故，改派伊格纳提耶夫进京更换，并有公文一件，遣使进京面交等语。当即面询该玛雨尔^③，既欲复行遣使进京，有何要件？据玛雨尔述称：此件公文，系到京后面交之件，且有口传之事，复有送交大学士文一件等语。应照新章沿途护送外，呈文内并称，穆拉维约夫率兵由黑龙江，赴朝鲜东界^④，便中将炮位运赴京城，换回彼罗夫斯基。其火枪一万杆，应由何处运送？并闻英、法二夷，亦欲进京，此项枪炮，足资捍卫。当即晓谕该玛雨尔，外国遣使，均应请示大部，部复未到以前，自应驻候。即将斥驳咨文，交玛雨尔带回。伏思俄罗斯遣使进京，若只用库伦斥驳，难保不另生枝节，可否由理藩院行文萨纳特衙门，库伦一体咨驳。”

批复德勒克多尔济这件奏折的谕旨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仅说道：“其俄使彼罗夫斯基因事回国，欲派伊格纳提耶夫来京一节，现已互换和约，自难阻止。”谕旨将《天津条约》抄给德勒克多尔济一份，并令他详阅其中的章程，以便接晤伊格纳提耶夫。这道谕旨也表明奕訢——和军机处——都仍在期待并且需要俄国的武器，
177 因为文内还提到如果武器果真到达天津，它们应由沙船驳送上岸，俄船不得进入港口^⑤。同日，降另一谕旨给德勒克多尔济：如武器

① 巴尔苏科夫，前书，262—264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 37，第 3 页下（咸丰九年四月十二日）。

③ 来使军官为少校（Major）此为音译——译者。

④ 《筹办夷务始末》，原文朝鲜东界尚有“雅阜尼国”，作者引文内缺——译者。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 37，第 4 页下，5 月 14 日。军机处负责草拟谕旨，按照坂野正高的说法，此件已经批准。

运到库伦，立即奏闻，并指示现在天津任钦差大臣的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武器运到时如何接受它们^①。

僧格林沁和直隶总督恒福在一份奏折中对于英、俄可能勾结表示了担心。此折于5月18日递送奕訢^②，内中奏报英国轮船八只护送该国使臣到津。而“今俄夷进呈军械，难保无夷人暗有密约”^③。奏折建议：如俄夷人等确系护送武器，可以使他们由北塘进京，经此路行走，不致令他们窥见主要的防务布置。奏折最后提出迫切要求：赶紧多发一些火枪、弓箭等等。就这份奏折看，似乎表示写奏折的人未始不欢迎俄国武器的到达，以有助于他们抵抗英国人。批复这件奏折的上谕，只说待俄国武器到达另行降旨^④。

就现有资料观察，很难解释拒收武器的事。在未有进一步的证据之前，只能提出两项假设。或者是北京的反俄派蓄谋在奕訢不知道的情况下，故意向彼罗夫斯基提出了拒绝接受的意思；再不然就是——这比较不可靠——自己承认拆开过彼罗夫斯基致哥尔恰科夫公文的穆拉维约夫，在这件公文里加进了假造的东西。穆拉维约夫于5月14日（2日）致海军大将康斯坦丁的信件^⑤，和伊格纳提耶夫的陈述：肃顺先直截了当拒收军器，后来又要求等待战争结束之后再把它们送来^⑥，无论就上述两种假设的哪一个来说，都不足成为确证。赫德所传的故事（见本书第189页），似乎只可表示中国人自己真的拒收过，但这不过是根据谣言。御史尹耕云178于1859年6月中的一份奏折警告不要接受俄方军器，是从中国资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37，第5页下。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37，第8页上（咸丰九年四月十六日）。

③ 作者原引《筹办夷务始末》卷37，第8页，英文中有节略。——译者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37，第9页上。

⑤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1，第555页。

⑥ 伊格纳提耶夫，前书，第56页等。

料中能够找到的反接受的唯一具体证据^①。伊格纳提耶夫的说法则似乎有些道理。他说肃顺和瑞常两人在他们领会到彼罗夫斯基把致送武器和另订新约两事联在一起的时候，拒绝了俄方提供的武器^②。

奕山于一份在5月25日送达奕訢的奏折中，奏陈黑龙江省“兵单，军械不足”，如令抗拒俄人，“其患不可胜言”^③。奕訢在该折上批示：“着与惠亲王等同看，并与景淳同看，问伊拒绝有何把握”。同日，又降旨谕令吉拉明阿阻止俄船（并无特殊办法）于绥芬、乌苏里航驶或上溯松花江至三姓。并着署吉林省将军特普钦委派委员，在吉林与黑龙江交界地方，严密侦察，俄船若到即“正言拒绝”，不得令其进入吉林省内^④。

在此期间，彼罗夫斯基提出他的另订新约方案，并且把由穆拉维约夫退回的一件中国外交咨文（4月7日发），连同俄方的抗议书，一并交给中国礼部^⑤。军机处为此于5月25日咨知彼罗夫斯基，其文如下^⑥：

179 “为咨复俄国使臣丕（彼）查照事，前于三月初五日，由理藩院行知贵国萨那特衙门文书一件，为贵国人有人在吉林省三姓地方滋扰生事，恐因此致伤和谊，故特行知贵国查明。乃今贵使臣丕（彼），由礼部将理藩院所行文书送回，如此行为，两国之情不能相通，必致误事。况三月初五日，尚未互换和约，

① 尹耕云：《心白日斋集》第1卷。

② 不过事实还是我们在中国资料中没有证实肃顺曾有过拒绝的情况。亦见第4章第274页末，脚注③。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37，第13页上（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37，第14页上。景淳为商谈已在北京。

⑤ 《退回的理由是：这件咨文应给俄国外交部，而不是萨那特衙门；咨文发出时没有知会彼罗夫斯基；且照会由军机处具衔，而不是由军机处领衔王大臣或大学士具衔。

⑥ 《筹办夷务始末》，卷37，第15页上（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自应照旧办理，并无不合，何以送还？贵国来文，我国从未有送还之事，至文书内有笔误之字，系属无意。彼此和好，此等小节，可毋庸谈，惟三月中，我国由理藩院所行之文书，实系要事，虽已退还，今仍须行知贵国，应交贵国何处衙门，即刻答复，以便交贵使臣。

贵使臣前送来之八条，本处逐条答复如下：

1. 绥芬、乌苏里远离俄国边界，俄国人不得前往。黑龙江交界之事，因京中不能知其情势，应由我黑龙江将军办理，自康熙年间，鸣炮誓天，中国与俄国以兴安岭为界，至今相安已有数十年。乃近年贵国有人在黑龙江附近海岸阔吞屯等处居住，该将军念两国和好之谊，不加驱逐，暂准居住空旷之地，已属格外通情。今闻往吉林地界，该处据兴安岭甚远，并不与贵国昆连，又非通商之处，断不可前往，致伤和好。

2. 专派大臣赴恰克图详立章则之请，现伊犁、塔尔巴哈台、恰克图均有办事之人，毋庸更改旧制。

3. 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处立界等语，该两处均有向来定 180 界，应毋庸议。

4. 陆路贸易一事，恰克图本有贸易，其他陆路应毋庸议。中国人并无欲在贵国内地销货、^①盖房、买地之事，贵国亦应照定例，在恰克图等处贸易，不得在别处陆路贸易。

5. 伊犁、塔尔巴哈台二处，今已通商，其喀什噶尔、齐齐哈尔、张家口均系和约内所无之处，不可前往通商，应照和约办理，至欲于该处授执事官一事，亦毋庸议。

6. 由驿送信一节，现已屡次往来派官护送，并无迟误，既在《天津条约》之内，以后自应续办。^②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 37，第 16 页，第 4 条系“运物”与原文不符。——译者

② 《筹办夷务始末》，为核办。——译者

7. 从前历次所立和约,现应复行核修为要等语。今和约已经互换,如欲核修,应照康熙年间所定,以兴安岭为分界,不准互相侵占。俄国于黑龙江两岸阔吞屯(马林斯克)及其余空旷地方仅许借予居住。

8. 遣使往贵国一节,和约中所不载,未便议及。

以上八条约已由钦派大臣瑞、肃当面向贵国使臣逐款说过”^①。

181 从这件答复,显然可以看出彼罗夫斯基提出的新条约都是些什么内容。这件答复也标志着中国的态度进一步强硬了。

5月27日,奕山、特普钦、齐齐哈尔副都统那敷德,和吉林船厂副都统禄权^②的联合奏折送达奕訢,其中报告俄人又在乌苏里江添占了四处地方。奕山还单衔奏称,希什马廖夫率领人众至乌苏里江口中国卡哨,命令该处官员派人同往兴开(凯)湖勘定边界,并且声言如不照办,彼等自占地地方。吉拉明阿再次要求穆拉维约夫飭令下属不得再行扩占,一面又令沿江驻卡官员,“再行设法阻拦”^③。奕山与那敷德又具奏请求,以后有关吉林之事,不由他们奏闻(换言之,即俄国渗入乌苏里,他们不再协同负责)^④。同日有道谕旨描绘俄国人的行径为“尤属狡执可恶”,责备一切困难总由奕山开头允借黑龙江左岸引起,并再度斥责奕山现在的行事。奕山的奏请虽已获准,但责令他与吉拉明阿亟图补救,不得希图将责任推御给吉林^⑤。

5月28日,军机处咨送另一复照给彼罗夫斯基,从中可以看

① 伊格纳提耶夫在《有关伊格纳提耶夫出使中国的材料》中证实,大约就在此时,满人提出了这一套争论理由。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37,第17页上(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37,第18页下。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37,第19页下。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37,第20页上。

出他在那几周之中，为议订一项新约而提了许多建议^①。该文如下：

“军机处……^②据贵使臣咨文……已悉一切^③……此次贵使臣来京，专为互换和约，尚书肃、瑞，亦只专办此事。此外原 182
无可议。所以将前此八条（逐款咨复）兹据贵使臣丕（彼）声称，一年内，由两国派可靠之员，会合在恰克图，商定应办事件等语。查陆路通商地方，本有各大臣办事，无须另派。至新议通商各海口，查《天津和约》内载，贵国有驻扎七处海口通商之大臣，与中国地方大员商办，更无须另派。即如黑龙江地界，须该将军办理，京中不能知其形势，碍难悬定。此次贵使臣到京，原为互换和约而来。查和约十二条内，并无驻扎在京之语，将来通商各事宜，总须在各海口，由该督抚商办，方能妥协。今该使臣已经换约，京中实无可办之事矣，至中国与俄国边界，康熙年间，鸣炮誓天，以兴安岭为界已有百余年，从无互相侵犯之事。今黑龙江将军，以附近海岸阔吞屯等处，许俄国人暂住，已是格外通情，岂能又占至吉林三姓地界？所有黑龙江空旷地方，本非俄国之地，何以说要永远属于俄国？若说他国要侵占沿海地方，中国自有办法。总之，中国与贵国和好多年，现又新换和约，从此当益友睦，各守信义，方能彼此有益。我等并非畏劳不办，如条约所有之事，自有各口大臣会同贵国来使商办，其条约所无之事，断难纷纷添出。至贵使臣送来木哩斐岳幅行理藩院之文件，本处业经收悉。其文内所指各地址。俱系黑龙江地方，京城不便断定，亦无从咨复。仍应由黑 183
龙江将军与贵国大臣秉公商办，烦贵使臣回国，告知木哩斐

① 包括对三姓地方的要求——不过，关于此事俄国资料中没有材料。

② 引文与《筹办夷务始末》对照有所节略。节略号为译者所加——译者。

③ 提供的日期（咸丰九年二月初八）显系错误的。

岳幅可也”^①。

6月10日递到的特普钦奏折，提议禁止俄国人在阿穆尔河下游通至海之路航行，并说黑龙江省应与吉林省同力抗拒俄人（是否使用武力则不清楚）^②。同日的谕旨没有采纳这些建议，而责令吉拉明阿告知俄人，中国当局现已查明吉林地方并非与俄国接壤，不应容许俄人在乌苏里屯居^③。6月11日，特普钦奏报德勒克多尔济秘密通知他说穆拉维约夫拟携带进呈的枪炮，经阿穆尔转赴天津。他已命令富呢扬阿^④阻其前进^⑤。同日有旨批示，除非穆拉维约夫折入乌苏里或松花江上游，毋庸采取此一行动^⑥。

彼罗夫斯基此时继续他的努力。6月12日，军机处送给他一份咨文，这次的语气是公开的愤懑了^⑦。

“（办理）军机处咨复俄国使臣丕（彼）查照事，今据贵使臣由礼部送来咨文一件，本处细阅贵使臣所提八条，前已逐条咨复。又尚书肃、瑞当面说明。迄今半月之久，何以复提此事？殊不可解。至黑龙江地界一事，应由黑龙江将军，会同贵使臣办理。此次大学士桂等至上海，原系为互换和约前往。至通商之事，皆系各该管地方官办理。恰克图等处，亦有本地方官，该管办事大臣，会同贵国使臣办理，本处前已咨明，无可再议。现在海口通商，均有《天津条约》可遵，中国以信义待人，但知守约，并无他意。”

坂野正高引述现存台湾未公布的档案，证明肃顺与瑞常二人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37，第21页上（咸丰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38，第5页上（咸丰九年五月初十）。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38，第6页下。

④ 富呢扬阿系三姓副都统一——译者。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38，第8页下。

⑥ 《筹办夷务始末》，卷38，第9页上，这就表明奕訢仍然要军械。

⑦ 《筹办夷务始末》，卷38，第9页下（咸丰九年五月十二日）。

都不愿与彼罗夫斯基会谈。彼罗夫斯基为此曾经三次向军机处发过牢骚。他宁可与军机处往来行文商谈他所提的新条约。而在一些比较次要的事情上,他才与礼部往来行文。^①

这里也许应当提到彼罗夫斯基使团成员的行为。他们在中国人当中似乎已经激起愤怒,但是他们却始终未曾受到过中国官方的限制。御史尹耕云上奏(可能是在彼罗夫斯基到达北京后没有多久呈递的),诉说新到使团人数比以往历次都多,而且其中有些俄人竟然爬上城墙,或收买军器马匹。这些显然都不是从前的教士团所敢干的。尹耕云为此奏请飭下理藩院和京营巡捕实力约束,并将逾额人员押解送回俄国。1859年2月4日,奕訢又看到钦差大臣蒙古镶黄旗都统胜保和安徽巡抚翁同书措词激烈的进一步诉屈。他们甚至主张处决彼罗夫斯基,或将使团全部拘禁,然后遣返回国^②。

这些奏折上的意见都未被采纳。引出这些奏折的原因,也许只是由于彼罗夫斯基僚属中的世俗人员人数较多,而且更富于冒 185
险精神,因而激起中国排外分子的反对情绪。据罗马天主教所派主持直隶教区本堂的蒙尼神甫给葛罗的报告,俄国人在北京行动自由,行为端正,身穿欧式服装(显然是不以宗教为职业的俗人才这样)^③。1859年5月间,赫德得到一份情报:北京有一百多个俄国人,他们爱干啥就干啥,惹得排外派很不满^④。俄国信使之一也告诉穆拉维约夫,他获准要到哪里就到哪里^⑤。

① 坂野正高,前书,第136页。

② 这两份奏折坂野正高都充分地描述了。前书,第130页,并引述了尹耕云前书。

③ 柯尔迪埃:《1859—1860年的远征中国》(1906年巴黎)第45页。

④ 《关于额尔金勋爵1859—1860年赴华特别使命信函》,一百这个数字确实是夸大了。

⑤ 巴尔苏科夫,前书,卷2,第297页。

另一方面,伊格纳提耶夫在《有关伊格纳提耶夫出使中国的材料》一书中招认了,彼罗夫斯基本人见不得人的行为使俄国人声名狼藉。书中暗示彼罗夫斯基时常出入酒楼、眠花宿柳^①。这种招认更由 1859 年 5 月 29 日彼罗夫斯基在崇文门挨了石头这件意外之事而被证实。当时他向军机处诉苦,由礼部答复他:如果他们依礼而行,将不致在街上受辱。这应该指出,如果没有原因,中国官方的函件一般是不会拿外夷的礼节当个题目的^②。

6 月 16 日,有一件特普钦^③呈递的折子,奏称驻扎阿穆尔与松花江会合处的营官来报,5 月 27 日(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有夷人一伙在该地出现,自称系奉穆拉维约夫之命上溯松花江至三姓、阿勒楚喀与吉林。他们扬言至死也要去到那里,并且拒不听任何劝阻。穆拉维约夫本人也在瑗珲露面,声言拟取道往乌苏里和绥芬视察。他说他生怕英国夷人要来抢夺这片地方,并且拿
186 出一张地图指出他打算在那里会见从吉林派去的官员。他将在那里等候一个月,如届时不见人到,他必赴天津。接着又有一份奏折报称穆拉维约夫业已下驶,一切劝阻概不听从^④。

奕訢的反应是在同日降谕,将奕山褫衔,暂留本任,吉拉明阿革任,并着特普钦派人将其捆拏枷号,于乌苏里地方示众。又着特普钦严斥俄国人,并将吉拉明阿向他们出示,“使见吉拉明阿……自必气馁^⑤”。又密谕:乌苏里地区居民,不得与俄夷往来,此节务

① 伊格纳提耶夫,前书,第 170 页,也说到彼罗夫斯基的哥萨克喝醉了酒还把妇女从她们所乘的车辆里拖出来。

② 坂野正高,前书第 131 页。他依据尚未公布的档案资料描述了这件事,但是上文内的斜体字和评论则是本书作者的。伊格纳提耶夫自称他一贯行事谨慎,因此从未觉察到任何干扰。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 38,第 10 页上(咸丰九年五月十六日)。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 38,第 11 页下,穆拉维约夫打算在波谢特湾等候满人。

⑤ 引文中缺一句,节略号系译者所加——译者。

必布置完毕,但亦勿使俄人发现^①。

6月22日,特普钦另折报称,乌苏里江江口卡所人员因寡不敌众,不得不让大帮俄人驾船载粮驶入江内,并允许少数小船上溯松花江^②。复旨仅着其慎防俄人,并以当地居民起事相威吓^③。

伊格纳提耶夫于6月4日(5月23日)在盛大的送行仪式下,离开了恰克图。这一仪式规模远较他们给彼罗夫斯基的为大。恰克图全城的俄国人几乎都在礼炮声中陪送他走过边界。他的属员已经减至四人,即巴留捷克·沃尔夫、塔塔里诺夫与蒙古译员本布夫。另外还有五个哥萨克作警卫,其中的一个是布里雅特人。其余所有官员和装备连同携带的卢布都留在西伯利亚^④。

6月7日(5月26日),伊格纳提耶夫到达库伦,受到德勒克多尔济的很好的款待。伊格纳提耶夫向他送了礼品,虽然他们并未亲自会面。6月27(15)日,伊格纳提耶夫到达北京。彼罗夫斯基于¹⁸⁷30日(18日)起程返俄。巴拉第与原教士团的教士们也早已离京,并在蒙古途中遇到伊格纳提耶夫一行人众^⑤。

自《天津条约》订立迄至伊格纳提耶夫到达北京的十二个月当中,英国政府在掌握俄国为对付中国所采取的一切行动的情报工作上,并没有多少改进。沃德豪斯勋爵于1858年5月底卸却驻圣彼得堡大使的职务。正如我们所知,使馆代办劳瑟于8月21日以俄国订立《天津条约》的初步消息,电告马姆斯伯里勋爵。8月23日,他在公文中向马姆斯伯里续报,俄国人还在“璦琿”订立另一条约,从而取得阿穆尔江左岸的土地。但这已是他所知道的全部消息

① 《筹办夷务始末》，这则谕旨的全文《关于额尔金勋爵 1859—1860 年赴华特别使命的信函》中有完整的译文。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 38，第 25 页上（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 38，第 26 页上。

④ 伊格纳提耶夫，前书，第 33 页。

⑤ 同上，第 33—41 页。伊格纳提耶夫的头衔在那一阶段俄国并未明确规定。

了。英、俄关系这时却比过去有所好转。新任大使约翰·克兰普敦爵士于8月底到达圣彼得堡就职时，即与哥尔恰科夫会晤。他向外交大臣报告说：“他与我作了长谈，并以显然满意的心情提到俄国与大不列颠在政治关系方面的改善。虽然我们所谈只限于一般性的议论，我乐于证明会谈的语气是坦率而友好的，（俄国大臣）阁下的发言也以敏锐和得体而显得出色”^①。

1858—1859年整个冬季，尽管外交部对俄国在高加索镇压部族叛乱的战斗也确实表现了好管闲事，但却对俄国在远东的事务表现不感兴趣^②。对任命彼罗夫斯基一事，哥尔恰科夫不透一点声气，克兰普敦也显然连听也没有听说过这事。1859年2月，哥尔恰科夫不让英国政府在兰皮书中公布俄国与中国、日本所订的
188 条约，就连普提雅廷向额尔金透露过的，他与中国当局的外交信函的细目也不能公布^③。

3月16日克兰普敦简短地汇报了伊格纳提耶夫的任命，年俸为四十万卢布（七千英镑），他并于4月14日将摘自《圣彼得堡报》，宣布在阿穆尔建置正规行政单位的一件沙皇诏谕送去。另外，他还附去一份得自秘密来源的关于俄国人在这一地区定居的情报。这份文件未附地图，很简短，是用法文写的。它没有指明是否已经占领了这片地方，也没有提俄国人正在向那里移殖，只说阿穆尔地区现有一万个俄国屯居者，1859年还要再送来一万五千人。俄国人意图在河口继续构筑防御工事系统，并建立造船厂^④。

传到在中国的英国人耳中的消息，同样也是含糊的。发给额

① 英国外交部档案。65/518, 29.8.58。

② 切尔克西亚（位于黑海边的高加索地区西北——译者）是沙皇与克兰普敦于11月14日会谈的题目。布隆诺夫与马姆斯伯里于10月28日或更早一些时谈的也是同一题目。（英国外交部档案，65/519）。

③ 英国外交部档案65/534。

④ 英国外交部档案65/535。

尔金勋爵之弟，派往中国互换《天津条约》使团首脑卜鲁斯的指令中，也没有提到俄国。卜鲁斯于1859年5月4日写信给马姆斯伯里说：

“依据大体真实的传闻，一个具有相当地位的俄国使团业已到达北京。它的成员身穿欧式服装，往来街市，未受阻拦，使团主要成员和中国政府之间就礼仪问题已经举行了会谈，据传在会谈中俄国人已从他们最初提出的要求让步。来自北京的消息，都得自当地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给他们的天主教的报告。其中大概只包含一些在北京街头巷尾所传关于这些事情的流言。阁下向圣彼得堡方面探询，谅可得到远比我们在中国沿海所得更为可靠的情报”^①。

（应当注意，俄国驻北京的教士团成员，向来只穿中国服装。伊格纳提耶夫到达之后才逼他们改换衣饰，此事不会早于是年7月。）

5月30日，卜鲁斯写信给马姆斯伯里说：“一个从北京回来的 189
人报告，皇帝圣意莫测，当时还谣传在北京的俄国人已全被屠杀”。卜鲁斯附呈一件他于5月22日收到的赫德来信，其中提到“一位有名气的广东人刘先生”曾去拜访他，并且描述了北京的排外气氛。刘说中国人已经完全拒绝俄国人所送的一万支枪。因为生怕这会带来同等数目的俄国人一齐进入北京。3月2日他说有一位俄国大使访问北京，那里已经有一百多个俄国人，任意在街上乱闯，使皇帝和排外派深为恼火。“有人还怕，如果英国人真的进来了，他们定会照俄国人已经据为己有的东西，加陪地敲榨。俄国人抢到一寸，英国人是会勒索一尺的。”^②

法国政府关于俄国与中国签订条约的消息，一点不比英国灵

① 英国外交部档案 17/312。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

通。可是，正由于他们的无知，对于中俄条约并不耽心。中法《天津条约》不仅被看作法国的一项胜利，而且还被认为是法、俄两国协调的成功。瓦列夫斯基于1858年9月22日密函蒙特比娄^①说：“同中国签定条约是一件大事”而且他非常欣赏俄国驻法大使基谢列夫，这位大使真正希望保持法、俄两国之间的亲密联系^②。蒙特比娄则于1858年8月27日以毫无嫉妒的语气向瓦列夫斯基报告了《璦琿条约》的订立。他写道：

“穆拉维约夫伯爵将军方面正在结束中，俄关于阿穆尔河流域占有权的长期悬而未决的争端。圣彼得堡的公众还不清楚这些最后协议的细节。大家仅仅知道这个协议保证俄国全部占有这条河流过的广阔、肥沃的土地的左岸，俄国政府对穆拉维约夫将军缔结条约的成果极为满意”^③。

190 总之，葛罗离国再度赴华时，就象卜鲁斯一样，对于俄国问题没有得到什么官方指示，然而在1859年3月27日他却写信向外交部报告俄国驻北京教士团任命的消息。他是先于卜鲁斯从中国的基督教徒那里获悉此项消息的^④。

美国与俄国保持着友好的情谊，并一直维持下去，直到1859年6月，为的是发展美国在阿穆尔河地区的贸易。对于这一地区的情况，美国比英、法都灵通。但是，却没有把它所知的情况让英、法两国的外交当局分享。

在柯林斯1858年2月离开阿穆尔以前，他已经指定在他离任

① 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译者。

② 法国国家档案馆藏档，C类，卷号 ABXIX3102，第636号信件。这种联系当时正处在高潮。蒙特比娄是驻俄外交使团当中在亚历山大二世诞辰庆典第一天唯一被邀参加的人（亦见法国外交部档案，俄国组，第217号，蒙特比娄致瓦列夫斯基，23/7/58）。

③ 法国外交部档案。

④ 科尔迪埃，前书，卷2，第45页。

期间由乔治·顾盛任副领事。同年10月,柯林斯再度赴俄,于11月21日从圣彼得堡写信给卡斯讲,穆拉维约夫下令东西伯利亚的学校教授“美国语言”,并任命蔡斯任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副领事,让乔治·顾盛返回原任所^①。不过,不管是蔡斯还是乔治·顾盛这一期间都没有送回什么消息,而柯林斯本人则未能再返阿穆尔。

美国驻圣彼得堡的新大使皮肯斯于1858年7月接任,受到俄皇和皇后“极其和蔼”的接待。俄皇并告诉他,俄国与中国缔结了一项条约。可惜,未谈及始末。8月26日,皮肯斯致卡斯的信写道:

“哥尔恰科夫公爵……前天即本月11日〔原文如此〕前来拜会,并在谈话中提到我们两国在中国的相互利益。他还提到沙皇陛下政府的驻华公使,与我们的公使列卫廉一致行动。两国的船舰也并泊在一处。我说皇帝陛下曾经告我,他的驻华使臣业已与中国缔结了一个条约。陛下并且表示他是在我觐见的前一天知道的。哥尔恰科夫立即答道,皇帝也告诉过他已向我国提到此事。但是事情并不完全确切,因为那不是两国之间的普通条约,而只是关于两国内陆某些地方事务的一 191
项特殊条约。据我从他那里理解,这个条约也许是由一个特别代表或地方长官为了局部目的而签订的。我推测这可能涉及中俄两国之间的内陆交通事宜,但我也没有去追问。他向我提到此事似乎是因为他要我晓得皇帝所告诉我已经定了一个条约的那番话,也许使我产生了误解。他还用这种意思来打动我:即他的政府热切希望我们两国应当在我们的对华谈判中,以亲善和互相谅解的精神一致行动。我答复说,我深信我的政府的意向也认为事情正应当是这样。附记:8月21日

^① 美国国务院档案,美国驻阿穆尔领事报告。

(原文如此),昨晚我得见哥尔恰科夫致蒙特比娄的一件照会,宣布英国、法国,也许还有俄国的对华条约业已订妥。关于美国的我尚未得确实消息”^①。

9月10日,皮肯斯又写信给卡斯说:“我现在要说明,我认为俄国所订条约已使阿穆尔河成了俄国与中国的边界……,此外,还可以设想,俄国所订这项条约在内地贸易和中华帝国的心脏地区的商务方面,将会给它以巨大的利益”^②。

一般说来,皮肯斯似乎对于俄国当前的潜在力量过份估计。9月11日,他写信给卡斯,详细议论“俄国将来可能在英属印度获得进展”。10月20日,他又写信告诉卡斯,科瓦列夫斯基在与柯林斯的一次会晤中,力言俄国不久即将从“阿穆尔河转折处”建造一条大铁路直达江口^③。

尽管俄国与美国关系良好,俄国密探还是私拆了皮肯斯的公文。他于10月24日向国务卿报告,他确信哥尔恰科夫之所以要改正他关于对华条约的印象,只是因为美国大使馆的文件已经被偷看了,他知道了条约的事业已报告美国总统。“我听说我的公文任何时候都可被人私拆,或者在这里,或者是在英国或普鲁士。我
192 想不出他为什么这样做,除非他已经得悉我向总统报告了。”^④

与此同时,卡斯于10月25日通知皮肯斯,总统以极为满意的心情,看到沙皇陛下派赴中国的使臣普提雅廷伯爵一直待人彬彬有礼,特别是这位官员后来在天津为列卫廉先生提供乘坐俄国汽船《亚美利加》号的方便。我为此请你早日找个机会用适当的言语,向俄国政府表达总统对普提雅廷伯爵一番盛意的谢忱。关于

① 美国国务院所藏手稿。35/18。

② 同上。

③ 美国国务院所藏手稿。

④ 同上,皮肯斯没有放秘密文件的保险库,显然也设有专门设备来放置使馆的文件。他和他的后任都抱怨薪水不够用(见皮肯斯致卡斯函 1859年6月27日)。

私拆公文事，卡斯仅说必须为应付这类坏事想出些办法。^①

关于阿穆尔的更确实情报，只在1月间才到达皮肯斯手里。当时有两个美国公民，奥托·埃斯奇和雅各比，从那一地区行抵圣彼得堡。他们随身携带一张“极为明细的地图”，和乌苏里江现已成为中、俄两国边界的消息。他们还说松花江上的三姓城有八万居民。^②12月或1月间的某天，国务院必是为了美国派赴中国互换中美《天津条约》的使节华若翰的事，召见过俄国驻华盛顿公使，虽然档案里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因为据皮肯斯于1859年1月13日向卡斯汇报，哥尔恰科夫告诉他“新近”任命彼罗夫斯基为驻北京外交代表之事，又说彼罗夫斯基业已奉命就他力所能及为华若翰将军去北京提供一切便利，并且为华将军办理“一个最友好国家在这种环境下能够办的任何事情”。不知为了哪些原因，皮肯斯以为彼罗夫斯基的名字是“彼罗茨基”。自此以后，国务院、皮肯斯本人，或者华若翰发出的有关公文，都这样称呼他。哥尔恰科夫在答复皮肯斯的询问时说，俄国在过去很长时间内，在北京有一个神职代表。这个代表隔四年（原文如此）调换回国。显然，可能哥尔恰科夫实际上说是十年一换，而皮肯斯搞错了。很清楚，皮肯斯在俄国事务的大海中有有些茫然的。他在这件公文中继续写道：“我愿再说，我有一切理由相信这个政府必将立即利用它在对华关系中的全部特权，不仅着眼于控制利润丰厚和庞大内陆贸易，而且还着眼于控制从与那个广阔帝国交往中得来的全部政治权力。这不光会影响东方的命运，也必将使俄国因此而对于欧洲未来的权力平衡，获得更牢靠的控制”。皮肯斯也认为阿穆尔铁路是个极感兴趣的计划。他为此力促美国修建太平洋大铁路，因为这条铁路“将给我们带来亚洲沿太平洋各国，特别是中国的有价值的并具有世

193

① 美国国务院所藏手稿，77/136。

② 美国国务院所藏手稿，35/18，皮肯斯致卡斯函，10/1/59。

界规模的贸易和旅行的方便”。2月3日，他又发出一件公文，其中谈到欧洲的权力平衡，并在结束时说俄国“现已摆脱与奥地利的一切牵扯，对英国和法国也不亏欠什么，而且即使他们都联合在一起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改变俄国的边界和领土……。这里的朝廷现在已是全欧洲都应当面对的现实，因为俄罗斯将成为大家最后的仲裁者”^①。皮肯斯直到秋天，还没有得到关于中国的进一步消息。

^① 美国国务院所藏手稿 36/18。

第四章 1859年6月至1861年1月： 伊格纳提耶夫的使命与 《北京条约》

194

正如序言所说，本书并未打算写伊格纳提耶夫出使的全部材料，因为这些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与报告中都已经有了。舒马贺尔的文章中也有此次出使的简史。这些材料中一些较小事件，日期有时会差一天；但在其他方面都是互相吻合的。伊格纳提耶夫的《回忆录》和报告又与《筹办夷务始末》对证相符。坂野正高根据布克斯盖夫登的著作和中国档案，把伊格纳提耶夫在北京自1859年6月至1860年5月的谈判，整理成一份很有趣的材料。而且，在此之前还有马克·曼考尔所作的另一个记载。因此，我只须为伊格纳提耶夫自1859年6月至1861年1月期间的活动作一番略述，并使我自己的工作主要限制在从中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资料中提出新的材料。我将把注意力集中指向伊格纳提耶夫和舒马贺尔著作中的某些资料，首先是和那些与不熟悉俄文著作的权威们历来所说的有抵触的地方。

收入本书的新材料，大部分是关于俄国人和中国人在东北边界所进行的活动。这里先概述一下这些活动在1859年春至1860年所采取的方式。俄国人继续对松花江上游三姓地区感兴趣（这我们已在第三章内提到），并且为在那里贸易进一步作了一系列的尝试。他们似乎是奉穆拉维约夫之命这样做的。他的目的也许不仅仅在于贸易，而可能是为了进一步侵占土地进行窥探。不过，由于我们所得俄国方面的材料不够充分，对于这一点，只能出之推

测。不管怎样,当中国人明白表示将要抵抗的时候,俄国人就收缩了他们在这个地区的远征。

对于抵抗俄国人占领滨海省,并把他们的军事哨所逐出阿穆尔左岸,满人也作了一次努力,但不是全心全意的,也没有什么效果。他们还筹划假如俄国人进一步侵入满人祖宗发祥之地,就予以反击。在那一年半当中,双方在东北方面,某种程度上关系是紧张的。直到中国人相信已经不可能把俄国人从滨海省赶走,而俄国人由于一口咬得太多无法咀嚼,暂时不提更多的要求的时候,这种紧张才宣告结束。

6月25日,即伊格纳提耶夫到达北京的前两天,僧格林沁率领中国军队在大沽击败英、法联军^①。这种前所未有的事情,自然鼓舞了北京朝廷的士气。这个朝廷现在比从前更不愿意对俄国在条约上作任何让步。然而,不久就可以看到,伊格纳提耶夫比起彼罗夫斯基,是个更为重要的人物。察哈尔都统庆昀当伊格纳提耶夫抵达该省时奏陈:“此次俄罗斯差员赴京,似与往届不同”。他已先期预备好了接待与护送事宜^②。伊格纳提耶夫一行人等乘坐轿子由直隶赴北京。他在北京受到普通的礼节的欢迎,不过,没有得到彼罗夫斯基曾经为他要求过的那种国家最高官员所应得的接待。他的官邸只有四个房间。与此对照,大沽之战以前为英国公使预备的并为伊氏亲眼看见的广大官邸,房间多到一百七十个^③。

① 后来,英国人中流传俄国人帮助防守大沽。他们甚至把这话传到巴麦尊那里(见《罗素文书》,英国档案保存处30/22/20)。相反,中国人认为俄国人跟英国人一起进攻,虽然此事好象是还没有让奕訢知道(见舒马贺尔:《俄国获得阿穆尔的历史——1848—1860年与中国的关系》,载于《俄国档案》,1878年第11号,第3册第319页;和伊格纳提耶夫《有关伊格纳提耶夫出使中国的材料》莫斯科,1892年)第87页和第160页。往后,在1860年额尔金向《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和其他英国在华名流都曾向伊格纳提耶夫承认了谣传的荒诞。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38,第48页上。

③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前书。

伊格纳提耶夫向肃顺和瑞常(他们重新受命与俄国人谈判)提出一项条约草案的详细建议。这个文件的原文没有收入伊格纳提耶夫的《回忆录》，而载于《筹办夷务始末》^①。下列译文即从那里得来，希望它能与俄文原本尽可能地相近似^②：

“俄罗斯国大皇帝，细阅早年所立新旧和约，确知其中条例不能除两国嫌隙，多因条说不合现在相交之意。或有含混之处，或有宜增之处^③，必须讲明，故议定补续数条，使时势相合，而和好益固，下至庶民相交，虽人事日繁，亦无妨害。是以本官与贵国钦差大臣等商办，一，按天津所立和约第九条，决定两国东西分界；二，定旱路贸易章程；三，查对早年所立和约，以指出增减各条。

《璦琿和约》应合《天津和约》。此后，两国东疆定由乌苏里江黑龙江两河会处，沿乌苏里江上流至松阿察河会处，由彼处交界，依松阿察上流，至兴凯湖及珲春河，沿此河流至图们江，依图们江至海口之地为东界。¹⁹⁷

东疆^④未定之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喀伦等处，由早年和约所定之地方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

两国应派可靠之员前往，该员等应将所指各分界，做记绘图，各书写俄罗斯字二份，满洲字或汉字二份。所做图记，该员等画押用印后，遇有边界及立界牌等事，以此图记为本。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39，第27页下。在《筹办夷务始末》上没有肃顺所上他和伊格纳提耶夫谈判的奏折。表明他已得到全权委任（咸丰九年六月初十日—1859年7月9日）。

② 作者所译，大体符合《筹办夷务始末》，但有脱漏。现照英文译出，脱漏处未附——译者。

③ 此处落“以及重说等弊”。——译者

④ 按：《筹办夷务始末》，卷39，第27页为西疆——译者。

将俄罗斯字一份或满或汉字一份,俄罗斯国收存,中国亦依此办理,图记作为条约之补续。

俄罗斯国人行商,或由恰克图,或由别处,随该商人之意,往库伦、张家口、北京及中国内地诸城贸易,中国人亦可往俄罗斯国行商。沿途贸易,两国相助保护,并准两国互相在对方一国典置田地、立堂、修盖商栈房屋。

为预禁贸易人等内于中国一切含混争端及稽查俄罗斯国商人,可于库伦、张家口、喀什噶尔、齐齐哈尔及在中国别处酌量设立领事官或任事官等,中国在俄罗斯国都城或他城亦可添设领事官、任事官等”。

1689 年与 1727 年之条约已经作废,应予修改,由新订《璦琿条约》代替。另订其他新约,须在恰克图办理。

《天津条约》所立来往北京之外交公文、物件,亦当详加酌商成
198 为续补此约之条例^①。

继条约草案之后,伊格纳提耶夫又送来他对草案所作的详细说明,此文的摘要已收入伊格纳提耶夫的《回忆录》。《回忆录》所坚持的论点之一,是声言桂良和花沙纳业已在致普提雅廷的咨文中全部接受了《璦琿条约》。伊格纳提耶夫还提醒中国,英国已经跟中国打过三次仗,而俄国则从未跟中国打仗。

条约草案和伊格纳提耶夫的一切论点,在 1859 年的夏秋两季,一直遭到肃顺和瑞常的顽强驳拒。这样直到新年,伊格纳提耶夫中断了和他们的谈判。

① 这是有趣的,值得一提。草约中没有提三姓,伊格纳提耶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到任何俄国对三姓的主张。也许可以认为彼罗夫斯基所提出的这种主张,其倡议人是穆拉维约夫而不是哥尔恰科夫。俄国人窜入三姓,也是在没有取得更高级领导的指示下,由穆拉维约夫挑起的。见上书第 181 页。9 月 3 日(8 月 22 日)穆拉维约夫自江户写信给伊格纳提耶夫,说他的意见是如果可能就占领松花江,并派各种船只溯江而上,直到吉林。见前引《材料》第 77 页。

按伊格纳提耶夫的《材料》所说,中国官员7月1日告诉他,肃顺与瑞常再次受命与他接触。7月2日,在他的要求下,书面向他证实了此事。并说他作为全权大臣已被皇上认可。可是,《筹办夷务始末》所载谕旨,任命肃顺与瑞常的日期是7月9日^①。此事使人联想到彼时奕訢可能还不管与俄国的交涉。这则谕旨或许出自惠亲王绵愉的主动。特普钦的奏折6月28日送达奕訢^②,奏报准俄夷之人再次上溯松花江,在该河口的中国军事卡所惧怕“俄夷船定将续来”^③。穆拉维约夫所乘之船下驶阿穆尔河,据报已首途赴上海。奕訢即写了以下谕旨:“与惠亲王等同看。该夷既要字据,莫若因势利导,俟其抵津后,再与辩论,或可挽回,王等酌之。”(这199可能是暗示奕訢想对俄国让步,但是又想要通过惠亲王之手。)

该折奏的硃批,语气并非十分肯定^④。总之,是饬令富及扬阿,不准俄人在松花江上贸易,并探明穆拉维约夫果赴天津,则晓谕俄人,天津系设防重地,不得逾越。还要预作秘密防备。7月3日,特普钦的另一奏折送达皇上^⑤,说明探不到穆拉维约夫的真实意图,而俄国的买卖人仍在三姓。折内要求景淳返回吉林。复谕,仅著景淳星驰前进^⑥。

穆拉维约夫的动向事实如下:他离开尼古拉耶夫斯克后即下驶入海。6月16(4)日抵迭卡斯特湾。自此又沿满洲整个海岸直赴朝鲜的图们江口。他在波谢特湾与布多戈斯基相遇,后者已成功地勘察了远至图们江口的边界。据舒马贺尔记载,自布多戈斯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39，第27页上（咸丰九年六月初十日）。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38，第49页上（咸丰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③ 此句系特普钦另一奏折中语，作者误植于此，以下几处引用《筹办夷务始末》奏折的地方，都有前后误植之处——译者。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38，第51页上。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39，第10页上（咸丰九年六月初四日）。

⑥ 《筹办夷务始末》，卷39，第11页上。

基于4月16(4)日离开乌苏里江口时起,直到6月28(16)日抵达图们江为止,他没有看到任何汉人或满人。此后,穆拉维约夫与布多戈斯基二人一起乘坐“亚美利加”号向天津驶去,布多戈斯基还在船上绘完了他的几幅地图。7月14(2)日,他们到了天津,停泊在美国船“帕格雷坦”号旁边^①。为了不致使中国人看破俄国在远东海面实力虚弱,穆拉维约夫把他自己身在“亚美利加”号船上一事秘而不宣,并且把他所率小小舰队的其它船只都远泊在从岸上瞭望不到的地方^②。可是,中国人仍然发觉他在那里——虽然他们还不知道他带来的船舰实际上已经代表了俄国在中国海的全部海军力量。穆拉维约夫提出要允许他派布多戈斯基和格鲁吉亚的达德希克梁尼亲王,携带地图与信件到北京送给伊格纳提耶夫。直隶总督恒福奏陈此事的奏折,7月17日送达奕訢。穆拉维约夫的要求,经过一番商讨之后获得准许^③。此时,穆拉维约夫正和美国新近来华也泊在北塘的使节华若翰将军关系搞得很好^④。

7月18日,奕訢收到特普钦的一份奏折^⑤,上面讲到俄国在三姓的买卖人现欲前往珲春,折内还附呈“海防官弁”的一份报告。这是中国档案中,第一次提到已有军队派赴满洲沿岸。呈报如下:

“初二日有大船二只,三板船二只,驶抵摩阔岁停泊。分遣夷众驾三板船至罕奇地方傍岸,其前到夷人,即竖立旗帜,往近登陆,经该弁兵婉言询问,有老夷一名以汉语答称,伊等由东海到此,等候续来大船八只,以便同赴天津办理公务。其

① 舒马贺尔,前书,第305—306页,穆拉维约夫约请清朝的官员和他一齐去划界,他在波谢特湾等了六天,但是白等了。

② 舒马贺尔,前书,第307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40,第1页上及其后各页,和卷41,第25页上。

④ 见美国国会参院行政文件,30(36,1)为此事往来的函件。在此以后,穆拉维约夫去了日本,随后又返回阿穆尔。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40,第6页下(咸丰九年六月十九日)。

由陆路先到夷人，俱图采阅地势而来。言毕，即使先到夷人四名，同驾小舟往迎大船来回等情。伏查夷酋穆拉维约夫，前有由东海赴天津进送枪炮之举；嗣在黑龙江省，又有赴绥芬、乌苏里，等候吉林委员勘界之言。近据各卡探报，又称该酋前赴奇咭，径赴南海，约须秋后旋回，兹实于琿春地界，先由陆路来夷三十余名，旋复由海道继至多人，竖立旗帜，忽来忽去。并称续有大船多只前来同赴天津。是否即系穆拉维约夫，均难悬定。该处孤悬海隅，兵数更多，如果该夷仅贪占地界而来，该处与绥芬较近，若令该夷联络布置，已属滋蔓难图。若复别有觊觎，则琿春地方，尤属堪虞。现拟派副都统銜吉林协领巴朴保拉朴、佐领永谦星驰前往，由宁古塔酌带弁兵，督率署协领富坤，相机筹画防堵，仍飞飭查明。如果仅系贪占空闲地面，即与之据理剖辩，不必显与争执，肇启衅端。并密禁本地旗民，不得与之交易”。

201

这一奏折是有趣的，里面所说的完全不象巴尔苏科夫或舒马贺尔提到的穆拉维约夫或布多戈斯基在未来的滨海省的那次旅行中，没有遇到任何人的那种情况。有关此事的材料，已被俄国作家们煞费苦心地质压下来了。这并非不可能的事。伊格纳提耶夫本人也只是说没有遇到官员^①。中国人奏折中所报确实不象是假的。皇帝所降谕旨除一般地命令监视俄国人的行动之外，并没有说应派军队进入滨海地带。而且，俄国人到达的消息，倘若是由当地居民从滨海传到吉林，中国人也用不着避而不提。

同日，特普钦送呈皇上另一奏折^②，报告俄国移民多起，于6月17日至7月16日之间，乘船进入乌苏里江。据报已用武力阻止此辈多次（但不清楚是那天）。特普钦声称，已派乌苏里江口的卡

202

①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前书，第94页和第104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40，第6页下。

哨弁兵上溯该江调查此事,他们发现俄人已占地“十四处,相距三、四十里至一百余里不等,每处建房并搭盖堆栈及仓库三^①至房屋十余所,各居夷人男妇幼稚二、三十名,畜有牛马,开园垦地,各有鸟枪、农具、船只等”。总之,特普钦怀疑有关这些人众的数字的估计是否正确,并认为很可能“不下六百人”。他已饬令宁古塔副都统赴乌苏里江口采取防堵措施,并教谕守卡各员,“据理晓谕拒绝”。

对此折的复谕于同日颁发,文如下^②:

“特普钦等奏俄夷由水陆分赴珲春,并夷众强赴兴凯湖查看地界及在乌苏里江建房垦地情形各一折,俄酋伊格纳提耶夫到京以后,声称欲会议东西交界。本月十六日,复有俄夷四人至天津北塘,投递照会,有紧要书信,须送给伊格纳提耶夫,自系为议勘地界起见。并闻穆拉维约夫,亦至天津。将来以理开导,如该夷酋等晓悟,其应如何办理之法,总须由该将军等定义,京中不能遥制。至乌苏里江等地方,并无与俄夷交界之处,叠经谕令该将军等设法拦阻,而夷踪日复蔓延,势将无所底止。该夷人船下驶,必须先过黑龙江地面,奕山于穆酋前来争论时,既未能据理拒绝;而于人船下驶时,亦未闻拦阻。实属咎无可辞!特普钦等叠次奏报派员拦阻,亦复毫无实际,岂得以奏明在前,遂可塞责耶?景淳此时定已行抵吉林,著会同奕山等,将俄夷如再有人船下驶,应如何妥为开导,设法拒阻;其业经建房垦地之人,将来如何驱逐;筹划办法奏明为要。夷情渐行桀骜,虽未可自我开衅,而该夷或竟恃强用武,将何以御之?特普钦等所称相机防堵,及多备余丁,勤加操练等事,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 40，第 9 页上，原文为“并搭盖草窝棚三五所至十余所，各居民人男妇幼稚二三十名至八九十名不等，牧放牛马”。——译者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 40，第 10 页上（咸丰九年六月十九日）。

并着景淳等悉心商办,以备不虞。毋得有名无实,致滋貽误”。

这则谕旨虽然含糊,但是流露了一种比从前更为急迫的语气。

奕山现在开始倒霉。他递了一则过时的奏折,报陈穆拉维约夫6月1日在瑗琿和他谈话的情形,此折于7月24日送达奕訢^①。俄人要求遣送数名满人教习前往各处俄屯,而吉拉明阿要拖延二年;穆拉维约夫拒不商讨贸易章程,并说中国人尽可以对有争议的条款自行其是。

7月29日,奕訢又见到奕山另一奏折^②,谓吉拉明阿已枷号示众,而他本人不可能更正《瑗琿条约》。他说:“恐一时不能会晤,即或会晤,想该夷酋狡诈多端,未必轻易即肯听从更正”。奕山最后建议,俟南方各省军务平定后再图办理。同日,特普钦有一奏折送达皇上,奏报7月17日有大批俄人乘船径赴瑗春,并为查勘边界求见将军。复谕^③不仅重复7月18日的谕旨,下令将俄人逐出乌苏里;并谕景淳与奕山,断不允在黑龙江左岸添盖新房,也不得和俄人另立新约——这是尤其行不通的一则命令。

这时候,美国新任驻华使节华若翰将军为了互换《中美天津条约》,坐了一辆有篷的大车,路上很不舒适,前往北京。1859年7月6日,他从天津写了一封短信给“彼罗斯基”(Peroziki),他以为那时彼罗夫斯基还在北京。这封信经过耽搁之后,交给了伊格纳提耶夫。因为,直隶总督恒福不敢专送此信,7月5日的奏折中提出不予传递的建议。华若翰在京的四天当中,被严禁在他的住所内,以后才答应他回北塘,并在该处得到互换的条约。那时,美国人似乎相信伊格纳提耶夫给与了华若翰很大的帮助和保护。因为,华若翰离开北京时曾写信给伊格纳提耶夫说:“我虽然没有能够见到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40,第26页上(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40,第32页上(咸丰九年六月三十日)。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40,第34页上。亦见中国给俄国的咨文。卷41,第37页下。

您,我将带着您对我关怀的回忆向我的政府汇报,这将成为那条业已把两国政府联在一起的友谊之链又加上一环”^①。研究这一时期的美国历史家们,也大都持同样的看法。最近一位历史家卡迪表述他的意见说:“在击退英国舰队后的那一阵混乱与欢腾当中,看来可能只是靠了伊格纳提耶夫对清朝朝廷的影响,才使华若翰得以访问北京”^②。这种看法的主要根据,似乎就是伊格纳提耶夫声称7月19(7)日写给华若翰的信,其中提到他曾经把华若翰即将到达北京的日期先期告诉中国人;并且向他们坚决要求:美国使节应受到适当的接待;这种看法也由于他曾经抗议中国人不许他与华若翰会见,而他还给华若翰送了几封友好的信件和几份《泰晤士报》这些事。可是,公平地讲,无论在伊格纳提耶夫的《回忆录》或《筹办夷务始末》里,都找不到任何记载,足以证明伊格纳提耶夫确曾请中国人好好接待华若翰。至于友好信件和几份《泰晤士报》这些事,本身并不能证实卡迪的判断。至少可以这样说,伊格纳提耶夫采取的所谓外交步骤,如果确有其事而《筹办夷务始末》却只字未提,那倒是令人奇怪的。

中国档案资料清清楚楚表明,西方各国之间的勾结问题经常萦回在中国人的脑子里。7月5日恒福的奏报就怀疑美国暗中同意了英国的计划。僧格林沁7月14日的奏折,提出一定不要让美国人与在北京的俄国人接触。他7月23日的又一奏折,断言美国人已与俄国人搞在一起,并必将共同在京施加压力。再者,奕訢允许美、英、法三国使节进入北京的谕旨,发布日期是6月6日^③,也

① 美国参议院行政文件(36届第一次会议,30号)内公布了华若翰和伊格纳提耶夫1859年的往来函件。坂野正高《中国和西方》(麻省坎布里奇,1964年)第114页及其后各页载有华若翰与中国人关系的全部材料以及他和伊格那提耶夫之间的往来函件。

② 卡迪:《法帝国主义在远东的根基》,(纽约,1954年),坂野正高没有提到此事。

③ 所有这些奏折与谕旨已由斯威舍译出,见《中国对付美夷的办法》(纽黑文,康涅狄格:1953年)第12章。

就是早在伊格纳提耶夫到达北京之前。他到了之后又亲自看见为三国使节备下的官邸，也必然晓得华若翰的接待大致已成定局。而且不管怎样，伊格纳提耶夫自己的《回忆录》里没有提他曾经为华若翰进行过任何斡旋^①。他引述写给他父亲的信说，自从他于8月2日向理藩院抗议不许他会见华若翰之后，曾接到该院的一件“草率咨文”，准他去见。但是，他没有利用这一许可。因为，他觉得由他先去拜会，未免有失尊严。伊格纳提耶夫还说，他虽然接到哥尔恰科夫的指示，令他帮助华若翰到北京。然而，自从他离开圣彼得堡之后，除去曾经收到穆拉维约夫喋喋不休的、而他并没有义务听从的饶舌之外，从未接到关于此事的新指示。为此，后来他向理藩院抗议他们发的“草率咨文”，而不是抗议对华若翰的接待。他并没有为华若翰作调人。他写给他父亲的信中又说：“我并不想去为美国人火中取栗，因为他们是自己把头伸进圈套的，甘心在受辱的条件下硬要去北京。他们自己既没有提出抗议，也没有要求我与之合作”。这虽不是明说伊格纳提耶夫并未事先报知华若翰的到达，但其含义则是：伊格纳提耶夫甚至连这件事也没有作。

伊格纳提耶夫也在致他父亲的一封信中抱怨：“……美国人乐于妥协，过份谦让和随随便便”。这并不能对他自己的处境有所帮助^②。而这还不是最妙的。在7月8日(6月26日)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没有哪个俄国人去拜访中国人，中国人也没有哪个来拜访俄国人。教士团简直是被拘禁着。中国人全对我们怀着敌意……现在，甚至在商店里中国人也不想把东西卖给俄国人。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仆人(大都是阿尔巴津人的后裔)或者经常供应教士团的几家商号去买什物。我们除中国报纸外得不到什么新

①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前书，第87页及其后各页。

②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前书，第106页。

闻”。不过，俄国人获准可以在街道上任意行走^①。对俄国人的敌意可能部分地由于伊格纳提耶夫强迫教士团成员放弃他们穿着中国衣裳的旧习惯，改穿俄式衣服而造成的^②。

1859年8月初，俄国与中国、或者是中国朝廷与伊格纳提耶夫之间，曾经交换过一些照会。而这些文件，在伊格纳提耶夫的《回忆录》和其他任何西方资料中都没有提到。清帝8月1日收到
207 僧格林沁的奏折，奏称英国船只载来四、五百人，已抵山海关洋面，并派一俄人上岸取食物。因为来的是俄国人，僧格林沁就下令不要向英船开火^③。次日，有一件咨文送达伊格纳提耶夫，要他通知他的政府，中国正与英国打仗，俄国不要使用英国船只，以免误伤该国之人。咨文内还要求俄国人不要在和平获得恢复之前，到新订条约允设的口岸贸易^④。

特普钦8月3日奏报三姓有俄人调戏王姓人之妻，被当地居民杀死。尸首在江中找到，罪犯已拿获，但情节“仍恐有不实不尽之处”^⑤。复谕德勒克多尔济向俄国外交部提出交涉，但首先责备三姓驻军队不应令俄人进入内地^⑥。

伊格纳提耶夫驳斥了英国船上有俄人之说，并声明穆拉维约夫即将返回北塘，拟派二、三人赴京。皇上于8月8日的谕旨中批准^⑦。但是在通知伊格纳提耶夫此事业已批准的咨文中却又说，倘有称系俄国之船径自驶入尚未据约开放之口岸者，定将开炮轰

①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同上书，第51页。在这封信中他也叹息俄国“没有代理人或密探。布克斯吉夫登的：《俄国—中国》一书中所载的这封信的说法更加坦率（旅顺港：1902年）卷1，第16页。

② 同上书，第96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41，第3页下（咸丰九年七月初三）。

④ 同上书，卷41，第11页上（咸丰九年七月初四）。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41，第13页上。（咸丰九年七月初五日）

⑥ 同上书，卷41，第13页下。

⑦ 同上书，卷41，第28页下（咸丰九年七月初十日）。

击。这份咨文和肃顺与瑞常 7 月 31 日送给他的那份有关边界的激烈咨文恰成双璧。显然它促使伊格纳提耶夫写了一份“极其强硬”的照会给中国人,这份照会到达奕訢手中是 8 月 13 日^①。中国人于 8 月 14 日答复说,华若翰已返回北塘换约,各口开市要等英、法条约互换妥当之后,约需时四个月^②。伊格纳提耶夫这回的答复较前和顺,他答应俄船将不赴天津或大沽“护助中国”,但俄国不愿放弃其赴各通商口岸的权利^③。8 月 18 日又一谕旨宣称:即 208 或是英、法船只,如非对方先行开炮,不应开炮轰击。倘有夷人敢于登陆,则无论何国,定当严拒。并将所绘西方各国旗式,交僧格林沁查验^④。8 月 22 日,僧格林沁启奏,表示他对俄国的意图有严重怀疑。因“俄夷侵占地界,难保不窥探各海口,另生诡谋”^⑤。不过奕訢坚持可准穆拉维约夫将信件投递北塘^⑥。从此明白看出,中国朝廷害怕与俄国全面决裂,而没有看清楚俄国不象英国,并不处于能够向中国本部发动敌对行动的地位。

然而,关于遥远的北方,清政权继续保持着幻想,以为还可以真地采取一种强硬路线。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当然是惠亲王。8 月 26 日,德勒克多尔济为三姓事件致送了一封坦率的抗议书^⑦。存在中国档案内的折本上硃批全文如下:

与惠亲王等同看。看来特勒克多尔济^⑧意存诱卸,并无

① 全文见《筹办夷务始末》,卷 41,第 30 页下。伊格纳提耶夫的《材料》中也提到。

② 同上书,卷 41,第 32 页下(咸丰九年七月十六日)。

③ 同上书,卷 41,第 34 页上。

④ 同上书,卷 41,第 35 页下(咸丰九年七月二十日)。

⑤ 同上书,卷 41,第 42 页下(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⑥ 同上书,卷 41,第 43 页下。

⑦ 同上书,卷 41,第 50 页上及其后各页(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⑧ 作者将《筹办夷务始末》此处原文“该贝子”译为德勒克多尔济,现照英文译出——译者。

想出好办法,尔等熟商,有无善策^①。

整个秋季里,俄国人在阿穆尔和乌苏里继续自行其是的干下去,而只遇到中国方面的一次阻挠。8月29日,奕訢看到一份奕山与景淳的奏折,奏称:他们拟探听穆拉维约夫的行踪,而他的踪迹诡密。景淳在一份单独上奏的奏折中,估计吉林兵丁常额为一万名,实有三千名,而仅能添增一千五百名。他请求将原应调往奉天增强海防抵御英人的绿营兵丁二百名免予调遣出境^②。

复谕将奕山革职著其赴京听候处理^③。特普钦暂署将军职务,并指令他严密侦察穆拉维约夫行踪。景淳得知二百名兵丁不再调赴奉天。

9月13日,奕訢收到景淳与特普钦的如下奏折:④

“暂署三姓副都统印务参领巴彦布咨,据黑河口委员协领倭克锦报称:六月十九日,有夷商瓦尔佛罗米幅带领通事人等七名,系船二只,出黑龙江口傍岸,声称奉夷官卜勒色依^⑤印票,前赴三姓等处贸易。向其阻拦不听,随系船只,搭帐房,等候卜勒色依火轮船定入松花江上行等语,经该署副都统恐火轮船恃强,遂派骁骑校斐凌阿,系船带兵迎阻。一面备兵一百名,密飭佐领富祥,在三姓附近窝坑口要隘屯扎,防其滋扰。并经奴才等指派佐领永祥,督飭迎阻去后,复据倭克锦报称,二十六日有夷商玛克西木斐耻等五名,系船一只,潜至松花江北岸,晤会瓦尔佛罗米幅等,开船自入松花江西上。虽经百般开导,该夷拚死不从。又据骁骑校斐凌阿禀报,七月初四日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41,第52页上。

② 同上书,卷42,第1页上(咸丰九年八月初二)。

③ 同上书,卷42,第2页下。

④ 同上书,卷42,第34页上(咸丰九年八月十七日)。

⑤ 我听不出哪一个俄国人的名字是与这个声音相符的。穆拉维约夫有个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少校普集诺(一译普西诺——译者),但与此并不十分相近,它读起来是普利塞。

(8月2日)至喀尔库玛屯地方,适遇瓦尔佛罗米幅等七名,船只前来。令其拢岸,再三开导。该夷不理,挥众开船。并据卡兵探报,玛克西木斐耻等五名,落后绘画两岸图式。佐领永祥、富祥报称,瓦尔佛罗米幅船只,已抵窝坑口停舶,专待落后人船,一同西上各等语。奴才飞飭该署副都统巴彦布,督飭各员极力阻回,断不准其分窜。据其报称初七(8月5日),瓦尔佛罗米幅等开船西上。经佐领富祥,横阻晓谕,三姓地居苦寒,无商可通,该夷见其急迫,始行回帆。于二十一日(8月19日)已出大黑河口入黑龙江上往去讫。又据督办夷务之署副都统协领富呢扬阿报称,玛克西木斐耻等五名,亦由中途折回,于十三日(8月11日)出大黑河口下往”。

这份奏折接下去讲俄夷难保不会复来,应飭各属照旧严防。随后又报称俄夷已至乌苏里江流域,于6月23日至8月16日之间,有八伙总计六百六十五人,妇女儿童在内。绥芬防御图勒斌报称夷人已乘船入兴凯湖,向绥芬开修道路,查看地势,并在地名平川的地方插立标杆,所有行为俱为明春构屋垦地预留地步。上奏 211 又令署副都统佐领富新、副佐领永谦派员前往绥芬,将俄夷所立标记焚毁。可是,至8月14日俄夷再次离开绥芬,将沿海之摩阔岁与伊兰哈达地方所立木杆撤去。

9月17日,伊格纳提耶夫有一照会通知奕訢,穆拉维约夫将于10月15日左右行抵尼古拉耶夫斯克或布拉戈维申斯克^①。9月21日及24日,清帝谕示景淳与特普钦,穆拉维约夫回来之时应如何与之讲论^②。令该大臣等提醒穆拉维约夫,边界自1689年以来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43，第1页上。伊格纳提耶夫于9月22日和肃顺、瑞常会见之后，便中断了他跟清人的谈判，但还继续留在北京（《材料》，见前书，第129页和坂野正高，前书，第151页）（咸丰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43，第7页下和第10页上（咸丰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早经划定。左岸借与俄国原只为防堵英夷。“奕山订立瑷珲条约”据称系恐穆拉维约夫动怒,实属糊涂。惟念中国与俄国和好多年,俄人所占左岸各处,连同阔吞屯(马林斯克)及奇吉在内,可以让她们借住。各处周围地带也应当严格划定。但不应准许他们在三姓贸易,或侵占乌苏里与绥芬。更不准他们将阿穆尔右岸空旷地方全部占用。伊格纳提耶夫致肃顺、瑞常的五件照会,均交给景淳与特普钦阅看。

在三姓被杀的俄人尸体(切博塔里夫),已于8月30日在阿穆尔河与乌苏里江汇合处还与俄国人,并安排将嫌疑犯刘有、王高氏交与富呢扬阿。咨送了一文与俄方,询其是否会同审讯?这是9月26日景淳与特普钦送到奕訢处的一份奏折所报^①。这些事没
212 有引起与在阿穆尔的俄国人的特殊麻烦。俄国的资料中没有任何记载提到松花江上发生的这些事件^②。

现在,景淳与特普钦必然是对于俄国人的问题作了认真的考虑。他们拟了一份长长的奏折,于10月8日送达奕訢^③。折内奏称:各卡官员均在守候穆拉维约夫,以便使他同意另订新约。如穆拉维约夫不肯,他们认为阻止俄人侵占的唯一办法是将中国贫民移殖空旷土地,特别是宁古塔,三姓、绥芬与乌苏里地区。但皇室发祥之地仍应封禁。他们又提出将滨海地区的“揽头”(官方特许采集人参者)^④动员起来,以固防务。这则聪明的移民建议被奕訢驳回了^⑤,却批准了动员揽头的建议。

特普钦于10月12日在另一奏折中^⑥报称:俄人声言穆拉维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43，第14页上（咸丰九年九月初一日）。

②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前书，第182页上提到一些关于这件凶杀案的事，在归还尸首问题上，又有过相当误会，不过，得到了解决。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43，第23页上（咸丰九年九月十三日）。

④ 大概是中国的汉族。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43，第25页上。

⑥ 《筹办夷务始末》，卷44，第1页上（咸丰九年九月十七日）。

约夫将于10月24日到达。驻守乌苏里江的协领禄昌报告：俄国头目一员已率领夷众自乌苏里江撤走，以及他曾将枷号的吉拉明阿向该俄员出示。禄昌据云曾对俄员反复开导多日，劝令将在乌苏里的俄国人全数撤走。该俄员对此全不理睬。特普钦对吉林省的安全表示忧虑，声称他已将冬衣、口粮发给驻在乌苏里江口及阿穆尔、松花江汇合处的官兵，使他们能在整个冬天固守如常。

此际，穆拉维约夫自日本返回阿穆尔，他于10月20日经过乌苏里与阿穆尔汇合处。督办夷务的副都统富呢扬阿，截住穆拉维约夫所乘的船，并被允上船。他被许可见到穆拉维约夫。特普钦描绘这次会见的奏折于10月29日到达清帝之手^①，文如下：

“……及会见穆拉维约夫，狂妄骄横，语言忿怒，辄问吉林将军因何未分勘地界？富呢扬阿即以奉派在此守候会晤，辩白吉林、乌苏里、绥芬等处，并不与俄国连界，无所用其查勘。谨遵大皇帝恩旨，除黑龙江左岸空旷地方，准其借与尔国暂居外，其余应遵康熙年间分定疆界，各守各土，不得稍有侵越。尔等务将乌苏里内人船即行收回，以敦和好。该酋喃喃向乌苏里江逡巡指画，不知何词。复以黑龙江将军奕山、副都统吉拉明阿均因前办不善，蒙大皇帝分别惩治情形，向其详细剖辩。该酋声称：“我亦知道，听说将吉大人锁拿乌苏里枷号”。询其船经何处，视该酋比划之状，系由波力外溜^②至此。遂即诘以尔既知奕将军等均因尔国背约，闯占乌苏里江获咎，即应代为设想，迅速撤回人船，方称和好。该酋答称：“现有使臣伊格纳提耶夫在京，专办此事，如办不了，我必得与吉林将军再办”。富呢扬阿即以乌苏里、绥芬，既不与俄国连界，无从查办，寸土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44，第17页上（咸丰九年十月四日）。

② 这个地方找不到，——原注。原文为Poliwaitzu，可能指伯力航道中靠外面的水流，非地名。——译者

断不敢允许；亦无可再议。该酋愈加忿怒，声称伊将到瑗琿，另行商讨，旋又责罪中国人杀害俄商。富呢扬阿随告以该夷商之种种恶行，并将其尸体已交付俄方等告诉该酋。惟该酋猝然声称行期甚忙，即催置副都统下船。富呢扬阿再向辩白，无如通事不肯详细传述。该酋摇首指划，故作无闻。但云伊将被杀害人之事面交委员普西诺〔普集诺〕听候办理。富呢扬阿因其催逼过促，即同委员等下船”。

批复这一奏折的谕旨内^①指示爱绅泰，可以在穆拉维约夫抵达瑗琿时，作为替特普钦向穆拉维约夫传话的中间人，向穆拉维约夫反复辩论开导。倘俄人公然破坏和平，即令乡勇及新近招集的揽头合力抵御。伊格纳提耶夫与边界之事全无关系。此事只应在边界就地解决。

11月14日，特普钦的一份奏折送达奕訢^②。内称穆拉维约夫并未抵瑗琿，经向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俄夷反复询问，所云穆拉维约夫行踪全然相悖。特普钦领旨仍行侦察穆拉维约夫何往^③。

11月19日，特普钦又有一份奏折到达^④。奏折中报称，在接到探报，穆拉维约夫正沿阿穆尔河左岸前进时，他已放弃等候并转返齐齐哈尔。他因此折回瑗琿，并于11月3日抵达该处。一位不知姓名的清朝官员，在穆拉维约夫乘车经过左岸时见到他，并与他同到道旁屋内接谈。但穆拒绝讨论边界问题，他所作的唯一让步
215 只是说如中国愿意，可派一代表到海兰泡。言毕驱车而去。特普钦即决定派爱绅泰于十月初十日（11月4日）去布拉戈维申斯克。在该地见到穆拉维约夫，将9月24日谕旨的意见反复向他宣述，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44，19页上。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44，第31页下（咸丰九年十月二十日）。

③ 同上书，卷44，第33页上。

④ 同上书，卷44，第36页下（咸丰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包括在左岸现已被占据之处与吞屯^①（马林斯克）与奇吉周围已允俄人占居之地，划清界限之事。对于穆拉维约夫的反映，特普钦以后奏陈如下：

“诂该酋闻之，辄即忿忿喧嚷，令喇嘛译员（阿瓦库姆）向爱绅泰传述，胆敢妄言，该处原系俄国地界，不但已去者不能迁移，此后尚有续来人船，并在兴凯湖、图们山等处建房安炮等语。该员复向开导，该酋气忿转加，怒目拍案，愈形桀骜。令喇嘛述称，非用枪炮，断不迁移。并令将黑龙江左岸之乌苏里卡房拆去。该员答以断难允准。该酋复称：如不拆去，我必令人拆毁。又言明年，必在黑龙江城（瑷珲）对岸，建盖房间，修立炮台。言毕，即令将其随从夷官唤进一名，其人神色凶猛，指称此系我国管炮将军，可与识面^②，该员见其声势虚骄，随亦（反颜相向）怒言，如欲恃强，中国岂无办法？该员亦将随带之佐领诺们德勒和尔唤进。该夷等见其身材雄伟，共相起立环视。该酋亦转颜作笑，点头不已，并亲身给酒，令其与夷人各领一杯，互相认识，且以前言为戏。

该员又令喇嘛传达，仍将前事订明，并约到城会见。该酋²¹⁶告称：江省并无可议事件，如尔将军有权，能将绥芬、乌苏里地面交给，即与会晤，否则无须见面。

爱绅泰复传前言，再三开导，并威胁俄人谓：如彼坚持强占，该处人民亦不相让。乃该酋俱置而不听，并令喇嘛勿再传述。再欲与言，该酋即令从人转入别屋不复出见。爱绅泰后趁月色渡江到城”。

奕訢就在这件奏折上硃批：^③“该夷虚言恫喝，是其惯技。差

① 应为阔吞屯——译者。

② 此后与《筹办夷务始末》所载不尽相符，删节较多——译者。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44，第39页下。

赧无词,即免伏鼠窜。惟赖汝等坚持定见,莫堕其奸诡术中,方为妥善。将来即使用武,俾该夷知天朝仁美兼备,衅非我开。虽制胜未必有把握,断不至为犬羊之类所訾议”。

接着的一则谕旨,著令各卡所严为防范,来年春天在三姓招募揽头,开垦空地。但中国方面不可先行开衅,如俄方来此骚扰,俟其登陆方与相拒,勿与其在沿江及舟中争斗^①。

在俄国材料中,对穆拉维约夫与副都统之间的会见没有详细记载。舒马贺尔^②说:1859年10月—11月间,穆拉维约夫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六周当中,多次与这位副都统见面,后者呼吁他“在217 乌苏里边界上作某些让步”。而穆拉维约夫一律加以拒绝。伊格纳提耶夫在摘引穆拉维约夫11月15(3)日的一封信时说,这位总督提到他“给了当地的中国官吏们揶揄一番。他还说,如果不是有伊格纳提耶夫在北京,定将“那个昂邦(副都统)臭揍一顿”。这位总督提到他又在乌苏里江口把清朝的昂邦富尼丘(这显然就是副都统富呢扬阿)“揶揄”了一番,并下令叫江口的中国卡所迁移,禁止中国人在哈巴罗夫斯克前面的阿穆尔河中航行^③。1859年10—11月哥尔恰科夫指示穆拉维约夫:如中国终于拒绝履行条约,就武装占领乌苏里和滨海地区^④。此时伊格纳提耶夫赞成攻打库伦、璦琿、三姓和齐齐哈尔,而穆拉维约夫则主张与哥尔恰科夫相同的路线。

整个秋季,阿穆尔河方面的中国当局都在意气沮丧与谣传纷纭中度过。12月11日,特普钦的一份奏折递到奕訢处,奏报左岸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44,第39页下。

② 舒马贺尔前书,307页。

③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前书,第80—81页。

④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伯爵传记材料》,(二卷集,莫斯科,1891年),卷I和舒马贺尔,前书,第312—313页。

俄人大肆活动^①。俄人曾试图在当地贸易，又在左岸各屯居民中散发传单，欲与之易换粮食、牛马。向俄方当局提出抗议时，此辈则怒称要派兵打开粮仓。爱绅泰复往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面见穆拉维约夫，但此时穆拉维约夫态度似尚缓和，并否认有任何类似计划。他还说英法两国将于明春派船六十只至天津。同日，又有特普钦一折送达奕訢^②，特普钦对他手下的官兵的忠实表示忧虑。并承认当地居民换米粮与俄夷已成固习。特普钦还奏报一项得自俄夷布色依（自海兰泡带来）的谣言，说上年6月间曾有从阿穆尔派出的俄国兵一队，在大沽与英国人一同作战。英、法制造事端，大半多与俄夷勾结有关^③。同日，奕訢降旨^④，将驻守黑龙江城兵弁二百八十名与西丹^⑤一同加以操练，并从墨尔根与布特哈派遣五百名兵丁至瑗珲由副都统那尔胡善管带。

1859年12月及1860年头几个月中，穆拉维约夫实现了他要把左岸的中国卡伦移往右岸的计划，而中国当局只进行了消极的抵抗。从1月起，北京朝廷日益集中心力，采取措施应付英国和法国的重新进攻。他们现在已经知道这种攻击是肯定要来的。为此，他们对俄国的态度变得更加谨慎。

1月10日，特普钦送达清帝的一份奏折称^⑥，阿穆尔河左岸与松花江汇合处对面的乌鲁苏牡丹卡伦被俄人焚烧。爱绅泰去布拉戈维申斯克向他们理论，俄人称此系奉穆拉维约夫之命，卡伦只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45，第14页下（咸丰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② 同上书，卷45，第17页。

③ 这无疑是属于穆拉维约夫那时发起的谣言攻势中的一个部分。见舒马贺尔，前书，第314页。虽然他没有特别提到这一次，但提到其他的，大意是春季俄军定将越过中国边界。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45，第19页上。

⑤ 西丹，按清代兵制，系尚未入伍的青壮。参见《黑龙江外纪》，第三卷“旗下未入伍者号西丹”。——译者

⑥ 同上书，卷46，第23页下（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能在右岸重建,他已责成爱绅泰与俄方继续商议在原址重建,行不通即派兵驻守旧墟。穆拉维约夫 12 月 3 日送来刀剪、玻璃与纺织品等多件,赠与黑龙江城全体官员。他们当即以肉类作为回礼。复谕命令将负责驻守俄夷所烧卡伦的佐领惩办。并只许招用土著部落驻守废墟,因为担心派出满人部队会与俄人发生冲突。

219 在 1 月 17 日到达奕訢处的景淳奏折^①谓:居住东海附近的恰喀拉族^②数约六、七百名,至琿春诉说俄人骚扰之苦。他派员调查,此次人众来意是否真诚。一道复谕中^③提到景淳的另一奏折遗失了^④。在此折中似曾奏报,他已发盾牌给乌苏里与绥芬地方的揽头作为武装^⑤,并派赴要隘屯扎。又增设台卡十四处——显系在兴安岭——并添造枪炮弹药。此旨提示如证明恰喀拉人的怨怒属实,即将其安置在苏城等处,并饬其查核揽头的可靠性。

特普钦同日又一奏折^⑥奏报乌鲁苏牡丹卡伦已经修复,但俄人复令拆移。派人来黑龙江城见爱绅泰,爱绅泰已返回布拉戈维申斯克面折此点,但无收获。俄夷又将卡伦毁去。此事描述如下:

“佐领鄂尔精阿等呈称:有夷官绰罗尼等四人,带领夷众三十余名,并传集附近居夷,齐至重修卡房,声言江左地面,业经许给,易换字约,屡次催令将乌鲁苏牡丹卡房拆移不听,前派夷官焚毁,何以今又重修?定须拆移右岸,各(俄夷)带器械,肆意鸣张。众(我)兵忿怒,欲向抵敌。鄂尔精阿恐致杀伤启衅,喝禁众兵,仍进卡房固守。次早夷众复来,携带枪刀铁

220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 46，第 32 页上（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② 奇勒尔人（?）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 46，第 32 页下。

④ 作者所引《筹办夷务始末》，卷 46，第 33 页下所载奕訢谕旨，并无遗失景淳奏折之意，恐作者误解——译者。

⑤ 作者将作为执证的腰牌误为盾牌——译者。

⑥ 《筹办夷务始末》，卷 46，第 33 页上。

斧，将重修卡房肆行砍毁，并将鄂尔精阿摔掷在地。众兵拦阻不听，欲执器械向其交锋，复经鄂尔精阿喝禁，仍在卡房旧基防守。差人飞速呈报之际，又有夷官密奇达带领马兵二百余名，各执枪刀，力逐官兵过江，至右岸距乌鲁苏牡丹附近地方而回”。

此后，这些官兵被派到更靠近吉林的各卡伦。

特普钦又上两折，^①奏报穆拉维约夫已赴上游，据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俄人说，系赴呼伦贝尔地方。特普钦下令：俄夷如阑入吉林所属各地，务须令其“安静回归”。爱绅泰在有西丹的人家中每家动员一人，在这些民人中得八、九十名甲长，他们领有一千三百七十七名壮丁。复谕^②默认了失去乌鲁苏牡丹卡伦，因为黑龙江左岸地方现在是肯定被俄国人攫占了。谕旨内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夷人在明春之前或因在吉林受阻，回至黑龙江滋扰生事，呼伦贝尔地在右岸^③应在该处严行拒守”。

1860年初，伊格纳提耶夫与肃顺、瑞常在京又继续会谈——但清朝的态度并无任何真正的改变^④。

正在关键时刻，2月16日，奕訢收到伊犁将军扎拉芬泰呈来的两份长长的奏折^⑤，提出用廓尔喀人和俄人共同攻打英属印度。廓尔喀人从西北陆路进攻，俄人则自海上从东南发动，中国本身派兵途经云南、西藏攻击印度。扎拉芬泰奏陈，此一计划系伊犁俄国领事在与一军官（满员）的谈话中提出，由该员禀陈上司。显然奕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46，第34页下和第35页下。

② 同上书，卷46，第37页上。

③ 作者所引《筹办夷务始末》，卷47，第37页上奕訢旨谕中此句不在这一段——译者。

④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前书，第155页；舒马贺尔，前书，第316及其后各页。《材料》第150页证明布克斯盖夫登的说法，花沙纳受命与伊格纳提耶夫和英国人谈判之后便自杀了。他以此逃避这一桩难办的任务。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47，第16页下，第18页上（咸丰十年正月二十五日）。

许亲身研究过这些奏折。他在第二份奏折上作了相当长的硃批^①，拒绝这个计划，因为廓尔喀人不适于做这件事。中国亦无此兵力，仅使俄夷从中得利。况“俄、英、法本属通同一气”。如果中国正式请求俄国出兵，俄国或者会先将此事告知英国，给中国制造麻烦。

此项奏折与硃批曾由蒋廷黻教授译出^②。他用这些文件来证明他的理论，议为中俄关系受周期性的支配。不过，这些资料的真正意义则另有所在。首先，进攻印度的方案，不过是1842年林、魏^③对外政策的重现，虽然这个奏折与林、魏的书，其间究竟有无直接联系，我们还不清楚。其次，从硃批看来是明显的，即：奕訢不知道从海上入侵印度是俄国力量所不及的，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其他事例，说明北京朝廷在本书所涉及的整个期间，毫不了解俄国的海军力量并不足与英国抗衡。不过，或许正是这一因素，反倒阻止了中国人以英制俄，而不是翻过来阻止了他们以俄制英。

2月间俄国人又把乌苏里江之内、图勒密支流南岸，显然位于黑龙江右侧的卡伦拆毁了。景淳报告此事的奏折于2月27日送达奕訢^④。折内提到驻守该卡伦的佐领报称：自10月20日至12月22日，“有俄夷多起进入乌苏里。夷官鱼吉幅尾计会同前来夷官多名，率领夷众百余人，各持火枪、刀剑等械，随带爬犁，前来逐卡，势甚鸱张。即令夷众燃放火枪，并将防御舒林，佐领乌勒吉，揪拉出屋。禄昌等迫不得已，无处存身，连夜退至距卡百里之浓江地方，暂借赫哲住房栖止”。

不过，景淳此时又飭令于旧址附近重修卡所，并赴英额岭后各要隘防守。又将一千名兵弁分为两起，其中多为西丹，派赴松花江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47，第22页上。

② 《剑桥历史评论》，第III卷，（1927年）第115—121页。

③ 指林则徐、魏源。——译者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48，第4页上（咸丰十年二月初六日）。

与黑龙江汇合处,变装易服,以放牧捕鱼为名,而实际上是“择要设伏”。料想这些人是为了伏击前来攻打璦琿或中国其他疆土的俄国人的。

景淳在这一奏折中还报告说:他已访悉,自乌苏里至海滨的小谷中,居民中最可靠的系揽头,彼等各有身家,惟其中或有流民踪迹其间,未宜发给武器,此等流民名为刨夫,究竟亦属有用之人^①。谕旨批示:著将布置设伏地点绘图呈明。其交付揽头守护地区,著绘具地图^②。使用刨夫以资守卫之举,亦获批准。

对三姓杀人案的调查加以叙述的景淳另一奏折,于同日送达奕訢^③。凶手刘有,直隶人氏,到三姓谋生,与另一中国外出行商之妻王高氏通奸。刘有科处重笞一百,王高氏笞九十,准俄国人赴该地的兵弁各笞八十。奕訢硃批:著询问刑部意见^④。

3月25日收到特普钦的奏折^⑤,提出一项计划,使鄂伦春人每年游牧路线应靠近中国兵力集中之处,而远远避开俄国人。但是,鄂伦春部现在仅有精壮五、六百人。而他又奏报新设五处卡所于璦琿江面以下及呼伦贝尔地区。此奏为奕訢批准^⑥。特普钦同日另一奏折奏报,已调五百名精壮兵丁自墨尔根^⑦与布特哈赴璦琿,惟该处尚需增援更多兵力。他又计划训练团练,但因此种人概多贫寒,须发给银两,添置装备、衣履以及马匹。他曾经考虑是否应派马队官兵五百名,哨探黑龙江(乌鲁苏牡丹)原有卡所,其后决定不这样办。硃批谕示:团练事交户部议办。

① 显然有未领执照的采参人、猎户等。揽头与刨夫可能都是渗入满洲的汉族。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48,第7页上。

③ 同上书,卷48,第7页下。

④ 奕訢硃批系“该部院议奏”——译者。

⑤ 同上书,卷49,第1页下(咸丰十年三月初四)。

⑥ 在同日的一道圣旨上——《筹办夷务始末》,卷49,第5页上。

⑦ 《筹办夷务始末》,卷49,第6页上。

及至 1860 年春,满洲防务的准备似乎达到了高潮。景淳与禄昌在一份 1860 年 5 月 7 日(十年闰三月十七日)^① 送达奕訢的奏折内报称:设于黑龙江—松花江会合处的伏兵,已经出发;另有二百名,即派赴乌苏里的尼满河。乌苏里江已建台卡八所,每所五人;并将另外增建八所,亦各配备兵丁五名。珲春的三百名乌拉丁壮,已遣派太平洋海滨。流民刨夫在小绥芬河上组成营卡十二座,又在近海的苏城与玛延河处,另设卡八十四座。此等人夫分隶一百五十余座营,总计不下万人。随派西丹一百二十名及兵弁等与之共同协力。为俄夷所扰的恰哈拉人,据查确属真诚;不过,全部人众仅二百七十名,唯仍望募集此辈一同御侮。此折仅简单硃批“知道了”,别无其他谕示。

看来颇有意思,这时在俄国占领线后面的乌苏里和绥芬流域,中国当局显然活动得很不错。可是,就各处卡哨丢失得那末不光彩来看,这些奏折内所报的事有多少可信是有些问题的。另一方面照舒马贺尔说,有两千支枪和用五辆大车装运的大炮,确已运往瑗珲。4 月份,在阿穆尔的俄人听到种种有关中国调动人力骇人听闻的谣传。另据舒马贺尔说,肃顺请调二万人到俄国边界上,以替代撤下去的二个喀尔喀蒙古人,但为彭蕴章所阻^②。

可是,不管中国在北方的防务效率怎样,它们现在已因在别处的事态发展而受到削弱。新的英、法远征部队正在中国海面集结,圣彼得堡 1 月份决定伊格纳提耶夫须与英、法、美的使节在海岸会合,试图同样起到 1857—1858 年普提雅廷所起的作用。他在北京谈判的那个冬天收获不大。清廷的态度于 1 月间一度软化,后来,又重新强硬起来。而伊格纳提耶夫作出的最大让步,限于阿穆尔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 50,第 10 页上。

② 舒马贺尔,前书,第 324 和 326 页。

河左岸^①。俄国人处于困境。然而，英国政府又一次援救了他们。

3 月份上半月，对伊格纳提耶夫 1 月 25(13) 日下的新指令到达他处。由于北塘附近没有俄国船只，他一时无从离开。并且他也不愿在使命没有完成之前离开。总之，彼罗夫斯基已经于一年 225 前与中国人达成协议，俄国使节得于和平时使用北塘港口。5 月 19(7) 日，伊格纳提耶夫又接到利哈乔夫船长(一级)的一封信，报告他的运输帆船“日本人”号到达北塘。于是，伊格纳提耶夫于 5 月 20(8) 日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许他于 8 天之内离开北京；不然的话，即请承认阿穆尔河—乌苏里江边界，并互换边界地图^②。这一通牒于 5 月 23(11) 日由军机处仅以一纸咨文答复，再次拒绝边界要求。对于离京一层，则不予理睬^③。5 月 24(12) 日，伊格纳提耶夫又接着提出另一最后通牒^④。这个文件显然曾经进呈皇帝御览。次日 5 月 25(13) 日，有谕旨勉强地答应伊格纳提耶夫的出京要求^⑤。这道旨谕内说：“该酋心存叵测，或勾结英、法滋扰，伊从中说合，意图取利；或暗助英、法，与我寻衅……，均未可知，若阻其前往，未免受其挟制”。5 月 27(15) 日，另一谕旨^⑥ 不准他从天津行走，也不准窥探大沽炮台。令其从速登舟，不得在该处逗留。对于伊格纳提耶夫 5 月 24(12) 日提出的最后通

①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前书，第 160 页及其后各页。让与左岸系肃顺与瑞常在致伊格纳提耶夫的信件里暗中认可的（《筹办夷务始末》卷 46，第 23 页）亦见坂野正高，前书，第 154 页。伊格纳提耶夫证实布克斯盖夫登说过，清廷对瑷珲条约上有关滨海地方的条款一直不肯承认。给伊格纳提耶夫新的指令中授他以特命全权公使的官衔。

②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前书，第 237 及其后各页。《筹办夷务始末》，卷 51，第 1 页上。

③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前书，《筹办夷务始末》，卷 51，第 2 页下（咸丰十年四月初三）。

④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前书。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 51，第 3 页下（咸丰十年四月初五）。

⑥ 《筹办夷务始末》，卷 51，第 5 页上（咸丰十年四月初七）。

牒,则未予正式答复。理藩院虽然不情愿,但仍为他提供了运输条件。他于5月28(16)日离京赴海岸^①。5月29(17)日,奕訢收到僧格林沁的一份奏折^②,叙述当前他所作的防务,并将他对俄国的看法表达如下:

226

“此次俄罗斯来至北塘,形踪诡秘,骄傲异常,难保非给英法窥探虚实,暗怀奸细。今在京俄酋伊格纳提耶夫,又欲来至北塘,与该夷会面,更属可疑。揆其情形,决非好意。查英、法与俄夷,本属狼狽为奸,若不知我虚实,尚存疑惧之心。似此俄夷内外消息相通,往来会面,英法何事不知的确?嗣后若不严禁往来,不特难防奸细,即海防事务更难办理。可否请旨飭下理藩院,传谕该夷,经此次出京之后,不可再有往来,以免窥探勾通。至俄酋利哈乔夫,倘欲进京,奴才自当竭力设法阻止”。

这件奏折的硃批,同意阻止俄国人再在北塘停泊,并说已书面通知伊格纳提耶夫,不要往来海滨晤面,也不要泄漏中国的机构情况^③;但拒绝同意禁止俄人赴海口,也不让利哈乔夫赴北京;因为这将“致令该夷有所借口”,引起麻烦。同日,有一谕旨重申此意^④。

伊格纳提耶夫于6月1日抵北塘,立刻乘坐“日本人”号去上海。他所乘的这条帆船因海上风滞,航行六天,始于6月16日抵达上海。在上海,他竭尽全力去执行给他的指令,并重施普提雅廷的故技^⑤。不过,他随即发觉他在中国人当中的处境,并不比普提

①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前书。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51,第7页上(咸丰十年四月初九)。

③ 《筹办夷务始末》原文为“俄夷备知底细,亦不在往返晤面,便不泄漏机关,总之在御之得法……”作者误解原意——译者。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51,第15页下。

⑤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前书,这次因无风不能前进的事他视为是一件有损他的尊严的灾难而向其他国家使节和中国人隐瞒了。

雅廷过去的处境更有利,而他与西方使节的关系,又与普提雅廷有²²⁷所不同。

英国政府对于近年来俄、中关系的经过,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情报。只不过对于它的真正性质多少有所觉察。奕訢将奕山革职^①并枷号吉拉明阿的消息载于《京报》,一份抄本送到了上海。1859年7月31日,卜鲁斯将一份译本送致外交大臣,并附有评论,说这至少证明必然已将乌苏里江一岸,在璦琿条约中让与俄国了^②。1859年8月10日,卜普斯又送了一份耸人听闻的情报给罗素,说伊格纳提耶夫已经于5月末^③与中国人批准互换了某种条约。这显然是对4月份彼罗夫斯基取得《天津条约》认可的传闻的误解。但英国政府无法确悉这背后到底是些什么事。另外,英国政府也弄不清它在大沽的失败,在多大程度上与俄国在北京的挑唆有关。至少,女王的丈夫相信俄国人从中插了一手,因而1859年9月24日,他写信给马姆斯伯里伯爵说:“俄国人已经利用他们自己的‘最惠国条款’,在我们的条约之下溜进(北京)去了。他们显然就是阻挠英国使节去北京的阴谋的教唆者^④”。

英俄关系的一般调子仍然相当友好。1859年6月11日,哥尔恰科夫写信给驻伦敦的布隆诺夫^⑤。信内显然曾令他找机会与罗素会晤,以便探听英国政府的对俄态度。布隆诺夫将这封信转给罗素。罗素于7月16日以私函答复说:

“我现在把承你信任秘密见示的那封信奉还——我已将

① 按《筹办夷务始末》,卷37,第11页下,应为革职留任。——译者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17/313。卜鲁斯在这封信中也送去了一个有趣味的,至少是部分正确的汇报。谈到俄国使团在北京的不得劲的处境。这是由法国的旅游者罗索尔传出来的,这个人化装成波兰人,随俄国传递快信的人混入北京。但因无法在那里停留,遂返回俄国,再由那里经海路重至中国。

③ 同上。

④ 马姆斯伯里文书,第三代马姆斯伯里伯爵的文件。

⑤ 罗素文书,30/22/114。

此信交巴麦尊等阅看，并获得极好效果——巴麦尊在对我的答话中说：“我曾于星期六晚间跟布隆诺夫谈过，并且告诉他说，我对俄国不怀敌意。我，以及整个英国之所以反对俄国，只是在我们觉得俄国政策有损于我们视为必须加以维护的利益的时候。我还提醒他，我跟他两人，在我们两国政府意见一致的事情上，曾经有过友好的共同行动。我接着说，既然英国与俄国对于欧洲正在发生或行将发生的事态，并没有基本分歧，看来我们或许是能够协调一致的’。——这虽然不是一个正式的答复，但它表达了友好情绪，我希望哥尔恰科夫能够改变他的想法，不再认为巴麦尊是个永久地、一贯地敌视俄国的人”。

女王陛下政府宽慰地觉得俄国方面是不会对英国作出急迫而重大的挑战了。克兰普敦爵士于1859年5月自圣彼得堡发回英国一封信，报告了俄国的军事力量。对此，巴麦尊写信给罗素说：“发现俄国的军队和海军处于如此落后的状态是使人高兴的”^①。

克兰普敦于1859年7月29日在一封私信中^②向罗素勋爵报告说，他曾与哥尔恰科夫谈过一次。哥尔恰科夫的语气是“对英国完全友好的”。克兰普敦接下去谈到中国事务说：“虽然我不怀疑，我们的挫败必然不会得到多大同情，可是我也没有看见任何方面露出不合适的幸灾乐祸情绪。我认为他们没有沉湎于幻想，并不以为我们最后会失败，而他们则能够保住局势为他们带来的好处”。

哥尔恰科夫还是把有关中国的事继续对英国使节极端保密。1859年9月12日，克兰普敦秘密向罗素报告^③，哥尔恰科夫曾将伊格纳提耶夫不久以前递来的公文中相当长的一段交给了他。伊

① 罗素文书。30/22/20。

② 同上。30/22/83。

③ 英国外交部档案，65/537。

格纳提耶夫在这段公文中描述了北京朝廷怎样为西方各国的使节²²⁹都准备了房屋；这段公文还很肯定地说僧格林沁在大沽攻击他们的行动并非奉命的。克兰普敦接下去写道：

“哥尔恰科夫表示，他自然无意保证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也不保证中国朝廷的信实，但是他想我们或者对这些新闻感兴趣。

“中国政府似曾告诉过伊格纳提耶夫将军，由于他们遭到所谓的英、法和美国方面的侵略，皇帝对这些国家所负的一切条约义务便都解除了，而且，这些条约都还没有批准的。他们还宣称他们准备履行自己对俄国的义务，与俄国所订条约的批准书已经互换过了。

“哥尔恰科夫在结束时说，俄国驻北京公使已经得到了全面的指示：如果有其他国家邀请，他即处于斡旋的地位，作出和解安排，以消除这次不幸事端所必然引起的种种纠纷”。

然而，英国政府没有趁此机会采取行动。罗素在1859年9月的信上^①，命令克兰普敦“特别注意”搜集俄国对中国和中亚政策的情报。外交部终于因为自己没有理会这件事而感到不安。

由于这个指令，克兰普敦于1859年10月7日写信给罗素^②，承认他并没有新的情报可资报告，并以下述词句原谅自己：

“我在探听任何事实或详细情节的时候，拿到手的无非是俄国政府本身认为宜于让我秘密知道的那些，和它认为适合于公开的很少几件事情。除此之外，我所遇到的困难是极罕见的”。他于申述俄国政府监督公职人员之严以后，又惋惜一位绅士最近出于必要而从俄国远走高飞的事。此人“曾经不时

① 英国外交部档案65/533。见克兰普敦致罗素7/10/59。英国外交部档案65/537。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65/537。

地把一些有趣材料交给我的前任和我^①，使我们获益不浅”。他接下去写道：

“再没有别的题目比这个政府在它的亚洲边界上所采取的行动，更受保密制度的严格控制了。外交部内单独设立一个部门，处理俄国与亚洲各国，当然包括中国在内的关系。在那里酝酿过或采纳过的计划，从来没有成为公开议论的题目。人们只是在命令业已在帝国的最遥远部分——这些往往是任何的外国代理人所观察不到的地方——已经付诸实施的时候才知道。在圣彼得堡获得正确情报的另一障碍是，这地方尽管政治上帝国首都，但地理上却位于边缘地带。在亚洲东部的领事或其他人员——即使我们雇用了他们的话——所传递出来的一切消息，都必须经过俄国邮局之手。

“关于俄国政府对中国的看法，和人们疑心中国的胜利或多或少得力于俄国的指教和物质援助一事，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事实根据，我对这两者目前除从俄国政府成员的言谈举动，和俄国官方报刊上既短且少的报导中获得一些消息外，别无其他办法可资查核判断。就这些消息本身来看，情况或许是可以令人满意的。哥尔恰科夫对于大沽之事始终表示惋惜；他似乎完全理解英、法两盟国政府必然深感有必要给予中国朝廷以严厉惩罚，来为英、法所蒙受的损伤，取得最最充分的补偿。”

然而，哥尔恰科夫又认为英国首相和他的政府“已经得到小小的意外收获”。哥尔恰科夫对于俄国曾给北京朝廷以援助之说，斥之为“荒唐得不值一提”，并说他已有一篇驳斥此说的文章，交给
231 《圣彼得堡报》。克兰普敦以为伊格纳提耶夫不会劝中国朝廷抵抗

① 把对俄国陆海军的估计数字透露给克兰普敦的可能就是此人。

英国,因为这种说法“或许会引起一些更不符合俄国利益和观点的后果”。由于距离遥远,俄国不大可能大规模支援中国,而且这样做将不可避免地为人所知,并导致与英国分裂。从整个来看,克兰普敦归结为英国无需耽心会在中国受到俄国的严重阻挠。

12月23日,克兰普敦给罗素送了一份阿穆尔地图,并给他写了私人信件,说据“商人”报告,俄国使节在北京的处境极为不佳,而中国皇帝表示“意欲推翻与俄国订立的条约,并将收回阿穆尔附近已让与的领土”^①。

但外交部仍不满意,1月7日写信给克兰普敦^②,尖锐地批评他只得到极其稀少的关于俄国各方面事务的情报,包括俄国与东方各国的交往。而在东方各地,英国与俄国的利益迟早是要发生直接冲突的。

英国似乎没有就派遣额尔金使团赴华事与俄国政府有过接触。但是,俄国驻伦敦大使布隆诺夫男爵,把给伊格纳提耶夫的最后指令的副本交给了外交部^③。这个副本,又转给了额尔金、卜鲁斯和克兰普敦。

总而言之,对伊格纳提耶夫愿意提供的帮助,英国政府并未对圣彼得堡做出感兴趣的表示。

额尔金收到的新指示,正如他1857年收到的和给予卜鲁斯的那些指示一样,全都没有提到俄国。指示只委婉地督促他完成使命,而不必从某个方面去取得协助^④。斯坦摩尔在他所写的《西德尼·赫伯特传》^⑤一书中指出,害怕俄国影响的扩大,是英国决定派出远征部队的真正原因。²³²“即使是内阁成员中的格拉德斯通、罗

① 罗素文书,30/22/83。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65/549。

③ 同上,和英国外交部档案17/333。

④ 《与英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卜鲁斯先生的往来文件》。

⑤ 斯坦摩尔:《西德尼·赫伯特传》(两卷,伦敦:1906年)。

素和米尔纳·吉布森”，他写道，“这三个曾在‘亚罗号’战争（即1857—1858年的对华远征）中批评巴麦尊最严厉的人，也都觉得有必要表示赞成”^①。

罗素于1859年9月19日写信给巴麦尊说^②：“看来未免奇怪，我这个曾经在‘亚罗号’案件中如此反对包令举动的人，竟然又会愿意支持卜鲁斯——可是事情就是这样。我不认为我们除同意与法国人合作，并只在天津讲和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行”。把英国统治阶层的心情总结得最简明的恐怕是克拉伦登了——他当时是反对党。他于9月18日写信给罗素说：“我不怀疑，我们的对华贸易，和居留该国的英国臣民的安全，以及我们在整个亚洲、甚至在欧洲的威望，都需要为这项失败，作出彰明较著的报复”^③。

1859年7月间罗素接掌英国外交部之后，经常向克拉伦登写信请教，并征询一些他自己所未曾涉猎到的外交事务细节，其中主要是关于中、俄两国的。1859年9月23日，克拉伦登在一封信中告诉罗素：“我敢说，我们在那些地方必须象对付蒙古人那样地去对付俄国人。他们千起事来喜欢鬼头鬼脑。不会愿意我们在北京，在那里我们能看到他们的野心——把中国阿穆尔和其他地方一点一点蚕食——以后的结果。现在在北京的那个伊格纳提耶夫将军是个极其聪明狡狴的家伙。前几年他曾到过英国。当时曾有一个出卖地图的人向我告发，伊格纳提耶夫雇他去把海图、我国各港口深浅水标以及铁路路线等弄到手（原文如此）。”^④

俄国跟法国的关系，比跟英国还是较为亲近的。但由于法国
233 在意大利的政策，和英、法在中国继续合作而带有一种紧张的

① 斯坦摩尔：《西德尼·赫伯特传》，卷2，第204页。伊格纳提耶夫认为1860年的远征所针对的，以直接指向俄国的在华影响的为多，对于中国本身则是较次的。《材料》第299页。

② 罗素文书，30/22/20。

③ 罗素文书，30/22/29。

④ 同上（克拉伦登不喜欢标点）。

成分。

1859年9月间，哥尔恰科夫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说服工作，力劝法国不要参加第二次对中国的武装远征。法国驻俄大使蒙特贝罗公爵为此于9月23日写了一封长信给瓦列夫斯基，提到哥尔恰科夫要求蒙特贝罗把他的意见秘密转告巴黎，说英、法海军将领们进逼白河的行为，无论从人权或策略观点来说，都是无法为之辩护的。而且，如果没有采取他们的那种做法，英、法天津条约或许已经批准，跟中国的和平已经建立了。蒙特贝罗在信内说哥尔恰科夫在进一步谈论此事时声称：

“……他认为，不应为了一个对我们仅具有次要意义的事业，而把我军投入一次遥远的征战之中，他对这一点十分重视，因而对我们讲话时所用的语言，就象他似乎荣幸地当了皇帝顾问而向皇帝讲话时所用的那种语言，他还请求我们，在我们弄清楚事实以前，先不要做出任何决定。而在他看来，事实是无可置疑的。如果事情的发展正如他所坚信的那样。他以为在赔礼道歉后，应接待我们驻京的公使礼仪应合乎他的身份，并批准条约，就我们说来，也该够了。他寻思究竟有哪些想法，使我们无法满足。他以为无非有两种考虑：我们的军队与英国的军队联合起来，在这些遥远的地带为共同的利益作战，我们在意大利问题上的观点就有可能获得这个强国的赞助，以及有必要在中华帝国提高我们的军威。”

哥尔恰科夫最后提议，如经亚历山大皇帝同意，他愿为法国出面斡旋。蒙特贝罗汇报说，他在这次会见中保持着“最大的审慎态度”，使他深为感动的是“哥尔恰科夫亲王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以致和我谈起这问题时，谈得很全面、很有层次——而他平时并不这样”。蒙特贝罗认为哥尔恰科夫之所以反对法国参加对中国 234 的远征，或许是由于怕英国会在靠近俄国远东属地之处取得立脚

点,也或许是由于耽心英、法联合对华作战,会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系^①。

10月11日瓦列夫斯基在回答蒙特贝罗的信件时,指示他要说明清楚法国为了自己在中国的威信,必定要在白河支援英国人。瓦列夫斯基这封信的底稿,最后两大段在发文时被删略,这两段文字表达了俄、法在远东的关系,值得在这里引述其中一部分:

“再说,我们当时的作法的确没有什么可让俄国担心的。它在亚洲北部扩张领土,不会引起我们的疑虑;我们出现在这些海面,也不可能成为它不安的理由。如果圣彼得堡的内阁,有意了解是什么性质的利益使我们在这一带出动海军的话,它就该相信在这些地带建立一种不会同它的影响竞争的影
响,对它是不会有什么妨碍的。”^②

此时,法国在圣彼得堡取得有关阿穆尔的情报来源似乎比英国要多得多。1859年10月21日,蒙特贝罗告诉瓦列夫斯基,俄国的天津条约已获批准。这是他从哥尔恰科夫处听来的。他同时呈送了一份1848年拉狄仁斯基上校所制的北京地图与一份阿穆尔地图给他的首长。他还在一封密函内提到,俄国测绘局1859年3月印行的地图上标明滨海省全省当时已转移给俄国。这比英国驻俄大使克兰普敦第一次在12月23日呈送给罗素勋爵的阿穆尔地图要早两个月。

235 搞不清楚法国对意大利和中国的意向,看来在俄国政府中是普遍的。1860年,蒙特贝罗向图温奈尔(五天前他被任命代替瓦列夫斯基任外交大臣)汇报,哥尔恰科夫催他讲明白法国的政策,

① 法国外交部档案,俄国集219。哥尔恰科夫也开玩笑似地对蒙特贝罗说,穆拉维约夫曾在签好他的条约之后,向中国人提出,要把碰巧在靠近边界之处的一些大炮送给他们,可是为中国人所拒绝。

② 同上。

并坚持说俄国并没有跟奥地利成立任何协议，只是诚挚希望跟法国而不是跟别的哪个强国一致行动。

1860年1月28日，图温奈尔就任外交大臣。2月1日，他致函蒙特贝罗，令其向哥尔恰科夫重申法国对俄国的友好^①。不过，俄国驻巴黎大使基谢列夫随即咨送一份照会给图温奈尔，要求他说明法国对中国的政策，其中提到给伊格纳提耶夫的指令，并建议法国为了外国对华贸易的利益，务必不要使用足以导致清朝覆亡的极端手段^②。维持清朝，正如克兰普敦所说，或许已经变成一件为圣彼得堡所关怀的事了。2月15日，图温奈尔写信给蒙特贝罗，附去照会副本一份。授权他以下列措词向俄国解释：

“圣彼得堡内阁利用采取这个十分友好步骤的机会，正如您将看到的，把在它看来会招致法国和美国对中国朝廷采取过于严峻的态度的不良后果通知我们；显而易见，他希望多少知道一些我们的意图。俄国政府在由于中俄两国政府的举止所造成的局面中，并非与中国内阁对峙，因此我们自然没有必要把我们在当前形势下要想做的事情告诉圣彼得堡内阁。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一点也没有理由对他完全隐瞒我们的决定。所以我觉得应该首先暗地向你说明帝国政府和不列颠女王陛下的政府共同采取的态度，以供您专门参考，必要时您在与哥尔恰可夫先生会谈时，可以使用这些情报。”^③ 236

法国政府就企图用这样的态度来使英国和俄国都感到满意。

蒙特贝罗也在一封2月15日发出并与前述来函交错的信中，向图温奈尔汇报说：哥尔恰科夫已把给伊格纳提耶夫的指令极为详尽地告诉了他，并把伊格纳提耶夫最近来信的内容也向他谈了。

① 法国外交部档案。

② 柯尔迪埃：《1860年的远征中国》（巴黎：1906年）第121页。

③ 法国外交部档案。

这位俄国使节在信中宣称：他认为，如果联军使节入京仅带少数随从，并仅限于在互换《天津条约》，中国人是不会拒绝的。他并再次向法国吁请，不要把事情做得太过份，也不要推翻清朝^①。1860年3月27日，图温奈尔又指示蒙特贝罗告诉哥尔恰科夫说：“法国急于尽快地跟北京朝廷取得合理的解决，因而就要挑选能对中国朝廷产生最大影响与威信的使节^②。”法国政府此时才向哥尔恰科夫重申保存北京清王朝确系法国的意图，看来未免为时太晚了。但是，法国并不放弃参加英国反对中国的军事远征的意图，也没有愿意接受伊格纳提耶夫的斡旋的任何表示。在给葛罗的官方指令中，正如额尔金勋爵得到的那些指令一样，没有提俄国^③。

法、英继续团结一致，可能是使哥尔恰科夫遗憾的事。因为，他于1859年9月找蒙特贝罗谈话时曾经提及，他向美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皮肯斯说过，他认为俄国或许会劝法国不要再去参与新的英中战争^④。迟至11月21日，哥尔恰科夫又在与皮肯斯的另一次会见中，重申了这一希望。在此之后，皮肯斯写信给卡斯说：“哥
237 尔恰科夫表示这种意见：法国皇帝不要急于跟英国合作在中国从事任何大规模的战争——而据我理解哥尔恰科夫亲王的意思是表示，即便是英国也并不愿法国跟他们一起去打中国”。哥尔恰科夫并接下去说，俄中两国之间的条约已在施行，因为俄国在中国各通商海口没有贸易，而他们又放弃了每三月从北京到伊尔库茨克来往商队的条款。

“他欣然谈到俄国和我国政府在中国的关系。他希望我们，正如过去我们已经做过的那样，以最真诚的态度来办事。他告诉我，

① 柯尔迪埃，前书，卷2，第122—123页。

② 法国外交部档案。

③ 柯尔迪埃前书，卷2，第124—137页。

④ 美国国务院所藏手稿35/18，皮肯斯致卡斯23/9/59。

总统不赞成我们的舰只和海军司令在白河事件中提出的救应和支援。他们(即俄国人)现在急于跟中国人搞好关系,他们着眼发展他们与中国毗邻的亚细亚地方重于其他一切。他们为移民垦殖阿穆尔地方做了很大努力。……而且还即将从此地,或者从莫斯科修建一条电报线直通阿穆尔”^①。

1860年1月24日,皮肯斯向国务卿汇报^②,哥尔恰科夫已将给伊格纳提耶夫的指令向他讲了,还说到:

“皇帝关切我们的公使华若翰是否仍在与俄国公使友好地一致行动。如果方便,他也希望能占有一只停在河中的美国战舰,这样可以接近俄国公使,以及如果适当,这样他可以象俄国公使应当做的那样,有助于在中国与英、法之间所进行的调解努力。他认为俄国对这几个强国之间的敌对行动没有任何兴趣。他对我们的政府表示最同情、最诚挚的感情。……他谈到俄国公使现在北京,主要是为了执行从前跟中国订过的 238 的有关两国边界的条约。他在那里是为解决边界问题,此事要比订立重大的商务条约的任何意图更重要。”

俄国在华盛顿的使节斯托克利,以同样的精神往见国务卿,并把哥尔恰科夫致俄国驻伦敦使节布隆诺夫男爵,要他交给英国外交部的有关伊格纳提耶夫的指令的信的副本给国务卿看了。1860年2月18日,卡斯写信给斯特克利,为此信向他致谢,并说:“我以非常喜悦的心情,从这封信里看到皇帝在以英法为一方,中国为另一方的即将发生的争端中所持的公正见解。我请你向哥尔恰科夫亲王保证,这一见解正是与美国总统所指示美国方面拟在中国推行的政策相一致的”^③。

① 美国国务院所藏手稿 35/18。

② 同上。

③ 美国国务院所藏手稿 38/82。

1860年2月23日，卡斯给华若翰有关联军远征部队的指令命他：“亲自与俄国公使随便交往，并且在为斡旋而作的一切合理努力中都与之合作^①”。

这样，伊格纳提耶夫所处的外交地位，只有与美国使节的关系差堪与普提雅廷相比，可是即使在这一方面，情况比1858年也是有些冷淡的。列卫廉与普提雅廷的亲密关系，并不能证明就是俄、美两国之间任何紧密联系的先驱。柯林斯对发展阿穆尔地区俄一美的商务所作的美梦，在现实中很少成果，他本人没有再返回远东。美国驻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副领事蔡斯，1859年12月19日^②写信给他说：“阿穆尔上游索非斯克（约距尼古拉耶夫斯克三百五十俄里）已完全禁止外商贸易^③，致使取得内地情报的办法极不能令人满意，发展当地资源的希望已经成比例地降低”。蔡斯报告说，²³⁹“谣传当地的俄国人与中国当局，由于两国政府对于订立有关阿穆尔河及其各支流的条约各作不同解释而产生纠纷。盛传这些纠葛所造成的后果之一是中国当局完全禁止他们的臣民把他们的物产卖给俄国人，已有一个中国老百姓因违禁而被绞杀。还传说有个俄国商人企图上溯松花江，在靠近江口处被一些汉人或满人杀死。为此已给予了俄国人全部赔偿”。另有谣传，中国人反对俄国人在松花江左岸定居，那一带现有“政府行动”。但是，蔡斯没有关于阿穆尔以南满洲沿海一带俄人居留地的“可靠情报”^④。

1859年10月29日，柯林斯从圣彼得堡亲自写信给卡斯，说美国已从俄国得到了为阿穆尔订购的约值一百万美元的轮船和机器订货单。美国已有值两百万的货物由船载往彼处。可是，这些说

① 美国国务院所藏手稿77/38。

② 美国国务院档案，美国驻阿穆尔领事的报告。

③ 奉穆拉维约夫1859年5月间的命令。此事前曾由普提雅廷于1857年建议过。见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载《布拉戈维申斯克：1959》第183页。

④ 美国驻阿穆尔领事的报告。

法正确与否值得怀疑。柯林斯不过是以此为他在同一封信中提出的宏伟计划进行辩护。他打算使用美国资本,从圣彼得堡开始敷设一条电报线,经过北京直抵日本江户。可是,1860年3月3日蔡斯自尼古拉耶夫斯克汇报,强调指出运输笨重货物上溯阿穆尔河至伊尔库茨克,要想卖到有利价钱是非常困难的。他接着说:尼古拉耶夫斯克的贸易,近来由于某些原因并不象美国国内一般所期待的那样,特别令人满意和鼓舞……目前,外国人在那里开辟并继续进行贸易的吸引力量并不大。

甚至连柯林斯本人此时也头脑清醒过来了。1860年5月1日他写信给卡斯,对俄国政府在阿穆尔的商业政策大肆责备,并附寄《圣彼得堡报》上一篇文章的译文。这篇文章提到1859年只有十
240
三只外国船开到阿穆尔。他认为阿穆尔公司在圣彼得堡和伊尔库茨克的“经营管理可悲的拙劣”。他并说:“可是在俄国,象这类性质的企业大多经营得很糟,因为商业企业当中缺乏生气,一大批雇员都在这类企业中领养老金,他们肯定会在很短的时期内把企业榨取得几乎一干二净”。柯林斯在这封信中也报告了他的电报线计划失败^①。

在伊格纳提耶夫的《报告》^②中,他自己对他此时采取的策略作了描绘。他要挑动中、英争端,以使中国人和英国人都不会在中国彻底战败之前妥协讲和。他甚至要做到听任英国人径自推翻清朝的程度。因为,再没有哪一伙当政的人比清朝权贵更对俄国人怀有敌意的了。伊格纳提耶夫使自己成为联军必不可少的顾问,同时又诱骗中国人尊敬他为朋友,对俄国所求无不首肯。对于法国,伊格纳提耶夫的任务就是挑拨他们跟英国的关系,并取得他们

① 美国驻阿穆尔领事的报告。

②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前书,第300页等和《报告》第1页。这也是明白的,他受命阻止西方使节长驻北京。

的支持,保持俄国在远东的利益以抵御英国。最后,他必须转移所有西方国家驻华使节的视线,使他们不注意俄国对中国的“未了事件”,还必须防止他们干预这件事,即使是间接地干预也不行。

在额尔金勋爵抵达上海之前,伊格纳提耶夫已经见过英国公使卜鲁斯。6月27日卜鲁斯致罗素勋爵的一封长长的密件中,对这次会见的大致情况作了描述^①。因为这封信太长,我们充其量只能把有关部分加以摘引。它使《材料》上的说法得到很好的印证。

“密件亲启

上海,1860年6月27日

亲爱的勋爵

241

伊格纳提耶夫在谈话过程中,表述了他现在和将来在中国推行的政策。阁下对此想必希望知道。他显然亟欲使人们不要以为俄国正在中国推行扩张政策,或者,在大家一致要求增加与中国交往的便利,并要求更自由地与中国政府接触这些事情上,以为俄国与英、法盟国意见不同。他承认,为了开发西伯利亚,在那里的海岸取得一个四季通航的港口是绝对必要的。他也承认取得这些是俄国相当时期以来的政策目标。他辩解说,俄国人所作的不过是重新进入1679年(原文如此)以前就属于他们的土地。当时他们是被中国人撵出去的。现在由于互相交换,边界已在两国政府之间确定下来。——他希望我体会得到俄国所特有的这些目标现在已经完全达到了”。

伊格纳提耶夫继续说道:如果有一国的外交使节留驻北京,他的处境即将十分难堪。他业已要求他的政府不要留一个使节在这里,如果英、法盟国并不坚持把他们的使节留下的话。他认为,如果想使西方国家与北京朝廷的更加紧密的接触产生有益的效果,则:

^① 罗素文书,30/22/49。

“……各国使节唯有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经常和谐地合作，绝不只为自己一方争夺势力和取得优势而各行其是。在这个题目上，他发表了长篇议论。他说：就外交这个字的意义而言，中国还不是一个办外交的场所。在中国，一切外国人都都是猜疑和嫌恶的对象。一国的代表决不能单独取得势力，除非他肯违反大家的共同利益，用一种敌视文明和进步的精神来办事，中国人死抱着他们的想法，以为外国都是分歧互嫉的，可以用以夷制夷的办法来对付。他们并非不希望外国人之间的这种对立会促使俄国人把他们的工程师和武器借给中国人用来防卫大沽。的确，他们曾经以协助镇压叛乱为名，提出过这种要求，可是没有得到同意。”

伊格纳提耶夫然后就呼吁要把军机处作为一个整体去跟它打交道，而不要依赖个别钦差或委员，这些人是不会把事实真相报告²⁴²给他们的朝廷的。他说为此他不曾找过哪一个钦差或委员去办任何事情。他告诉卜鲁斯说，何^①曾于1859年上过奏折，要在各通商口岸鼓动反抗，而他则曾在1859年敦促中国人屈从英国军队的要求。他似乎含蓄地示意，攻克大沽是有其必要的。他说：“公布发交卜鲁斯的第一个指示和额尔金到达的消息，为北京的激烈派增添了信心。因为他们认为这差不多就是否定了原先在此地推行的路线；他们还有理由期待会作出让步”。卜鲁斯在这封信的结尾处写道：“我应当提到，伊格纳提耶夫将军相信对于条约中作出的主要让步，例如长驻北京，长江通航，护照制度等等，或者由于文件曾经窜改，或者由于其他原因，皇帝已经被人蒙蔽了”^②。

① 指何桂清——译者。

② 这在中国档案中没有证明（见斯威舍）说它是真实的。《材料》中也没有证据说伊格纳提耶夫相信它是真实的。正如他与卜鲁斯的许多谈话一样，可能是故意说假话。

额尔金到达上海之后不久，即与伊格纳提耶夫建立了亲切的关系，这从这两个人自己所作关于这一时期的记述中得到证明。额尔金一到便喜欢这个俄国使节，并在他的私人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①。伊格纳提耶夫还鼓动他从速推进战争。两个人在以后几个月中会晤多次。但是，他们之间的正式接触则是稀少的。关于他们在10月份之前的关系，我们还没有发现到尚未公布的材料，能增添一点已公布材料中大家知道的他们的关系。法国外交部档案拥有一份至今尚未公布过的1860年6月10日布尔布隆给图温奈尔的报告，就伊格纳提耶夫刚到上海时，与法国使馆的波兰籍一等秘书哥士耆的一次谈话所作的汇报。这一文件在描绘了伊格纳提耶夫的到达以后写道：

“哥士耆先生今天曾代表我去看望和问候俄国公使。下面是他同后者会谈的报告。伊格纳提耶夫将军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至少在表面上热诚到了极点。他是从北京直接来的，为了等候本国的军舰，曾在北塘逗留十天。他怕受连累，也为了避免中国当局的指责，没有取道大沽……，他离开北京，旨在向中国朝廷表明，在面对中国事务的时候，海上列强之间存在着一种共同关系。他曾经竭力劝告北京内阁克制自己，并指出它行为荒谬，尤其是在对法国的关系上，后者去年确实受到了侮辱。不过，他的劝告无济于事”。

伊格纳提耶夫继续讲了北京主战派的情况^②。强调在大沽对中国人奋力痛击所可能得到的有益效果。他呼吁，欧洲列强之间

① 见9月27日与10月31日的记载，日记中7月21日记载表示出额尔金很了解法、俄使节合作的可能性。而伊格纳提耶夫对额尔金所得的第一次印象则是“冷酷、傲慢、明显地善疑”（《报告》，第6页）。

② 他告诉哥士耆，主战派以肃顺和北京五城巡捕头子郑亲王端华为中心。事实上，这几个都是最反俄的人物。伊格纳提耶夫深知此事，并且在《材料》内提过。《材料》中写作僧(Seng)亲王，但无疑就是郑(Cheng)亲王。

一定不会出现不和。他对法国政府表示极为友好。提到克里米亚战争时,他说这只是两兄弟之间的一次交锋。后来,他谈到了俄、法在中国合作这个题目时说道:

“在他看来,法国的利益和俄国的利益,在这些地方决不是对立的。据哥士耆所能回忆的,说他还补充了一句,意思是谈到别的国家,情形恰好就不同了;言外之意,看来是把我们同英国人明确地加以区别。在全部会谈中,哥士耆先生自然也涉及两个帝国之间应当存在的真诚团结与友谊关系,不过²⁴⁴他没有存心或者无意中流露出非难英国人和他们在这些地方的政策。”

布尔布隆结束道:在见过伊格纳提耶夫之后,哥士耆到卜鲁斯处“向他提供自己收集到的一般情报,来证明两国使馆之间的真诚关系。”

在这次见面后,伊格纳提耶夫又会见布尔布隆多次,并催他赶紧执行攻打中国的军事计划,以此来作为教训清廷的唯一手段^①。他在6月26日致布尔布隆一封很长的正式信件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他在信中提到并没有任何关于推翻了《璦琿条约》的说法。他说他曾在北京费了一番工夫说服中国人履行他们在《天津条约》中对西方各国所负的义务。葛罗到达上海以后,对伊格纳提耶夫本人和他对法语的运用自如,产生良好印象^②。

这位俄国使节对美国使节华若翰的笼络,在华若翰1860年6月29日给国务卿卡斯的一份未曾公布过的汇报中有所叙述^③。华若翰在描述了伊格纳提耶夫的到达之后,说伊格纳提耶夫会见了 他。“并告诉我他离开北直隶湾来此是为了和我进行商量”。伊格

① 柯尔迪埃,前书,第207页,和伊格纳提耶夫:《材料》,前书。

② 柯尔迪埃,前书,208及其后各页。

③ 美国国务院所藏手稿92/20,华若翰致卡斯20/5/60。

纳提耶夫告诉他满人政权处于不稳定状态，并结论说，北京以及“全国到处都给人一种印象，即：皇朝即将被推翻。只有一线希望能圆满解决当前的争端——那就是大沽炮台陷落后，中国人或许会就范讲和。我深信联军深入内地，后果必将招致各方面利益惨重损失”。或许从上面引证的第一句话起，就可以推测出伊格纳提耶夫发现华若翰之易于摆布，正如普提雅廷对列卫廉一样。因为从华若翰向卡斯所作汇报中，看不出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不是按照伊格纳提耶夫原话的表面价值全盘接受的。这位俄国使节对这个
245 美国人的影响，由于另一个美国人阿尔伯特·赫尔德的关系而进一步加强。赫尔德当时既被任命为俄国驻上海领事，又兼充华若翰将军的秘书，因为这一阵子这位美国公使由于卫三畏休假回国而身边没有译员和秘书^①。

伊格纳提耶夫与华若翰 1860 年 6 月 18、19 日来往的正式信件，美国政府从未公布。不过，它也并不使人感到太大的兴趣^②。

伊格纳提耶夫在上海的时候，并没有去跟中国当局进行任何交涉。这使江苏巡抚薛焕迷惑不解，并引起他的疑虑。他在 7 月 13 日送达奕訢的奏折内奏报道：伊格纳提耶夫已行抵上海，竭力煽动英、法攻打天津^③。在此奏折上硃批的意见是伊格纳提耶夫企图“于中取利”。同日，又降旨令薛焕向其他西方使节讽示，伊格纳提耶夫的真实意图在于诱使他们败在中国手里，以便讨好中国^④。这一想法比其他许多以清帝名义提出的策略高明一些，但它同样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7 月 4 日（6 月 22 日），伊格纳提耶夫离沪去日本，7 月 7 日到

①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前书，唐德刚，前书，第 141 页。

② 美国国务院所藏手稿 92/20。

③ 斯威舍，前书，第 651 页（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五日）。

④ 同上，第 652 页。

长崎,待了四天后他又再次到了北塘,到那里是7月15日^①。

除了伊格纳提耶夫在他的《材料》和报告中所记他自己在北塘的活动的资料外,斯威舍把中国文献中于1860年7月14日—8月4日这期间提到俄国的文件,几乎都翻译了。为此,我们仅就这一时期的谈判作一简单摘要。

在伊格纳提耶夫去日本之先,他已派遣了塔塔里诺夫另乘一船径赴北塘,告诉中国人他答应出面斡旋并交给他们一件由他和华若翰代表他们的政府联名签署的照会^②。在僧格林沁的命令下,港口官员拒不接受此项文件,虽然他同意将一封信件转交给留下来负责北京教士团的大司祭古里^③。伊格纳提耶夫到达北塘时,²⁴⁶又发出三件照会给军机处^④。仅有7月21日的一份咨文对此作了答复。咨文提出,如英、法愿如华若翰那样,前来互换《天津条约》,则仍可保持和好^⑤。

然而,伊格纳提耶夫没有理睬这份咨文。他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他之所以如此,因为他试图斡旋,就将要影响到俄国的中立,并将自己置于极为窘困的境地。不过,很清楚,真正的理由是现在已经认识到北京朝廷如不在大沽再失败一次,就不会顺顺当当地批准《瑷珲条约》,或者接受联军的要求,英国人也决计不会同意按照华若翰方式换约。在这个阶段,任何斡旋的打算所能给伊格纳提耶夫带来的那点好处,就得要象普提雅廷付出的努力所得到的那样微不足道。不过,他私下里把中国的咨文告诉了葛罗^⑥。

①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前书,第266及其后各页。

②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前书,第266及其后各页。

③ 斯威舍,第654页。

④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前书。

⑤ 同上,和《筹办夷务始末》,卷54,第13页下(咸丰十年六月初四)。

⑥ 柯尔迪埃,前书,第245—249页有部分译文。

这段时期当中，伊格纳提耶夫因之远远避开中国人，而全力以赴地去和英、法搞好关系。7月19日，在烟台拜访了法国舰队，在孟斗班将军处逗留，受到了丰盛的接待，为了避免联军向他追问得太紧，两天后就离开了^①。尽管伊格纳提耶夫自信他的访问是一个极大的成功，法国的海军将领们事实上却一点也不欣赏这件事。不过，葛罗男爵现在已全被俄国使节争取过去了。7月24日，他向图温奈尔汇报“俄国将军这次在〔我军〕兵营的逗留，是被我军总司令以不高兴的态度来看待的。我的意见则与他们不同，而且我相信，伊格纳提耶夫将军对我们的态度，要比他对中国朝廷的态度好得多”^②。

247 中国人当时试图离间美国公使与俄国公使，他们告诉美国公使说，伊格纳提耶夫去日本时，据说交给塔塔里诺夫，要他让中国人接受的那件照会，俄国人始终没有交出来。7月30日，发布了一件谕旨，指示应向华若翰就美国这件照会的事，对伊格纳提耶夫提出责难。谕旨内还提到据僧格林沁奏报，明常^③曾告诉他，美国人的这件照会已经交给中国方面了。中国人又向华若翰重提讲和的条件。7月31日有两道旨谕，详细论述了要设法使华若翰居中调停。同时，僧格林沁递来奏折，报告说华若翰自行表示愿充调人。尽管如此，华若翰的调停证明是没有用处的。他的活动只惹起英、法方面的讨厌。8月1日，英、法军队强行登陆之后，激烈的战事于8月3日开始^④。

①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前书，第275页及其后各页。伊格纳提耶夫在他的《报告》中提到，他与葛罗和布尔布隆的关系热烈，早在6月里就开始了。

② 柯尔迪埃，前书，卷2，第234页。

③ 即塔塔里诺夫，明常是他的中文名字。——译者

④ 斯威舍，前书，第662—673页。与柯尔迪埃，前书，246—247页。曼考尔也提到这一点（《哈佛有关中国的文件》卷10，第72页）但华若翰似乎不认真看待，在他的官方报告中，没有提到这事。

华若翰在事先通知伊格纳提耶夫之后^①，于8月7日退至烟台。此后，他没有再作进一步调停的尝试。俄国公使跟他友好地分手，但是私下里却向额尔金和葛罗强调他本人已经不参与美国人努力进行的活动，而且早在四个西方国家的使节同赴北塘之前，他即已跟中国人没有个人接触^②。

英国人对待俄国的态度，并没有因英国攻陷大沽炮台之后，从搜获的大量中国官方文件当中发现有一件是关于俄国的而有所改变。这是军机处于1860年3月23日致僧格林沁信件，通知他说伊格纳提耶夫要求准许俄国船只开到北塘传递邮件。这份信件中提到俄国船可能假装运来大炮和枪枝。因此，英国人从这个文件中进一步得到了俄国供应武器的风声。这封信的译文于1860年8月23日由额尔金寄交罗素勋爵^③。此际，上海英国报纸的访员²⁴⁸大约就在同一时候，从中国方面探悉北京朝廷拒绝批准阿穆尔—乌苏里的边界，并一再刊出关于此事的报导。可是，英、法在北方的代表，却无一人向伊格纳提耶夫就此事提出过任何问题^④。他们也没有把此事向英国或法国外交大臣作过汇报。可能，他们因为伊格纳提耶夫跟他们在一起，就认为这充分证明他在北京的使命未获成功。

此时，奕訢对俄国的态度又再度强硬。8月12日，他收到僧格林沁的奏折^⑤，内中描写了军事情况，并报称额尔金“阴险凶悍，异于常人”。这位亲王随之提到俄国人的行为如下：

“至俄夷尤堪痛恨。八年结伴而来，肆意要求。上年甫经

① 美国国务院所藏手稿 92/20。

②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前书，第289页。伊格纳提耶夫在他的《报告》中着重讲到华若翰的离开，留给给他的是使他处在一个比普提雅廷更糟的境遇里。

③ 英国外交部档案 17/330。

④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前书，第299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55，第29页上（咸丰十年六月二十六日）。

接仗以后,该夷即至海口。本年由京前往上海,勾引各国同时而至。近日^①北塘泛舟出村……。据称 15 日系俄夷引路,占据北塘。美夷声称,17 日之战,俄夷亦曾协助兵力^②,是该夷心怀叵测已可概见……。现在俄夷船只,仍在北塘河外停泊,并无动静,其意似有所待。前由军机处由驿递出俄罗斯毡包一个,奴才等暂存,尚未发给该夷。至英、法二夷,如有转机,择地会面之期^③;倘俄夷同来,应否准其会面答话,奴才等未敢擅使,伏候训示”。

复谕^④与额尔金直接谈判,该旨继续说道:

“至俄夷播弄是非,勾结挑衅……最为可恶。此时亦不必明言,并可照会美夷,询其前次中国信函曾否向俄夷要回,俾该夷互相猜忌。至法酋^⑤,如愿择地会面,即或俄夷同来,毋庸阻止。恒福不必向其答话。再前俄夷所寄毡包一件,著即送去,并告知该夷现无应商之事。催令即行启碇,勿在海口逗留”。

奕訢对俄国人的语气更加轻蔑,并非单纯由于受僧格林沁所上奏折的一时影响。他大概也为终于有消息传到北京,在黑龙江屯居的俄国人遇到严重困难一事所左右。7 月 1 日,(十年五月十三日)景淳的一份颇长的奏折送达皇上^⑥,奏报 3 月 15 日,^⑦俄人一伙闯入三姓附近贸易,将乌苏里河谷之嫩江上的中国卡所食物全部抢去,并欲将卡官和吉拉明阿截去,以为要挟中国通商的手段。

① 英文误为今日(to day),查《筹办夷务始末》,实为“近日”。——译者。

② 无论在那份报告里,看来都没有任何真实性。

③ 此处系按《筹办夷务始末》,卷 55,第 30 页上抄录,按原文译应为:“如我有机会,我将约定时间、地点会见英、法二夷。”——译者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 55,第 30 页下。

⑤ 按《筹办夷务始末》,卷 55,第 31 页下原文应为“至英法二酋”。——译者

⑥ 《筹办夷务始末》,卷 52,第 7 页上。

⑦ 系 2 月 23 日——译者。

清军当即撤换，而以赫哲人替代。俄人在阿穆尔河、松花江汇合处的左岸，向该赫哲人挥手以示友好，并似乎已经觉察设有伏兵而发生疑惧。赫哲人报称，阿穆尔河下游的俄国人已在挨饿，并且都反²⁵⁰对穆拉维约夫。对于这些赫哲人与俄国人之间早已发生的不和，以及俄人企图收买赫哲人的首领未能成功，此折有详尽的奏报。从宁古塔署副都统佐领富新传来的有趣新闻：系一名满兵赴兴凯湖西岸，见有俄人新建房三所，内中无人，堆积羊草数千捆，乘空将其房焚毁。随即赴兴凯湖北岸，见房二所亦即烧毁“无事”。琿春协领台斐音阿报称，有俄人三十名，携炮、牛、马、犬、食粮及火枪、帐篷，4月25日于摩阔岁迤南海岸着陆。他告诉他们“不准”上岸，但此辈全然不理。5月8日^①，有数人撑驾小船赴海，余则看守器物。景淳奏折结语如下：“奴才督率官兵西丹以及牲丁，加意严防，无论何项夷人，断不准登岸。……俄夷要求通商……原为接济口粮，占据山场起见，奴才上年奏明三姓严禁货换，如敢违犯，请照军法从事”^②。他又附带谈及，已将禁令向山场人夫申明，并呈求将吉拉明阿免于枷号，因他实已患病。复谕^③令继续在山场招募揽头，禁止交易，著将乌苏里与绥芬空旷之地交揽头开垦，准将吉拉明阿释放。

特普钦于8月9日再上一奏折^④，说明由于“六十四屯增防之后，夷情稍见安戢”^⑤。爱绅泰奏报称，海兰泡俄方头目或联络官布色依请求，中国禁换酒类与俄人，因当时供应俄人“货少酒多，夷人²⁵¹饮之，多病致毙”。爱绅泰也接待了一名俄皇侍臣玛克什莫幅（马克

① 系3月18日。——译者

② 引文内删节号系译者所加。——译者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54，第11页下。

④ 同上，卷55，第22页下（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三日）。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55，第22页下为“挑派余丁屯防去后，夷情稍见安戢”。——

西莫夫?)的来访,该人称他在穆拉维约夫不在时,前来视察这个地区,并已下令让俄人安静守法。这一年冰融后,俄人庞大的远征的船只、木筏下驶黑龙江,但特普钦并未报陈人船为数多少等情况。传闻俄人在黑龙江左岸空地垦荒。同日降旨令仍禁止供应食物并调查俄夷在左岸的垦荒活动^①。

阿穆尔的情况,是躲不过那位没有取得认可的美国驻尼古拉耶夫斯克副领事的注意的。美、俄在那里的关系,到1860年夏天还是前途无望。1860年6月30日,蔡斯写信给柯林斯,说迭卡斯德湾不再给外国人派领水员。他还写道:

“……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对外贸易,或指定给外国人的贸易限额,与上年相较,没有实质上的增长,而且受到限制。此际遇到的困难与干扰,部分是由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地方当局强加给某些贸易分公司的……它既不减,也不增,到目前为止,这里没有建立出口贸易的任何迹象。在上年冬天那段时间当中,阿穆尔上游居民的对外贸易受到限制,许多必要的物品完全取消了。如果不是这样限制对外贸易,这些物品无疑是能得到的”。

关于中国当局,蔡斯说道:“从这里得到的消息,似乎俄国人与
252 阿穆尔的满人和汉人的相互谅解,不很好——在最近几天以来,两国人民所有的贸易来往如果不是全部停止,也是中断了的”^②

在同一天所写的第二封信内,蔡斯告诉柯林斯,在尼古拉耶夫斯克,不可能从俄国当局那里得到统计材料,那时俄国人连美国船的一切船舶证件都不交他保管,而要存放在他们那里。因为,蔡斯不被俄国政府当作领事对待。而他了解,那年直到那时,还没有美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55,第25页上。

② 美国国务院档案,阿穆尔地区美国领事报告。

国船来该处访问^①。舒马贺尔和巴尔苏科夫两人对 1860 年的阿穆尔没提出什么材料，这或许是意味深长的。舒马贺尔描绘那年夏季某日，穆拉维约夫派了一名官员到瑗琿吁请划定边界，并说明俄国的军事准备只是计划占领由条约订明让给的地方。如中国方面的属民骚扰，或中国企图把军队调往松花江下游，都将受到武力拦阻。^②按照伊格纳提耶夫的说法^③，穆拉维约夫自 1859 年到 1860 年，一直处于一种“心神不定，漠然无关”的状态。

再回头来谈北直隶。伊格纳提耶夫当时没有吃水浅的船只可以让他靠近大沽炮台，就没有法子在 8 月 21 日那天多看到一些打仗的情况。英、法联军部队以及额尔金勋爵，贺布将军和葛罗于 8 月 26 日到达天津，此时伊格纳提耶夫还在他的船上。自从攻击开始以后，额尔金与葛罗不理睬他，也没有约他跟他们一齐到天津^④。由于中国人直接跟英、法接触，他现在对局势有插不上手的危险。为避免此种情况，他采取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大胆的步骤”，就是派塔塔里诺夫于 8 月 26 日溯江而上，到天津去为他找所住房，并借口查询北京的教士团发来的邮件，从而跟中国人打上交道^⑤。8 月 28 日，塔塔里诺夫与直隶总督恒福以及曾受命与西方使节谈判过的武备院卿恒祺建立了接触。他们高兴地接待了他，显然希望从伊格纳提耶夫处得到帮助^⑥，并立即奏请皇上旨意，文如下：

“窃于本月 12 (8 月 28) 日，据俄罗斯国通事明常来至奴

① 美国国务院档案，阿穆尔地区美国领事报告。1860 年 10 月间蔡斯终于被承认为美国领事，但是过了几年美国认为这个职位无用把它撤掉了。

② 舒马贺尔，前书，第 327 页。

③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第 312 页等。

④ 同上，第 19 页。

⑤ 伊格纳提耶夫在他的《材料》内说，英国人阻挠了塔塔里诺夫，用谎报水深信号办法，使他整整两天不能渡过拦江沙。但《材料》第 303 页上是另一种说法。

⑥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第 306 页；《报告》第 20 页。

才恒福行寓，当经奴才等与之接见，该通事声称：现有该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投递军机处公文一件，询其所云何事？据云寄信至该国馆中，派人来津，并该国公使现由东洋折回，不日即可前来，且欲与英、法二国调处等语。奴才等现正办理抚局，该国既有居间调处之意，未便拒绝，恐别生枝节，只可暂时羁縻，一俟钦差大学士桂良，15日来津后，彼时该国使臣，亦可到来，再行公同商办^①”。

8月29日，此奏送达奕訢，同日复谕令恒福可与俄国使臣接谈。教士团如有致伊格纳提耶夫的回文，亦可派人在护送下递至天津^②。而理藩院送来的一件咨文则通知伊格纳提耶夫，切勿在英、法问题解决之前晋京，桂良亦未受权与他谈判。教士团的一个
254 信奉东正教的中文教习，获准携带大司祭古里的信送交伊格纳提耶夫。信里面有关于北京政局的有用情报：郑亲王和卞宝书都已被罢黜^③。伊格纳提耶夫于8月29日移居天津。他试图向额尔金和葛罗自荐作为调人，并把古里的新闻挑选一些供给他们。然而额尔金和葛罗对他都极为怀疑。此后，伊格纳提耶夫又自行向英国人和中国人双方大献殷勤。他的办法是尽可能地把情报告诉前者，并帮助后者更顺当地解决他们与联军之间的一些小争端。但看来他暂时还没有打算主动地去促进和平谈判，正如他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的一样，他还是宁愿等到联军与中国人的关系坏到极点时候再来出头^④。这帮俄国人被前往天津一路上的村民和城里的商人所欢迎，把他们当成保护人。商人们还宴请伊格纳提耶夫一次，中国官员不久就转而经常向他们求助^⑤。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58，第2页上（咸丰十年七月十二日）。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58，第2页下（咸丰十年七月十三日）。

③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前书，第313页等；《筹办夷务始末》，卷59，第14页下。

④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前书，第309页。

⑤ 伊格纳提耶夫：《报告》第21页等。

9月3日，伊格纳提耶夫又向北京朝廷写信，要求在英、法使节入京后，几天之内就应该让他回到北京。他的要求虽然简短却很坚决。塔塔里诺夫于9月5日将此函交给桂良，桂良自己主动提出要伊格纳提耶夫在联军之间出任调人，但伊格纳提耶夫对此不予置理。9月9日（8月26日），从北京教士团派来的波波夫到了天津，报告说俄国教士团已受严密监视，不过，还让他们自由活动。他同时带来了更多的京师防御计划的新闻^①。

桂良和恒富尽管倾向同意，而理藩院对伊格纳提耶夫的信的答复却是否定的。可是伊格纳提耶夫在9月8日又一次写了信，说明他确实想进北京。9月11日的谕旨勉强同意了他的要求，允许让怡亲王会见俄国使节，要是俄国使节已经知道他离京去接手办理和平谈判事宜的话。不过，仍然没有提到在与英、法的纠纷结束之前，便与俄国谈判解决的问题^②。从伊格纳提耶夫的《回忆录》²⁵⁵和《报告》中来看，他直到后来才知道怡亲王曾经短暂地充任过谈判人的角色。

紧接着就在后一日，即9月12日，奕訢批阅特普钦一份长长的奏折，给他的印象是俄国人在阿穆尔依然还处于不自在的地位^③。此折奏道，商业交易仍然禁止，希什马廖夫曾来璦琿并告诉爱仲泰，穆拉维约夫本年不会再来，如诸事平静，明年亦不会再来。希什马廖夫还怨诉“乌苏里、英额岭等处，口民强横”。爱仲泰强调他们都系山野之人，自卫身家，众怒难犯，且该处非属俄国，俄人宜即撤回。希什马廖夫又说“自上年断其米粮，以致由本处远劳运送，殊非和好之道”。爱仲泰答以本地中国臣民，米粮尚且不足，不能换给他人，如若劫掠彼之粮食，江左旗屯数万之众，岂能甘心。至

① 伊格纳提耶夫：《报告》，第23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61，第1页上（咸丰十年七月二十六日）。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61，第10页上（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七日）。

此，希什马廖夫即“词穷失望而返”。特普钦在结束这件奏折时提出警告说：俄人将包围英额岭以南的绥芬地面。可是，无论北京朝廷或满洲将军，都对于从该地区调出军队没有什么顾虑。9月末，从吉林撤走二千人往南送^①。

伊格纳提耶夫在天津停留期间，成功地赢回了与葛罗的友好，并打破了额尔金的冷漠。他取得葛罗的信任到如此程度，后者在9月5日自言自语地对他承认了这点。同日，他并得到额尔金的认可，说英国与俄国在华利益并不矛盾——前者在于商业而后者在于“国境”^②。伊格纳提耶夫将他在北京时亲自绘制的北京地图拿给法国人看；法国人却没有把他传给英国人。9月7日，葛罗和额尔金两人分别各自劝诱俄国以交战国身份参加他们的军事行动，他却坚持谢绝这么做。然而，9月9日额尔金起身赴北京，葛罗是10日去的。这时候他们对伊格纳提耶夫又不放心了，担心他鼓励中国人不要让步。这位俄国使节被甩在天津时，听到许多群众对联军士兵的劫掠发出的怨声。使他好笑的是，英国海军上将沙默竟也来向他求教。这位上将显然对中国人很紧张^③。

不论哪一方面都没有讲和的行动，联军继续前进。尽管他们伤亡很重，并在通州遭遇到僧格林沁所率部队相当大的阻挠。伊格纳提耶夫在他的《回忆录》（第311页上）内自称，只是由于他个人的努力，才防止了英国人和中国人在联军打到北京之前就达成协议。这一说法似乎主要依据这样的事实，即额尔金于9月9日离天津那天，恒福曾亲自拜访伊格纳提耶夫，直接向他提出未经奕訢授权的非官方呼吁，请他斡旋，而伯爵什么事也不肯答应，并送话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62，第24页上和卷63，第19页上（咸丰十年八月初四和十年八月十四日）。

② 伊格纳提耶夫：《报告》，第28页等。

③ 伊格纳提耶夫：《报告》，第28页等。

给葛罗说恒福仅仅是要求联军过三天再向北京进军，以消除葛罗的疑心。葛罗在那时急于加速终止敌对行动，他也许会过于热心地要去谈判，因而毁灭俄国要使中国彻底战败的希望^①。可是，英、中冲突的战火，即使没有伊格纳提耶夫的煽动，也是要越烧越炽烈的。9月22日，伊格纳提耶夫在给他父亲的信中慨叹他“迄今为止还不能左右谈判”^②。

就在同一天，9月22日，这位伯爵终于离开了天津。他9月25日在一个叫张家湾的地方赶上了额尔金与葛罗。照他的《报告》²⁵⁷所说，战斗的艰苦似乎已使英、法两方的使节和将领各自对于对方的举动感到恼火。他们见到他都很高兴，并且不久就各自委婉地向他吐露对于对方的不满^③。

伊格纳提耶夫曾经怂恿额尔金把他的武装进攻推向北京。可是中国军队现在差不多全部溃退，他也改变对清朝的态度，转而采取要保全它的存在的政策。这时，他又催额尔金进兵，而以商谈方式劝他把部队停止在北京城外。他的这种并非无私的进言，目的在于争得机会，抢在盟军之前进入北京^④。用他自己的话说，9月26日那天，他向英国人出示“包括一幅北京地图和一幅从天津至北京路线地形图和统计情报。这些都受到英国人的高度珍视。”这事为贺布所确证。贺布在他所写的战役记载中，在1860年9月26日写道：“额尔金勋爵和我骑马去拜访伊格纳提耶夫将军。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出示给我们一幅由他下令精心绘制的地图。它的上面明细标出北京的每一个重要街道和房屋。这份东西承他慨允借给我们复制，仅只要求我们不得公布出去，因为当时他还没

① 伊格纳提耶夫：《报告》，第63页等。

②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第326及334页。

③ 伊格纳提耶夫：《报告》，第108页等。

④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第310—312页，第341等页和《报告》第115页等。改变政策的事只在《材料》内提到。

有将它呈送圣彼得堡。我将这份地图拍了照，我还从俄国人那里又得到了极有价值的情报(有关北京地形的)”^①。按伊格纳提耶夫的《报告》所说，他并没有把他所制地图借给他们复制的意思，只是因为巴留捷克无意中把地图的事透露给了他们，并且他还将此图向法国人出示过，就不得不将图借给他们。

258 当此之时，对于是否为使节常驻北京而施加压力，额尔金还没有完全作出决定。英国一定会尽力对此提出要求，这对伊格纳提耶夫很合适，因为对照之下，他本人就可更显得温和了。另一方面，使节常驻北京是俄国最急于避免的，因为这样会使中国人更易于受英国人的控制。就连美国人和法国人也比俄国人处于能占更多便宜的优越地位——前者靠他们的非侵略性的记录，后者靠他们的改信罗马天主教的教徒。结果，伊格纳提耶夫在10月2日(9月20日)一次长长的会晤中，劝告额尔金放弃使节常驻北京的想法和由清帝作一次礼仪式接见的要求。他说他自己于1859年抵达北京时，曾拒绝接受由奕訢接见的提议——这一说法是否真实？可惜额尔金没法查对。在这次会晤中，额尔金再次提起：“差不多远征军的所有成员和额尔金勋爵本人都抱有经过蒙古和西伯利亚返回欧洲的希望”。但是，伊格纳提耶夫告诉他说，这将是最不适宜的，因为气候非常寒冷，而路程中有两天必须行经僧格林沁的辖区，那里满是怀有敌意的蒙古人^②。

在没有几天之前，9月27日(15)，伊格纳提耶夫从通州写信给军机处说，他即将进京，因为联军现已为他开通了道路。10月5日(9月23日)复文到来，说军机处已离开北京，他的信转递给他们了^③。这件回文是奉恭亲王之命发出的。这对于伊格纳提耶夫

① 克灵顿和诺雷斯合著：《1860年的对华战争》，伦敦，1873年；亦见伊格纳提耶夫：《材料》，第322页和《报告》，第109页。

② 伊格纳提耶夫：《报告》，第169页等。

③ 同上(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一日)。

倒有些用处，因为他能够据以假定，皇帝必是跑掉了，并以之告诉额尔金和葛罗。

联军于10月6日洗劫了圆明园。额尔金和葛罗于10月7日到达现场，他们是在10月5日离开通州的。伊格纳提耶夫则宁愿留在那里，以待局势澄清，只是他派遣沃尔夫和巴留捷克和联军诸位使节保持接触，并自10月9日（9月27日）起，与北京教士团取得联系。从10月11日（9月29日）起，他派巴留捷克、波波夫在北京城墙边的俄国人墓地上宿营，还带着些哥萨克人^①。

《回忆录》中说，伊格纳提耶夫在京城陷落前的最后几天，致力于在英、法的首领当中散布不和。如果此说属实，则联军首领间失和的主要起因集中于私人摩擦。²⁵⁹

按照《回忆录》的说法，年纪大的葛罗被额尔金，甚至被孟斗班蒙在鼓里。他还和自己的幕僚合不来。他觉得跟随额尔金很吃力。额尔金比他年轻得多，而且无论去到那里一概骑马。葛罗通常住在不如这位英国爵爷舒服的风子里，有时甚至住在破庙里。葛罗奉有维持清朝帝位的命令，他个人的意向也认为应当这样办。因为这可以少找麻烦，并且不致耽误他返回巴黎。他满心想早些回到那里。另一方面，额尔金对清朝的态度则没有那么明朗。这些以后还要提到。

照《回忆录》所说，额尔金和葛罗向沃尔夫抱怨对方的行事；葛罗说额尔金办事缺少商量；额尔金说葛罗未能阻止对圆明园的抢劫。只是我们没有其他材料对此加以确证。这件事，怪就怪在这样久经磨练的外交家们，竟然会如此不顾自己的身份，把这种事情向伊格纳提耶夫的秘书去诉说。可是当伊格纳提耶夫到达北京，并亲自拜访他们的时候，他们显然做得比这还要过分^②。

^① 伊格纳提耶夫：《报告》。

^②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第182等页。

这位俄国使节那时从他跟英、法的关系中捞到好处，从他们那里拿到英、法联军在圆明园找到的中国方面关于俄国的外交文件。他把这一重要任务交给巴留捷克，并指示他应于10月12日先去见葛罗。这位男爵拿出法国人所得的一捆文件交给巴留捷克，说道：“你有充分理由不要指望得到英国人掌握在手中的有关文件，因为他们有把一切文件都发表的癖好”。他应允以他的影响来向英国人做工作，使他们放弃他们得到的四箱俄国文件，但没有办到。

260 可是，两天以后，10月14日，巴留捷克不知使了一些什么手段，从英国译员威妥玛那里还是把那批文件弄走了。这至少是他在《报告》里所说的故事。在他的《材料》中，伊格纳提耶夫仅仅提到“巴留捷克从联军处把他们所攫取的一部分文件取了回来，其中包括彼罗夫斯基要求在《璦琿条约》和《天津条约》中增添的条款。这是波波夫在英国翻译官威妥玛明白这是些什么文件之前拿到手的^①。”

伊格纳提耶夫等待的最后时刻终于到来了。中国人直到10月13日还没有打开北京城门。他们后来只是在接到如不开城立刻就会遭到攻击的最后通牒时才开城的。即使这样，也没有一个中国官员敢于出来与英国人开始议和谈判。恭亲王则于10月14日写信给葛罗，答应跟他谈判。照伊格纳提耶夫所说，葛罗于同一天便秘密向巴留捷克试探，伊格纳提耶夫是否有意出面调停，可是葛罗又不愿公开作出正式表示。伊格纳提耶夫意识到他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便于10月15(3)日进驻俄国墓地，并且从那里先去拜会法国使节，然后拜会英国使节。

他发现他们彼此都有意见，《报告》中的话是说葛罗“显然很欢迎我的蒞临，在跟我谈话中，把他自从我们上一次会面之后他对额

^① 伊格纳提耶夫：《报告》，第189,195页；《材料》第342页；亦见《英国议会文件》：《关于中国事务的往来文件》，英国人没有译出这些文件中的任何一件。

尔金和一般英国人，以至对孟斗班所郁积的一肚子牢骚全都向我倾吐了”。伊格纳提耶夫认为葛罗“显得茫然若失，不知怎样办才好”。

伊格纳提耶夫发现额尔金也喜欢见到他，并对他表示出对(联军)统帅的不满，对远征军的一般军事成员以及他的同僚葛罗男爵也都有意见。额尔金把伊格纳提耶夫领到寺庙中他住的僻静地方，“以一个英国外交官来说，坦率得惊人”的方式，与他谈了很久的话。这次交谈，正如《报告》中所提到的，是确有趣味的。额尔金把他那份最后通牒全文给伊格纳提耶夫看了，这位将军对此表面上赞同，同时也竭力向额尔金指出他的要求过高，让中国人如此丢脸是无法奠定持久和平的。在此之后，额尔金向伊格纳提耶夫明261
着说，中国人要是拒绝了最后通牒，对英国倒会更好一些，因为那样子他们就可以把北京的皇宫打个稀烂，撤到天津去过冬，在造反的人们当中宣布一个登上皇帝宝座，把都城迁到南京。“那时英国只用四艘炮舰，便可将巨大的中华帝国的命运掌握在手里”。如果华北失掉，或变成一个独立的部分，英国都不在乎。伊格纳提耶夫回答说，不管那一种情况，俄国全不在乎，可是法国和美国却绝对不会同意这样干。他坚决说道：俄国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并试图劝额尔金不要推翻清朝。额尔金呢，按伊格纳提耶夫的说法，是显然露出窘迫之状^①。

这位英国使节之所以说这些话，只是为了引逗伊格纳提耶夫说出心里话。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他当时是认真这样想的，因为罗素勋爵给他的明确指示是保持清朝^②。可是他或许确实没把这种想法当真，因为他曾在1860年7月13日致外交大臣的

① 伊格纳提耶夫：《报告》，第215及其后各页；额尔金不象是真想毁掉皇宫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圆明园的命运使他并不感到愉快。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17/392，罗素致额尔金17/4/60。

一封私函中，似乎半认真地指出：整个推翻清王朝，倒比迫使他们就范更容易一些。“我们或许可以吞并这个帝国，如果我们有胃口再搞一个第二个印度在手；我们也或许可以改换王朝，如果我们知道从哪儿能另找一个的话。但是倘若真要现存的王朝接受不列颠所希望的条件，并且信守它，那末请许我斗胆断言，那将是需要一番细致处理的”。^① 后来还有一封致罗素的信（见下面），表明他盘算着清王朝覆亡的可能性。

不管额尔金的想法是真是假，伊格纳提耶夫反正认定额尔金已经深信造反者方面定会胜利。因此，伊格纳提耶夫就抓住这点作武器吓唬中国人，并激起法国人去反对英国人。在第二天，他设法使葛罗男爵和法国的其他将领相信，额尔金意欲推翻满人。后来他还用同一个故事劝诱满人自己接受条件。^②

10月16(4)日午后，这位俄国使节乘坐一顶绿呢大轿再度进入北京^③。并去到俄国教士团南馆。几小时之内，留在城里的少数高级中国官员便去他那里乞求他出面调停。他答应这样做，只是必须接受俄国提出的全部条件。第二天，这些官们又来要求。伊格纳提耶夫重申，他只有接到恭亲王的书面请求才能理会他们，而且他的应允是有条件的。即：中国人决不向他隐瞒正在和英、法盟国谈判的任何事情，没有事先和他商量，什么也不要做，还要答应他第一次到北京时为俄国提出的一切要求。10月18(6)日，恭亲王的书面要求就及时送来了。

在进入北京之前，伊格纳提耶夫先要古里去向中国再次探听，

① 罗素文件，30/22/49。

②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第329及其后各页；《报告》第233及其后各页。伊格纳提耶夫深信英法两国驻华使节已经完全失和，因此他的时机到来了，见《报告》第327页。

③ 法国将军孟斗班设法使伊格纳提耶夫能够进入城门。额尔金试图说服伊格纳提耶夫跟英、法使节一起进城，但是他宁愿自己单独行动。

是不是应允了？应允了他就这么去做。¹⁷日古里的信送到恭亲王处，恭亲王即奏陈如下：^①

“恭亲王等又奏，再前据俄罗斯伊格纳提耶夫，由通州知州转呈照会军机处来文，并有寄该馆喇嘛固礼公文一件，臣等恐该国或有别意，未便给与固礼收阅，当即割行该知州，告以现今军机处，早已随扈起程，须由驿递再行转交，恐回信较迟等语，婉词致复。嗣于22日（10月17日）复据该喇嘛由五城察院投递呈词一纸，意欲我处王大臣，备文令该使臣到京，设法办理等词，复经咨复五城，令其备文咨复该喇嘛，告以现在两国交兵，各城俱闭，未便令该使臣进京。如果有意为中国不平，亦必在外代为调停，俟两国兵退后，即可照常来京云云。兹据五城咨称，该喇嘛必欲中国文书，亲自赍往通州，臣等告以答复该喇嘛，现在各路兵勇，云集城外，恐该国人去，致被阻拦，有伤和好，令其从缓再商，以免多生枝节”。

奕訢在此奏折上仅简短地批“知道了”，证明他在某种程度上仍在处理政务。他在同日，^②又在另一谕旨中应允了伊格纳提耶夫进京，其词如下：“著文祥即由军机处给与照会，令其进京，若再以军机处随扈出京为词，恐其直赴行在，不成事体”。10月19日，又一旨谕同意让伊格纳提耶夫做调人，似乎还有欢迎他帮忙之意，文如下“俄使伊格纳提耶夫进京后，如欲从中说合，不必拒绝，倘有可乘之机，恭亲王等相机办理可也”。^③由此可见，凡是业经发生的事情，奕訢事后无不予以认可。

以后两天内，伊格纳提耶夫与留驻在北京城内的清朝代表单

① 《筹办夷务始末》，第65卷，第22页上（咸丰十年九月初四）。

② 《筹办夷务始末》，第65卷，第28页下。——原注，实载于《筹办夷务始末》，第65卷，第23页下。——译者

③ 同上，第31页下（咸丰十年九月初六）。

独进行商谈，并在说服他们接受盟国条件一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个人担保了恭亲王在谈判中的人身安全，也成功地使联军减少他们提出的一些立待履行的要求^①。10月19日深夜，即联军最后通牒所定时限即将于第二天早晨10时届满之前不久，清朝终于开城投降。这样，北京城便免遭洗劫。此事即使不是全部，也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伊格纳提耶夫的斡旋^②。10月18日，他写了一封长的密件给额尔金与葛罗^③。述说他为他们所作的一切努力。额尔金也复了他一封简短的正式道谢的密函，还附上他咨送恭亲王的最近一次照会复本一份^④。英国档案对于在缔约之前俄、英使节间的关系再没有提供什么情况，而伊格纳提耶夫自己却说，当时额尔金转而反对起他来了^⑤。可是，在法国外交部档案中，有一封没有发表过的葛罗致图温奈尔的私函，信内描绘了葛罗当时对伊格纳提耶夫的依赖，以及伊格纳提耶夫对葛罗的影响。

“1860年10月19日广胜寺。

亲爱的同事……伊格纳提耶夫将军已经进了北京，附上他写给我的信的复本。他的劝告或许会得到遵从。我但愿如此。对他，我是存了一些希望的，我将不犹豫地请他协助我〔这里有三个字难以辨认〕^⑥。英国人对圆明园的野蛮的，我几乎想说成中国式的焚烧，可能要吓坏了恭亲王。如果他放弃北京，我们怎么办？我承认，我怕明天过了还没有答复，而这在

① 这些要求的清单见《材料》，第379页。

②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第358页等和《报告》。舒马贺尔，前引书，第329—332页。

③ 柯尔迪埃：《中国与泰西各国关系史》（巴黎，1901—1902年），第一卷，第94—95页。

④ 英国外交部档案17/331。

⑤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第344页等。条约签字之后，他们又重新和好了。

⑥ 这封信显然是仓促写成的。它就是柯尔迪埃在他的《中国与泰西各国关系史》中第Ⅱ卷，第400页上提起过，但没有引用的那个文件。

我是绝望的事，却使额尔金勋爵称快，他想焚烧一切，摧毁一切，显然试图做到消灭当今的王朝。

20 日晨 6 时又及：

我在夜间 2 时收到伊格纳提耶夫将军一封信，我先前曾 265 经在极度保密之下写信给他，请他务必让恭亲王明白：他掌握着他的王朝的命运。如果他在今天上午 10 时之前无条件地接受我们的全部要求，就能讲和，北京就能脱险。我仅仅暗示了一下，恭亲王就答应把在 7 月 18 日犯下了滔天大罪的僧格林沁和瑞麟两位司令员免职……

这是我所能期望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摆脱英国的影响，也许还抵制了它的影响。能做到这一点，是和伊格纳提耶夫将军的协作分不开的，他在整个事件中，干得那样机智，我简直找不出话来赞美。

应该给他高级勋章。事情结束以后，我将瞒着他，正式为他请求。”

联军和中国方面的直接对话于 10 月 20 日开始，只是伊格纳提耶夫通过他与满人每天会晤，仍然从中插手^①。

从伊格纳提耶夫的《报告》和联军所定各条的内容规定可以看出，他觉得他自己并没有办法，而且也没有认真尝试阻止英国人和法国人从中国人那里榨取到他们所想要的一切。英国人少要了一百万两银子的赔款，但这是否由于伊格纳提耶夫的干预？却无法证明^②。

英国的《北京条约》于 10 月 24 日签字；法国的条约是 25 日签的字。

①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第 358 页等；舒马贺尔，前引书，第 329—332 页。

② 虽然他在《材料》内自称是这样（第 379 页），他确实减轻了联军方面关于占领北京城的某几项次要要求。

同日,被中国人杀死的英国俘虏的尸体,郑重地埋葬在俄国东正教公墓里。这一安排是伊格纳提耶夫早些时同意的。此事大为
266 额尔金欣赏,也使这些英国俘虏的遗体免遭中国人报复性摧残。这一天,英、俄两国使节为此交换了友好信件。伊格纳提耶夫还抓住额尔金对法国人留在中国所抱的猜忌大耍手腕,他尽力用各种办法劝说英、法两国不要把他们的军队久留在北京。10月27日,额尔金写给罗素一封私人信件^①,其中论及清朝的事:

亲爱的约翰勋爵:

要使这里的事情按照我认为是最好的方式进行,是颇为困难的,因为我的将领只给我两周时间,而法国人(即使是我的杰出朋友葛罗)对于中国的当今统治王朝怀有一种脆弱的感情,同时还不愿追究英、法俘虏被害的事。他们生怕对杀俘罪行施行惩罚会损害这个王朝——我疑心(我知道伊格纳提耶夫将军也有这样意见)耶稣会士已使法国人相信,对当今在位皇室发生影响,激起他们心理恐惧,可以诱使他们恢复两百多年前优待耶稣会的诏谕,因而使法国能对全中国树立影响。^②

俄国使节还说服英国人和法国人不要立刻就向北京派驻大使,而只在冬季的下余时间内在北京留一个代办。伊格纳提耶夫在《报告》和《材料》里关于此事的吹嘘,已由其他资料证实。11月3日,额尔金致外交大臣的密函中说:“我在此附上我收到葛罗男爵为英、法立即在北京建立使馆这个问题所写私函的摘录——我不能采纳葛罗阁下在此信中表述的全部意见,他所持的异议,连同伊格纳提耶夫将军决计不留在北京过冬这件事,已具有足够的分量。

① 《英国议会文件》:《关于中国事务的往来文件,1859—1860年》,这些热情书信曾由曼考尔引用(前引书,第86—87页)。

② 罗素文件,30/22/49。

使我认为卜鲁斯先生目前不在北京住下是适宜的^①。额尔金没有告诉罗素的是,伊格纳提耶夫长时间以来竭力影响英国人,使他们 267 不把使节留住北京,一直闹到和卜鲁斯发生激烈辩论^②。而且葛罗男爵的那封信是在听到伊格纳提耶夫一番劝说之后,立刻就写的^③。

联军方面的条约签字之后,伊格纳提耶夫就有了更多时间致力于他自己的事业。他相对说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说服了中国人,差不多全按俄国的条件,签订了一个新的中俄条约。

伊格纳提耶夫和恭亲王为这件事所交换的照会,有许多已见于《材料》。恭亲王与清朝皇帝之间的奏折和谕旨,大部分都收录在《筹办夷务始末》中,因此可以从中、俄两方面来追溯这次谈判的最终的几个步骤。中国方面的记载比较完整,至少双方是符合的。

伊格纳提耶夫一收到恭亲王 10 月 18 日来函请他帮助,立刻就答覆说俄国的一切要求必须先行照允。恭亲王则答称伊格纳提耶夫必须先为中国出面斡旋。接着,双方以这种口吻又交换了一些咨文^④。10 月 22 日,恭亲王向奕訢奏陈,伊格纳提耶夫一再咨照,请许他居中调解,并且表示可以指望他去使联军方面削减他们的赔款要求,和使他们不久就从北京撤出军队。恭亲王写道:

“臣等明知此事系俄夷怂恿。今为此言,何可尽信。然解铃系铃,究出一手。若不令其前往,难保不倍加作祟。因给以照复,令其前赴劝阻,设能如其所言,于抚局不无裨益。而伊酋事后如有要求,再作理论”^⑤。

① 英国外交部档案 17/332。

② 伊格纳提耶夫:《报告》,第 275 页。

③ 同前书,第 282 页。

④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第 358 及其后各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第 67 卷,第 4 页上(咸丰十年九月初九)。——原注,恭亲王的奏折系刊于《筹办夷务始末》,第 66 卷,第 11 页上(咸丰十年九月初九)作者所列卷数页数均误——译者。

268 10月26日,恭亲王在答复伊格纳提耶夫发来,但未载入《材料》的一件咨文时,通知俄国使节说,他已令瑞常、和军机大臣宝鋆、麟魁和成琦跟他谈判^①。这位亲王直到两天以后,才向清帝奏报他所采取的这一步骤。随后,他又于10月28日上奏,附呈伊格纳提耶夫的两件照会(中、俄两方的资料内都没有刊载过这两个文件),并报告说他已决定与俄国人谈判,因为他觉得“未便拒绝,以免别生枝节”。^②同一天,恭亲王收到奕訢发来,但是和他的奏折交错的一道谕旨,许他与俄国人谈判^③。他在回奏时说,他已令上述诸人与俄国人开始谈判。他实际没有明说是他指派了他们,而只是提到他们自己:“均以该夷未可拒绝,愿与晤面往说”——含意是说他们或许是仅有的几个愿去谈判的人。在这件奏折内,恭亲王提到伊格纳提耶夫所发而双方都从未公布,但显然具有威吓性质的照会时说:“该酋有兵端不难屡兴之语。该夷地接蒙古,距北路〔去新疆^④〕较近,万一衅起边隅,尤属不易措手。”

在同一天的第三件奏折内,恭亲王报告说,他已遣瑞常与伊格纳提耶夫立刻开谈,因为后者还没有透露他的要求^⑤。那一天,另有一道谕旨指示瑞常等,可以在谈判时向伊格纳提耶夫言明:“绥芬、乌苏里等处均照奇吉、阔吞之例借与该夷居住。此外俱不必提及,以杜其得步进步”。^⑥

① 伊格纳提耶夫:《材料》,第358及其后各页。瑞常和庆英也在10月20日拜会了伊格纳提耶夫(见坂野正高,前引书,根据尚未公布资料来源)。

② 《筹办夷务始末》,第67卷,第4页上(咸丰十年九月十五日)。

③ 同上,第67卷,第8页。

④ 〔去新疆〕是作者自己加的。——译者

⑤ 同上,第67卷,第10页下。据伊格纳提耶夫:《报告》,第254页,谈判自10月27(15)日开始。——原注,作者此注有误。《筹办夷务始末》第67卷,第10页原文为“该夷心怀叵测,未便过于拒绝”。而同卷第9页上恭亲王的另一折奏内云:“而此次照会内,颇有居功之意,心殊叵测。至所称未了之事,既未言明,又未定议,臣奕訢自未便与之晤见,仍应瑞常等前往商酌”。——译者

⑥ 《筹办夷务始末》,第67卷,第11页上。——原注,实在第12页上——译者。

11月5日,恭亲王终于在奏折内开列伊格纳提耶夫所提要求²⁶⁹的清单^①。他索要乌苏里、绥芬河、图们江一带的全部滨海地界。西路则要求沿着起自1727年在沙宾达巴哈所立界牌,往西至斋桑淖尔湖,自此向西南顺天山南支的特穆尔图淖尔,南达浩罕边界的全线,由俄国和中国各派全权大员绘图勘定。伊格纳提耶夫还要求在张家口、库伦、齐齐哈尔和喀什噶尔通商,和设立俄国领事馆的权利^②。恭亲王说:“(伊格纳提耶夫提出)繁琐条目,种种要求,心殊叵测。且英、法两夷之来,皆属该夷怂恿。倘或从中作祟,则俄夷之事一日不了,即恐英夷之兵一日不退,深为可虑。臣等……窃思该夷要求各款,诸多遗害。内北京、张家口、齐齐哈尔三处尤其紧要,断不能允准……”。

接着,恭亲王又于11月8日在一件长折内奏陈满人谈判代表与伊格纳提耶夫苦苦争辩,只取得有限的成功^③。他们在第一款中添入一段,规定俄国当局应准许原来居住在让出地区的中国人仍旧留住在那里,照常打猎捕鱼。第二款内他们争到把两处彼此矛盾的辞句删除。第三款(即最后签字的条约正文第五款)争得的²⁷⁰是禁止俄国人在任何通商处所和任何时候同时聚集二百人以上,并且只准他们在某种控制之下进入中国,“庶杜其呼朋引类,滋生事端”。满人谈判代表所获得的最大成功,恐怕是他们使伊格纳提耶夫放弃在北京、张家口、齐齐哈尔通商和设立领事馆,以及在库伦、喀什噶尔两地通商。此外还在约文内添入语句,言明中国不为喀什噶尔卡外的游牧人进卡抢掠,对俄国人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任何责任。牧民的牲畜逸越边界,中国也不管赔偿^④。驻北京

① 《筹办夷务始末》,第67卷,第54页下(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三日)。

② 这是他自1859年6月以来所要求的。其中只有在内地随处贸易的要求后来被放弃了。这大概是由于英法和美国都没有得到它。

③ 《筹办夷务始末》,第68卷,第12页下(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六日)。

④ 满人的这两点规定都已包括在最后的条约之内。俄国与北京和内地的贸易是以商队的形式进行的。肃顺、理藩院和主管恰克图贸易的官员,都对此特别反对(见伊格纳提耶夫:《材料》)。

的俄国使馆与俄国边界之间往来寄递的书信物件的数目，大小和次数，都明定章程，严格限制^①。满人还抗拒俄国方面提出的要求：即沙皇须待咸丰皇帝批准条约之后八个月才能批准。“其余字句之间，较有关碍者删除不少……臣等伏思俄人乘英、法入城之后，肆意要求，添立款目，貽患将来，何可胜言。今日能多减一条，即日后少增一害……瑞常、成琦等声称该酋狡执异常，几于一字不能更易”。在争到这些之后，恭亲王建议俄国要求的主要部分应予接受。他指示如：“再与之理论，难保不勾结英、法为患。但于目前
271 之患较少，不得不委曲允从，以便催令英酋退兵，俾京师根本人心安定，以全大局”。同一天，亲王把条约约文呈交清帝。次日，即11月9日，清帝在一道谕旨内批准了它^②。

中国方面关于这次谈判的资料就引用到这里。据伊格纳提耶夫自己在《报告》内所说^③，历次会议都自早晨九、十点钟，直开到下午六、七点钟。会议在教士团首脑的房间内举行。具体谈判由塔塔里诺夫和古里发言，伊格纳提耶夫则在幕后操纵，发号施令，很少亲自露面。这些谈判最使人惊奇的特征是在对英、法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在谈判开始时，伊格纳提耶夫就警告满人谈判人员，决不得向联军方面泄露任何消息，并且立下条规，要他们自愿遵守。这个条件被完全遵行^④。每天清朝的谈判代表一到，他们的轿子就立刻被打发回家，等到他们快要散场时，才再来接。由于这种办法，从来没有人疑心到他们曾在俄罗斯馆开过会。有一次，机灵的巴夏礼瞥见一顶没有被抬走的轿子，就来拜会俄国人，显然

① 《筹办夷务始末》，第68卷，第17页下。——原注，实在《筹办夷务始末》，第68卷，第13—14页上。——译者

② 《筹办夷务始末》，第68卷，第17页下（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七日）。

③ 伊格纳提耶夫：《报告》第284及其后各页。《材料》只刊载照会，而很少评论。

④ 伊格纳提耶夫还拒绝以恒祺作为谈判对手，因为此人参加对英国的谈判（见《筹办夷务始末》，第66卷，第11，14页；第67卷，第7至9页）。

意在查看他们在干什么。可是伊格纳提耶夫在他自己的房间内接待了巴夏礼,并且告诉他说:俄国翻译官正在和中国官吏谈论邮递信件问题。巴夏礼得到这一解释,满意而去。

双方的第一次会谈“充满激烈辩论”。10月28(16)日,额尔金和他的将领们跟伊格纳提耶夫在一起欢宴,而与此同时,参加中、俄第二次会谈的双方人员正在邻近地方怒冲冲地高声争论。英国人对此竟然一无觉察。第二天,即10月29(17)日,法国人与伊格纳提耶夫会宴,在欢笑中的法国人照样什么也没有了解到。

可是谈判有一阵子露出停滞不前的迹象。因此,伊格纳提耶夫利用联军于11月6日撤退这件事,于次日写信给恭亲王,吓唬他说,如果不满足俄国的要求,他就要召回英、法军队。另一方面,他也证实他曾经作出一些让步,正如《筹办夷务始末》内各奏折中所说的那样。

11月10日,清帝批准条约的谕旨送交俄国使节。伊格纳提耶夫立刻把条约的各种文本核对翻译。在这一阶段,他不得不再次作一些未经说明的细小让步。因为满人见到译成汉文的俄文约本之后,强烈反对其中的一些字句。奇怪的是,中国已公布的档案里没有提到这事。恭亲王于11月10日正式拜会伊格纳提耶夫。会晤时谈到提供武器问题。伊格纳提耶夫表示这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第二天早晨,俄国人回拜了恭亲王^①。

俄国的《北京条约》随即于11月14日互换批准。它是俄国的一次重大外交收获。这个条约以一大片新领土上不容争议的权利给予俄国,包括俄国在1858年《天津条约》谈判中曾经企求但未能到手的土地。这个条约还为俄国带来更多的便宜。按照1860年《北京条约》的规定,中国在1858年《天津条约》中,对于留住阿穆尔左

^① 《筹办夷务始末》,第69卷,第21页上(咸丰十年十月初六)。伊格纳提耶夫予以证实(见《报告》,第301及其后各页)。

岸的中国人所保持的独立行政管理权，完全被剥夺了。在新疆边界方面，俄国还获得机会把他们的边界进一步向前扩展。俄国的商务权利也相当大地扩展了，其中包括在库伦及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馆，在商业邮递交通上还可以有权穿过蒙古，不受约束。沿着边境国界全线的事务，由双方的地方当局在平等基础上处理。伊格纳提耶夫没有能为他的国家取得在北京、张家口、齐齐哈尔三地设立领事馆，和在中国内地各处贸易的权利。这多少对于俄国的扩张可能施加了一些阻碍。

273 换约仪式上出现一些值得重视的事件。伊格纳提耶夫在这次仪式中重申俄国仍愿提供武器。恭亲王则拒绝在俄国人拿出交给他的地图上签字，以防俄国人对于留在已失土地上的中国屯居地获得无限制的权力。恭亲王在奏报当天所发生的事情的折子里，谨慎地表示，他个人赞成接受伊格纳提耶夫提供的武器和教官，只要教官的人数不多的话。^①

额尔金勋爵于11月9日动身回国。他在向伊格纳提耶夫辞行时表现得很热情，但对于中、俄《北京条约》的谈判显然还一点儿也不知道。英国外交部的档案里找不到任何记录，足以证明在北京的英国人在1860年底以前对此有所觉察。额尔金曾将11月18日北京的《京报》摘要译出，寄呈英国外交大臣，但是里面只字未提俄国条约。^②英国和法国的条约文本，曾由中国当局在北京及其四围各地张贴公布，但没有证据表明额尔金曾将英国条约文本送一份给伊格纳提耶夫。

① 《报告》，第284及以后各页。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17/332，额尔金致罗素，1860年1月12日。曼考尔指出，在额尔金于1860年10月31日给他妻子的信内，对于伊格纳提耶夫和他相处时所表示的情谊，仅仅暗示有些怀疑，见《额尔金勋爵的书信和文件》，第368页。额尔金于10月25日写信给罗素，以赞扬的字句，提到伊格纳提耶夫的功劳。（见《英国议会文件》：《关于中国事务的往来文件，1859—1860年》，第210页）。

11月17日即俄国条约签字之后，伊格纳提耶夫甚至还试图通过托马斯·艾德金，一位额尔金留在北京的翻译官，劝说西方各国不要在下一年把他们的外交代表派到北京。艾德金于11月18日写了一封密信给卜鲁斯。他在信尾所加的附笔内说：“伊格纳提耶夫昨晚告诉我，中国朝廷找他请教，要他考虑采取什么策略才能推迟外国公使于明年进京”。艾德金接着谈及俄国教士团对他表示的善意。（据《报告》内的说法，伊格纳提耶夫疑心艾德金是奉命留下来监视他的^①。而据布克斯盖夫登所说 则是伊格纳提耶夫用盛宴款待骗了艾德金，甚至把他灌得烂醉如泥。）额尔金这时早已摆脱伊格纳提耶夫的影响。他于12月10日从上海把艾德金致卜鲁斯的那封信寄交罗素勋爵，并附去他自己的看法，“可能伊格纳提耶夫自己倒是更愿意在北京建立外国使团的吧。”^②

伊格纳提耶夫于11月22日，俨然象一位皇室大人物一样，乘坐一顶十六抬大轿，离开北京回国。他经过蒙古和西伯利亚的旅程简直是一次胜利凯旋。自1815年以来，俄国还没有缔结过如此有利的条约。大概俄国也从来未曾有过象这样的，由一个如此年轻的外交家，赢得了如此巨大的功勋。1860年的胜利，大大地冲淡了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留下的痛苦回忆，特别是因为这次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蒙蔽了英国人。

直到1860年最末一个月，英国政府在事情过去这么久以后，才终于从约翰·克兰普顿爵士处得到俄国在远东活动的大量情报。先是9月17日和10月17日，克兰普顿曾将发表在《海洋文集》署名A. P. 的^③巴拉第的《1858年日记》，摘要译出寄回英国。最后，克兰普顿于1860年11月18日发回一件很长的报告，其中

① 伊格纳提耶夫：《报告》，第283页。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17/332。

③ 英国外交部档案65/554,555。——原注，A. P. 即修士大司祭巴拉第的俄文缩写。——译者

包括关于俄国对阿穆尔地区政策的正确描述，连同关于《瑗珲条约》——或者如他所说的“埃贡”条约——及其内容的报导。这件报告附有一张地图和俄国在远东陆海军建制的详细调查。英国外交大臣对这件“有价值的”报告大为赞赏和称谢，虽然它到得为时过晚了^①。

尽管恭亲王有条件地同意了伊格纳提耶夫重申对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是这件事仍然没有什么较大的进展。恭亲王再度奏报此事。他的奏章于11月23日递达奕訢。当时这位享年不永的皇帝，寿命已经将近结束。他的初步想法是赞成派遣中国兵弁到恰克图去向俄国人学习，可是要将俄国援助的整个问题发交曾国藩计议。后者经过认真考虑之后，主张拒绝接受^②。恭亲王便也跟着表示拒绝。

275 然而在1862年初，最终仍有一万支步枪和其他武器在恰克图移交给中国人。但是没有俄国教官进入中国。关于俄国武器的使用和维修，由少数几个中国武弁在恰克图附近学习训练。过了不久，中国人就停止这种训练。俄国武器后来由受英国训练的名为神机营的中国陆军所使用。这支军队曾经参加剿除盗匪保卫北京，并曾于1865年在满洲镇压土匪^③。因此，俄国武器是在和当初普提雅廷所预计完全不同的环境下送到中国人手里的。至少在以后的三十五年当中，在北京处于主导地位的外国影响，是英国的而不是俄国的。

^① 英国外交部档案65/550。

^② 1860年11月23日至1861年1月5日之间，具有高度重要性的那些谕旨和奏折，已全部由斯威舍译出。恭亲王在11月23日奏折内说，他又与伊格纳提耶夫互相拜会了一次，并且向俄国使臣表示中国从未拒绝接受武器。伊格纳提耶夫还提议用俄国海军协剿太平军，但是俄国方面的资料完全没有提到这些事。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3卷，第6页下等；英国外交部档案，卜鲁斯致罗素，1860年7月2日，恒慕义，前引书，第1卷，第382页，第2卷，第854页。纳罗奇尼次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莫斯科，1956），第125页。认为英国公使卜鲁斯怂恿中国停止恰克图附近的训练，并且引用俄国中央军事史档案来证明此说。

结 论

276

在象本书这样的一部研究著作里，要想紧密结合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以及中国统治圈子内党派分合这样一些较广泛领域来描述这一时期的俄中关系谈判，是无法办到的。坂野正高的书，《中国和西方》，新近为后一个题目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但没有详细论述这些年月里的中俄关系。这一题目，显然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探讨和协作。这里只是尝试性地提一些意见。

坂野教授认定奕訢受到以怡亲王载垣为首的王公集团的影响，但主要是受肃顺的怂恿。据坂野的说法，惠亲王绵愉扮演了元老的角色，并且充任皇帝与这个集团之间的联络人。这一集团鼓吹好战政策，但在面临失败之下接受了和解。卞宝书是这一集团的职位较低的追随者。本书所征引的材料都不违反这一论断。这些资料表明，自 1858 年 5 月起，如果不是还要早的话，某些满洲显贵，如郑亲王端华、惠亲王绵愉、怡亲王载垣，以及肃顺，都肯定反对向俄国作超出最低限度的让步。惠亲王绵愉对于制订 1858 年 5 月以后在东北抗俄策略，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伊格纳提耶夫有很好的理由把肃顺看作是自己的最大对头。除满洲王公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人也都是反俄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象反对其他外国 277 人一样反对俄国人。据坂野的意见，这大概是由于他有军事野心的原故。1860 年曾国藩于深思熟虑之后，建议不应接受俄国的军事援助，虽然他并没有参预早先的政策决定^①。此外，历史已经证

^① 曾国藩推重林则徐。他肯定从未亲俄。吴相湘认为曾国藩拒受俄国援助是感受林则徐和《海国图志》影响的直接结果。（前引书，第 325 页）。

明，曾经特别对俄国怀有敌意的人们是御史尹耕云，蒙古将军胜保，和安徽巡抚翁同书。但是似乎从来未曾有过什么有组织的反对俄国亲英、法盟国的党派。他们无论是对俄国，或对英、法盟国，都同样反对作任何让步。除非被迫这样作。

同样地，也似乎不存在任何明显的亲俄党派。坂野把桂良描绘成为主和派的中坚，也联带地称花沙纳为稳健派。他还指出谭廷襄的主战态度，随着战争危险增加的程度，而成比例地下降。但是所有这三个人都一致讥诮普提雅廷于 1858 年，所作的如我们所提到的那些活动。尽管谭廷襄和普提雅廷的私人关系挺不错。

彭蕴章起初在 1856—1857 年间主张一种近于中间的路线。他赞成与俄国和解，但拒受俄国的军事援助。不管怎样，这在事实上就是从事态演变的力量，和清政权的犹疑不决中出现的政策。因为，武器到底是以一种不明显露出俄国影响的方式接受下来了。

仅只有少数几个人，或者能够被指认为曾在某个时期表示过对俄国的同情。其中一个满族将军国瑞。巴拉第曾于 1858 年在去天津的路上跟他谈过。另一个是 1857 年以前时期的蒙古人赛尚阿。他或许应对《伊犁条约》之得以签订负大部分的责任。奕山和他的左右亲信，如爱绅泰，对俄国人表现过一点友善，并未积极建议与俄国人合作。其中只有一个人，吉拉明阿，作出事来带有叛国的味道。

总的说来，态度是随着个人而不是随着集团变化的，并且随着俄国政策的展开而转变。如果普提雅廷能在 1858 年阻止英、法盟国提出他们最可怕的条件，他可以感到中国人方面潜藏着对俄国和他本人的极大好意。可是他没有能够作到这一点，他引起了中国人的幻灭之感。这种幻灭失望情绪在俄国人进占乌苏里地区，并且露出对满洲心脏地带怀有野心的时候，就进一步加重。及至伊格纳提耶夫于 1860 年进而与盟国串通一起时，他的态度在中国

人眼中，的确已是“可恶之极”的了。另一方面，他又以出面调停，赢回了一部分同情。

值得注意的还有，在中国王公和官吏们的心目中，应付俄国人的工作，显然不如应付英国人和他们所造成的问题那么急迫严重。

咸丰皇帝奕訢本人的动摇犹豫已在我们的资料中暴露无遗。^①他不信任一切外国人，宁愿自己能够应付，而不愿借助任何外国人。但是来自南面和东面的英国压力，迫使他不得不寻求俄国的中立，如果不是俄国援助的话。他或许由于不知道俄国海军力量薄弱，又联想到俄国在两个多世纪的正常交往中使中国遭受的屈辱，还不及英国在短短几十年里使中国遭受的四分之一，因而时常倾向于寻求俄国的调停和援助。俄国人时常被认为是两个祸害当中较轻的一个。可是每当俄国人过于彰明较著地暴露出他们的真面目时，便再次引起中国人的反感。然而奕訢确实会在一次摇摆之中，或许答应与俄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如果俄国能迅速为他提供一些具体的东西。1858年的武器与教习如果真地送到中国的大门口，它们或许是会被接受的。我们现在还无法确知它们为什么会在1859年又遭到拒绝。只有两件事是能肯定的。奕 279 訢想要得到武器，而以伊格纳提耶夫和穆拉维约夫为一方，以肃顺为另一方的人们，全都不愿意他得到它们。

奕訢和他的顾问们，对于英国和俄国两方的实际和潜在力量，都一无所知。他也不了解英俄抗争的程度。当时英国人更处于能够真正帮助中国，制止俄国的地位，而不是俄国真能帮助中国抗拒英国。当时在中国的外国官员中，只有额尔金勋爵和修士大司祭巴拉第，对中国抱有真诚的同情和尊重。但是巴拉第没有实权，而普

^① 这种动摇似乎是军机处大部分人员所共有的，因为他们赞成接近俄国的谕旨。（见坂野正高：《中国和西方》（麻省坎布里奇，1964年），第145页及第158—159页上关于1859—1860年的详细分析。

提雅廷和伊格纳提耶夫对中国人都没有多大的怜悯之心和兴趣。倘若奕訢当时投向额尔金，靠他的善心帮助抵御俄国人，后果或许会完全不一样。但这是揣测，而揣测是不可取的。

在这个阶段，俄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成为中国可以用来抗衡西方国家的砝码。整个时期充满对前途投下的阴影。1857—1860年俄国对提供武器的谨慎，预示着1895年的李鸿章的虚假同盟，1923—1927年的联合阵线，和最后的，但是真正的1949年同盟。对俄国的摇摆不定，是中国政策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大概直到最近还有些摇摆存在，后来也还会更多。

本书的绪论里曾经强调提出中国对于失去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土地所感到的痛心。但是作者也没有发现证据，足以扭转史学家们久经认可的论断，即把俄国攫取这些地方看作是从来未有的一次最不流血，和可以宽恕的征服。不过，满人的抵抗看上去要比迄今为止俄国所发表的著作中允许人们知道的严重得多。但是既然见不到俄方的档案，便无法弄清那次抵抗的确实规模，也无法知道俄国人于1859年沿松花江上溯进窥的幕后动机。事实仍只能是，单从中国资料来看，俄国人攫占土地的整个进程中，唯一被杀死的俄国人是由汉人而不是满人所杀，而且是出于私怨，并非由于爱国。

也必须看到，无论失掉这些土地的清政府怎样无能，中国的现
280 政府已经从这次插曲中学到了一课。中国自己在它的南面和西面，对它的较弱邻国控制松弛的边缘地带，推行了穆拉维约夫路线。

俄国政策在本书所涉及的岁月里取得的成功，很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穆拉维约夫的个人胜利，在较小程度上也是伊格纳提耶夫的个人胜利。但是很显然，这也应归功于那些较少受到歌颂的英雄们——如哥尔恰科夫，科瓦列夫斯基，巴拉第，以及熟练的译

员塔塔里诺夫,不畏险阻的马尔特诺夫,和勘探移殖远东省分的那些勇敢而有才能的男子和妇女们。说哥尔恰科夫在这件事的功绩大可与伊格纳提耶夫、普提雅廷和穆拉维约夫的功绩等量齐观,同样称赞,或许有失公允。因为以哥尔恰科夫在圣彼得堡所处的中枢地位,自然易于对当时的世界局势,作持平的观察。虽然如此,他的审慎指导显然曾经多次拯救了其他几个人,使他们没有一下子便闯进足以以为俄国惹出数不尽麻烦的鲁莽冒险之中。科瓦列夫斯基被沃德豪斯认为是俄国远东政策的主要负责人,在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职位上,并不仅仅是盖了橡皮图章。可是据伊格纳提耶夫的《材料》,和本书各章内的资料来看,都指明主要功绩应归哥尔恰科夫。这也是卡巴诺夫的意见。只在提供武器这件事上,穆拉维约夫和伊格纳提耶夫二人的判断,回顾起来,都显得比哥尔恰科夫深谋远虑。如果这件事当时真地办成功了,很可能把俄国卷进一场比 1895—1905 年间那次在中国的纠纷时机,更加不成熟和力量不足的冒险行动之中。哥尔恰科夫和他的外交政策还有待于史学家们的研究。在接触不到俄国档案资料的情况下,只能对他作一些肤浅的评论。

穆拉维约夫是作为一个相当乖僻的人物出现的。他惯于为夸大的希望和夸大的恐惧所左右。这个不寻常的人物的传记还大有可写的余地^①。遗憾的是无法见到卡巴诺夫著作的全文。普提雅廷竭力施展自己的才能,首先露出是个能带头行动的人。他也是主张提供武器的领先人物之一。他曾在额尔金和葛罗的鼻子底下,冒着相当危险,如此长时期地和中国人进行着秘密谈判。可是最后他从他们方面也一无所得。他之所以未能获得中国对阿穆尔—乌苏里边境方面的承认,主要由于英、法联军未能在 1858 年

^① 苏利文所写:《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博士论文,麻省坎布里奇,1953 年)是内容不够充实的。

进攻北京。

伊格纳提耶夫在所有于上述时代卷入中国局势的人们当中，比较起来，显然是个更老练的外交家，能够做到真正的纵横捭阖。然而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英、法联军当时攻占了北京。这会使中国的某些未来的宣传家们易于指责他是西方帝国主义的走狗。他所选择的行动时机，他经常到处紧跟英、法联军首脑之后出头露面的方式，差不多已为他注定了这样一个称号。不过，也应当承认，伊格纳提耶夫曾在一些小事情上，给予中国人以切实的帮助。而且他所作的比普提雅廷为多。虽然普提雅廷曾于 1858 年甚至违反他自己的意愿，敦促中国与英、法解决纠纷。对于普提雅廷和伊格纳提耶夫都大可使用十七世纪形容当大使的人时所用的双关语：“一个为他的国家被送到国外去说谎的老实人”。

俄国这时候的政策或许确实是延长了清王朝的寿命。而这对中国来说是不是帮忙，却是大成疑问的。虽然额尔金奉有命令，不得推翻清朝，可是只靠他和葛罗两个，1860 年在北京是不可能欺骗和吓倒留在北京的清朝官吏并迫使他们接受议和条件的。但这又是揣测了。

俄国在这些年月里的政策，明显地例证了以诡密作为政治武器的好处和缺点。俄国人在向阿穆尔地区推进中，和对华关系中的诡密行径，使他们在与英国人打交道时，得到的好处是价值可观的。可是谁又能否认这种诡密，这种对在阿穆尔地区经商的美国人所表示的疑忌，阻碍了这一地区的发展，并且为俄国移民造成不必要的困苦呢！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见到笼罩前途的阴影。它为本世纪内以庞大规模显示出来的俄国政策，提供了一次微型预演。

282 这使我们注意到对于十九世纪中叶的俄、美关系还缺乏周密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或许会对美国不是那么光彩的，因为正如我

们所见到的那样，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人员，大多偏于天真质朴，或才识不足。且不提皮肯斯。即以列卫廉和华若翰两个为例，与他们所必须对付的欧洲人和中国人相比，有时就不免显得有点象未经世故的娃娃。美国对于俄国人在阿穆尔地区进展所获情报，比英国人好得多。可是美国人既没有把他们所掌握的情报传递出去，也从未试图利用它去和俄国人讨价还价，以美国的沉默和善意换取俄国在阿穆尔地区对美国商人的优待。可是倘若美国当时不是濒临内战前夕，事情也许会是大大不相同的。

在两次对中国的远征的中间期间，俄、法两国驻华使节之间存在着一种谨慎而隐蔽的半谅解一事，似乎未为英国人所全部觉察。柯尔迪埃在他于1905年和1906年发表的著作中，未曾引起人们对这件事的注意，是意味深长的。

那些年中英国的活动在世界上充满光辉，煊赫一时。可是它们今日都已黯然成为陈迹。提到这些，真不免令人伤感。英国学者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时，恐怕都会不禁苦笑。试想额尔金当日曾经率领两万一千军队，和一支艘艘百艘的无敌舰队，跑到中国夺取商业权益，建立帝国声威。这些今日都已全部消逝了。而穆拉维约夫以两万人赢得的省分，却可能永久成为俄国人的。而且英国的昙花一现式的炫耀武力，迄今仍是中国与西方关系中怨仇难解的根源。想到这里，心情是苦恼的。

英国的态度自始至终完全地，但不是有意地助长了俄国扩张的成功。女王陛下政府的行事方式实在带点宿命性质。它对于阿穆尔地区或乌苏里地区，所知既少，又复漠不关心，却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每一件重大事情上，为俄国占领这片土地，和从法律上加以确认，提供了方便。

阿穆尔地区的事真是天数。因为这一大片土地在几千年内未经远东那些为数众多的民族移殖，而是一个世纪又复一个世纪地 283

等待着穆拉维约夫，实在是历史上一件怪事。可是俄国最终也必须为他们的征服，付出代价，即使不是流血也得花钱。因为这些省分，会在极长一段时间内为他们的国库造成重大的消耗。

在总结时，不妨看看本书所研究的时期怎样能够纳入俄中关系的总的型式当中。可以看出，过去三百五十年的关系经历了五个主要阶段。本书第一章概括了自从明代中国与莫斯科公国时期的俄罗斯，于十七世纪发生接触直到十八世纪末的情况。初时，中国对俄国享有一种优势。这两个民族，在地理条件所造成的限制之下，大部分时间内一直有由小事造成的不安宁和争吵。彼得大帝以后，力量对比开始转变。及至十八世纪末，中国所享优势已经消失。自此以后直至1851年的一段时间内，两国在外交关系上大致仍然平等对待。尽管俄国已是两者中较为强盛的一方。1851年的《伊犁条约》立即成为一个已经过去的阶段的终点标志，正如1792年条约是这一阶段的顶点标志一样。到了1854年穆拉维约夫远征阿穆尔的时候，俄国明确对中国享有优势的时代就开始了。

接着下来的一百年历史，从俄国方面来说，是一再致力于吞噬中国的领土。起初是谨慎小心地吃，后来是放胆地大口吞咽。俄国并且打算充任中国的监护盟友，借此对中国树立某种霸权。然而这些企图一次又一次地受挫于中国人本身的反俄反应，或者其他列强的干涉，或者两者兼有，例如在1859年，1860—1861年，1881年，1905年，1927年，和最后在五十年代。

从中国方面来说，这一世纪的历史充满屈辱和衰弱，对俄关系也形成一种摇摆不定的方式。中国的政治家们不时地转向俄国寻求物质援助和政治支持。以抵拒压迫他们的其他国家，例如在284 1858年，1860年，1895年，1923年，以及1949年^①。中国每一次

^① 蒋廷黻喜欢称之为“周期律”。他早在1929年就注意到这点。

接近俄国之后总会紧跟着产生一阵怨愤和失望幻灭之感。而且俄属远东省分是俄国历来从中国身上咬下并且嚼咽的最大一口。外蒙古的前途尚未可知。中国要求收回的其他被俄国夺去的领土都比较小。所以《北京条约》为俄国所取得的对中国的优势，在全世界面前盖上了印章。但是，曾国藩很少张扬，却经过深思熟虑后拒受俄国援助一事，或许比《北京条约》更具有重大意义。

俄国对中国的优势大概在 1895—1905 年达到它的顶点。这些年间的外交关系，带有俄国专断的色彩，正如 1792 年条约是中国的专断一样。可是日本在 1905 年对于俄国的野心给予一次重大的打击。这就再一次造成一种局势，使中、俄两国无论哪一个，都不能把对方看成是低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 年的革命，和接着下来的俄国国内政争，都大大加强了这种局势。中国在蒋介石之下重新统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

俄国从反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中胜利地扩展了领土，提高了自信。它似乎终于接近可以不顾其他国家，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中国的地位了。但是 1895—1905 年间的局势是不会重演的，因为中国自己又再次挺身站起来了。1949 年以后的中国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能使他们自己独立于俄国之外的保证人了。而这是在清朝早期^①所办不到的。

中国共产党人掌权之后立即与俄国缔结紧密的联盟，成为早期在这方面一切行动的礼赞。它也使俄国人这一次在中国终于成为他们在过去九十年内一再追求的监护盟友。但是，当新政权取得自信，而外来威胁又见减退的时候，用不着多久就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倒退反应。在俄国人本身方面也有了一种意义不小的退缩，²⁸⁵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援助者和教诲者的身分，正导致他们陷入一

^① 原文如此，应为后期——译者。

种犹如古希腊塞浦路斯王皮格马利翁热恋他自己所雕少女石像般的局势。中国的和俄国的共产党政府度过短暂的蜜月期以后，两国关系的情调颇有重新回到十八世纪的意味。当然，今天双方竞争所牵涉到的问题和赌注都无比地加大了。今天，俄国对中国仍然占些优势，虽然不是压倒的。同时，限制他们自由行动的力量已不再是地理条件，而是核子物理，共产主义教条，和世界政治了。可是，自 1960 年以来，正如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一样，总的局面是两个高傲的帝国，彼此谁也不喜欢谁，但是在一场激烈的分争中，谁都会大有损失。中国政府信奉马克思主义，以它作为国家的官方哲学，和中国的工业化，赋予中国和俄国以意识形态上的共同语言，并且前所未有地把他们拉在一起，但是中、俄真诚信赖和合作的日子还远得很。有一点是肯定的，尽管他们彼此之间在种族、文化、历史方面仍然差别极深，并且存在着许多实际的和潜在的不和根源，然而俄国和中国两方都不得不作为有漫长共同边界的邻居，在这个你推我挤的地球上，面对不可捉摸的未来，大家共同生存下去。

一、尚未刊印的

刘易斯·B. 卡斯:《私人函件》,密执安大学图书馆。

爱德华·德·斯托克利信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

《克拉伦登文书》,1857年1月—1858年2月,与英国驻华大使、英国驻俄大使的函件;与巴麦尊、罗素的函件,博迪安图书馆。

英国外交部档案:公共档案保存处;特别是:

《外交部档案第17辑》——对驻华英使的指示与驻华英使的报告,以1857—1860年为主。

《外交部档案第65辑》——对驻俄英使的指示与驻俄英使的报告,1857—1860年。

《外交部档案,第27辑》——对驻巴黎的英国大使的指示与英国大使的报告,1857—1860年。

法国外交使节档案:法国外交部街

《中国辑》第20—32卷;《俄国辑》1857—1860年第214—21卷。

法国国家档案:《瓦列夫斯基伯爵私人信件的副本》,抄件类,ABXIX 号集3102。

第三代马姆斯伯里勋爵的文件,承现在的马姆斯伯里子爵慨允使用。

《罗素文书》:1859年7月—1860年12月:约翰·罗素勋爵与英国驻华及驻俄使节的来往函件,与巴麦尊、克拉伦敦的来往函件,英国公共档案保存处。

《列卫廉的个人日记》(2卷):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

美国国务院的档案:

《M辑第92——美国驻华使节的报告》

287

《M辑第35——美国驻俄使节的报告》

《M辑第77——给驻华、驻俄使节的指示》

《M辑第31——1834—70给驻美俄使的备忘录》

二、已刊印的

官方刊印的

288

英国议会文件:

《1859年,第33号,关于额尔金勋爵1857—1859年赴华的函件》《1860年第68与69号有关中国事件的信函》。

《1860年第69号(2587,2606,2641,2677):与英皇特命全权赴华使臣卜鲁斯的来往函件,及其后致卜鲁斯的函件》。

《清季外交史料》,北京,1932年。

《筹办夷务始末》,民国时期,北京匣装本;1963年台北影印本

《咸丰条约》,北京,民国时期本。

《约翰·克兰普顿爵士致英国外交国务大臣的报告》,1860年11月18日。

《红档》杂志,第21卷

《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北京,1916年。

《黄皮书》,巴黎1863年。

《侍从将军伊格纳提耶夫于1861年1月致外交部亚洲司关于他出使中国期间的外交关系的总结报告》,圣彼得堡,1895年。

《俄中关系,官方正式文件(1689—1916)》莫斯科,1958年。

289 《俄中条约汇编(1689—1881)》圣彼得堡,1889年。

《大清历朝实录》,东京,1937—1938年。

《东华录》

美国参议院行政文件;《第10号》,30卷(36届1次会议)。

回忆录、通信等

290

奥尔古德, C.: 《1860年中英的战争》,伦敦:1901。

巴布科夫将军:《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

巴尔苏科夫, I. P.: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材料》,二卷集,莫斯科,1891。

柯林斯, P. M.: 《下驶阿穆尔河旅行记》,纽约,1860。

克灵顿和诺克斯:《1860年的对华战争》纽约,1875。

不著撰人：(N. P. 伊格纳提耶夫)：《有关伊格纳提耶夫出使中国的材料》，莫斯科，1892。

克鲁扎诺夫斯基编：《卡发罗夫(大主教巴拉第)致穆拉维约夫的信件》，见《俄国档案》。卷2，卷3，1914。

《卡发罗夫1858年的日记》，伊凡诺夫编，圣彼得堡，1912。

《卡发罗夫旅行札记》，圣彼得堡，1912。

柯瓦列夫斯基：《中国旅行记》，圣彼得堡，1853。

克鲁逊什特恩，A. J. A.：《环球旅行记》，伦敦，1813。

洛赫，A. B.：《额尔金勋爵第二次使华期间的自述》，伦敦，1869。

莫格斯侯爵：《1857—1858年出使中国回忆录》，巴黎，1860。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人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圣彼得堡，1897。

俄里范，L.：《1857—1859年额尔金勋爵出使中国和日本》，伦敦，1859。

奥斯登·萨根男爵：《驻华公使普提雅廷伯爵回忆录》，见《圣彼得堡报》1876年94号。

291

八里桥伯爵，G. G. M, A. A. (孟斗班将军)：《1860年的对华远征——孟斗班将军的回忆录》，巴黎，1932年。

巴律·巴里埃，利奥波德：《1860年远征中国记》，巴黎，1863。

列卫廉，W. B.：《中国问题》，见《北美评论》1860年90号。

司徒卢威：《西伯利亚回忆录(1848—1854)》，圣彼得堡，1889。

丁科夫斯基：《1828—1829年经过蒙古到达中国的游记》，圣彼得堡，1824年。

特列斯金：《1810年2月19日至3月13日伊尔库茨克省长特列斯金与中国边界官员蕴端多尔济等友好会见记》，见莫斯科大学的皇家学会史和古代俄罗斯，读本，第1册，莫斯科，1860。

瓦兰，保罗：《远征中国》，巴黎，1862。

瓦西列夫：《北京回忆录》，圣彼得堡，1861年。

华尔伦，T(编辑)：《额尔金勋爵的文件和信函》，伦敦，1872。

卫三畏：《1858和1859纪事》，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华北分会会刊第XLII卷，1911。

温格罗符，库克：《1857—1858年的中国》，伦敦，1858。

尹耕云：《心白日斋集》。

扎博林斯基：《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古代俄罗斯》，1883年6月。

- 《百科全书》(俄文)波罗克豪斯及埃弗朗编,出版年月不详。
 翟理斯:《汉英辞典》
 恒慕义(编辑):《清代中国名人录》,两卷,华盛顿,1943—1944。
 马修斯:《汉英字典》修订本,哈佛,1952。
 《俄国人名辞典》:圣彼得堡,1910。
 苏联科学院:《俄中关系》,莫斯科,1958。
 斯卡奇科夫:《中国书目》,莫斯科,1932及1860年新版。
 袁同礼:《中俄西北条约》,香港,1963。
 薛仲三:《两千年之中西历表》,北京,1956。
 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北京,1936。
 傅乐淑:《1644—1820年,中西关系文献汇编》,(英文)亚利桑那,1967。

- 《历史研究》,北京。
 《远东问题》(即以后的亚非人民),莫斯科。
 《苏维埃中国学》,1958年(停刊)。
 《历史问题》

有关此一时期的专著及文章

- 坂野正高:《中国和西方》,麻省坎布里奇,1964。
 邦纳-史密斯与卢姆拜:《第二次对华战争》,伦敦,1954。
 陈芳芝:《中国边界外交》,见《燕京学报》,卷五,第50号,1950年7月1日。
 柯尔迪埃,H:《1857—1858年对中国的远征》,1905年。
 《1840年对中国的远征》,1906年。
 胡世泽:《近代中俄关系的条约基础》,博士论文,巴黎,1918。
 294 卡巴诺夫,P.L:《阿穆尔问题》,布拉戈维申斯克,1959。
 《黑龙江问题及其解决》,卷一,二卷,博士论文,莫斯科,1947。
 林同济:《中俄黑龙江边界问题》,见《太平洋历史评论》,1934年卷三。
 曼考尔·马克:《伊格纳提耶夫少将赴北京的使命》,哈佛大学,关于中国的文献,卷十(1956)。

孟思明:《北京俄罗斯馆》,见《哈佛亚细亚研究期刊》卷23(1961)。

舒马贺尔:《俄国获得黑龙江的历史(1848—1860年与中国的关系)》,见《俄国档案》第11号,第三册(1878)。

《俄国同中国的关系,(1567—1805)》。

《俄国档案》第6号(1879)。

沙利文:《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博士论文,麻省坎布里奇,1955。

斯威舍(厄尔):《中国办理美夷事务的经过》,纽黑文,康涅狄格,1953。

蒋廷黻:《1860年的中、英、俄》,见《坎布里奇历史评论》,卷3(1929)。

维谢洛夫斯基:《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圣彼得堡1905。

查尔斯·鲁:《亚历山大二世,哥尔恰科夫,和拿破仑三世》,巴黎1913。

其他补充著作

295

贝利,T.:《美国面对俄国——从早期到现在的俄美关系》,伊萨卡,1950。

班蒂什-卡拉姆津:《俄国史》,卷IX。

巴尔苏科夫,L.P.:《波果丁生平》,莫斯科,1890。

巴尔托尔特,V.:《西方研究东方的历史》,圣彼得堡1911。

《关于东方语系的历史资料》,圣彼得堡1909。

贝尔,H.C.F.:《巴麦尊》,二卷集,伦敦,1936。

布克斯吉夫登,A.:《俄国——中国》,(即1860年北京条约——译注)卷1,旅顺,1902。

卡迪,J.F.:《法帝国主义在远东的报告》,纽约,1954。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昆明,1947。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海,1931。

陈博文:《中俄外交史》,上册,1931。

《中俄关系史》,华盛顿1957。

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上海,1931。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交史》第一号,卷8,1932。

克莱德,P.H.(编辑):《美国对华政策——外交和公众文件,1839—1939》,达勒姆,北卡罗来那,1940。

柯尔迪埃,H.:《中国和西方列强关系史》,二卷集,巴黎1901—1902。

《巴拉第计告》,见《远东评论》,1882。

科斯廷,W.C.:《大不列颠与中国》,牛津,1937。

- 科温, C. D. 编辑:《中国与日本的经济的发展》, 伦敦, 1964。
- 丹尼特, T.:《美国人在远东》, 纽约, 1941。
- 费正清:《对清代行政管理的三项研究》, 麻省坎布里奇, 1960。
- 《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 麻省坎布里奇, 1953。
- 费正清与邓嗣禹:《中国对西方的反应》, 麻省坎布里奇, 1954。
-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 北京, 1953。
- 顾迟, C. P. 与田伯烈, H.:《英国对外政策的历史》, 两卷。
- 戈登, A. H.:《阿伯丁子爵传》, 伦敦, 1893。
- 格雷戈里, J.:《英国政府与公众对待太平军叛乱的政策与态度》, 哲学博士论文, 伦敦, 1957。
-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阿穆尔州札记》, 圣彼得堡, 1894。
- 陈博文:《中俄外交史》
- 赫尔德, H.:《马姆斯伯里的对外政策, 1848—1849》, 哲学博士论文, 伦敦, 1954。
- 何汉文:《中国外交史》, 上海, 1936。
- 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 麻省坎布里奇, 1959。
- 肖一山:《清代通史》, 四卷集, 北京, 1927—1928。
- 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 1858—1860 年的外交状况》, 麻省坎布里奇, 1960。
- 297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北京, 1953, 英文版, 1955。
- 黄大受:《中国近代现代史》, 台北, 1961。
- 《中国近代史》, 台北, 1953。
- 基恩, D.:《日本人发现了欧洲》, 伦敦, 1952。
- 哈尔芬, N. A.:《1857—1860 年俄国在中亚的政策》, 莫斯科, 1960。
- 金莱克:《克里米亚的侵略》, 伦敦, 1863—1887。
- 克拉普罗斯, J.:《论文集》, 见《旅行新年鉴》, 卷 28。
- 柯尔沙克, A.:《中俄贸易关系历史统计概要》, 喀山 1857。
- 郭廷以:《近代中国外交史料》, 台湾, 1958。
- 库尔茨:《16, 17, 18 世纪的俄中关系》, 哈尔科夫^①, 1929。
- 拉塞森, M. M.:《1784—1917 美国对俄国的冲击》, 纽约, 1950。
- 伦森, G. A.:《1852—1855 年俄国人到日本的远征》, 盖恩斯维尔, 1955。

① 哈尔科夫应为基辅。——译者

- 《俄国向日本的推进》，普林斯顿，1959。
- 李定一：《中国近代史论集》，台北，1956。
- 李鼎声：《中国近代史》，上海，1939。
-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四册，上海，1923。
-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诸问题》，北京，1965。
- 刘彦：《中国外交史》，台湾，1962。
- 马克斯威尔，H.B.：《第四代克拉伦登子爵乔治的生平和书信》二卷，伦敦，1913。
- 莫里逊，J.L.：《第八代额尔金子爵传》，伦敦 1928。
- 马士(Morse H.B)：《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伦敦 1910—1918。
- 慕斯，W.E.：《克里米亚的制度》，伦敦，1963。
- 纳诺奇尼次基，A.C.：《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1860—1895)》，莫斯科，1956。
- 诺维科夫，伊凡：《阿穆尔边区》，圣彼得堡 1865。
- 拉文斯坦，E.G.：《俄国人在黑龙江》，伦敦，1861。
- 拉塞尔：《与俄国的一场伟大的战争》，伦敦，1895。
- 《战争》，伦敦，1856。
- 萨文，V.P.：《沙俄、苏联与中国的相互关系》，莫斯科，1930。 298
- 斯卡奇科夫，P.E.：《驻北京的东正教医生》，见《苏维埃中国学》，1958，第4号。
- 斯拉德科夫斯基，M.I.：《苏中经济关系概要》，莫斯科 1957。
- 索科洛夫，Yu.A.：《俄国驻塔什干首任大使》，见《历史问题》1959，第三号。
- 斯坦慕尔，A.A.G.：《西德尼·赫伯特传》，即《赫伯特·李勋爵传》，两卷，伦敦，1906。
- 唐盛镐：《俄国在满洲和外蒙古的政策，1911—1917》，达汉姆，北卡罗莱那，1959。
- 泰勒，A.J.P.：《争霸欧洲的斗争，1848—1914》，牛津，1954。
- 托马斯，B.P.：《1815—1867 的俄美关系》，巴尔的摩，1930。
- 特鲁塞维奇，KH.：《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莫斯科，1882。
- 曾友豪：《中国外交史》，北京，1926。
- 昂特伯杰，P.F.：《滨海省(1856—1898)》圣彼得堡，1900。
- 瓦西列夫，V.P.：《俄中条约》，圣彼得堡，1860。

伍德沃德, L. (编辑): 《改革的时代》, 见《牛津英国历史》, 卷 13。

吴相湘: 《近代史事论集》二卷集, 台北, 1964。

《俄帝侵略中国史》, 台北, 1957。

茨科夫, E. M. (编辑): 《远东国际关系史(1840—1949)》莫斯科, 1956。

唐德刚: 《美国对华政策》, 耶鲁, 1963。

人地名对照表

Ablai Khan, Sultan 阿布拉汗, 苏丹
Adkins, Thomas 艾德金, 托马斯
A-er-kuang-shih-le-k'e, River 阿尔管
什勒喀河
Agte, Major 阿赫杰, 陆军中校
Aigun (Heilungchiang) 瑗琿(黑龙江)
Ai-shen-tai 爱绅泰
Albazinians 阿尔巴津人
Alcock, R. 阿礼国
Alechinsk'a Manchuria 阿勒楚喀, 满
洲
Aleksandrovska, Maritime Province
滨海省亚历山德罗夫斯克
Alma Ata (Verny), Semirech'e 阿拉
木图(维尔内)谢米列钦耶
Amazar, River 阿玛扎尔河
Amur (Heilung), Saghalien Amur,
River 阿穆尔河(黑龙江)萨哈连河
Amur-Ussuri frontier 阿穆尔-乌苏里
边界
An-chi-yen tribe 安集延部族
Argun, river 额尔古纳河
Austen, Mr. 奥斯坦
Avvakum, Archimandrite 阿瓦库姆,
大司祭(安文公)

Babkov, General I.F. 巴布科夫将军
Baddeley 巴德利
Baikal, Lake 贝加尔湖
Balkhash, Lake 巴尔喀什湖
Balliuze, Captain 巴留捷克上尉
Bambuev 本布夫

Banno, Matasaka 坂野正高
Bantysh-Kamenskii 班蒂什-卡姆斯基
Bantysh-Karamzin 班蒂什-卡拉姆津
Barsukov I.P. 巴尔苏科夫, I. P.
Barthold, V. 巴尔托尔德, V.
Bell, H.C.F. 贝尔, H.C.F.
Bely Mesiats festival 贝利, 弥塞亚撒
节(俄语对蒙古元旦节的名称)
Beniamin, Father 魏若明神甫
Bezborodko, A.A. 别兹鲍罗德科, A.
A.
Bichurin, N. Ia. (Father Iakinf) 俾
丘林(亚金甫神甫)N. Ia.
Blagoveshchensk (Hailanpao, Ust'-
Zenisk), Amur Province 阿穆尔省
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 又名精斯克)
Bonham, S.G. 文翰 S.G.
Bonner-Smith, D. and Lumby, E.W.R.
邦纳-史密斯, D. 和卢姆拜 E.W.R.
Bowlby, Thomas William 鲍尔比, 托
马斯, 威廉姆
Bowring, Sir John 包令, 约翰爵士
Bradley, Dr. 布雷医生
Bretschneider 布雷特斯奇奈德
Bruce, F.W.A. 卜鲁斯, F.W.A.
Brunnow, Baron 布隆诺夫男爵
Budogorskii, Lieut-Colonel 布多戈斯
基, 陆军中校
Bukhara 布哈拉
Bukhtarma, River 布赫塔尔马河
Buksgveden, A. 布克斯盖夫登, A.
Bunge, Professor 朋治教授
Buria, River 布列亚河

Buryat tribe 布列亚特部族

Cady, J.F. 卡迪, J.F.

Cahen, M. 加恩, M

Canning, Lord 坎宁勋爵

Cass, Lewis B. 卡斯, 刘易士, B.

Ch'a-la-feng-t'ai, General 扎拉芬泰
将军

Ch'angchiak'ou (Kalgan), Chihli Pro-
vince 直隶省张家口(卡尔干)

Chang-chia-wang 张家湾

Ch'ang Tien-yuan 张殿元

Chapdelaine, Father 马正农神甫

Chartoryshskii, Prince 查尔托罗斯基
亲王

Cha-sa-k'e (Kazakhs) 扎萨克(哈萨克)

Chase, H.G. 蔡斯, H.G.

Chateaurenard 查特伦那德

Chebotarev 切博塔里夫

Chefoo, Shantung Province 山东省芝
罘(烟台)

Chelney, Major 绰罗尼少校

Ch'en, Agnes Fang-chih 陈芳芝

Ch'en Fu-kuang 陈复光

Ch'eng-ch'i 成琦

Cheng Tien-fong 程天放

Cheng, Tuan-hua Prince 郑亲王端华

Ch'en K'e-ming, Major 游击陈克明

Ch'en Po-wen 陈博文

Chia Ch'ing Emperor (1796-1820) 嘉
庆帝 (1796-1820)

Ch'ia-ha-la tribe 哈巴拉族

Ch'ia-k'et'u (Kiakhta), Tran-Bai-kha-
lia Province 外贝加尔省恰克图

Chiang Ting-fu 蒋廷黻

Ch'i-ch'i (Kizi), Maritime Province
滨海省奇吉

Chichulin, Lieut-Colonel 奇丘林, 陆
军中校

Ch'ien Hsin-ho 钱忻和

Ch'ien Lung Emperor 乾隆帝

Chi-la-ming-a 吉拉明阿

Ch'le-er tribe 奇勒尔族

Chin-ch'ang, General 晋昌将军

Ch'ingchili area 精奇里地区

Ching-shun, General 景淳将军

Ch'ing-ying 庆英

Ch'ing-yün, General 庆昫将军

Ch'i-Sang-nao-er (Tsaisan), Lake 斋
桑淖尔(斋桑湖)

Ch'iu Hsieng-chien 裘行简

Ch'i-ying 著英

Chreptowich 奇赖普托维奇

Chuguchak (Tarbagatai), Jungaria 丘
古察克(塔尔巴哈台)

Ch'ung-lun 崇纶

Chusan Island 舟山岛

Circassia, Russia 俄国切尔克西亚

Clarendon, 4th Earl of 克拉伦登伯
爵, 第四代

Collins, P.M. 柯林斯, P.M.

Collins, W.W. 柯林斯, W.W.

Constantine, Grand Duke 康斯坦丁,
大公(海军大将)

Cordier, H. 科尔迪埃(法) H.

Cossacks 哥萨克人

Cowly, Lord 考莱勋爵

Crampton, Sir John 克兰普敦爵士

Cushing, George S. 顾盛, 乔治

Dadeshkiliani, Prince 达德希克梁尼
亲王

D'Auvar, Colonel 奥夫莱, 德, 上校
de Bourboulon 布尔布隆, 德

De Castries bay, Maritime Province
滨海省迭卡斯德湾

de Morny 莫尔尼, 德

Despot-Zenovich, Major 迭斯波特-

捷诺维奇, 少校
de Thouvenel 图温奈尔, 德

Elgin, 8th Earl of 额尔金勋爵, 第八代
Esche, Otto 埃斯奇·奥托

Fairbank, J.K. and Ssu-yu Teng 费正清与邓嗣禹
Fane, Hon. Julian 费恩·朱利安
Fei-ling-a, Captain 斐凌阿, 骁骑校
Fei-ya-ha tribe 费雅哈部族
Forbes, Mr., 福士
Fuchs, Professor 富克斯教授
Fu-hsiang, Major 富祥佐领
Fu-hsin, Major 富新佐领
Fu-k'un, Deputy Colonel 富坤, 佐领
Fu-le-hunf-a 富勒洪阿
Fu Lo-shu 傅乐淑
Fu-ni-yang-a, Brigade Commander (Colonel) 富呢杨阿协领

Gasford, G.K.H. 加斯弗尔德, G.K.H.
Gavrillov 加夫里诺夫
Gibson, Thomas Milner 吉布森, 托马斯·米尔纳
Gill, Mr. 吉尔
Gilliak Committee (1850) 吉利亚克委员会
Gilliak Tribe 吉利亚克族
Gladstone, W.E. 格拉德斯通 W.E.
Gobi desert 戈壁沙漠
Golovkin, Count Yu, A. 戈洛夫金伯爵
Gorbitsa, River 格尔必齐河
Gorchakov, Prince General 哥尔恰科夫, A.M. 亲王

Gorden, A.H. 戈登, A.H.
Graf N.N. Murav'ev-Amurskii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
Grant, General Hope 贺布(格兰特·贺布)将军
Gregory, J. 格雷格里, J.
Gribovskii, Archimandrite 格里鲍夫斯基, 大司祭
Gros, Bron 葛罗男爵
Grum-Grzhimailo, G.E.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 G.E.
Gulishambarov 古里沙巴罗夫
Gurii, Archimandrite 古里, 大司祭
Gurkhas 廓尔喀

Ha-la-t'a-le 哈拉塔拉
Han-ch'i 罕奇
Hanka, Lake 兴凯湖
Han-pa-er 罕巴尔
Han Po-wen 汉博文
Hao-han (Kokand) 浩罕
Hart, Robert 赫德, R.
Ha-sa-ke (Kazakhs) 哈萨克
Heard, Albert F. 赫尔德, 阿尔伯特, F.
He-che tribe 赫哲族
Hei, River 黑河
Heng-ch'i 恒祺
Heng-fu 恒福
Herat Afghanistan 阿富汗赫拉特
Ho Kuei-ch'ing 何桂清
Hoo Chi-tsai 胡世译
Ho Ping-ti 何炳棣
Ho-shen 和珅
Hou-wen 喉温
Hsieh Huan 薛焕
Hsiao I-shan 肖一山
Hsien Feng Emperor (1850-1861) I-ting 咸丰帝 (1850-1861) 奕詝 (谥字

该作住,作者误一译者)

Hsingan mountains 兴安岭

Hsiü, Immanuel C.Y. 徐中约

Huang Ta-shou 黄大受

Hua-sha-na 花沙纳

Hull, Capitain 赫尔船长

Hummel, A.W. 恒慕义, A.W.

Huo-ssu-ke region, Amur Province

阿穆尔省霍斯克地区

Hu-sun-pu 胡逊布

Hu-su-tung-a 瑚素通阿

I, Tsai-yuan, Prince 怡亲王载垣

Ignatiev, Major-General Count

Nikolai Pavlovich 伊格纳提耶夫,陆

军少将,尼古拉·帕夫洛维奇

I-ko, General 奕格将军

Ili, River 伊犁河

Imperatorskii Bay, Maritime Province

滨海省皇帝湾

Irkutsk Province 伊尔库茨克省

Irtysk, River 额尔齐斯河

I-shan, General 奕山将军

Jacoby 雅各比

Jeddo (Yeddo), Japan 江戸,日本

Jui-ch'ang 瑞常

Jungars 准噶尔人

Kabanov, P.I. 卡巴诺夫

Ka-er-ku-ma, Kirin Province 吉林省

卡尔库玛

Kafarov, N.N. (Archimandrite Pal-ladii) 卡发罗夫, N.N. (大司祭巴拉第)

Kalun 卡伦

Kamchatka, Maritime Province 滨海

省堪察加

Kamenskii, P.I. (Archmandrite Peter)

卡缅斯基, 大司祭彼得

K'ang Hsi Emperor 康熙皇帝

Karatal, river 卡拉塔尔河

Karpov, Commissioner 卡尔波夫, 俄国划界委员

Karsakov 卡尔萨科夫

Kashgar (kachikaer), Sinkiang 新疆

省喀什噶尔

Keene, D. 基恩, D

K'e-er-hsin, Mogolia 蒙古科尔沁

Khabarovsk, Maritime Province 滨海

省哈巴罗夫斯克

Khalfin N.A. 哈尔芬, N.A.

Khalka Mongols 喀尔喀蒙古人

Khiva, West Turkestan 希瓦, 西土耳其斯坦

Kiakhta (Ch'ia-k'et'tu), Trans-Baikal Province 外贝加尔省恰克图

Kisselev, General Count 基谢列夫伯爵将军

Kizi (Ch'-ch'i), Lake, Maritime Province 滨海省, 奇吉湖

Klaproth, J. 克拉普诺斯, J.

Kleczkowski, M. 哥士著, M.

Kokand (Hao-Han) 浩罕人(被称为安集延人)

Konstantinovsk, Maritime Province 滨海省康斯坦丁诺夫斯克

Korsk, A. 柯尔沙克

Kovalevskii, E.P. 科瓦列夫斯基, E.P.

Kruzenstern, A.J. 克鲁逊什特恩, A.J.

Kuei-liang 桂良

K'ulun (Kulun, Urga), Mongolia 蒙古库伦(乌尔夏)

Kuo-jui, General, 国瑞将军

Kuo T'ing-i 郭廷以

K'uo-t'un-t'un(Mariinsk), Maritime Province 滨海省阔吞屯(马林斯克)

Kurts, B. 克尔茨, B.
Kyushu Island, Japan 日本九州岛

Ladyzhenskii, Colonel 拉狄仁斯基上校

Lavrov 拉夫罗夫

Lay, H.N. (Li T'ai-Kuo) 李泰国

Lazarev, M.P. 拉扎列夫, M.P.

Legashev 列加希夫

Leidenburg, Captain 李顿北. 船长莱顿布尔格旧译名

Lensen, G.A. 伦森, G.A.

Leontiev 列昂节夫

Lesser Khingan range 小兴安岭

Lesser Pinling range 小斌岭

Laio, river 辽河

Li Hsing-yuan 李星沅

Li Hung-chang 李鸿章

Likhachev, Captain 利哈乔夫上尉

Lin-k'uei 麟魁

Li Ting-i 李定一

Li Ting-sheng 李鼎声

Liubimov 列比莫夫

Liu Ching-tsao 刘锦藻

Liu Yung-kuei 刘永桂

Lowther, William 劳瑟, 威廉

Lu-ch'ang, Colonel 禄昌协领

Lu Chien-ying 陆建瀛

Lu-ch'uan 禄全

Macao 澳门

Macartney, Lord 马戛尔尼勋爵

Mckinley, Mr. 麦金莱

Maimachen (ch'ia'et'u) 买卖城(即恰克图)

Maksimov 马克西莫夫

Maksimovich 马克西莫维奇

Malmesbury, 3rd Earl of 马姆斯伯里

伯爵第三代

Mancall, Mark 曼考尔, 马克

Markov 马尔科夫

Marshall, Humphrey 马沙利

Martin, W.A.P. 丁甦良

Martynov, Lieut-Colonel 马尔特诺夫
中校

Medem, Count 梅迪姆伯爵

Meng Ssu-ming 孟思明

Menshikov, A.S. 孟什科夫 A. S.

Ming Ch'ang (Tatarinov) 明常(塔塔里诺夫)

Ming I, Assistant Commissioner 明
谊, 参赞大臣

Min-ning, Emperor (1820-1850) 旻宁
(道光皇帝)

Middendorff 米登道尔夫

Mikita, Captain 密奇达俄国军官

Moerken 墨尔根

Mok'uosui 摩阔岁

Montebello 蒙特贝罗

Montauban, General 孟斗班将军

Mouly Father 摩尼神甫

Muraviev, Count N.N. 穆拉维约夫
伯爵将军

Na-er-hu-shan, Deputy Commander
那尔呼善, 副都统

Na-fu-te, Deputy Commander 那敷
德, 副都统

Nagasaki, Japan 日本长崎

Napier, Lord 内皮尔勋爵(英国驻美大使)

Narochnitskii, A.L. (cited) 纳洛奇尼
次基, A.L.

Nerchinsk, Trans Baikal Province 外
贝加尔省尼布楚(尼津斯克)

Nesslrode Count Karl Robert 涅谢
尔罗捷伯爵, 卡尔·罗伯特

Nevel'skoi, G.I. 涅维尔斯科伊, G.I.
Nicholson, Captain 尼科尔森, 船长
Nikolaevsk, Maritime Province 尼古
拉耶夫斯克
Niman, River 尼满江
Ninguta, Manchuria 满洲宁古塔
No-men-te-leh-ho-er 诺门德勒尔
Nung, River 嫩江

Ob, river 鄂毕河
O-erh-ch'ing-a, Major 鄂尔精阿, 佐领
Okhotsk, sea of 鄂霍次克海
Oliphant, L. 俄里范
O-lun-chu'n tribe 鄂伦春族
Orenburg, Russia 俄国奥伦堡
Osten Sacken, Baron Fridrich von 奥
斯登, 萨根男爵, 弗利德利希·冯

Pai-kuei, Governor 柏贵, 巡抚
Palmerston, Lord 巴麦尊勋爵
Pao-chün 宝掇
Pa-P'u-puo-la-p'u, colonel 巴朴保拉
朴
Parker, Peter 伯驾
Parkes, H.S. 巴夏礼
Pa Yen-pu Lieut-Colonel 巴彦布, 协
领

Pechurov, P. 毕休罗夫
P'eng Yün-chang 彭蕴章
Perovskii, Piotr 彼罗夫斯基(丕业罗幅
斯基)
Petropavlovsk, Kamchatka 勘察加彼
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Pickens, Francis Wilkinson 皮肯斯,
弗朗西斯·威尔金森
Pien Pao-shu 卞宝书
Policarp, Archimandrite 波利卡尔普
大司祭

Poliwaitzu 波力外溜
Popov 波波夫
Possiet Bay, Maritime Province 滨海
省波谢特湾
Possiet, Captain 波谢特船长
Prince Consort (Prince Albert) 驸马
亲王(英国女王的丈夫艾伯特亲王)
Prussia 普鲁士
Pruth, river 普鲁特河
Purdy, John 珀迪, 约翰
Pu-t'e tribe 布特族
Put'ehu 布特哈
Putiatin, Count Yevfimiy Vassilievich
普提雅廷伯爵, 叶夫费梅·瓦西利耶维
奇
Puzino, Major 普集诺少校

Ravenstein, E.G. 拉文斯坦, E.G.
Reed, William B. 列卫廉(威廉姆, B.
列德)
Rehbinder, Governor 列宾捷尔市长
Robertson, Vice-consul 罗伯孙副领事
Romanov 罗曼诺夫
Rossokhin 罗索兴
Rumiantsev, Count 鲁缅采夫伯爵
Russell, Lord John 罗素(约翰)勋爵
Russian Senate 俄国萨那特衙门

Saint Pré, Count 圣伯利伯爵
Sai-shang-a 赛尚阿
Sanhsing, Kirin Province 吉林省三姓
Savvin, V.P. 萨文, V.P.
Sa-ying-a, General 萨迎阿将军
Schumacher, P.V. 舒马贺尔, P.V.
Sebes, Father 塞比斯神甫
Seng-ko-lin-chin General Prince 僧格
林沁亲王将军
Seymour, Admiral Sir Michael 西马

靡各厘爵士,海军上将

Seymour, Thomas. 西摩,托马斯

Shabin-Darbaga (Shao-pin-ta-pa-ha),

Mount 沙宾达巴哈岭

Shangrim, I.P. 尚格林, I.P.

Sharmer, Admiral 沙默,海军上将

Sheng-pao, Commissioner 胜保,钦差大臣

Shilka, River 石勒喀河

Shishmarev 希什马廖夫

Shu-lin 舒林

Sidney Herbert, Lord Herbert 西德尼-赫伯特,赫伯特勋爵

Sikhote'-Alin Mountains 锡霍特阿岭山脉

Sivillov, Daniel 什维尔洛夫,丹尼尔

Skachkov, P.E. 斯卡奇科夫, P.E.

Sladkovskii, M.I. 斯拉德科夫斯基, M.I.

Sokolov, Yu. A. 索科洛夫, Yu.A.

Sophisk, Maritime Province 滨海省
索非斯克

Special Amur Committee 特设阿穆尔委员会

Stanmore, A.H.G. 斯坦摩尔, A.H.G.

Stanovio mountains 斯塔诺夫山脉

Stoeckl, Baron de 斯托克利男爵,德

Strelka, Yeniseisk Province, Siberia

西伯利亚叶尼塞斯克省石勒喀

Struve, V. 司徒卢威, V.

Sophisk, Maritime Province 滨海省
索非斯克

Su-chang-a 苏彰阿

Su-shun 肃顺

Suifen, River 绥芬河

Sungari (Lower Amur) River 松花江
(阿穆尔河下游)

Sullivan, J.L. 苏利文, J.L.

Sung-a ch'a River 松阿察河

Swisher, E. 斯威舍, E.

Ta-Hei River 大黑河

Ta-hung-a, General 达洪阿将军

Tai-Fei-in-a, Colonel 台斐音阿协领

Taku, Chili Province 直隶省大沽

Tang P.S.H. 唐盛镐

Ta-nien 达年

Tan Ting-hsiang 谭廷襄

Tatarinov 塔塔里诺夫

Te-Kung Tong 唐德刚

Te-le-k'e-tuo-er-chi, Prince 特勒克多
尔济亲王

T'e-mu-er-t'u-nao-er, River 特穆尔图
淖尔河

Te-pu-chin 特普钦

Tikhvinskii, S.L. 特克文斯基, S.L.

Timkovskii, E.F. 季姆科夫斯基, E.F.

Tiumen, River 图们江

Tiumenshan 图们山

Tolstoi, Count 托尔斯泰伯爵

To'msk Province, Siberia 西伯利亚
托木斯克省

Treshkin 特列斯金

Trevelyan G.M. 崔威扬 G.M.

Trusevish, K.H. 特鲁塞维奇, K.H.

Tsaisan (Chi-sang-nao-er) Lake 斋桑
湖(斋桑淖尔)

Tseng Yu-hao 曾友豪

Tso Shun-sheng 左舜生

Tugarinov, Policarp 图加利诺夫,波里
卡尔普

T'ulemi River 图勒密河

Tungus tribes 通古斯族

Ude, River 乌第河

U-le-chi 乌勒吉

U-le-hung-a 乌勒洪额

Uliassut'ai 乌里雅苏台

Ulusumotan, Manchuria 满洲乌鲁苏
牡丹

Uriankhai area, Mongolia 蒙古乌梁
海地区

Uriankhai-Dvoedants area, Mongolia
and Sinkiang 蒙古与新疆唐努乌梁
海地区

Uruppa Island 乌鲁普岛

Ussuri area 乌苏里地区

Ust'-Strel'ka, Amur Province 阿穆
尔省乌斯特-斯特烈耳卡

Ust'-Zeisk (now Blagoveshchensk),
Amur Province 阿穆尔省乌斯特-结
雅(现在的布拉戈维申斯克)

Vaganov, Lieutenant V.V. 瓦加诺夫
中尉

Valikhanov, Ensign Ch. Ch. 瓦利哈
诺夫弁目

Vancouver Island 温哥华岛

Varfolomeev 瓦佛罗米福

Visiliev, Gurii 华西列夫, 古里

Vasiliev, V.P. 华西列夫, 符·普·

Vaskin 瓦斯金

Vatovskii, Captain 瓦托夫斯基, 上尉
Verkhneudinsk, Transbaikai Province.
外贝加尔省上乌丁斯克

Veselovskii, N.I. 维谢洛夫斯基, N.I.

Vladislavich, Savva 务拉的思拉维赤,
萨瓦

Voitshekhovskii, Dr. 沃伊特谢夫斯基

Wade, T.F. 威妥玛

Wa-k'e-chin, Colonel 倭克锦, 佐领

Walewski Comte Alexandre 瓦列夫
斯基伯爵

Walrond, T. 华而伦, T.

Wang Ch'ing (Wen-Ch'ing) 万青藜

(文庆)

Ward, General John Elliott 华若翰.
J.E. 将军

Wen chien 文谦

Weng T'ung-shu, Governor 翁同书
巡抚

Wen-hsiang 文祥

Williams, S. Wells 卫三畏

Wodehouse, Lord 沃德豪斯勋爵

Wok'eng'ou 窝坑口

Wolff 沃尔夫

Wu Cho, Censor 吴焯御史

Wu-erh-kun-tai 乌尔棍泰

Wu Hsiang-hsiang 吴相湘

Wu Hsiung-kuang 吴熊光

Yakoleva, P.T. 雅可夫列娃, P.T.

Yakutia 雅库西亚

Yalpukhu, River 雅尔布克胡河

Yalpuzsheliu, River 雅尔布泽留河

Yarkand, Sinkiang 新疆叶尔羌

Yazykov 亚兹科夫

Yeddo (Jeddo) Japan. 江戸, 日本

Yeh Ming-ch'en, Viceroy 叶名琛,
总督

Yen-feng 延丰

Yenisei, River 叶尼塞河

Yeniseisk Province, Siberia 西伯利亚
叶尼塞斯克省

Yen-lin 延龄

Yilhanhata, Maritime Province 滨海
省伊兰哈达

Ying-e mountains, Manchuria 满洲
英额岭

Ying-hsiu, Governor 英秀, 巡抚

Ying-lung, General 英隆将军

Yin Keng-Yun, Censor 尹耕云, 御史

Yin-wu, Deputy Commander 印务,
代理副都统

Yu-ch'eng, Grand Secretary 裕诚, 大

学士

Yung-ch'ien, Major 永谦, 佐领

Yung-insiang, Major 永祥, 佐领

Yun-tuan-tuo-er-chi, Governor 蕴端多

尔济总督

Yunus Khodje 玉努斯和卓

Yu Yuan-an 余元盒

Zaborinskii, Colonel 扎波伦斯基上
校

Zakharov, Ivan 扎哈罗夫, 伊凡

Zakrevskii, Count 扎克列夫斯基伯爵

Zei, River 精河(精奇里江)

Zenkovsky 岑科夫斯基

译 后 记

本书作者奎斯特德是英国人,曾任马来亚大学历史系讲师,现任香港大学教授。除本书外,还著有《1895—1917年俄国在华势力范围》(1975年)一书。

在西方出版的有关中俄关系史的大量著作中,以论述十九世纪中叶沙俄侵华为中心的专著,本书是比较详备的一种。

本书中引证的中文、俄文和英、美、法原始档案资料,比较丰富,有的还是首次发表,对研究沙俄侵华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作者掌握古汉语的能力较差,在引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及《清季外交史料》中所载的谕旨或与各国来往的咨文时,有理解错误的地方,也有少许漏译。译者在这些地方作了注释,供读者在必要时对照,为避免烦冗起见,就不一一引述原件了。

本书结论系陈泽宪先生所译,法文部分系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协助译出。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组对译文作了仔细校订,谨此说明并致谢忱。

陈 霞 飞

1979年11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一八五七——一八六〇年俄国在远东的扩张

作者= (英) R.K.I.奎斯特德著 陈霞飞译

页数=298

SS号=10479890

DX号=

出版日期=1979年12月第1版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绪言

绪言附记

第一章 1792年至1857年俄中关系的背景

第二章 1857年1月至1858 年7月：普提雅廷的使命与《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

第三章 1858年7月至1859年6月：彼罗夫斯基的使命，《天津条约》的互换，与《瑷珲条约》之被中国废除

第四章 1859年6月至1861年1月：伊格纳提耶夫的使命与《北京条约》

结论

书目

人地名对照表

译后记